真理报

第十四期

2026年5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刊编辑小组，ICOR（中国）成员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中国共产党人（马列毛）

毛 主 席 语 录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录



时事评述

★ 论山西矿难 1-16

★ 论湖南烟花厂事故 17-34

★ 纪念胖猫两周年 35-44

★ 从5月习特会看美中帝国主义交易与世界重新瓜分 45-61

★ SOVINTERN——机会主义的新招牌：对当代修正主义国际路线的批判 62-91

百家争鸣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8周年 92-105

★ 纪念文化大革命60周年 106-113

不周山下

★ 永存的原则，深刻的教训 ——永远不能忘却的对文革的纪念 114-118

★ 让我们加强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团结！ 119-121

历史文献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第一部分） 122-123

导师语录 124



论山西矿难

一、引言：这不是“意外事故”，而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

2026年5月22日晚，山西长治沁源县留神峪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瓦斯在地下爆炸，矿工在井下遇难，家属在地面等待，救援队伍进入矿井，官方随后成立事故调查组，新闻媒体开始滚动报道伤亡数字。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这一切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套熟悉的程序：事故、救援、通报、问责、整改、哀悼，然后等待下一次事故。

但是，马列毛主义者不能这样看问题。

我们不能把这场矿难看成单纯的“安全生产事故”，不能把它看成某些管理人员疏忽大意的结果，也不能把它看成矿井深处某种偶然的技术故障。瓦斯爆炸当然有它的直接技术原因，但技术原因背后还有社会原因；事故现场背后还有生产关系；遇难矿工的尸体背后，还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资产阶级舆论总是喜欢把矿难讲成“安全意识不足”“管理不到位”“制度落实不严”。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在批判，实际上是在掩盖。它把阶级压迫说成管理问题，把资本逐利说成操作失误，把工人的死亡说成偶然悲剧。这样一来，真正应该被审判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而被放过了。

留神峪煤矿事故最刺眼的地方，不仅是死亡人数的惨重，而且是事故背后暴露出来的一整套黑暗事实：入井人数与公示人数严重不符，大量工人没有真实纳入定位系统，井下生产状况被层层遮蔽，企业对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呈现的是一套表面秩序，而矿井深处运行的却是另一套真实秩序。地面上有一套制度，井下有一套生产；文件里有一套安全，现实中有一套剥削。

这就说明，问题绝不是“有没有制度”。在修正主义中国，安全制度、监管制度、责任制度从来不缺，缺的是工人阶级真正掌握这些制度的权力。只要矿工不能决定自己是否下井，不能拒绝危险作业，不能公开揭露违法生产，不能通过自己的组织直接监督矿山，那么所谓“安全生产”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官僚写在纸上的漂亮话。

煤矿不是孤立的生产单位，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缩影。在那里，矿工把自己的生命时间交给矿井，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机器和瓦斯，把自己的肺、骨头、血汗交给资本增殖。煤炭从地下被挖出来，变成商品，变成利润，变成老板的财富、地方的产值、官员的政绩；而矿工得到的，则是微薄工资、职业病、伤残风险，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不是为了人的生命而生产，而是为了价值增殖而生产。工人的生命只有在能够创造利润时才被承认；当他们成为事故中的死者和失联者时，他们又被转化为统计数字、赔偿对象和“惨痛教训”。资产阶级国家可以为他们默哀，可以开新闻发布会，可以处分几个责任人，但它绝不会主动承认：正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把这些矿工送进了死亡的井下。

因此，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单个矿山的问题，而是整个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它暴露的不是某个企业的“底线失守”，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没有底线。只要利润支配生产，只要官僚庇护资本，只要工人被剥夺组织权和监督权，矿难就不会真正结束。它只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矿井、换一批工人，继续发生。

对遇难矿工最起码的尊重，不是把他们安放在空洞的悼词里，而是追问：是谁让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下井？是谁隐瞒了真实的入井人数？是谁制造了地面制度与井下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是谁从这种危险生产中获利？又是谁在一次次矿难之后继续维护这种吃人的秩序？

马列毛主义的批判，必须从这里开始：矿难不是自然灾害，而是阶级压迫的爆炸形式。井下爆炸的是瓦斯，地上爆炸的则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长期积累的阶级矛盾。留神峪的矿工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苦难处境的集中体现。他们的死亡控诉着一个事实：没有工人权力，就没有工人安全；没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生命保障。

二、事故的基本性质：以工人生命换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矿难

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首先是一场矿难；但从阶级本质上说，它更是一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造出来的屠杀。

瓦斯不会自己为了利润而聚集，矿井不会自己为了产量而超负荷运转，图纸不会自己变成两套，监控不会自己变成两套，入井人数也不会自己从公示牌上的数字变成真实井下的另一批人。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都站着一个共同的东西：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以及围绕这种追逐形成的官僚保护网。

在资产阶级看来，煤矿的目的不是保障矿工的生命，而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尽可能低成本地把煤挖出来。安全设备要花钱，停产检查要损失利润，减少下井人数要影响产量，真实登记工人要增加责任，暴露隐蔽工作面要承担法律后果。于是，在资本的算盘里，工人的安全就被一笔一笔扣除，最后被压缩成一种可以冒险、可以牺牲、可以事后赔偿的成本。

这就是资本主义矿难的根本逻辑。

留神峪事故中最说明问题的，并不仅仅是瓦斯爆炸本身，而是大量工人没有被真实纳入管理系统。所谓“未持卡人员”，表面上是安全定位制度没有落实，实质上是矿工被资本变成了隐形劳动力。他们在井下劳动，创造价值，支撑产量，但在地面的制度表格里，他们却可能没有完整的位置。资本需要他们的劳动，却不愿承担对他们生命的责任；资本需要他们下井，却不愿让他们作为真实存在的人被看见。

这不是一般的“管理混乱”，而是有组织的剥削秩序。

如果企业只是“不懂安全”，它不会制造两套图纸；如果企业只是“疏忽大意”，它不会让实际入井情况和公开信息严重不符；如果企业只是“制度落实不到位”，它不会长期形成一套能逃避监管的地下生产方式。这里的问题不是无知，而是有意；不是偶然，而是制度性；不是一个矿长一时胆大，而是资本在利润驱使下必然走向的方向。

资本主义从来不会真正尊重工人的生命。它只是在工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承认工人的存在，在工人死去的时候把他们改写为事故数字，在舆论需要安抚的时候把他们称作“遇难人员”。可是，在生产过程中，矿工不是被当作社会主人，而是被当作可以替换、可以消耗、可以压到井下去换取利润的劳动力。

煤矿的黑暗，不只在地下，更在生产关系之中。

井下瓦斯的积累，是自然条件和生产活动的结果；但让矿工在这种条件下继续劳动，让危险被掩盖，让真实人数被遮蔽，让安全制度变成纸面装饰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资本为了利润压缩安全，企业为了产量隐瞒风险，官僚为了政绩和稳定维持表面秩序，最后由矿工用生命支付总账。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本质：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是积累起来的财富反过来统治创造财富的人。在煤矿里，这种关系表现得尤其血腥。机器、巷道、煤层、瓦斯、监控系统、定位卡、图纸，看似都是技术对象，但它们一旦被资本掌握，就会成为支配工人的工具。安全制度本来应该保护矿工，但在资本统治下，它可以被伪造、被绕开、被表演化；矿工本来是生产的主体，却在现实中被排除在决策、监督和管理之外。

资产阶级总喜欢说“企业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这句话表面正确，实际上荒唐。因为企业本身就是利润主体，让利润主体自觉限制利润，等于让狼看守羊群。资本家当然可以在会议上讲安全，可以在墙上贴标语，可以在事故后痛哭流涕，但只要生产目的仍然是利润，只要矿工仍然没有权力，只要监管仍然服务于整个资本积累秩序，所谓“第一责任人”就不过是事故发生后用来切割责任的空话。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有权决定矿工如何下井，而矿工没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安全？为什么企业可以安排生产、安排班次、安排隐蔽工作面，而工人不能公开组织起来监督矿井？为什么事故发生前，工人只能服从命令；事故发生后，工人的尸体才被拿来证明“安全生产重要”？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阶级问题。

留神峪煤矿事故说明，在修正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工人阶级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他们被称作“人民”，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劳动条件；他们被称作“劳动者”，却不能决定生产是否安全；他们被称作“主人翁”，却在资本和官僚共同支配的矿井里成为最没有权力的人。

因此，这场事故的基本性质必须明确：它不是孤立的瓦斯爆炸，不是单纯的企业违法，不是偶然的安全漏洞，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工人生命换取利润的集中表现。它证明，只要资本支配劳动，只要生产服从利润，只要工人没有真正的组织权、监督权和斗争权，煤矿就会继续成为吞噬工人生命的黑洞。

矿工的死亡不是“代价”，而是控诉。

他们不是为所谓发展牺牲的数字，不是事故通报里的几行文字，也不是官僚问责程序中的背景材料。他们是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压进井下、被违法生产秩序推向死亡的工人阶级兄弟。对这场事故的批判，必须从他们的阶级地位出发，揭露资本如何把活人变成劳动力，把劳动力变成利润，把死亡变成可以处理的善后问题。

留神峪矿难的血，写出的不是“安全生产警示录”，而是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受牺牲的阶级判决书。

三、从马克思主义看：资本不是物，而是吃人的社会关系

要理解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就不能只看井下发生了什么，还必须看井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瓦斯、巷道、通风、图纸、定位卡，这些都是直接现象；但在这些现象背后，真正支配矿井运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不是单纯的物，不是机器、厂房、矿井、货币本身，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不是因为它天然具有某种神秘力量，而是因为它能够支配活劳动，能够把工人的劳动过程变成价值增殖过程，能够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迫使无产者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煤矿正是这种关系最赤裸的表现之一。

在留神峪煤矿中，井下的煤层不是孤立的自然资源，矿井设备不是中性的技术工具，安全系统也不是自动保护工人的神圣装置。它们都被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煤炭只有被开采出来、运出去、卖出去，才能转化为利润；矿工只有下井劳动，才能使死的生产资料活起来；而资本家只有不断压低成本、延长劳动、提高产量、逃避限制，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更多利润。

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生命安全从一开始就处在被压低的位置。

对于矿工来说，井下是劳动场所；对于资本来说，井下是利润来源。对于矿工来说，瓦斯爆炸意味着死亡；对于资本来说，瓦斯治理意味着成本。对于矿工来说，真实登记入井人数是生命保障；对于资本来说，隐瞒人数可能意味着逃避责任、逃避监管、扩大生产。双方看待同一个矿井，却处在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上。

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里总会反复出现一个荒唐现象：安全制度写得越来越多，安全口号喊得越来越响，事故通报越来越规范，可工人的死亡却一次又一次发生。因为问题不在于纸面制度是否存在，而在于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决定生产过程，谁承担危险，谁获得利润。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价值增殖。

矿工下井，不是因为社会首先关心矿工如何安全地劳动，而是因为资本需要煤炭，市场需要商品，企业需要利润，地方需要产值。在这个链条中，矿工的生命被放在最后。只有当矿工的劳动能够转化为利润时，他才被资本承认；而一旦他在事故中死亡，他又被转化为赔偿金额、伤亡数字、事故案例和宣传材料。

这就是资本对人的异化。

工人创造财富，但财富反过来统治工人；工人开采煤炭，但煤炭所形成的资本反过来支配工人的命运；工人使用机器，但机器和矿井作为资本的物质形态，反过来把工人压进危险的劳动过程。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资本统治劳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秘密。

因此，留神峪煤矿事故绝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生产安全失败”。它更深刻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生产安全本身就是从属于资本增殖的。安全只有在不妨碍利润时才被重视；一旦安全与利润发生冲突，资本就会想方设法绕开安全、削弱安全、伪造安全，甚至把安全制度本身变成遮蔽危险的工具。

所谓“阴阳图纸”，正是这种资本逻辑的具体表现。

图纸本来应该反映真实生产状况，帮助监管、救援和安全管理。但当图纸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它就不一定服务于工人生命，而可能服务于资本隐瞒。公开的一套图纸用来应付检查，真实的一套生产系统用来攫取利润。表面上是技术文件造假，实际上是资本关系在纸面上的分裂：一面是给监管看的合法矿井，一面是给利润服务的真实矿井。

所谓“未持定位卡人员”，也是如此。

定位卡本来应该保护矿工，使每一个下井工人的位置都能被掌握，使事故发生后救援能够更快展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定位卡可以变成选择性使用的工具。被登记的人，是制度承认的人；没有被真实纳入系统的人，则成了资本主义矿井里的隐形劳动者。他们为资本创造价值，却不被资本完整承认为需要保护的生命。

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阶级关系的暴露。

资产阶级常常把资本主义的罪恶说成“少数企业缺乏良心”。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问题不在于资本家有没有良心，而在于资本作为资本，必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规律运动。资本家个人可以善良，也可以残忍；可以温和，也可以粗暴；但只要他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参与竞争，他就必须服从资本增殖的规律。否则，他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所以，煤老板的黑心不是偶然的道德堕落，而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表现。官僚的包庇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而是国家机器与资本积累相互勾连的表现。矿工的死亡不是偶然的灾祸，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工人生命当作成本来处理的必然结果。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比一般人道主义批判更深刻。

一般人道主义会说：矿工也是人，他们不该死。
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指出：正因为矿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是作为完整的人存在，而是作为劳动力商品存在，所以他们才会被反复推向死亡。
一般舆论会说：企业应该更重视安全。
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指出：只要企业以利润为目的，安全就永远会被利润压迫。
一般问责会说：必须严惩责任人。
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指出：只惩罚几个责任人，而不触动资本支配劳动的关系，就只能为下一次矿难准备新的条件。

留神峪煤矿事故中的矿工，并不是抽象的“遇难人员”。他们是无产阶级，是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用身体支撑社会运转的人。他们的死亡，把资本主义平日隐藏起来的真相炸开了：所谓繁荣，建立在劳动者的危险之上；所谓发展，建立在工人的沉默之上；所谓产值，背后是一个个被压入地下的生命。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吃人性。

它不一定每天都以爆炸的形式出现。更多时候，它表现为粉尘病、工伤、疲劳、低工资、欠薪、黑工、超时劳动、职业病和无法组织起来的恐惧。但矿难发生时，这种平日隐藏在工资关系背后的吃人性，就会突然以最血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井下爆炸的一瞬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面目也随之暴露：它不是为了工人而存在，而是把工人作为燃料来维持自己的运转。

因此，对留神峪矿难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矿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常状态，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逻辑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爆发。只要资本仍然支配劳动，只要生产资料仍然脱离工人群众，只要劳动者仍然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生存，只要利润仍然高于生命，那么工人死亡就不会真正停止。

矿井深处爆炸的是瓦斯，但更深处燃烧的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
被埋葬的不只是一个个矿工的生命，还有资产阶级关于“发展”“安全”“共同富裕”的全部谎言。
留神峪煤矿事故用血证明：资本不是中性的财富，资本是压迫关系；资本不是发展本身，资本是对劳动的统治；资本不是文明的象征，资本从一开始就带着工人的血。

四、从列宁主义看：官僚监管不是工人的保护者，而是资本统治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如何支配劳动，那么列宁主义则进一步揭示了国家机器在阶级社会中的真实作用。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不能只看企业，也不能只看矿长、老板和直接责任人；必须进一步追问：在这样一个长期存在违法生产、隐瞒人数、伪造表面秩序的矿山背后，地方权力、监管机构和整个国家机器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官僚最喜欢的一种说法是：企业违法，政府监管不到位，所以要加强监管。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很严厉，实际上仍然把问题限制在制度运行层面。它假定国家机器本来是中立的，监管部门本来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只是某些干部失职，某些环节松懈，某些制度没有落实。这样一来，国家机器本身就被从批判中解救出来了。

列宁主义绝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国家不是超阶级的调停机关，不是站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主持公道的中立力量。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谁掌握生产资料，谁掌握政治权力，谁就能够通过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所谓法律、监管、行政、警察、法院、许可、检查，表面上是公共秩序，实质上总是同一定的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

在修正主义中国，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

名义上，国家仍然使用“人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等语言；现实中，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各种地方利益集团手中。矿工在口号里是主人，在矿井里却是被管理、被命令、被压迫、被牺牲的人。监管部门口头上保护工人，实际上首先保护的是生产秩序、地方稳定、产值数字和资本积累的连续性。

这就是为什么矿难之后总会出现同样的官僚程序：领导批示，成立调查组，召开会议，严肃问责，开展整顿，吸取教训。可是，矿难之前，矿工有没有权利拒绝危险作业？有没有权利公开组织起来监督矿山？有没有权利揭发隐蔽工作面而不遭报复？有没有权利让自己的生命高于企业产量和地方政绩？这些根本问题，官僚机器从来不真正回答。

因为一旦回答这些问题，就会触及阶级权力本身。

留神峪事故暴露出来的入井人数严重不符、大量人员没有被真实纳入定位系统、图纸和监控系统存在两套秩序等问题，说明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漏洞，而是一套能够长期运行的地下秩序。这样的秩序不可能只靠一个矿长或几个管理人员维持。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企业知道如何应付监管，监管也在现实中接受了一套表面化、文件化、形式化的安全秩序。

也就是说，矿井里不仅有瓦斯，还有官僚主义的毒气。

这种官僚主义不是简单的办事拖拉，不是一般的文牍主义，而是脱离群众、压制群众、服务资本的统治方式。它把真实的工人生命变成表格，把真实的危险变成汇报材料，把真实的井下情况变成可以修饰的图纸，把真实的阶级矛盾变成可以由上级会议处理的“风险隐患”。工人活着的时候，它不让工人说话；工人死去之后，它代表工人哀悼。

这正是修正主义国家机器最虚伪的地方。

它可以在事故后表现得非常严肃，却不能在事故前让工人真正掌握权力。它可以派调查组，却不能允许工人阶级独立组织起来。它可以要求企业整改，却不能打破企业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它可以处理几个干部，却不能承认整个官僚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就是矿难的制度根源。

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只要国家机器仍然维护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所谓监管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武器。它最多只能在事故过于惨烈、社会压力过于强烈、统治秩序受到冲击时，进行有限的整顿和切割。它不是为了让工人当家作主，而是为了修补统治机器，让同样的生产关系继续运转下去。

因此，我们必须批判一种危险幻想：好像只要国家监管更严，矿难就能根除；好像只要中央调查更严厉，地方资本就会自动收敛；好像只要问责几个官员，工人的生命就能得到保障。这种幻想把无产阶级引向对官僚机器的依赖，而不是引向自己的组织和斗争。

真正的问题不是“监管有没有到位”，而是“监管服务于哪个阶级”。

如果监管服务于资本积累，那么它就会在平时默许、纵容、形式化，在事故后选择性严厉。
如果监管服务于地方政绩，那么它就会关心产值、税收、稳定和舆情，超过关心矿工的真实处境。
如果监管不受工人群众直接监督，那么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官僚系统内部的自我检查、自我汇报和自我修补。
如果工人没有权力，那么再多监管文件也只是统治阶级写给统治阶级看的文件。

这不是说具体责任人不应该被追究。相反，所有直接责任人、包庇者、失职者、渎职者都必须被追究。但是，马列毛主义的批判不能停在这里。我们不能让几个责任人成为整个制度的替罪羊，不能让一次事故调查掩盖长期存在的阶级压迫，不能让官僚问责遮蔽工人阶级被剥夺权力这个根本事实。

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地方政府、企业资本和监管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利益结合。企业需要利润，地方需要经济指标和稳定局面，监管部门需要维持行政秩序。三者之间并不总是赤裸裸地合谋，但它们在客观上共同维护着一个事实：生产继续进行，矿工继续下井，利润继续实现，危险继续由工人承担。

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它不是完全没有法律，而是让法律服从统治需要；不是完全没有监管，而是让监管服从生产秩序；不是完全没有问责，而是让问责服从政治止血；不是完全没有哀悼，而是让哀悼不能转化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它最害怕的，不是几篇批评文章，而是矿工群众自己站起来，自己调查，自己揭露，自己组织，自己斗争。

所以，留神峪事故给我们的列宁主义教训是：无产阶级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寄托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良心上。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官僚监管不是天然的保护伞，国家调查也不是天然的正义。只有当工人群众拥有组织权、监督权、揭发权、拒绝危险作业的权利，并且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下形成自己的力量时，安全才可能不再是资本和官僚的恩赐。

矿难之后，资产阶级国家会说：我们一定严肃调查。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说：调查必须揭露整个阶级统治关系。
资产阶级国家会说：我们一定吸取教训。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说：真正的教训是工人没有权力。
资产阶级国家会说：我们一定加强监管。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说：没有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监管仍然会变成官僚表演。

列宁主义的锋芒就在这里：它不允许我们把国家看成抽象的公共机关，而要求我们追问国家属于哪个阶级、服务哪个阶级、镇压哪个阶级、保护哪个阶级。留神峪煤矿事故用血证明，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依靠官僚机器来获得解放，也不能依靠资本国家来保障生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政治领导，才能把生命从资本和官僚手中夺回来。

五、从毛主义看：问题的根子在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统治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列宁主义揭示了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那么毛主义则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一个曾经以社会主义名义建立起来的国家里，为什么工人阶级又会重新沦落到被资本驱赶下井、被官僚监管压制、被事故数字抹平的地位？为什么一个口头上仍然高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权，现实中却一再让劳动人民用鲜血来支付资本积累的账单？

答案只能从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统治中寻找。

毛主席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自动消失；相反，斗争会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资产阶级不一定只以旧地主、旧资本家的面目出现，它还可能在共产党内部、国家机关内部、经济管理机关内部，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形式出现。

这正是毛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发展之一。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曾经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掌握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到限制和改造，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修正主义路线一旦取得领导权，所谓改革、开放、市场化、现代化，就会逐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改造成官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不再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而重新变成被雇佣、被管理、被压榨、被牺牲的劳动力。

留神峪煤矿事故，正是这种历史倒退的血腥表现。

如果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矿工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条件？
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存在，为什么企业能够在利润驱动下隐瞒真实生产情况？
如果工人阶级真正居于领导地位，为什么矿工没有权力拒绝危险作业？
如果国家机器真正属于劳动人民，为什么监管体系长期不能阻止资本把矿井变成死亡陷阱？
如果所谓“人民至上”是真实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人民在井下成为可以被隐藏、被消耗、被统计处理的对象？

这些问题无法用“个别企业违法”来解释，也无法用“基层干部失职”来解释。它们指向一个根本事实：修正主义中国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披着红色外衣、使用社会主义词汇、由官僚资产阶级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

毛主义者必须敢于说出这个事实。

修正主义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它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现实。它仍然说“工人阶级”，但工人没有权力；它仍然说“人民”，但人民不能监督生产；它仍然说“社会主义”，但生产服从利润；它仍然说“共同富裕”，但矿工用生命为资本积累铺路；它仍然说“安全发展”，但安全制度在资本面前一次次被撕碎。

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欺骗性。

公开的资产阶级统治至少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而修正主义统治则把资本主义复辟包装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把市场化说成发展生产力，把剥削说成就业，把雇佣劳动说成灵活用工，把资本积累说成经济建设，把工人的牺牲说成发展中的阵痛。它一面让资本重新统治劳动，一面又用红色语言安抚劳动者，让工人相信自己仍然是“主人翁”。

可是，矿井深处不会撒谎。

在那里，谁有权安排生产，谁有权决定班次，谁有权决定是否停产，谁有权修改图纸，谁有权隐瞒人数，谁有权面对监管，谁又只能服从命令下井，这些问题把一切政治伪装都撕开了。矿工是否是主人，不是看宣传栏上写了什么，而是看他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劳动过程；不是看新闻里怎样称呼他，而是看他在危险面前有没有拒绝权；不是看国家怎样悼念他，而是看他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组织权和监督权。

从毛主义观点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权力的问题不能分开。即使某些企业名义上存在国家资本、地方资本或混合所有制，只要工人群众没有实际支配权，只要生产由官僚和资本家决定，只要劳动者被排除在管理之外，那么这种所有制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官僚资产阶级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社会主义不是国家替资本家当老板，更不是官僚替工人管理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掌握国家，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参与生产管理、政治管理和社会监督。离开工人群众的直接参与，离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离开继续革命，所谓社会主义就会变成官僚命令、资本积累和红色招牌的混合物。

留神峪事故说明，今日中国煤矿中的工人并不掌握生产。

他们不是制定安全制度的人，而是被安全制度管理的人。
他们不是监督企业的人，而是被企业安排的人。
他们不是决定停产的人，而是在危险中被要求继续劳动的人。
他们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而是在事故发生后被国家权力统计、调查和善后的人。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修正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全部宣传。

毛主义还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复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在路线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被利润挂帅取代，当群众运动被官僚管理取代，当阶级斗争被“发展第一”取代，当劳动人民的主动性被专家治国、干部治厂、资本经营取代时，资本主义关系就会一步步恢复。最后，工人虽然仍然生活在挂着红旗的国家里，却已经重新被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压到机器和矿井之下。

这就是留神峪矿难的历史含义。

它不是一个孤立煤矿的事故，而是资本主义复辟全过程在矿井中的集中爆发。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人民曾经拥有的社会保障、政治地位、集体力量和主人意识被一步步瓦解。工人从“国家主人”变成“劳动力资源”，从阶级主体变成维稳对象，从政治力量变成工资劳动者。矿工在井下遭遇的，不只是瓦斯和煤尘，更是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积累下来的阶级后果。

修正主义者会说：我们也重视安全，我们也追究责任，我们也保护劳动者。
毛主义者必须回答：你们追究的是事故责任，却不追究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责任；你们保护的是表面秩序，却不保护工人的阶级权力；你们治理的是事故后果，却不治理资本支配劳动的根本关系。

毛主义的锋芒就在这里：它不满足于一般的反腐败，不满足于一般的监管改良，不满足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哀悼。它要追问路线，追问政权性质，追问谁领导谁，追问生产为谁服务，追问工人阶级究竟有没有权力。因为只要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只要政权实际服务于官僚资产阶级，只要生产服从利润而不是服从人民需要，那么所有安全制度都可能被资本主义现实掏空。

所以，留神峪事故给我们的毛主义教训是：没有继续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巩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工人阶级的安全；没有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生产，就没有所谓“人民至上”。一旦党和国家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一旦工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一旦资本重新成为社会运行的中心，矿难、工伤、欠薪、失业、压迫和死亡就会成为劳动人民必须反复承受的现实。

这不是偶然的偏差，而是路线变质的结果。
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社会主义被修正主义背叛后的结果。
这不是“发展中难免的代价”，而是资本主义复辟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血税。

因此，对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毛主义批判，必须明确指向修正主义统治本身。我们不能只要求更严格的安全检查，而要指出工人没有权力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不能只要求惩办事故责任人，而要指出资本主义复辟才是最根本的责任；不能只要求善后赔偿，而要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体。

矿工的血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错误，而是会杀人的政治路线。
资本主义复辟不是书本里的概念，而是会在矿井里爆炸、在工人身上留下伤口、在劳动人民家庭中制造哭声的现实。
毛主义不是对过去的怀念，而是理解今天中国工人苦难、揭露修正主义统治、重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武器。

留神峪矿难证明，红色招牌不能保护矿工，官僚监管不能解放工人，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所谓发展不能给劳动人民带来真正安全。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批判修正主义，重新确立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让工人阶级真正掌握生产、掌握国家、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种以劳动人民生命为代价的吃人秩序。

六、批判资产阶级事故叙事：反对把阶级罪行技术化、偶然化、个别化

每一次重大矿难发生后，统治阶级都会迅速制造一套解释事故的语言。这套语言看起来是在说明事故原因，实际上是在限制群众的思考范围；看起来是在追究责任，实际上是在保护制度本身；看起来是在哀悼遇难者，实际上是在阻止工人的死亡转化为阶级愤怒。

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同样如此。

在事故发生以后，各种说法会陆续出现：瓦斯治理不到位，安全制度执行不严，企业主体责任没有落实，监管存在漏洞，个别干部失职失责，矿方违法违规组织生产。这些说法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但是，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指出：如果批判停留在这些层面，就会把一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造出来的阶级罪行，降格为一场技术事故、一场管理事故、一场偶然事故。

这正是资产阶级事故叙事的危险所在。

第一种叙事，是技术主义叙事。

技术主义叙事把矿难解释为瓦斯浓度、通风系统、监测设备、定位卡、图纸管理、作业流程等技术环节的问题。它会详细讨论哪个设备失灵，哪个流程没有执行，哪个参数异常，哪个安全措施没有做到位。表面上看，这种叙事很专业、很客观、很科学；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把人从生产关系中抽走，把事故从阶级关系中抽走。

瓦斯为什么没有被有效治理？
通风为什么没有保障？
定位卡为什么没有覆盖所有下井工人？
图纸为什么会变成两套？
监控系统为什么会变成两套？
隐蔽工作面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些问题不能只从技术层面回答。因为技术本身不会撒谎，设备本身不会逐利，图纸本身不会伪造自己，监控系统本身不会主动制造两套现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为了利润破坏技术制度？是谁为了产量压倒安全？是谁为了逃避监管制造假象？是谁把本来应当保护矿工的安全技术，变成应付检查和遮蔽真实生产的工具？

技术主义叙事不回答这些问题。

它把瓦斯爆炸说成自然危险，把安全失败说成技术漏洞，把资本逐利说成系统缺陷。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官僚就从阶级审判中逃脱了。事故变成了“技术没有管好”，而不是“资本有意识地践踏工人生命”。这就是技术主义叙事的反动作用。

第二种叙事，是个别违法叙事。

这种叙事承认企业有问题，承认矿方违法，甚至承认个别人胆大妄为、丧尽天良。但是，它把一切问题都集中到少数企业、少数老板、少数矿长、少数管理人员身上，好像只要把这些人抓起来、判下去、处分掉，问题就解决了。

这种叙事比纯粹的技术主义更进一步，但仍然是不彻底的。

因为它承认有坏人，却不承认产生坏人的制度；承认有违法，却不承认违法背后的利润冲动；承认有黑心资本家，却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必然不断制造黑心资本家。它把煤老板描写成制度中的异常分子，而不是资本关系的正常人格化代表。它把矿难说成少数人突破底线，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利润为底线。

马列毛主义者不是说具体责任人不该被严惩。相反，所有直接和间接责任人都必须被追究。但是，如果只追究几个责任人，而不揭露他们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所谓严惩就会变成制度自保的手段。统治阶级可以牺牲几个执行者，保全整个机器；可以把几个老板和干部推上前台，遮蔽资本支配劳动的根本事实。

第三种叙事，是官僚问责叙事。

这种叙事的中心是“上级高度重视”“迅速成立调查组”“严肃追责问责”“深刻吸取教训”“全面排查隐患”。它的功能不是没有实际效果，它确实可能带来一段时间的整顿、停产、检查和处分。但是，它最核心的政治作用，是向群众制造一种幻觉：国家机器正在代表人民解决问题，工人只需要等待调查结果，等待处理决定，等待善后安排。

这种叙事最善于把群众排除在政治之外。

矿工活着的时候，没有权力参与真实监督；矿工死去之后，官僚机器代表他们发言。
矿工下井的时候，必须服从企业安排；矿工遇难之后，国家机关代表他们接受哀悼。
矿工面对危险的时候，不能独立组织起来拒绝；事故发生以后，群众被要求相信调查组会给出公正结论。

这就是官僚问责叙事的本质：它把工人阶级从斗争主体变成等待对象，从政治主体变成善后对象，从社会主人变成被管理的受害者。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指出，没有工人群众直接参与的调查，不可能真正揭开全部真相；没有工人群众组织权的问责，不可能真正防止下一次事故；没有触动生产资料支配关系的整改，不可能真正保障工人生命。官僚系统可以调查事故，但它不会主动调查自身作为资本统治组成部分的阶级性质。

第四种叙事，是人道主义哀悼叙事。

这种叙事会说：生命可贵，逝者安息，愿悲剧不再发生，向遇难者默哀，向救援人员致敬。这样的语言本身并不一定错误。遇难矿工当然应当被悼念，家属当然应当被安慰，救援人员当然值得尊重。但是，如果哀悼被用来替代追问，如果眼泪被用来压制愤怒，如果“愿悲剧不再发生”被用来回避“悲剧为什么反复发生”，那么人道主义哀悼就会变成阶级批判的麻醉剂。

统治阶级喜欢没有政治后果的悲伤。
它允许群众哭，但不允许群众追问。
它允许群众献花，但不允许群众组织。
它允许群众说“太惨了”，但不允许群众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杀人”。
它允许遇难者成为被同情的人，却不允许他们成为控诉制度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马列毛主义不能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

我们当然要悼念矿工，但我们更要指出是谁让他们死。
我们当然要同情家属，但我们更要揭露是什么制度制造了这种家庭破碎。
我们当然要尊重救援，但我们更要追问为什么这些人一开始就被送进了危险之中。
我们当然希望悲剧不再发生，但我们更要说明：只要资本支配劳动，这种悲剧就一定会以各种形式反复发生。

第五种叙事，是发展主义叙事。

这种叙事不会公开为矿难辩护，但它会把矿难放进所谓“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地方经济”“产业转型阵痛”之中。它会暗示，煤炭生产关系复杂，地方财政依赖资源，经济发展需要能源保障，安全生产和发展之间要平衡。说到底，它是要让工人的死亡成为所谓发展的代价。

这是最无耻的叙事之一。

什么叫发展的代价？谁的发展？谁的代价？资本家的财富增长，是矿工用生命支付；地方的产值数字，是矿工用血汗支撑；城市的灯火和工厂的运转，是矿工在地下承担风险。发展主义叙事从来不说清楚，发展成果归谁，发展风险由谁承担，发展代价落到谁身上。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反对这种把工人生命献祭给发展的逻辑。

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以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中心；资本主义发展，则把劳动人民变成发展的燃料。留神峪矿难说明，在修正主义中国，所谓发展已经越来越表现为资本积累的发展、地方政绩的发展、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利益的发展，而不是工人阶级自身解放的发展。

第六种叙事，是法治主义叙事。

这种叙事会说，一切交给法律，一切等待调查，一切按照程序处理。表面上看，它很公正；实际上，它试图把阶级矛盾锁进法律程序之中。法律可以处理某些违法行为，却不能自动处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律可以惩罚某些责任人，却不能自动把生产资料交还给工人群众。法律可以规定安全标准，却不能保证工人在资本面前拥有真正的拒绝权和组织权。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法律本身也有阶级性质。它可以约束某些过分粗暴的资本行为，但它不会取消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它可以承认矿工获得赔偿的权利，却不承认矿工推翻剥削秩序的权利。它可以承认事故调查的必要，却不承认工人阶级独立组织和斗争的必要。

所以，法治主义叙事的局限就在于：它把矿难变成司法和行政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问题。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这些叙事一一击破。我们不能让技术主义掩盖资本逐利，不能让个别违法掩盖制度罪恶，不能让官僚问责掩盖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不能让人道主义哀悼麻痹群众斗争，不能让发展主义把工人生命变成代价，不能让法治主义把阶级矛盾锁进程序。

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不是一个可以被温和解释的事件。它是一场阶级社会的爆炸，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伤口，是资本对劳动长期压迫在矿井深处的集中喷发。任何不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释，都是不彻底的；任何不追问工人阶级权力的批判，都是软弱的；任何不揭露修正主义统治的哀悼，都会被统治阶级吸收为无害的悲伤。

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立场：矿难不是单纯的事故，而是阶级罪行；遇难矿工不是抽象的受害者，而是被压迫阶级的兄弟；事故调查不能代替阶级分析，行政问责不能代替群众斗争，安全整改不能代替工人权力。

只有这样，留神峪矿难才不会被资产阶级叙事重新埋葬。
只有这样，矿工的死亡才不会变成统治阶级档案里的“惨痛教训”。
只有这样，遇难者的血才能成为揭露旧制度、唤醒工人阶级、推动革命斗争的证词。

七、矿工为什么成为“隐形人”：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地位

留神峪煤矿事故中最令人愤怒的事实之一，是大量矿工并没有被真实地、完整地纳入公开的管理系统。入井人数与公示人数严重不符，大量工人未持定位卡下井。也就是说，在资本需要他们劳动的时候，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在安全系统应当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变成了制度中的“隐形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问题。

矿工为什么会成为“隐形人”？为什么他们在井下挖煤、创造价值、承担危险，却不能在地面的管理系统中以完整的生命身份出现？为什么资本可以使用他们的劳动，却不愿承担对他们的责任？为什么他们活着的时候被当成劳动力，出事的时候才被当成伤亡数字？

这些问题直指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中国劳动群众的真实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表面上是自由人，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这种自由是虚假的自由。因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活，不接受资本安排就无法获得工资。在这种关系中，工人并不是作为完整的人进入生产过程，而是作为劳动力商品进入生产过程。资本购买的不是工人的人格，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资本关心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而是工人的劳动能不能创造剩余价值。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天然具有一种把工人“物化”的倾向。

工人在资本眼中，首先不是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不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尊严的人，而是一个班次、一个岗位、一个工号、一段劳动时间、一份工资成本、一项可以被调配的劳动力资源。资本需要工人的时候，就把他们压进生产；资本不需要工人的时候，就把他们抛向失业；资本需要逃避责任的时候，就试图让他们在制度中消失。

所谓“隐形矿工”，正是这种物化关系的极端表现。

他们不是没有劳动，而是劳动被资本占有；不是没有危险，而是危险被资本隐藏；不是没有生命，而是生命不被制度承认。他们在井下真实地呼吸、流汗、恐惧、劳动，但在企业对外呈现的秩序中，他们却可能只是一群不该被看见的人。资本既要他们存在，又要他们不存在；要他们在煤层前存在，在监管前不存在；要他们在利润表里存在，在责任表里不存在。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残酷辩证法。

工人越是为资本创造财富，就越可能在资本的统治下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矿工开采煤炭，煤炭变成商品，商品变成利润，利润变成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而矿工本人却被压缩为“劳动力成本”。他创造的世界越来越巨大，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却越来越渺小。最后，他甚至可能连真实下井人数中的一个公开位置都保不住。

这不是偶然的管理黑洞，而是阶级地位的反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矿工就不可能成为隐形人。因为他们应当是生产的主人，是安全制度的监督者，是企业管理的参与者，是决定劳动条件的主体。矿井中的每一个工人，都应当以完整的政治身份和阶级身份存在。他们不是被统计的对象，而是统计制度的主人；不是被监管的对象，而是监督资本和管理者的力量。

但是，在修正主义中国，情况完全相反。

工人仍然被称作“人民”，但他们没有人民应有的权力；工人仍然被称作“主人翁”，但他们不能真正决定生产；工人仍然被宣传为国家的基础，但他们在现实中被资本和官僚共同管理。劳动群众在政治语言中被抬得很高，在生产关系中却被压得很低。这种巨大反差，正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基本特征。

留神峪煤矿里的“隐形矿工”，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整个社会中无产阶级处境的缩影。

在工厂里，工人可能被外包合同隐藏。
在建筑工地上，工人可能被层层转包隐藏。
在平台经济中，骑手可能被算法和“个体工商户”身份隐藏。
在煤矿里，矿工则可能被没有定位卡、没有真实登记、没有公开人数的方式隐藏。

形式不同，本质相同：资本需要劳动者创造价值，却不愿承认劳动者作为阶级主体的权力。

这种“隐形化”有几个作用。

第一，它削弱工人的安全保障。一个没有被真实登记、没有被完整定位、没有被制度承认的工人，在危险来临时就更难获得保护和救援。资本为了逃避监管而隐藏工人，实际上就是把工人的生命推向更大的危险。

第二，它削弱工人的责任追究。工人越是不被真实记录，事故发生后就越容易出现人数混乱、责任模糊、善后困难。资本可以在这种混乱中争取时间、推卸责任、降低损失。

第三，它削弱工人的组织能力。当工人被分割成正式工、临时工、外包工、未登记人员、隐形劳动者时，他们就更难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资本通过用工形式的分裂，破坏工人阶级的整体性。

第四，它削弱工人的政治可见性。工人只在死亡时短暂进入公众视野，平时却被排除在社会叙事之外。资产阶级社会只愿意看见作为受害者的工人，不愿意看见作为斗争主体的工人。

这正是我们必须严厉批判的地方。

矿工不是隐形人。是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变成隐形人。
矿工不是没有声音。是资本和官僚压制了他们的声音。
矿工不是没有力量。是修正主义统治切断了他们组织起来的道路。
矿工不是社会边缘人。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基础。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这些被资本隐藏的人重新放回历史中心。

资产阶级叙事喜欢把矿工写成“弱势群体”。这个说法表面上同情工人，实际上降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矿工当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伤害的位置，但他们绝不是天然软弱的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生产的承担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最有理由、也最有力量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毛主义尤其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判断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必须落实到对矿工、工人、农民、外卖员、建筑工、临时工、失业者等被压迫群众的真实认识中。历史不是由老板创造的，不是由官僚创造的，不是由专家和资本市场创造的，而是由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创造的。

留神峪矿工的死亡之所以具有政治意义，正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被统治阶级不断掩盖的事实：这个社会离不开工人，但这个社会又不断压迫工人；资本离不开工人，但资本又不断牺牲工人；国家宣传离不开“人民”，但现实政治又不断排除人民。

这就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

它一方面需要劳动人民维持生产、创造财富、支撑国家机器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害怕劳动人民真正组织起来、监督起来、斗争起来、成为政治主体。于是，它就必须把工人分散化、沉默化、隐形化、对象化。它要的是会劳动的工人，不是会斗争的工人；要的是创造产值的工人，不是要求权力的工人；要的是事故后被哀悼的工人，不是事故前能阻止危险生产的工人。

因此，批判留神峪矿难，必须批判这种把工人隐形化的制度。

我们要追问：每一个下井矿工是否被真实登记？每一个劳动者是否有权知道井下真实危险？每一个工人是否有权拒绝危险作业？每一个矿工是否有权公开揭发违法生产？每一个劳动者是否有权组织起来监督企业和监管部门？如果这些权利不存在，那么所谓安全生产就是虚假的；如果工人没有权力，那么所谓人民至上就是空洞的。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矿工不能只是被保护的对象，更应当成为保护自己、管理生产、监督社会的主体。真正的安全，不是资本家恩赐给工人的安全；真正的尊严，不是官方悼词赋予工人的尊严；真正的可见性，不是事故发生后媒体短暂给予工人的可见性。真正的安全、尊严和可见性，必须来自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力量和政治权力。

留神峪事故中的隐形矿工，用血揭开了修正主义中国劳动群众的真实处境。他们在资本需要时被召唤，在监管面前被隐藏，在事故发生后被统计，在善后程序中被处理。这样的命运不是某个矿山特有的，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中无产阶级命运的集中表现。

所以，我们必须说：让矿工重新可见，不只是让他们出现在名单上，而是让他们作为阶级主体出现在政治中。让矿工重新发声，不只是允许他们诉苦，而是让他们拥有组织和斗争的权力。让矿工重新成为主人，不是宣传栏里写几句“主人翁”，而是让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生产、监督管理、决定自己的命运。

资本主义把工人变成隐形人。
修正主义用红色语言掩盖这种隐形化。
马列毛主义的任务，就是把被隐藏的劳动群众重新揭示出来，把他们从事故数字中解放出来，把他们作为创造历史的阶级力量重新摆到社会中心。

留神峪矿工不是无名的牺牲品。
他们是被资本主义复辟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的血要求我们回答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到底属于资本和官僚，还是属于劳动人民？

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革命的回答，矿工就仍然可能继续成为隐形人；只要劳动群众没有真正掌握权力，井下的黑暗就会继续吞噬人的生命。对留神峪矿难的批判，必须把这些被隐藏的人重新带到光亮处，让他们不再只是被哀悼的人，而成为控诉旧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复辟、推动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证人。

八、群众路线的立场：安全不能靠恩赐，只能靠工人自己组织起来

留神峪煤矿事故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也最残酷的道理：真正知道井下情况的人，是矿工自己；真正承担死亡风险的人，也是矿工自己。可是，在现行制度下，最知道危险的人没有决定权，最承担危险的人没有监督权，最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却被排除在安全生产的真正权力之外。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资产阶级和官僚机器总喜欢把安全生产说成自上而下的管理问题。上级发文件，部门搞检查，企业开会议，干部讲责任，矿区贴标语，工人参加培训。表面上看，安全制度层层覆盖，责任体系十分完整；实际上，一旦矿工群众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监督权、组织权和拒绝危险作业的权利，这些制度就随时可能变成纸面制度、表演制度和事故后的免责材料。

毛主义的群众路线恰恰要求我们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是从办公室看矿井，而是从井下看矿井；不是从企业汇报看安全，而是从矿工亲身经验看安全；不是把群众当成被教育、被管理、被保护的对象，而是把群众当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监督生产、揭露黑暗的主体力量。

谁最清楚通风有没有问题？矿工知道。
谁最清楚哪个工作面危险？矿工知道。
谁最清楚有没有超强度生产？矿工知道。
谁最清楚定位卡有没有真实发放？矿工知道。
谁最清楚图纸和实际巷道是否一致？长期在井下干活的人知道。

但是，知道不等于能够说出来；说出来不等于能够改变；个别人说出来，更不等于整个工人阶级能够形成力量。这就是群众路线必须解决的问题：把分散的经验变成集体的认识，把个别的不满变成共同的斗争，把被压制的声音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安全不能靠资本家良心。

资本家当然会在事故后讲安全，会在检查时讲安全，会在会议上讲安全，会在墙上写“安全第一”。但只要生产目的是利润，只要矿工是被雇佣和被管理的人，只要资本掌握生产安排，安全就永远会在利润面前让路。资本家可以暂时收敛，可以在风头上停产整顿，可以花钱补上一些设备，但只要工人没有权力，资本就会在下一轮利润压力下重新寻找漏洞。

安全也不能靠官僚恩赐。

官僚监管可以查，可以罚，可以发文件，可以成立调查组。但是，官僚系统脱离群众以后，它看到的往往是企业汇报、台账材料、检查路线和表面秩序。它可以看到摆出来的那一套东西，却未必能看到井下真实运行的那一套东西。更重要的是，如果监管不受工人群众直接监督，那么监管本身也可能被企业应付、被地方利益影响、被形式主义吞掉。

所以，真正的安全只能建立在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基础上。

工人必须有权知道真实的生产情况。
工人必须有权检查真实的安全条件。
工人必须有权拒绝危险作业。
工人必须有权公开揭发违法生产。
工人必须有权监督企业、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
工人必须有权用自己的组织保护自己的生命。

没有这些权利，所谓安全生产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义讲群众路线，不是把群众当成口号，而是承认群众有认识能力、有斗争能力、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群众路线就意味着：必须从矿工中来，到矿工中去；必须收集矿工的真实经验，集中矿工的正确意见，再回到矿工群众中形成实际力量。任何离开矿工群众的安全制度，都是不可靠的；任何排斥工人参与的安全检查，都是残缺的；任何不允许工人组织起来的安全宣传，都是欺骗。

资产阶级喜欢说，工人需要被培训。
马列毛主义者说，工人当然需要掌握安全知识，但更需要掌握权力。

资产阶级喜欢说，工人要增强安全意识。
马列毛主义者说，矿工最有安全意识，因为危险落在他们身上；真正缺乏安全意识的是把利润放在生命之上的资本。

资产阶级喜欢说，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
马列毛主义者说，只让企业承担责任，而不让工人掌握监督权，就是让狼自己写羊圈安全报告。

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反对这种颠倒。矿工不是安全事故中的被动对象，不是等着被救援、被赔偿、被悼念的人。矿工是生产现场最直接的认识者，是揭露违法生产最重要的力量，是防止矿难最根本的群众基础。没有矿工自己的参与，任何监管都只能看到表层；没有矿工自己的组织，任何安全制度都可能被资本绕开；没有矿工自己的斗争，任何事故问责都可能变成一次政治止血。

因此，对留神峪矿难的批判，不能只停在“要求加强监管”。加强监管当然必要，但更根本的是：谁来监督监管？谁来监督企业？谁来保证矿工说真话不会被报复？谁来保证揭发违法生产的人不会失业、被打压、被孤立？谁来保证矿工不是单个地面对资本，而是作为一个阶级集体面对资本？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整改就只能是周期性的。事故发生后严一阵，舆论过去后松一阵；检查来了停一阵，检查走了干一阵；文件上写一套，井下执行另一套。最后，每一次“吸取教训”都变成下一次事故前的仪式。

工人群众的组织问题，才是安全问题的核心。

一个孤立的矿工即使发现危险，也可能因为害怕失业、害怕报复、害怕被扣工资、害怕被排挤而沉默。一个班组即使知道违法生产，也可能因为没有外部支持、没有公开渠道、没有集体保护而被迫服从。只有当矿工能够组织起来，能够形成集体意志，能够把个人经验变成共同意见，能够把共同意见变成公开压力，安全才不再是资本和官僚随意摆布的东西。

群众路线还要求我们反对替群众作主的官僚主义。

很多时候，官僚机器会说：群众不懂，专家懂；工人不懂，领导懂；井下工人只要按规定操作就行，安全管理由上面负责。这种看法表面上重视专业，实际上轻视群众。专业知识当然重要，但专业知识必须同工人群众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如果专家只听企业汇报，不听矿工声音；如果领导只看台账材料，不看真实井下；如果监管只走规定路线，不接触一线工人，那么所谓专业就会变成脱离群众的盲目。

真正的群众路线，不是不要专业，而是把专业放到群众监督之下，把技术服务于工人生命，把管理交给劳动人民监督。技术人员、监管人员、调查人员都应当听取矿工群众的意见，而不是让矿工在他们面前沉默。任何安全调查，如果没有大量普通矿工、家属和一线劳动者的真实声音，就不可能完整。任何事故结论，如果只来自企业材料和官僚系统内部报告，就一定要警惕其局限性。

留神峪事故尤其说明，工人群众必须拥有揭露真相的权力。

真实入井人数为什么会被遮蔽？隐蔽工作面为什么能存在？两套图纸、两套系统为什么能运行？这些东西如果长期存在，就说明一定有人知道，一定有人经历，一定有人在日常生产中看见过异常。但是，看见并不等于能说；知道并不等于能揭露。没有群众组织，没有政治保护，没有阶级力量，许多真相就会被埋在井下，直到爆炸把它们炸出来。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相常常要等到死人以后才能被承认。

毛主义者不能接受这一点。我们要的是事故之前的群众监督，而不是事故之后的尸体证明；要的是工人活着的时候拥有权力，而不是死去以后才被承认为“遇难者”；要的是群众能够阻止危险生产，而不是等到爆炸之后再让调查组进入现场。

因此，群众路线在这里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十分具体的政治要求：让矿工能够说话，让矿工能够组织，让矿工能够监督，让矿工能够拒绝危险，让矿工能够参与调查，让矿工能够把自己的经验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当然，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权利不会自动到来。资本不会主动交出权力，官僚不会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企业不会主动欢迎工人组织。工人阶级要获得这些权利，必须依靠自己的觉醒、团结和斗争。安全不是恩赐来的，尊严不是施舍来的，生命保障不是靠统治阶级良心换来的。它们只能通过劳动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争取。

这就是留神峪矿难对工人阶级的教训。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老板良心上。
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僚监管上。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事故后的问责表演上。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没有群众参与的制度整改上。

真正可靠的，只有工人群众自己。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具体矿工都必须单独承担改变制度的重担。恰恰相反，群众路线反对把责任压到单个工人身上。资产阶级常常把事故原因说成工人违章、工人安全意识差、工人操作不规范，这是一种对受害者的二次压迫。我们必须明确：在资本支配劳动的条件下，个别工人的行为不能掩盖企业和制度的主要责任。工人群众要组织起来，不是为了替资本承担责任，而是为了夺回被资本剥夺的安全权力。

群众路线的目的，是让工人从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从被调查对象变成调查主体，从被保护对象变成自我保护的阶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谁有权定义危险，谁有权停止生产，谁有权揭露真相，谁有权监督企业，谁有权决定劳动条件，这些问题都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阶级权力问题。

留神峪煤矿事故用血证明：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真正的安全；没有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就没有真正的生产监督；没有劳动人民的组织力量，就没有真正的生命保障。

因此，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对矿难的哀悼转化为对工人群众组织权的强调，把对事故原因的追问转化为对群众路线的坚持，把对资本和官僚的批判转化为唤醒劳动群众自我解放力量的政治工作。

矿工最懂矿井。
工人最懂生产。
劳动人民最懂自己的苦难。
群众不是等待拯救的对象，而是改造社会的主体。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揭露被资本隐藏的真相。
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打破官僚主义的遮蔽。
只有组织群众，才能把分散的恐惧变成集体的力量。
只有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井下的黑暗才可能被彻底照亮。

九、政治结论：从矿难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

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不是孤立的安全事件，而是中国社会现实阶级矛盾的一次血腥暴露。它把平时被发展话语、稳定话语、法治话语、监管话语遮蔽起来的东西，突然集中地推到了人们面前：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仍然处在被支配、被剥削、被压迫、被牺牲的位置；官僚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则掌握着生产、管理、监管和舆论解释的权力。

这场矿难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安全意识不足”，不是“管理能力不强”，不是“个别企业违法违规”，而是劳动人民与资本统治之间的矛盾。矿井里的爆炸，不过是这种矛盾在特定地点、特定时刻、特定生产条件下的集中爆发。

在煤矿中，这个矛盾表现得极为清楚。

一方面，是矿工。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生活；他们进入井下，承担最直接的死亡风险；他们创造煤炭，支撑能源供应，创造企业利润和地方产值；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决定生产的权力，没有真正监督企业的权力，没有真正拒绝危险作业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资本和官僚。他们掌握企业、掌握生产安排、掌握监管通道、掌握事故解释权。他们可以决定是否生产，决定如何生产，决定如何向上级汇报，决定如何面对检查，决定如何处理事故之后的善后和舆论。矿工创造财富，却不掌握财富；矿工承担危险，却不掌握安全；矿工付出生命，却不掌握真相的解释权。

这就是阶级矛盾。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总是试图把这种矛盾说成“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的关系，说成“劳动者和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说成“地方经济和职工就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留神峪矿难撕破了这些温情脉脉的谎言。所谓共同体，在利润面前变成了资本对工人生命的压榨；所谓共同发展，在事故中变成了矿工死亡、资本善后、官僚问责、制度继续运行。

工人和资本不是什么平等合作的伙伴。资本需要工人的劳动，却要压低工人的权利；资本需要工人创造价值，却要把安全成本降到最低；资本需要工人进入井下，却不愿让工人真正监督井下。工人的生命安全和资本的利润冲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生产目的仍然是利润，只要生产资料仍然脱离工人群众，只要国家机器仍然维护资本积累，矿工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因此，留神峪矿难的政治结论首先是：工人阶级没有权力，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没有权力，工人就只能被安排下井。
没有权力，工人就只能面对危险沉默。
没有权力，工人就只能在事故后被统计、被善后、被哀悼。
没有权力，所谓安全制度就可能随时被资本撕碎。
没有权力，所谓人民至上就只能停留在宣传语言里。

所以，矿难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可能只靠技术整改，不可能只靠行政问责，不可能只靠法律处罚，更不可能靠资本家良心发现。它要求工人阶级重新成为政治主体，要求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监督生产、管理生产、决定生产目的的权力。

第二个政治结论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

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国家，不会让矿工在没有真实保障的条件下被压进井下；不会让资本和官僚共同制造隐蔽生产的空间；不会在事故发生前排斥工人监督，在事故发生后才代表工人哀悼。真正的工人国家，必须让工人群众成为安全生产的主人，成为企业管理的主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

而今日中国的现实恰恰相反。

工人阶级在名义上被尊崇，在现实中被排斥；在宣传中被称为主人，在生产中被当作劳动力；在事故后被称为遇难者，在事故前却没有权力阻止危险。这个反差说明，修正主义政权所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根本利益。

第三个政治结论是：工人斗争不能停留在经济要求上，必须上升到政治要求。

矿难发生后，当然必须要求真相，要求赔偿，要求救治伤员，要求安置家属，要求追究责任。这些都是正当的、必要的。但是，如果斗争只停留在赔偿金额、责任处分、事故处理上，那么它仍然没有触及根本。因为赔偿是在死亡之后发生的，追责是在事故之后发生的，善后是在悲剧之后发生的。工人阶级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死后的赔偿，而是活着时的权力。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提出更深的要求：

要求工人群众直接监督安全生产。
要求矿工拥有拒绝危险作业的权利。
要求所有下井人员真实登记、公开透明。
要求事故调查必须听取普通矿工和家属的声音。
要求企业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接受劳动群众监督。
要求打破资本和官僚对真相、生产和安全的垄断。

这些要求已经不是单纯经济要求，而是政治要求。它们指向一个核心问题：谁掌握生产？谁掌握权力？谁决定劳动人民的命运？

第四个政治结论是：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矿难揭露同工人阶级组织工作结合起来。

如果矿难批判只是停留在文章中，只是停留在愤怒中，只是停留在网络舆论中，它很容易被统治阶级吸收、冷却、遗忘。统治阶级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群众的愤怒变成短暂情绪，把短暂情绪变成新闻周期，把新闻周期变成档案材料，最后让一切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马列毛主义者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必须把矿难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向工人群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吃人；必须把事故真相作为政治揭露的材料，说明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如何维护资本秩序；必须把遇难矿工的血作为控诉，说明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必须把分散的同情和愤怒，转化为更清醒、更持久、更有组织的阶级意识。

没有组织，愤怒会消散。
没有理论，痛苦会被解释成命运。
没有政治领导，个别事件不会自动变成阶级斗争。
没有马列毛主义，矿工的死亡就可能被资产阶级叙事重新掩埋。

所以，革命者的任务，不是替群众哭一场就结束，而是把哭声变成控诉，把控诉变成觉醒，把觉醒变成组织，把组织变成斗争。

第五个政治结论是：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阶级内容必须被揭穿。

修正主义者喜欢把中国的发展描写成民族复兴、强国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道路。但是，留神峪矿难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现代化要靠矿工在井下承担死亡风险，如果强国建设要靠隐形劳动者支撑，如果地方发展要靠工人生命作为代价，那么这种现代化究竟属于谁？

属于资本的现代化，不是工人的解放。
属于官僚政绩的现代化，不是劳动人民的幸福。
属于利润和产值的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
踩着矿工尸体前进的发展，不是人民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发展。

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以人民需要为目的，以工人阶级掌握生产和国家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所谓现代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漂亮外衣。

第六个政治结论是：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权问题。

谁掌握国家，谁就决定安全制度服务于谁。
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决定生产过程服从什么目的。
谁掌握政治领导，谁就决定工人是主人还是劳动力。

在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安全只能是被限制在资本积累框架内的安全。它可以减少事故，可以改进技术，可以惩罚过分恶劣的违法行为，但它不能取消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只要这种统治存在，工人的生命就仍然会在利润面前受到威胁。

所以，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矿难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联系起来。不是因为我们要把一切问题简单口号化，而是因为矿难本身已经提出了政权问题：到底是资本和官僚决定工人的命运，还是工人阶级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到底是让国家机器继续服务于资本积累，还是让无产阶级重新掌握国家机器？到底是让生产继续服从利润，还是让生产服从劳动人民的需要？

这就是留神峪矿难提出的根本政治问题。

它不是一个可以用几次整改解决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可以用几个判决结束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可以用几篇悼文安抚的问题。
它是一个关于阶级、政权、路线和革命方向的问题。

从这场矿难中，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真实地位，看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看到群众路线和工人组织的必要性，看到重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现实依据。

矿工的死亡不是历史的偶然。
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是工人阶级被剥夺权力的结果。

因此，留神峪矿难所要求的，不只是事故调查，而是阶级清算；不只是安全整改，而是工人权力；不只是善后赔偿，而是革命觉醒；不只是对遇难者的哀悼，而是对吃人制度的斗争。

这一政治结论必须写得清楚：只要资本支配劳动，矿工就不会真正安全；只要官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人民就不会真正当家作主；只要修正主义继续用红色语言掩盖资本主义现实，工人阶级的苦难就会继续被遮蔽。

留神峪矿难用血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能只要求被保护，必须要求掌握权力；不能只要求被同情，必须重新成为历史主体；不能只等待调查结论，必须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斗争，把死亡的矿井变成控诉旧制度、唤醒新斗争的战场。

十、结尾：让矿工的血成为控诉旧社会的证词

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不能被写成一段短暂的新闻，也不能被封存在事故调查报告和官方通报之中。它不是一个会随着舆论热度下降而结束的事件，而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承受苦难的一次血腥呈现。井下爆炸的是瓦斯，但被炸开的，是所谓“人民至上”“安全发展”“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虚伪外壳。

每一个遇难矿工，都不是抽象的数字。

他们有家庭，有亲人，有生活，有恐惧，有希望。他们下井不是为了成为新闻，不是为了成为事故案例，不是为了成为安全教育材料，而是为了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维持生活。他们本应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受到尊重，却在资本和官僚共同支配的生产秩序中，被推向危险、沉默和死亡。

资产阶级社会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工人活着的时候被当作劳动力，死去的时候被当作“遇难人员”；劳动创造财富的时候不被看见，事故造成死亡的时候才被短暂哀悼；他们的劳动支撑着社会运转，他们的生命却在利润面前被不断贬低。

因此，对遇难矿工最起码的尊重，不是把他们安放在空洞的悼词里，而是说出他们为什么会死。

他们不是死于命运。
他们不是死于偶然。
他们不是死于单纯的技术故障。
他们死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死于官僚监管的虚伪，死于工人权力的缺失，死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人民生命的系统性贬低。

如果我们只说“愿逝者安息”，却不说是谁制造了这种死亡，那么哀悼就是不完整的。
如果我们只说“吸取教训”，却不说教训的根源是资本支配劳动，那么教训就是虚假的。
如果我们只说“加强监管”，却不说工人群众必须掌握监督权和组织权，那么监管就仍然可能成为官僚表演。
如果我们只说“严惩责任人”，却不说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制度才是最根本的责任人，那么问责就可能变成制度自保的工具。

留神峪矿难要求我们的，不是廉价的悲伤，而是清醒的阶级愤怒。

这种愤怒不是盲目的仇恨，而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认识；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无产阶级政治觉醒的起点。矿工的血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复辟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不是书本里的路线争论，而是会在矿井里爆炸、会在工人身上留下伤口、会在一个个劳动人民家庭里制造哭声的现实。

修正主义者可以继续使用红色语言，可以继续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可以继续把事故说成个别问题，可以继续用调查、问责、整改来修补统治秩序。但是，矿井深处的事实已经揭露了一切：一个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不会让工人在没有权力的条件下被迫承担死亡风险；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让资本和官僚把劳动人民变成可以隐藏、可以消耗、可以事后统计的对象。

所以，留神峪矿难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一个矿山的黑暗，更在于揭露整个社会制度的黑暗。它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处境集中地摆在我们面前：劳动人民创造财富，却不掌握财富；劳动人民承担生产，却不掌握生产；劳动人民被称为主人，却没有主人的权力；劳动人民在宣传中被歌颂，在现实中被压迫。

这就是我们必须批判的旧社会。

这个旧社会不一定穿着旧衣服。它可以修建高楼，可以发展高铁，可以制造芯片，可以举办盛会，可以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和最宏大的宣传语言。但只要工人仍然被资本支配，只要劳动人民仍然没有权力，只要生产仍然服从利润，只要矿工仍然在井下用生命支付发展的代价，这个社会在阶级本质上就仍然是吃人的旧社会。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这个事实说清楚。

我们不能让遇难矿工被资产阶级叙事第二次埋葬。第一次，他们被埋葬在矿井和爆炸之中；第二次，他们可能被埋葬在“事故处理完成”“责任人受到处分”“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的话语之中。前一种埋葬夺走他们的生命，后一种埋葬夺走他们死亡的政治意义。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遗忘。

要记住他们，不是为了停留在悲伤中，而是为了让他们的死亡成为控诉资本主义复辟的证词。
要悼念他们，不是为了接受统治阶级安排好的情绪出口，而是为了把哀悼变成阶级觉醒。
要追问真相，不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舆论需要，而是为了揭露资本、官僚和修正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
要总结教训，不是为了写几句安全口号，而是为了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留神峪矿难也告诉我们，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能靠资本家的良心，不能靠官僚的恩赐，不能靠事故后的短暂整顿，不能靠没有群众参与的安全制度。工人阶级的生命保障，归根到底只能来自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力量，来自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生产和国家的权力，来自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复辟秩序的彻底批判和改造。

没有工人权力，就没有工人安全。
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真正监督。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没有对修正主义的彻底批判，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未来。

因此，对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总结，不能是“愿悲剧不再发生”这样软弱的愿望。我们当然希望悲剧不再发生，但历史不会因为愿望而改变。只要造成悲剧的社会关系继续存在，悲剧就会以新的形式、新的地点、新的名字反复出现。真正防止悲剧的力量，不是祈愿，而是斗争；不是等待，而是组织；不是相信统治阶级自我净化，而是相信工人阶级自己的历史力量。

留神峪矿工的血，向我们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个社会到底为谁生产？
矿井到底属于资本，还是属于劳动人民？
国家机器到底保护谁，压制谁？
所谓发展到底服务于谁，又牺牲了谁？
工人阶级到底是宣传中的主人，还是现实中的劳动力？

这些问题，不能由事故通报替我们回答，不能由官僚问责替我们回答，不能由资本家忏悔替我们回答。它们只能由阶级斗争来回答，只能由劳动人民自己的觉醒和组织来回答，只能由无产阶级重新成为历史主体来回答。

所以，本文最后必须明确指出：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不是一场孤立的灾难，而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份血色判决书。它判决了资本逐利的罪恶，判决了官僚监管的虚伪，判决了红色招牌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吃人本质，也判决了一切试图把工人死亡降格为“管理疏漏”和“技术事故”的资产阶级叙事。

遇难矿工不能复生，但他们的死亡不能沉默。
井下的爆炸已经过去，但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
官方的调查会有结论，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结论必须更加深刻。

这个结论就是：只要资本支配劳动，矿难就不会真正结束；只要官僚资产阶级掌握权力，人民就不会真正当家作主；只要修正主义继续统治，社会主义的名字就会继续被用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现实。

让矿工的血成为证词。
让遇难者的名字成为控诉。
让井下的黑暗照出旧制度的罪恶。
让每一次哀悼都变成阶级觉醒的起点。

对留神峪矿工最好的纪念，不是沉默，不是遗忘，不是等待下一次官方通报，而是揭露这个吃人的制度，组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立场，为工人阶级重新夺回自己的命运而斗争。

论湖南烟花厂事故

一、爆炸不是偶然：从浏阳“5·4”事故看见阶级关系

2026年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短短一瞬间，厂房被撕裂，火光和浓烟吞没了生产现场，工人、火药、成品、半成品和倒塌的建筑混在一起。一个平日里被包装成“产业基地”“地方名片”“传统产业”的生产场所，在爆炸声中显露出它真实的一面：那里不是节日烟火背后的浪漫工坊，而是劳动者长期被放置在火药、粉尘、化学药剂和死亡风险之中的危险现场。

官方通报中的数字是冰冷的：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但这些数字绝不是抽象的统计表格。每一个“死亡”背后，都是一个劳动者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吞噬；每一个“伤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在突如其来的爆炸中被打碎；每一个“失联”背后，都是亲人在废墟和火场之外痛苦等待的绝望。对统治者来说，这些数字可以被写进事故通报、调查报告和新闻发布会；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些数字是血，是肉，是活生生的人被危险生产条件夺走生命的证据。

面对这样的事故，统治阶级总是有一套熟练的话语。事故发生后，领导批示、调查组成立、公安传唤、停产整顿、排查隐患、深刻反思、举一反三，这些词语会迅速出现。它们看起来严肃，实际上却往往把问题收束为“管理不到位”“安全意识不强”“个别人员失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仿佛只要几个负责人被处理，几份文件被下发，几场会议被召开，几十条生命的血账就可以被归入一个行政程序之中。

可是，问题恰恰不在事故之后的这些表演，而在事故之前的整个生产关系。烟花爆竹生产本来就是高危生产，它离不开火药、粉尘、氧化剂、还原剂、称量、装填、搬运、储存等危险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中安全距离不足、危险品混存、超量堆放、防静电设施失效、现场管理混乱，都可能把工人的劳动现场变成死亡现场。因此，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危险条件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为什么工人每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为什么危险被一再推给工人，而利润却被资本拿走？为什么事故发生之后才强调安全，而事故发生之前安全却总是让位于订单、产量和成本？

这场事故首先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技术上的漏洞当然要查，直接责任当然要追，但如果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就会掩盖更根本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安全不是天然排在第一位的，利润才是。防静电设施需要投入，危险品分类存放需要空间，工人培训需要时间，限量操作会影响产量，停产整改会耽误订单。对资本来说，这些都不是生命保障，而是成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压低成本、提高产量、追逐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高危行业中的所谓“安全生产”，常常变成一种矛盾的东西。文件上说安全第一，生产中却是利润第一；墙上贴着安全标语，现场却可能堆满危险物料；会议上强调责任落实，工人却没有真正拒绝危险作业的权利。所谓安全制度，只要不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只要工人不能监督生产、不能公开揭露隐患、不能要求停产整改、不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它就很容易变成资本和官僚共同维护生产秩序的装饰品。

所以，事故发生时爆炸的是火药；事故发生前长期堆积的，却是资本对安全成本的压缩，是地方产业利益对监管底线的侵蚀，是企业管理层对工人生命的漠视，是工人在生产现场中的无权状态。工人不是不知道危险，工人每天就在危险中劳动。真正的问题是，工人知道危险之后有没有权力说不？有没有权力停止生产？有没有权力把隐患公开出来？有没有权力组织自己的安全监督？如果没有，那么所谓“安全生产责任制”就只能是纸面制度，真正支配生产现场的仍然是利润、订单、产量和地方政绩。

浏阳是烟花产业的重要产地，烟花产业给地方带来名声、税收、就业和市场。但必须指出，所谓“产业繁荣”不是没有代价的。节日天空中的烟花越绚烂，越不能掩盖生产现场中工人的危险处境。消费者看到的是烟花升空时的光亮，地方政府宣传的是产业规模和地方品牌，企业看到的是订单和利润；而工人面对的，却是火药、粉尘、化学品、爆炸风险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这种鲜明的对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缩影。

在资本支配劳动的地方，劳动者的生命总是被放在利润之后。资本可以把安全投入说成成本，把停产整改说成损失，把工人的警告说成麻烦，把事故后的赔偿说成负担。但资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没有工人的劳动，就没有所谓产业；没有工人在危险中生产，就没有烟花升空；没有劳动者把自己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就没有资本和地方政府所炫耀的繁荣。

因此，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安全意识淡薄”，更不能把责任轻轻推给一线工人。我们必须从阶级关系出发追问：谁组织了这种危险生产？谁决定了安全投入的多少？谁决定了产量和订单高于停产整改？谁从烟花产业中获得利润和政绩？谁在事故前纵容隐患存在？谁在事故后急于把问题限制在“个别责任人”范围内？又是谁在爆炸中失去生命、健康和亲人？

答案是清楚的：资本得到利润，地方得到产业政绩，监管系统在平日里维持表面秩序，而工人得到的是危险、伤残和死亡。这就是这场事故最深刻的阶级性质。所谓“特别重大事故”，并不是日常秩序的例外，而是日常剥削、日常危险和日常无权状态在某一瞬间的集中爆发。它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要生产仍然服从利润和政绩，而不是服从劳动者的生命和权利，类似的血案就绝不会只是过去。

二、不能把事故说成偶然：危险早已存在于日常生产之中

每一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最常见、也最方便的解释，就是把它说成“偶然”。有人说，这是某个环节突然出了问题；有人说，这是个别人员操作不当；有人说，这是安全意识不强；还有人把它说成某种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这样的解释看起来是在分析事故原因，实际上却是在缩小事故性质。它把一场由长期危险条件积累而成的阶级惨案，压缩成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动作、某一个人的失误，从而掩盖了事故背后的生产关系、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

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当然有它的直接原因，当然需要查明爆炸到底发生在哪一个环节，哪些物料如何接触，哪些工序存在违规，哪些负责人负有直接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的视线只停留在爆炸发生的一瞬间，就会看不见爆炸发生之前的漫长过程。火药不是在爆炸那一秒才变危险的，化学药剂不是在事故那一天才具有杀伤力的，危险品混存、现场混乱、防护不足、管理失效，也不是在爆炸声响起之后才突然出现的。真正的事故，早在工人每天进入危险车间、每天面对火药和粉尘、每天在没有充分权力的情况下服从生产安排时，就已经开始了。

所谓“偶然事故”，往往是必然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许多灾难，都不是没有征兆的。它们在发生之前，通常早已以隐患、违章、超负荷、赶工、设备老化、管理混乱、监管走过场等形式存在着。只是这些东西在平日里并不被当成真正的危机，而是被当成可以忍受、可以拖延、可以暂时掩盖的“小问题”。直到死亡大规模出现，直到爆炸震动社会，直到舆论无法沉默，统治机器才开始承认这些“小问题”原来具有杀人的力量。

高危生产中的每一个隐患，平时看起来都可以被轻轻放过。这里多堆了一点物料，那里少维护了一次设备；这里安全距离没有严格执行，那里防护措施没有真正落实；这里为了赶订单加快一点速度，那里为了节省成本减少一点投入；这里工人提醒一句，管理层压下去；那里检查发现问题，企业写一份整改说明，监管部门盖一个章。单独看，每一项似乎都可以被解释、被拖延、被通融、被遗忘。但在火药、粉尘、氧化剂、还原剂和易燃易爆物品构成的生产环境中，这些所谓“小问题”叠加起来，就会变成吞噬工人生命的大灾难。

这就是高危行业事故的残酷逻辑：危险在平日里被习惯化，隐患在制度中被正常化，工人的不安在劳动纪律中被压下去。只要没有爆炸，企业就可以继续生产；只要没有死人，监管就可以继续写报告；只要订单还在，地方就可以继续宣传产业繁荣；只要利润还能实现，资本就可以继续把危险当成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积累起来的危险以最暴烈的方式爆发，统治者才开始说“教训极其深刻”。可是，对已经死亡的工人来说，这种“深刻”来得太晚；对长期处在危险中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深刻”也远远不够。

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把事故解释为单纯的偶然。偶然论的政治作用，就是把系统性问题说成局部问题，把阶级问题说成管理问题，把资本逻辑造成的危险说成个别人员的一时疏忽。这样一来，事故似乎就不再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只是管理水平的问题；不再是资本把工人置于危险中的问题，而只是安全培训不足的问题；不再是工人缺乏权力的问题，而只是工人不够小心的问题。它把真正应该被审判的制度结构，悄悄替换成几个可以被处分、被拘留、被牺牲的具体人物。

把事故说成偶然，还有一个更恶劣的作用，就是把制度责任转化为个体责任。只要把问题归结为某个工人操作不规范，某个班组管理不到位，某个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就可以避开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一线工人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为什么管理层有权组织危险生产，却不用亲自承受危险？为什么地方监管明知高危行业隐患严重，却长期无法真正改变生产条件？为什么企业可以把安全投入视为成本，把停产整改视为损失，而工人却没有权力拒绝危险作业？

这里必须明确：工人不是事故的制造者。工人进入车间，不是为了寻死，而是为了活下去；工人接触火药、粉尘和化学品，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危险，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逼到这样的位置：不劳动，就没有工资；不服从，就可能失去饭碗；不忍受危险，就可能被替换；不接受管理命令，就可能被说成“不配合生产”。在这样的关系中，所谓“自由劳动”不过是被生存压力包裹起来的强制劳动。

真正制造危险的，是以利润为目的组织生产的资本；真正纵容危险的，是把产业稳定和经济利益放在工人生命之上的地方权力；真正维持危险的，是让工人在生产现场中没有实际监督权、没有组织权、没有拒绝危险作业权的整个制度。工人面对危险，最多只能凭经验、小心和忍耐来保护自己。但在一个由资本规定节奏、由管理层发布命令、由地方利益保护生产秩序的劳动现场中，个人的小心无法战胜结构性的危险。

因此，所谓“操作失误”必须被放回具体的生产关系中分析。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自由的个人动作，而是在生产节奏、劳动纪律、计件压力、管理命令和生存压力下完成的动作。工人不是站在抽象空间里“选择”怎样操作，而是在资本规定的时间、空间、任务和秩序中劳动。只要这个秩序本身就是危险的，只要它为了利润不断压缩安全边界，那么事故就不能被简单归咎于一线人员。

更进一步说，即使存在个别人员的直接错误，也不能因此掩盖系统性的责任。一个真正把工人生命放在第一位的生产制度，应当能够防止个人错误变成群死群伤的灾难。它应当有充分的隔离、冗余、防护、监督和停工机制。相反，如果一个小失误就可以引发特别重大事故，如果一个环节的混乱就能造成几十人死伤，如果一个车间的问题就能把整个厂区变成火场，那说明问题绝不是某个人“不小心”，而是整个生产系统已经把工人放在了没有安全缓冲的危险边缘。

这也是为什么“安全意识淡薄”这种说法尤其虚伪。谁最知道生产现场危险？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不是事故后赶来开会的官员，而是每天在车间里劳动的工人。工人当然知道火药危险，知道粉尘危险，知道化学品危险，知道设备失灵危险，知道堆放混乱危险。问题不在于工人是否知道危险，而在于工人知道危险之后能不能改变危险。没有权力的意识，只能变成恐惧；没有组织的警觉，只能变成忍耐；没有停工权的安全教育，只能变成要求工人在危险中更加小心地服从。

资产阶级和官僚最喜欢要求工人“提高安全意识”，因为这句话把责任悄悄推给了工人个人。仿佛只要工人足够小心，危险生产就可以安全；仿佛只要工人多记几条规定，资本压缩安全成本的后果就能被抵消；仿佛只要工人把自己的生命保护好，企业和监管系统就可以继续照旧运行。可是，工人个人的小心不可能代替安全投入，工人的谨慎不可能代替危险品隔离，工人的经验不可能代替停产整改，工人的忍耐更不可能代替他们应有的组织权和监督权。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把浏阳“5·4”事故说成偶然。偶然论的实质，是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脱；操作失误论的危险，是把工人的受害者身份偷换成责任者身份；安全意识论的虚伪，是要求工人用个人小心来弥补资本和监管系统制造的结构性危险。这样的解释越流行，真正的责任链就越容易被遮蔽；这样的语言越熟练，工人的血就越容易被行政程序和新闻套话冲淡。

这场爆炸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一天出了问题，而是平日里早已出了问题；不是某一个人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危险生产秩序出了问题；不是工人缺乏安全意识，而是工人缺乏支配自己劳动条件的权力。只要这种秩序不被揭露，只要危险仍被当作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只要工人仍然只能在火药桶旁服从命令，那么所谓“事故”就会继续以不同形式出现。爆炸只是最后一声巨响，在它之前，危险早已在资本的日常生产中沉默地燃烧。

三、资本为了利润压低安全成本：所谓“节约成本”，就是节约工人的生命

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之所以不能被说成偶然，正是因为高危行业中的危险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危险有它的物质基础，也有它的社会根源。火药、粉尘、化学药剂、成品、半成品、储存空间、生产流程、工人操作，这些构成了爆炸发生的直接条件；而资本为了利润压缩安全成本，则构成了这种危险长期存在和不断积累的根本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安全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成本问题。防静电设备要不要装？装了以后要不要维护？危险品要不要分类存放？分类存放要不要更多空间？工人要不要培训？培训要不要停工？发现隐患后要不要整改？整改是不是影响订单？一旦严格执行安全规范，产量会不会下降？利润会不会减少？这些问题在表面上是管理问题，在本质上却是资本和工人生命之间的对立问题。

对工人来说，安全意味着活着回家，意味着身体不被炸碎，意味着肺不被粉尘毁坏，意味着每天进入车间时不用把命交给运气。可是对资本来说，安全首先表现为支出：设备是支出，空间是支出，培训是支出，停产是支出，整改是支出，减少库存是支出，降低生产速度也是支出。资本不是不知道安全重要，而是只要安全影响利润，安全就会被一再压缩、推迟、打折、变通，直到事故把这种压缩变成血淋淋的后果。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冷酷之处。资本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了增殖自身而生产。它组织劳动、购买设备、租用厂房、雇佣工人，不是因为它关心劳动者的生命，而是因为活劳动能够为它创造利润。在这种关系中，工人的身体本身就被当成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只要工人能够继续劳动，只要生产能够继续运转，只要产品能够继续卖出去，工人的危险、疲惫、恐惧和伤害，就会被资本当作可以忍受的“生产条件”。

烟花爆竹行业把这个矛盾表现得格外尖锐。因为在普通行业中，压低安全成本可能表现为工伤、职业病、机械伤害、过劳和慢性损害；而在烟花爆竹这种易燃易爆行业中，压低安全成本很容易直接表现为爆炸、燃烧、坍塌和群死群伤。这里没有多少缓冲地带。火药不会因为企业要赶订单就变得温顺，粉尘不会因为地方要发展产业就失去危险性，化学品不会因为文件上写着“安全第一”就停止反应。物质规律不会服从资本的利润计划，但资本却总是试图让工人的生命去适应它的利润计划。

因此，所谓“节约成本”，在高危行业中具有极其血腥的含义。少维护一次设备，可能就是多给爆炸留一次机会；少做一次培训，可能就是让工人在不充分了解危险的情况下进入现场；少设置一道隔离，可能就是让局部事故扩大成整体灾难；多堆一点物料，可能就是把一个车间变成一个更大的火药桶；为了赶订单多压一天生产，可能就是把工人的生命再往危险边缘推一步。资本账本上省下来的每一笔钱，都可能以工人的血肉形式重新出现。

资产阶级总喜欢把企业说成“市场主体”，把利润说成“发展动力”，把成本控制说成“经营能力”。可是，在工人阶级看来，必须反过来看：企业所谓的经营能力，往往就是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减少安全投入、提高劳动强度、转嫁风险的能力。资本所谓的效率，不是劳动者生命安全的效率，而是利润实现的效率。它不是让人更安全地劳动，而是让人在更短时间内、更低成本下、更多风险中为资本创造更多剩余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安全问题和剥削问题分开。工人被剥削，不只是工资被压低，不只是劳动时间被延长，也包括他们被迫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劳动。危险本身就是剥削的一部分。资本把安全成本压下去，把危险转嫁给工人，再把省下来的成本转化为利润。也就是说，工人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价值，而且还用自己的身体替资本承担风险。资本赚到的不只是产品利润，还包括它没有支付的安全成本；而这部分成本，最终由工人的伤残、死亡和家庭破碎来偿还。

在这里，所谓“安全投入不足”并不是一个中性的管理缺陷，而是资本逐利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企业如果真正把工人生命放在第一位，就必须在很多情况下牺牲利润：危险品不能超量存放，生产节奏不能无限加快，隐患没有排除就不能复工，设备没有维护就不能使用，工人没有充分培训就不能上岗，发现重大问题就必须停产。可是，一旦这样做，资本的增殖就会受阻，订单会延误，成本会上升，市场竞争中可能落后。因此，在资本逻辑面前，安全总是被迫接受利润的审判。

这不是某一个老板“良心坏”的问题。个别资本家当然可以更贪婪、更冷血、更无耻，但即使换成另一个老板，只要他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只要企业仍然以利润为目的，只要生产仍然由资本支配，压缩成本、追赶订单、提高周转、降低安全支出，就仍然会作为一种客观压力存在。资本家可以在嘴上讲安全，在会议上讲责任，在墙上贴标语，但只要安全和利润发生冲突，资本的本能就会推动它把安全往后排。

这也是为什么高危行业中常常出现“明知危险仍然生产”的现象。不是他们不知道危险，而是他们知道危险之后仍然要算账：停产一天损失多少？整改一次花费多少？处罚一次金额多少？事故概率多大？能不能侥幸过去？能不能临时应付检查？在这种账本里，工人的生命被变成了概率，安全隐患被变成了风险成本，监管处罚被变成了经营支出。只要违法成本低于整改成本，只要事故概率被资本侥幸地估算为“还不会马上发生”，危险生产就会继续运转。

这种账本本身就是吃人的账本。它表面上计算的是成本、利润、产量和订单，实际上计算的是多少危险可以让工人承担，多少隐患可以继续拖延，多少风险可以押在劳动者身上。资本不需要公开说“工人可以死”，它只需要在每一次安全投入面前犹豫，在每一次整改要求面前拖延，在每一次工人担忧面前压制，在每一次监管检查面前应付，最后工人的死亡就会作为资本逻辑的结果出现。

所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所暴露的，不只是某一个企业的管理混乱，而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安全和利润之间的根本矛盾。安全要求减速，资本要求加速；安全要求隔离，资本要求节省空间；安全要求停产整改，资本要求连续生产；安全要求工人拥有发言权，资本要求劳动现场服从管理命令；安全要求生命高于产量，资本要求产量服务利润。只要这种矛盾仍然存在，所谓“安全生产”就永远处在被利润侵蚀的危险之中。

在修正主义统治下，这种资本逻辑又披上了“发展”的外衣。企业赚钱被说成发展，地方产业扩张被说成发展，出口订单增加被说成发展，城市名片打响被说成发展。可是，对于工人来说，问题是：这种发展到底是谁的发展？如果发展的结果是企业利润增加，而工人仍然在火药桶旁劳动；如果发展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增长，而劳动者没有安全监督权；如果发展的结果是烟花产业更加繁荣，而生产者的生命仍然可以被危险条件吞没，那么这种发展就是建立在工人血肉之上的发展。

资产阶级和官僚可以在事故后说“生命至上”，但真正的“生命至上”必须表现在事故前。它必须表现在企业敢不敢因为安全停产，地方政府敢不敢因为隐患关闭企业，监管部门敢不敢因为工人举报追究资本，生产现场敢不敢让工人真正掌握监督权。如果平日里一切都服从订单、产量、利润和政绩，事故后再讲“生命至上”，就只能是一种迟到的、虚伪的、用来安抚社会情绪的政治语言。

我们必须指出，高危行业的安全问题不可能靠资本家的自觉来解决。因为资本家的自觉一旦触及利润，就会迅速退缩；企业的承诺一旦遇到订单，就会迅速让步；监管的口号一旦碰到地方利益，就会迅速软化。真正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安全的力量，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只有那些每天在危险中劳动的人，才最知道哪里危险，哪里需要整改，哪里不能继续生产。只有工人有权监督生产，有权公开隐患，有权拒绝危险作业，有权组织起来同资本斗争，安全才不会只是资本账本上的一项成本。

因此，浏阳“5·4”事故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就是：不能把安全成本问题看成企业管理问题，而必须看成阶级剥削问题。资本压低安全成本，不是因为它不懂安全，而是因为它懂利润；不是因为它不会计算，而是因为它计算得太清楚；不是因为它偶然疏忽，而是因为它总是把工人的生命放在资本增殖之后。所谓“节约成本”，在高危行业里就是节约工人的生命；所谓“提高效率”，在资本统治下就是提高工人承受危险的强度；所谓“产业发展”，如果不由劳动者掌握权力，就可能变成一条通向爆炸、伤残和死亡的道路。

这正是这场事故最不能被掩盖的地方：火药爆炸只是一瞬间，资本压低安全成本却是长期的；厂房坍塌只发生在现场，利润逻辑却贯穿整个产业链；工人的死亡被写进事故通报，资本的日常剥削却常常被包装成发展成就。我们要揭开的，正是这种包装。我们要指出的，正是那些被烟花光亮掩盖的黑暗：资本把安全变成成本，把工人变成耗材，把危险变成利润的一部分，最后又把爆炸后的血债交给劳动者家庭和整个社会来承担。

四、工人承担危险，资本占有收益：烟花产业繁荣背后的血肉代价

在烟花产业的宣传话语中，人们看到的是“传统产业”“地方品牌”“出口优势”“产业集群”“文化名片”。烟花升空的时候，城市看到的是节日气氛，商人看到的是市场订单，地方政府看到的是产业政绩，消费者看到的是绚烂景观。可是，在这一切光亮背后，真正支撑烟花产业运转的，是一个个在火药、粉尘、化学品和爆炸风险中劳动的工人。烟花在天空中爆开之前，首先是在工人的劳动现场中被制造出来的；节日的光亮，首先来自劳动者在危险中的生产。

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阶级对立：资本得到利润，地方得到名声，市场得到商品，消费者得到观赏，而工人得到的却是危险。烟花产业越是被包装成地方经济的成功，越不能掩盖它对高危劳动的依赖。所谓“产业链完整”“生产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在工人阶级看来，首先意味着更多劳动者被组织进危险生产之中，更多火药、半成品和危险物料在生产现场流动，更多劳动时间被投入到可能爆炸的环境里。

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在这里。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商品好像脱离了生产过程，变成了独立的东西。烟花被摆在货架上，被用于庆典，被出口到海外，被地方宣传包装成文化符号。可是，这些商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工人用劳动制造出来的，是在具体的厂房、车间、工序、设备和危险环境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显得光鲜，生产它的劳动过程却可能充满危险；商品在消费者面前带来欢乐，生产者却可能在制造它的过程中失去生命。

这就是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颠倒。人们容易记住商品的价格、品牌、用途和景观，却忘记商品背后的劳动者。烟花升空时，掌声给了烟花；产业获奖时，荣誉给了地方；订单增加时，利润给了资本；事故发生时，死亡却给了工人。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产品，工人的身体承担了风险，工人的生命支撑了产业，但工人并不真正占有这个产业的成果。资本占有产品，资本占有利润，资本占有生产指挥权，而工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并承受生产中的危险。

因此，不能把烟花厂爆炸看作一个孤立事件。它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收益和风险的分离。收益向上集中，风险向下转嫁。企业经营者不必每天站在最危险的工位上，地方官员不必每天接触火药粉尘，市场商人不必在装药、称量、搬运和储存中承受爆炸风险。真正被放在危险中心的，是一线工人。可是当产品销售、利润实现、地方产业扩张时，工人并不是主要受益者。工人得到的只是工资，而工资本身又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是让工人能够继续活下去、继续回到危险岗位上的最低条件。

在这里，工资掩盖了剥削，工资也掩盖了危险。资本好像已经通过工资支付了工人的劳动，于是工人在危险环境中所承受的一切都被说成“岗位要求”“行业特点”“个人选择”。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工人拿到的工资，并不等于他们创造的全部价值，更不等于他们承担的全部风险。资本不仅占有剩余价值，而且把生产风险压到工人身上。工人的工资里，并没有真正包含他们可能被炸死、炸伤、毁容、致残、失去健康和让家庭破碎的代价。资本付出的只是劳动力价格，工人交出的却可能是整个身体和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高危行业的工人处境尤其残酷。普通剥削表现为剩余劳动被资本占有，而高危行业中的剥削还表现为生命风险被资本转嫁。资本不仅让工人为它劳动，还让工人为它承担危险；不仅从工人的劳动时间中榨取价值，还从压低安全成本中获得额外利益。只要企业少投入一点安全设施，少安排一点培训，少维护一次设备，少停产一天整改，它就可能节省成本、提高产量、保住订单。而这些被节省下来的成本，最终并没有消失，只是转化成工人身体上的风险。

因此，烟花产业的所谓繁荣必须被重新审视。它不是一个中性的经济事实，而是一个阶级事实。谁在繁荣中得到利润？谁在繁荣中承担危险？谁用“地方经济”来包装产业？谁用“就业机会”来要求工人忍受危险？谁在事故后说“沉痛哀悼”，却在事故前不断推动生产扩张？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所谓产业繁荣就会成为掩盖阶级剥削的漂亮词语。

地方政府常常把这类产业说成“带动就业”。可是，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是有没有就业，而是什么样的就业。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会给工人提供工作，因为资本需要劳动力来增殖自己；但是它提供的工作往往是低工资、高强度、缺少权利、充满风险的工作。如果所谓就业意味着工人只能在火药桶旁谋生，如果所谓产业发展意味着劳动者必须用生命换工资，如果所谓地方经济稳定意味着工人不能真正拒绝危险作业，那么这种就业就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更恶劣的是，统治阶级还常常用“老百姓要吃饭”“地方要发展”“企业要生存”来为高危生产条件开脱。仿佛只要一个产业提供了就业，它对工人的危险就可以被原谅；仿佛只要地方经济需要它，它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拖延；仿佛只要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工人就应该理解资本压缩成本。可是，工人要吃饭，难道就必须在死亡风险中吃饭吗？地方要发展，难道就可以把劳动者放进火药桶里发展吗？企业要生存，难道就可以让工人用自己的生命给资本续命吗？

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无耻的地方：它先用贫困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力，再用就业机会要求工人感谢资本，最后在工人因危险生产而死亡时，又用“行业特殊”“管理疏漏”“个别责任”来掩盖资本的根本责任。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生存；资本掌握生产资料，于是可以规定工人在哪里劳动、怎样劳动、以什么节奏劳动、承担什么风险。所谓“选择工作”，在这种关系中并不是真正自由的选择，而是被生存压力逼出来的被迫选择。

烟花厂工人的处境，正是这种被迫选择的集中表现。工人当然知道危险，工人当然不愿意被炸死，工人当然希望安全地劳动、安全地回家。可是，当生产资料不属于工人，当就业机会掌握在资本手里，当地方产业链把大量劳动者吸附在高危生产上，当工人没有独立组织和监督权时，个人意愿就无法改变生产条件。一个工人可以害怕爆炸，却不能凭个人害怕改变整个车间的安全制度；一个工人可以发现隐患，却不一定有权要求停产；一个工人可以想活着回家，却必须在资本规定的危险秩序中继续劳动。

所以，不能把事故后的哀悼和事故前的生产分开。真正的问题不是事故后有没有表达悲痛，而是事故前有没有把工人当人。工人的生命不是在追悼会和通报中才有价值，而是在每天进入车间之前就应当高于利润、高于产量、高于订单、高于地方政绩。如果平日里生产服从利润，事故后再说生命宝贵，这种宝贵就是虚伪的；如果平日里工人没有权力，事故后再说尊重生命，这种尊重就是空洞的；如果平日里资本可以支配危险，事故后再说严肃追责，这种追责就很容易变成维持秩序的表演。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看到，烟花的“美”本身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扭曲了。人民群众当然有节日生活的需要，当然有审美和娱乐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连这种需要也被资本拿来组织高危生产、榨取利润、转嫁风险。天空中的烟花越美，越应该让我们想到地面上的劳动者；节日的欢笑越响，越不能忘记那些在生产过程中被迫承担危险的人。真正的人民节日，绝不应该建立在工人无权和生命风险之上。

资本主义把工人的劳动隐藏在商品背后，把工人的危险隐藏在产业背后，把工人的死亡隐藏在事故通报背后。我们的批判，就是要把这些被隐藏的东西重新揭开。我们要说清楚：烟花产业的利润不是资本家天才经营的结果，而是工人劳动的结果；地方产业的繁荣不是官僚政绩的恩赐，而是劳动者付出的结果；事故中的死亡不是命运无常，而是资本把危险压给工人的结果。

因此，浏阳“5·4”事故的第四个教训就是：必须从收益和风险的分配中看见阶级关系。谁占有收益，谁承担风险，这是判断一个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关键。在这起事故中，资本和地方利益集团占有产业收益，而工人承担生产风险；资本和官僚宣传产业繁荣，而工人用身体支付繁荣的代价；资本可以在市场中实现利润，而工人却可能在车间中失去生命。这种关系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表现。

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绝不能允许这样的分离继续存在。生产的目的应当是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资本增殖；生产的组织应当服从劳动者生命和安全，而不是服从利润和政绩；生产的成果应当归劳动人民享有，而不是由资本占有；生产中的风险应当由社会共同消除，而不是转嫁给最底层工人。只有当劳动者真正掌握生产资料，真正掌握监督生产和管理生产的权力，产业的发展才不再是少数人的利润和多数人的危险，才不再需要用工人的血肉来照亮资本的天空。

浏阳的爆炸告诉我们：烟花升空的一瞬间可以被消费社会看作美景，但烟花生产中的每一分危险都必须被工人阶级看作血债。我们不能只看见天空中的光亮，而忘记车间里的火药；不能只看见地方产业的名片，而忘记劳动者的伤亡；不能只看见事故后的追责，而忘记事故前的剥削。工人承担危险、资本占有收益，这正是这场事故背后最清楚、最残酷、也最不能被掩盖的阶级真相。

五、地方产业利益与监管矛盾：当监管者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推动者

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不能只从企业内部寻找原因，也不能只停留在某个厂房、某个车间、某个管理人员的责任上。烟花厂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个完整的地方产业体系之中。企业的生产、地方的财政、产业的名声、出口的订单、政府的政绩、监管的尺度，彼此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地方产业利益和监管责任之间的矛盾，才成为高危行业事故反复发生的重要根源。

浏阳是著名的烟花产地。烟花产业不仅仅是普通企业经营问题，而是被包装成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传统产业的重要代表、城市形象的重要名片。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面对烟花企业时，就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监管者。它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组织者、推动者、宣传者和受益者。它要维护地方产业规模，要保护市场竞争力，要保证就业，要争取税收，要塑造地方品牌。这样一来，监管者和发展者的身份就发生了冲突。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负责监管企业安全，企业负责落实主体责任，二者似乎界限分明。但在现实中，只要一个产业深深嵌入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就很难真正站在工人生命安全的立场上同企业利益彻底对立。企业停产，影响产值；严格整改，影响订单；关停落后产能，影响就业和税收；处罚过重，影响产业稳定；事故曝光，影响地方形象。于是，安全监管很容易从“消灭危险条件”，退化为“不要出大事”；从“保护工人生命”，退化为“维持生产秩序”；从“严格执法”，退化为“帮助企业过关”。

这就是地方产业利益和监管责任之间的根本矛盾。一个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监管，应该首先问：工人的生命是否安全？危险品是否严格隔离？生产现场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工人是否有权拒绝危险作业？隐患是否彻底清除？如果不能保证，就必须停产，必须整改，必须追责，必须公开。而一个被地方产业利益牵引的监管，则会首先考虑：企业能不能继续生产？产业会不会受影响？订单会不会流失？地方名声会不会受损？社会舆论能不能控制？这两种逻辑是根本不同的。

在高危行业中，这种矛盾特别致命。因为安全监管只要稍微让步，后果就可能是爆炸、燃烧、坍塌和死亡。普通行业中的形式主义检查，可能造成慢性损害；而烟花爆竹行业中的形式主义检查，却可能直接把几十个工人的生命推向灾难。危险品混存、防静电设施失效、物料堆放混乱、工房布局不合理、超量储存、违规操作，这些都不是可以“带病运行”的小毛病。它们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引爆事故的条件。

可是，在地方产业利益面前，这些危险往往会被行政语言驯化。严重隐患被说成“问题”；违规生产被说成“管理不到位”；安全设施失效被说成“落实不细”；危险品混存被说成“现场管理不规范”；监管失职被说成“责任压得不实”。这种语言看起来客观，实际上是在降低问题的政治性质。它把可能杀人的危险说成可以整改的缺陷，把危及工人生命的制度性问题说成工作作风问题，把资本和地方利益的合谋关系说成“安全理念不牢”。

更要害的是，地方监管往往不是完全不知道问题，而是知道以后仍然采取轻微处理、象征处理、程序处理。检查发现隐患，发整改通知；企业提交材料，表示已经整改；监管部门复查，盖章通过；随后企业继续生产。这个过程看起来有程序、有文件、有记录，但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危险真的被清除。相反，它可能只是把危险从现实现场转移到纸面材料上，把工人的生命安全变成了一套行政流程。只要流程走完，责任似乎就落实了；至于车间里是不是真的安全，工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活着回家，反而变成次要问题。

这正是形式主义监管最可怕的地方。它并不是没有动作，而是用动作代替结果；不是没有检查，而是用检查代替整改；不是没有文件，而是用文件代替安全；不是没有责任制，而是用责任制的字面存在代替工人的实际权力。它把监管变成一种表演，把隐患变成一种材料，把工人的生命变成一种可以在报告中被处理的对象。等到事故发生之后，同样的机器又会开动起来：成立调查组，召开会议，下发通知，开展专项整治，强调举一反三。于是，事故前的形式主义，变成事故后的形式主义；事故前没有保护工人，事故后也未必真正改变结构。

必须指出，地方政府在这种关系中并不是中立的。它不是站在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公正裁判，而是在现实中同地方资本、产业链、税收、就业、政绩深深绑定在一起。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地方政权，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机关，而是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维护地方资本积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产业秩序的官僚机器。它的“监管”并不脱离它的阶级性质。它可以在事故后表现出愤怒和悲痛，但在事故前，它更常表现为对产业运行的保护、对企业困难的体谅、对工人声音的忽视。

这种地方官僚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总是赤裸裸的腐败，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表现为直接收钱办事。更常见、更稳定、更深层的，是利益结构上的一致。企业要利润，地方要税收；企业要生产，地方要产值；企业要订单，地方要产业名片；企业怕停产，地方怕影响经济；企业怕曝光，地方怕影响形象。即使没有一笔具体的交易，这种结构也会推动地方权力在监管上软化，在处罚上从轻，在整改上留余地，在舆论上控制影响。阶级关系不只是通过贪腐表现出来，更通过整个地方发展逻辑表现出来。

所以，事故发生后如果只是说“监管不到位”，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问：为什么监管会不到位？为什么高危行业中明明需要最严格的监管，却往往出现最熟练的形式主义？为什么地方政府一方面强调安全，一方面又不断推动产业扩张？为什么发现隐患之后不能真正停产，不能真正清除危险，不能真正让工人参与监督？答案就在于：监管被地方产业利益绑架，工人生命被放在地方资本积累和政绩工程之后。

这种矛盾也决定了，单靠自上而下的检查很难真正保护工人。因为检查本身属于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又同地方产业利益纠缠在一起。今天检查，明天复产；今天通报，明天淡忘；今天专项整治，明天恢复常态。只要工人没有权力，只要生产现场的信息掌握在企业和监管部门手中，只要隐患能不能公开由上面决定，只要停不停产由资本和官僚协商，工人的生命就仍然处在被动地位。所谓监管严格与否，仍然取决于统治机器的需要，而不是取决于劳动者自己的安全要求。

真正的安全监管，不能只靠官僚机关来完成。高危行业的第一监督者，应该是每天在危险中劳动的工人。因为只有工人最清楚设备有没有问题，物料堆放是否危险，工序是否被压缩，管理层是否为了赶订单违章，培训是否走过场，防护设施是否真的能用。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的这种知识被压低，工人的这种判断被排斥，工人的这种发言权被剥夺。企业把他们看作劳动力，监管把他们看作被管理对象，而不是生产安全的主人。

这就暴露了修正主义社会所谓“人民至上”的虚伪。如果人民真的至上，那么工人就应该有权监督企业；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工人就应该有权拒绝危险作业；如果安全真的第一，那么地方政府就应该把工人生命放在产业发展之前；如果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那么劳动者就不应该在自己创造的产业中处于最无权、最危险、最被动的位置。可是现实恰恰相反：资本有权组织生产，地方有权决定产业政策，监管有权处理事故，而工人只有在事故中死亡、受伤、等待赔偿的“权利”。

因此，浏阳“5·4”事故的第五个教训，就是必须揭露地方产业利益与监管责任之间的矛盾。不能把地方政府简单说成“没有管好”，而要看到它在产业发展中的实际角色。它不是站在外面看着资本，而是同资本共同构成地方经济秩序；它不是单纯失误，而是在长期发展逻辑中把工人生命置于产业利益之后；它不是偶然监管失职，而是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表现出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本性。

事故之后的调查和追责，当然必须进行。但如果追责只停留在几个企业负责人，只处理几个基层监管干部，只开几场安全会议，而不揭开地方产业利益对监管的系统性侵蚀，那么这种追责就是不彻底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事故后谁来背锅，而是事故前谁在保护生产继续运转；不是谁在爆炸后说错了话，而是谁在爆炸前让危险继续存在；不是哪一个干部没有认真检查，而是整个地方发展模式为什么总是把产业和利润放在工人生命之前。

我们要反对用“发展中的问题”来淡化这场事故。工人的生命不是发展的燃料，劳动者的身体不是地方产业的垫脚石，危险生产不能因为能带来产值就被宽容，监管失职不能因为地方经济需要就被解释。所谓发展，如果建立在工人无权、危险积累和事故频发之上，就不是人民的发展，而是资本的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劳动者的解放，而是劳动者被继续压在利润和政绩之下。

所以，必须把地方监管问题重新放回阶级斗争中理解。安全监管不是中性的技术治理，而是不同阶级利益冲突中的一个战场。资本要求宽松，工人要求安全；地方要求稳定，工人要求生命；官僚要求可控，工人要求公开；企业要求复产，工人要求彻底整改。站在哪一边，决定了监管的性质。只要监管站在产业和资本一边，它就只能在事故后悲痛，在事故前纵容；只要监管不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它就永远可能变成保护资本的形式主义外壳。

浏阳的爆炸不是单个企业的爆炸，也是地方产业治理模式的爆炸。它炸开的不仅是厂房，也炸开了“发展优先、安全随后”的虚伪逻辑；炸开的不仅是生产现场，也炸开了地方官僚和资本利益纠缠的现实；炸开的不仅是火药，也炸开了那些关于产业繁荣、地方名片、传统优势的漂亮话。我们必须透过浓烟看到：当监管者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当地方政绩同资本利润绑在一起，当工人被排除在安全监督之外，所谓监管就很容易成为事故之前的保护伞和事故之后的遮羞布。

六、形式主义监管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不愿触动利益

在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中，最不能被轻轻放过的，就是事故前已经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监管失效。高危行业的事故，往往不是因为危险完全隐藏起来，而是因为危险即使被看见，也没有被真正消灭。检查可以发现问题，文件可以指出问题，处罚可以记录问题，整改可以声称完成问题，但只要这些动作没有改变生产现场的实际危险条件，它们就只是形式主义监管的一部分。这样的监管不是没有眼睛，而是没有阶级立场；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不愿触动危险背后的利益。

所谓形式主义监管，并不是完全不检查、不发文、不处罚。恰恰相反，它经常有很多动作：有检查记录，有整改通知，有行政处罚，有专项会议，有安全培训，有责任书，有台账，有汇报材料。表面上看，监管机器一直在运转；但问题在于，这些运转是否真正服务于工人的生命安全，是否真正迫使企业停产整改，是否真正清除了危险源，是否真正让工人能够监督生产。如果没有，那么再多的文件、会议和检查，也只是在给危险生产披上一层合法外衣。

在高危行业中，形式主义监管的危害尤其严重。因为烟花爆竹生产不是普通生产，它的危险不是抽象的。火药、粉尘、氧化剂、还原剂、半成品、成品、储存空间、工房布局、防静电设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直接关系到工人的生命。这里没有多少侥幸空间，也没有多少试错机会。普通行业中一个隐患可能造成一名工人受伤，而烟花爆竹行业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可能瞬间造成群死群伤。因此，对这类行业来说，监管如果只是走过场，本身就是对工人生命的犯罪。

可是，在资本和地方产业利益的压力下，危险往往被行政化、轻描淡写化、可整改化。严重隐患被写成“存在问题”，违规生产被写成“管理不到位”，危险品混存被写成“现场不规范”，防护设施失效被写成“维护不及时”，监管失职被写成“责任落实不细”。这些词语看似温和、专业、规范，实际上却在降低危险的真实性质。它们把可能导致爆炸和死亡的条件，变成了可以在表格中勾选、在报告中说明、在会议中强调、在下一轮检查中复核的行政事项。

这种语言本身就是统治秩序的一部分。它不直接否认危险，却把危险变成可以管理的文字；它不公开反对安全，却把安全变成可以拖延的程序；它不说工人的生命不重要，却在实际操作中让工人的生命服从于企业复产、地方稳定和产业利益。事故发生前，它用“整改”来安抚危险；事故发生后，它用“追责”来平息愤怒。无论事故前还是事故后，它最关心的往往不是工人阶级如何掌握安全权力，而是如何把问题重新纳入官僚程序之中。

形式主义监管最典型的逻辑，就是“发现—通知—整改—复查—归档”。这个程序表面上完整，实际上完全可能脱离生产现场的真实危险。检查人员发现问题，企业写整改报告；监管部门收到材料，认为程序完成；企业继续生产，地方产业继续运转。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整改是不是彻底？工人有没有参与确认？危险物料是不是清空？设备是不是恢复有效？生产节奏是不是降低？企业有没有因为隐患真正付出不能继续生产的代价？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所谓整改就只是纸面整改。

纸面整改的本质，是用文字代替现实，用材料代替安全，用程序代替工人的生命。资本最喜欢这种整改，因为它成本低、影响小、容易应付；官僚也喜欢这种整改，因为它有文件、有记录、有流程，可以在事故发生后证明“我已经履职”。但工人最清楚，这种整改并不能保证他们安全。车间里有没有危险，工人知道；设备有没有失效，工人知道；物料是不是乱堆，工人知道；管理层是不是为了赶订单继续冒险，工人也知道。只是工人的知道没有权力，官僚的文件却有权力；工人的生命被放在现场，官僚的责任被放在档案里。

这就是形式主义监管的阶级本质。它不是单纯懒惰，不是单纯低效，也不是单纯能力不足，而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种治理方式。它既不能完全放任事故，因为事故会破坏社会稳定；又不愿真正触动资本，因为资本和地方产业利益是它要维护的经济基础。于是，它就在中间寻找平衡：平日里检查一下、提醒一下、处罚一下、整改一下，让生产继续运行；事故后严肃一下、震怒一下、问责一下、整顿一下，让秩序重新恢复。

在这种模式下，监管不是为了根除危险，而是为了管理危险；不是为了让工人掌握安全，而是为了让危险在统治机器可控范围内继续存在。只要不出大事，隐患可以拖；只要舆论不爆炸，问题可以压；只要企业还能生产，整改可以慢；只要地方产业还需要，处罚可以轻。直到爆炸真的发生，几十条生命被吞没，统治机器才开始表现出它的“严肃性”。可是这种严肃性恰恰暴露了它平日里的不严肃。

如果事故前早已发现危险，却只是轻罚、警告、要求整改，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为什么这样的危险没有导致立即停产？为什么高危企业可以在隐患存在的情况下继续生产？为什么处罚的代价远远低于彻底整改的代价？为什么工人的生命安全要靠企业自觉和监管部门的抽查来保障？为什么一线工人不能直接要求停产、不能公开隐患、不能组织自己的安全监督？这些问题，才是形式主义监管真正害怕被提出的问题。

形式主义监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总是把安全责任向下压。上级压给地方，地方压给部门，部门压给企业，企业压给班组，班组压给工人。到最后，最没有权力的人，反而被要求承担最多的安全责任。工人要签安全承诺书，工人要参加安全培训，工人要记住操作规程，工人要提高安全意识；可是工人能不能决定安全投入？不能。工人能不能决定生产节奏？不能。工人能不能决定停产整改？不能。工人能不能公开企业隐患而不受打压？往往不能。于是，责任层层下压，权力层层上收，最后形成最荒唐的局面：有权的人不直接承受危险，承受危险的人没有权力。

这正是资产阶级安全治理的虚伪所在。它要求工人在危险中保持纪律，却不给工人改变危险的权力；它要求工人对自己生命负责，却不让工人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管理；它要求工人服从安全规章，却允许资本在利润压力下不断侵蚀安全边界。所谓“人人都是安全责任人”，如果不建立在工人权力之上，就只能变成“人人都可以被追责，而真正有权的人可以转移责任”。

因此，我们必须把形式主义监管同工人无权联系起来。只要工人没有权力，监管就很容易变成官僚和资本之间的内部事务。企业向监管部门汇报，监管部门向上级汇报，上级向社会通报；而真正每天面对火药和粉尘的工人，只能被动接受安排。安全信息不掌握在工人手中，隐患整改不由工人确认，停产复产不由工人参与决定，事故调查也很难真正体现工人的声音。在这样的制度下，所谓监管再严，也仍然是从上往下的统治技术，而不是工人阶级自我保护的武器。

真正有效的监管，必须以工人群众的参与为基础。高危行业的安全监督，不能只靠企业自查，不能只靠地方抽查，不能只靠上级专项检查，而必须让一线工人拥有实际权力。工人应该有权选出自己的安全代表，有权随时报告和公开重大隐患，有权要求立即停产，有权参与复产验收，有权查看企业安全记录和处罚记录，有权拒绝任何危险作业而不被开除、不被扣工资、不被打击报复。没有这些权力，所谓监管就永远缺少最关键的一环。

但是，这种工人监督权恰恰是资本和官僚最不愿意给的。因为一旦工人拥有真正的监督权，生产现场就不再完全由资本支配；一旦工人能够公开隐患，企业就不能轻易掩盖危险；一旦工人能够要求停产整改，订单和利润就不能凌驾于生命之上；一旦工人能够组织起来，安全问题就会从行政管理问题变成阶级斗争问题。资本害怕的不是安全口号，资本害怕的是工人用组织起来的力量把安全从口号变成权力。

这也说明，形式主义监管不是一句“加强监管”就能解决的。统治者每次事故后都会说加强监管，问题是：谁来监管监管者？谁来监督企业和地方政府？谁来保证整改不是纸面整改？谁来保证工人声音不被压制？如果答案仍然是上级机关、专项检查、领导批示，那么旧问题还会以新形式回来。因为整个监管体系仍然在官僚结构内部循环，工人仍然被排斥在真正权力之外。

所以，我们批判形式主义监管，不是为了要求官僚机器“更认真一点”就算完了，而是为了指出：只要监管不接受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只要安全不成为工人的实际权力，只要企业和地方政府仍然可以用文件和程序处理危险，事故就不会真正被预防。官僚可以在事故后写出最严厉的通报，资本可以在事故后做出最诚恳的检讨，但只要事故前工人仍然无权，下一次危险就仍然会在沉默中积累。

浏阳“5·4”事故的第六个教训，正在于此：危险并不总是因为没人知道而存在，更多时候是因为知道危险的人没有权力，拥有权力的人不愿触动利益。工人知道现场危险，却缺少组织和制度保障；监管部门知道行业危险，却受制于地方产业和官僚逻辑；企业知道隐患可能致命，却把整改成本放在利润账本里计算。于是，危险被所有人看见，又被所有有权者拖延；危险被不断记录，又被不断归档；危险被反复强调，又被继续保留在生产现场。

这不是无知造成的悲剧，而是利益造成的罪行。不是没有发现隐患，而是发现隐患后没有让资本真正付出代价；不是没有安全制度，而是安全制度没有掌握在工人手中；不是没有监管机关，而是监管机关同地方产业利益纠缠在一起。形式主义监管的本质，就是在不改变资本支配生产的前提下，试图用文件、会议、检查和处罚来管理资本制造的危险。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事故后那种空洞的总结：“安全生产不能有丝毫松懈。”真正要问的是，谁在松懈？为什么松懈？谁从松懈中获利？谁为松懈付出生命？如果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发现，所谓松懈并不是抽象的作风问题，而是资本和官僚在利益面前共同形成的纵容。工人的生命被放在纸面制度之后，危险被放在产业利益之后，监管被放在地方发展之后，最后爆炸把所有这些被拖延、被掩盖、被轻描淡写的问题一次性炸开。

浏阳的爆炸告诉我们：形式主义监管不是安全生产的偏差，而是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安全治理的常态表现之一。它可以检查危险，却不根除危险；它可以记录隐患，却不让工人掌握权力；它可以处罚企业，却不改变资本支配生产；它可以在事故后追责，却不能在事故前真正把工人的生命放在利润和政绩之上。这样的监管，越是外表严密，越说明工人阶级必须争取自己的监督权；越是程序完整，越说明没有工人参与的安全制度不过是统治秩序的装饰。

七、不能把责任甩给一线工人：受害者不是替罪羊

每一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最容易被推到前台的，往往不是资本所有者，不是地方官僚，不是长期失职的监管链条，而是一线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事故通报中常见的词语，是“操作不规范”“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业”“现场管理不到位”“员工培训不足”。这些词语看似是在追究责任，实际上却经常把责任链条向下压，把真正的制度性责任遮蔽起来。最危险的地方由工人站着，最沉重的责任也往往被推给工人；而真正有权决定生产条件的人，却常常躲在“管理问题”和“个别失误”的背后。

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当然需要查明直接环节，也当然需要追究所有直接责任人。但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原则：不能把一线工人当成事故的根源。工人进入烟花厂，不是为了制造事故，更不是为了把自己炸死。工人进入车间，是因为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他们接触火药、粉尘、化学药剂、成品和半成品，是因为资本把他们安排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他们服从工序、服从班组、服从管理、服从产量要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把他们固定在这种秩序之中。工人不是危险生产关系的设计者，而是危险生产关系的承受者。

所谓“操作失误”，必须放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理解。在抽象的事故分析中，一个动作可以被孤立出来，好像某个人只要“不犯错”，事故就不会发生。但在现实的生产中，工人的动作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生产节奏、劳动强度、工序安排、管理命令、计件压力、赶工要求、设备状况、物料堆放、培训质量和现场环境的共同制约。工人不是在真空中自由操作，而是在资本规定的时间、空间和纪律中劳动。把事故简单归结为某个操作动作，就是把劳动过程中的强制关系抹掉了。

这正是资产阶级事故叙事的狡猾之处。它把工人从整个生产关系中抽出来，把他们说成一个个孤立的责任主体；然后又用这些孤立的责任主体，来遮盖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可是，谁决定了生产布局？谁决定了危险品怎样存放？谁决定了设备是否维护？谁决定了工人培训是否充分？谁决定了订单优先还是安全优先？谁决定了发现隐患后停不停产？这些决定权并不在一线工人手里，而在企业管理层、资本所有者和地方监管系统手里。既然权力不在工人手里，为什么事故发生后责任却总是向工人身上压？

工人当然可能在劳动过程中犯错，但问题是，一个合理的安全制度，必须防止个体错误变成群死群伤的灾难。真正重视生命的生产体系，应当通过隔离、限量、冗余、防护、监督、停工机制和工人参与，把个人失误的后果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如果一个动作、一个环节、一次疏忽就可以引发特别重大事故，那说明问题不是某个工人“不小心”，而是整个生产系统已经把工人放在没有安全缓冲的危险边缘。把这种系统性危险说成个人责任，是对死伤工人的二次伤害。

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许多所谓“违章”，本身就是资本逼出来的。企业为了赶订单，可能压缩工序；为了节省成本，可能减少人员；为了提高产量，可能默许甚至要求工人加快速度；为了避免停产，可能让工人在隐患没有彻底清除的情况下继续作业。到了事故发生之后，这些在日常生产中被默许的“变通”，又会突然变成工人的“违规操作”。平时资本要效率，事故后资本讲规章；平时管理层催速度，事故后管理层讲纪律；平时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后却要求工人承担“安全意识不足”的罪名。这种逻辑极其卑鄙。

“安全意识淡薄”也是最常见、最虚伪的一种说法。谁最知道烟花厂危险？不是坐办公室的老板，不是事故后赶来视察的官员，不是写通报的人，而是每天进车间的工人。工人当然知道火药危险，知道粉尘危险，知道化学品危险，知道爆炸危险。问题从来不是工人有没有意识，而是工人有没有权力。没有权力的意识，只能变成恐惧；没有组织的意识，只能变成忍耐；没有停工权的意识，只能变成在危险中更加小心地服从。要求工人“提高安全意识”，却不给工人改变危险条件的权力，这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在为资本卸责。

真正应该被追问的是：工人发现危险之后能不能拒绝作业？工人提出隐患之后会不会被打击报复？工人有没有权力要求停产整改？工人有没有自己的安全监督组织？工人能不能查看企业的安全记录、处罚记录和整改报告？工人能不能参与复产验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把事故归结为工人个人意识，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没有权力的地方，不能谈真正的责任；没有组织的地方，不能谈真正的安全；没有工人监督的地方，所谓安全制度就只能是资本管理劳动的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喜欢把责任个人化，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追问阶级关系。它把贫困说成个人不努力，把失业说成个人能力不足，把工伤说成个人不小心，把事故说成个人违章。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被洗干净了。可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反过来揭露：个人行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工人的错误不能脱离劳动制度来分析，基层管理的混乱不能脱离企业逐利来分析，企业违规不能脱离地方产业利益来分析，地方监管失效不能脱离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来分析。

在烟花厂这样的高危生产中，一线工人处于最矛盾的位置。他们最接近危险，却最缺少权力；他们最了解现场，却最难决定现场；他们最需要安全，却最容易被要求服从；他们是事故中最可能死亡和受伤的人，却又最容易在事故后被指责为“操作不规范”。这种荒唐的倒置，正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真实写照。资本掌握生产资料，因此掌握生产指挥权；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因此只能服从资本安排。等到资本组织的危险生产造成灾难，资本又试图把责任推回给被它支配的劳动者。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替罪羊逻辑。真正的责任链条必须从权力链条上查。谁有权决定，就应当首先追究谁；谁从生产中获利，就应当首先追究谁；谁长期纵容隐患，就应当首先追究谁；谁在事故前把产量、订单、利润和地方政绩放在工人生命之前，就应当首先追究谁。不能让最底层的人承担最上层决策的后果，不能让最无权的人替最有权的人背锅，不能让死伤工人的名字变成资本和官僚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这里还必须区别一线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的不同位置。有些班组长、车间负责人可能参与压迫工人，可能执行危险命令，可能在事故中负有直接责任；这些责任当然不能抹掉。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让追责停留在基层。基层管理人员往往只是资本命令的执行者，他们上面还有企业主、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体系、地方监管部门和产业利益结构。如果追责只到基层，就等于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保护起来。真正的追责必须向上追，而不是向下甩。

事故后的司法处理也必须警惕这一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人员被传唤，并不等于全部责任已经被揭开。法律程序可以处理直接责任人，但阶级批判必须追问更深层的东西：为什么危险生产能够长期存在？为什么违法成本低于整改成本？为什么地方监管没有真正把企业压停？为什么工人没有自己的监督权？为什么资本能够把高危劳动组织成利润来源？如果这些问题不被回答，即使处理了若干个人，整个危险生产秩序仍然可能保留下来。

资产阶级法律往往善于处理“谁违反了规定”，却不愿处理“规定为什么不能保护工人”；善于处理“谁直接导致事故”，却不愿处理“谁长期从危险生产中获利”；善于处理“谁在现场犯错”，却不愿处理“谁设计和维持了这个危险现场”。这正是法律形式平等掩盖阶级不平等的地方。在纸面上，每个人都要遵守安全规章；在现实中，有的人制定生产计划，有的人执行生产计划；有的人占有利润，有的人承担危险；有的人坐在办公室里讲安全，有的人在火药桶旁用命试安全。

因此，工人阶级的立场必须非常明确：一线工人首先是受害者，不是替罪羊。即使某些工人被卷入具体操作环节，也不能把他们从资本支配劳动的关系中抽离出来审判。真正该被审判的，是把他们推入危险现场的资本，是让他们无权拒绝危险作业的制度，是把地方产业利益放在工人生命之前的官僚机器，是事故前形式主义监管、事故后切割责任的整个统治逻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提出工人权力的问题。只要工人没有组织权、监督权、停工权和公开隐患的权利，事故后就总会有人把责任推给他们。只有当工人能够集体监督生产，能够公开安全问题，能够拒绝危险命令，能够参与事故调查，能够决定复产条件，所谓安全责任才不是压在工人头上的枷锁，而是工人保护自己生命的武器。没有工人权力，安全责任就是向下甩锅；有了工人权力，安全责任才可能真正变成对资本和官僚的约束。

浏阳“5·4”事故的第七个教训，就是必须撕碎“工人责任论”的面具。不能让死者被沉痛悼念之后，又被暗中指责；不能让伤者在病床上承受痛苦之后，又被写进“操作失误”的叙事；不能让一线劳动者在生产中承担危险，在事故后承担罪名。工人已经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不能再让他们成为资本和官僚逃避责任的工具。

真正的责任不在最底层，而在最有权力、最有利益、最有能力改变生产条件却没有改变的人那里。资本组织了危险生产，地方保护了产业运行，监管纵容了隐患积累，工人则在爆炸中流血死亡。这个关系必须讲清楚。只有讲清楚这一点，浏阳的血债才不会被“操作不规范”“安全意识淡薄”这些词语冲淡；只有讲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从事故中看到真正的阶级真相：受害者不是替罪羊，劳动者不是资本罪行的挡箭牌。

八、事后追责代替不了工人监督：没有工人权力，安全就是空话

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调查组会成立，责任人会被传唤，企业会被停产整顿，地方会开展排查，媒体会报道“深刻吸取教训”，有关部门会强调“压实责任”。这些动作当然不是没有意义。事故必须调查，责任必须追究，死伤者必须得到交代，违法违规者必须付出代价。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事故后的追责，永远代替不了事故前的工人监督。等到爆炸已经发生，等到工人已经死亡，等到家庭已经破碎，再严肃的调查也不能把死者带回来；再严厉的通报也不能改变他们曾经长期处在危险之中的事实。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最擅长的，就是在事故之后表现出严肃性。它可以用最快速度成立调查组，可以用最强硬的语言要求整改，可以用最庄重的姿态表达哀悼，可以用最标准的程序处理责任人。可是，我们必须问：这些严肃为什么总是在事故之后才出现？为什么工人在事故前没有同等严肃的权力去制止危险？为什么企业可以在平日里掌握生产现场，而工人只能在爆炸后被统计为死亡、失联和受伤？为什么监管部门可以事故后要求全面整顿，却没有在事故前真正让工人参与监督？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事后追责处理的是已经爆发的灾难，工人监督针对的则是尚未爆发的危险。事后追责面对的是废墟，工人监督面对的是生产现场；事后追责整理的是事故链条，工人监督切断的是危险链条；事后追责给出的是行政结论，工人监督要求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没有工人监督，安全就只能依赖企业自觉、监管抽查和上级整顿；而这些东西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它们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工人的生命。

事故后的追责，往往有一个明显特点：它把问题纳入国家机器的处理程序之中。谁违法，谁失职，谁违章，谁管理不到位，谁被传唤，谁被处分，谁被追刑责。这套程序可以处理某些具体责任，但它很容易把工人阶级排除在真正的安全权力之外。工人作为受害者出现，作为家属出现，作为伤者出现，作为被安抚和赔偿的对象出现，却很少作为生产安全的主人出现。事故之后他们被同情，事故之前他们却没有权力；事故之后他们被统计，事故之前他们的声音却可以被压下去。

如果一个社会只在事故后让工人被看见，那么这种“看见”本身就是残酷的。工人不应该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被通报，不应该只有在受伤之后才被关心，不应该只有在家属维权之后才被倾听。工人每天都在生产现场，每天都在接触设备、物料、工序和危险。他们对安全的判断，不应该等到事故发生后才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对隐患的担忧，不应该等到爆炸之后才被承认。真正尊重工人生命，就必须在事故发生之前承认工人的监督权。

所谓工人监督，绝不是企业安排几个安全员，也不是让工人签几份安全承诺书，更不是在班前会上喊几句口号。工人监督必须是真正的权力。第一，工人必须有权选出自己的安全监督代表，而不是由企业管理层任命“听话”的安全员。第二，工人必须有权检查生产现场，查看危险品存放、设备维护、通风防护、防静电设施和工序安排。第三，工人必须有权公开重大隐患，而不受开除、扣工资、调岗、威胁和打击报复。第四，工人必须有权在发现严重危险时立即停止作业，要求停产整改。第五，复产不能只由企业和监管部门决定，必须经过工人代表确认。

没有这些权力，所谓“安全生产”就只是资本和官僚的语言。企业可以说自己重视安全，监管部门可以说自己严格执法，地方政府可以说自己深刻反思，但只要工人不能拒绝危险作业，只要工人不能参与停产复产决定，只要工人不能公开隐患，只要工人不能组织起来监督生产，那么安全就仍然掌握在资本和官僚手中。资本和官僚可以承诺安全，也可以为了利润和政绩让安全让步；工人却只能用身体承担他们让步的后果。

工人监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生产现场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完全靠上级检查发现。检查是阶段性的，生产是日常性的；检查可以提前准备，危险却随时存在；检查人员来时企业可以整理现场，检查人员走后生产又可能恢复旧样。真正每天看见危险的，是工人；真正知道设备有没有失效的，是工人；真正知道物料有没有乱放的，是工人；真正知道管理层有没有为了赶订单压缩工序的，也是工人。离开工人监督，监管就像闭着眼睛摸火药桶，迟早要出事。

资本当然不喜欢工人监督。因为工人监督一旦真正存在，就会限制资本对生产现场的绝对支配。工人可以公开隐患，资本就不能轻易掩盖；工人可以拒绝危险作业，资本就不能随意冒险赶工；工人可以要求停产整改，资本就不能把订单放在生命之前；工人可以参与复产验收，企业就不能用纸面材料糊弄监管。工人监督把安全从企业的道德承诺，变成工人阶级的实际权力；把“生命至上”的口号，变成资本必须服从的现实约束。

正因为如此，工人监督不是单纯的安全技术问题，而是阶级权力问题。谁监督生产，谁就拥有一定程度的生产权力；谁能决定停工，谁就能限制资本增殖；谁能公开隐患，谁就能打破企业和地方官僚对信息的垄断；谁能组织工人维护安全，谁就能把分散的恐惧变成集体的力量。资本害怕的不是安全培训，资本可以把安全培训变成形式；资本害怕的是工人组织起来，把安全变成斗争，把监督变成权力，把隐患变成揭露资本的证据。

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工人监督被剥夺得尤其彻底。官方可以说有工会，可以说有职代会，可以说有安全员，可以说有群众路线，可以说人民至上，但在现实的生产现场中，工人有没有权力同资本和管理层对抗？有没有权力公开揭露隐患？有没有权力因为安全问题集体停工？有没有权力不经过企业批准就组织安全监督？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所谓工人参与就是虚假的。它不是工人监督资本，而是资本和官僚把工人组织进它们的管理秩序之中。

真正的工人监督，必须同工人的独立组织相联系。没有组织，工人的声音就是分散的；没有组织，个别工人的举报很容易被压下去；没有组织，工人的恐惧会被管理层各个击破；没有组织，所谓监督权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只有工人能够集体讨论安全问题，集体选出代表，集体要求整改，集体拒绝危险命令，集体保护举报者，安全监督才可能成为现实力量。否则，资本一句“影响生产”，管理层一句“不服从安排”，就可以把工人的个人反抗压下去。

因此，浏阳“5·4”事故之后，如果只是要求“加强监管”，仍然是不够的。加强谁的监管？由谁来监管？监管听谁的声音？监管是否接受工人群众监督？如果还是企业自查、地方检查、上级抽查、事故后追责这一套，工人仍然处在被动地位。真正需要加强的，不只是官僚监管，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监督权；真正需要落实的，不只是企业主体责任，而是劳动者对生产安全的实际决定权；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某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而是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无权状态。

事故后的追责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它常常以“处理完责任人”来结束社会追问。几个负责人被传唤，几个干部被处分，几家企业被停产，几条规定被重申，然后舆论逐渐平息，生产秩序逐渐恢复。可是，如果工人没有获得新的权力，如果安全信息仍然不透明，如果地方产业利益仍然压倒工人生命，如果监管仍然是官僚和企业之间的事务，那么这种追责就只是在旧秩序内部修补旧秩序。它可以清理废墟，却不能阻止下一个废墟的形成。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用追责替代变革的做法。追责必须服务于揭露整个危险生产关系，而不是把问题缩小为若干个人的责任。调查必须追问企业如何组织危险生产，地方政府如何保护产业运行，监管如何形式主义化，工人为什么没有权力，隐患为什么没有被公开，停产为什么没有发生。赔偿必须充分，责任必须上追，制度必须公开，而更重要的是，工人必须从事故中获得组织起来监督生产的权利。否则，追责就是把血债行政化，把愤怒程序化，把阶级问题技术化。

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工人监督被剥夺得尤其彻底。官方可以说有工会，可以说有职代会，可以说有安全员，可以说有群众路线，可以说人民至上，但在现实的生产现场中，工人有没有权力同资本和管理层对抗？有没有权力公开揭露隐患？有没有权力因为安全问题集体停工？有没有权力不经过企业批准就组织安全监督？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所谓工人参与就是虚假的。它不是工人监督资本，而是资本和官僚把工人组织进它们的管理秩序之中。

真正的工人监督，必须同工人的独立组织相联系。没有组织，工人的声音就是分散的；没有组织，个别工人的举报很容易被压下去；没有组织，工人的恐惧会被管理层各个击破；没有组织，所谓监督权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只有工人能够集体讨论安全问题，集体选出代表，集体要求整改，集体拒绝危险命令，集体保护举报者，安全监督才可能成为现实力量。否则，资本一句“影响生产”，管理层一句“不服从安排”，就可以把工人的个人反抗压下去。

因此，浏阳“5·4”事故之后，如果只是要求“加强监管”，仍然是不够的。加强谁的监管？由谁来监管？监管听谁的声音？监管是否接受工人群众监督？如果还是企业自查、地方检查、上级抽查、事故后追责这一套，工人仍然处在被动地位。真正需要加强的，不只是官僚监管，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监督权；真正需要落实的，不只是企业主体责任，而是劳动者对生产安全的实际决定权；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某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而是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无权状态。

事故后的追责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它常常以“处理完责任人”来结束社会追问。几个负责人被传唤，几个干部被处分，几家企业被停产，几条规定被重申，然后舆论逐渐平息，生产秩序逐渐恢复。可是，如果工人没有获得新的权力，如果安全信息仍然不透明，如果地方产业利益仍然压倒工人生命，如果监管仍然是官僚和企业之间的事务，那么这种追责就只是在旧秩序内部修补旧秩序。它可以清理废墟，却不能阻止下一个废墟的形成。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用追责替代变革的做法。追责必须服务于揭露整个危险生产关系，而不是把问题缩小为若干个人的责任。调查必须追问企业如何组织危险生产，地方政府如何保护产业运行，监管如何形式主义化，工人为什么没有权力，隐患为什么没有被公开，停产为什么没有发生。赔偿必须充分，责任必须上追，制度必须公开，而更重要的是，工人必须从事故中获得组织起来监督生产的权利。否则，追责就是把血债行政化，把愤怒程序化，把阶级问题技术化。

工人监督还必须包括事故调查权。事故发生后，不能只让企业、政府、专家和监管部门来解释事故。遇难工人家属、受伤工人、同厂工人、行业工人代表，都应该有权了解事故调查过程，有权提出问题，有权查看相关记录，有权要求公开关键事实。否则，事故调查就可能变成统治机器内部的文件生产。工人的死亡由别人解释，工人的危险由别人定义，工人的赔偿由别人决定，工人的未来由别人安排，这本身就是工人无权状态的延续。

真正的安全，必须建立在劳动者能够支配自己劳动条件的基础上。工人不是机器的附属品，不是生产指标的工具，不是地方产业的耗材。工人是生产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是最有资格决定生产能否安全进行的人。没有工人，企业无法生产；没有工人，产业无法存在；没有工人，所谓地方经济就是空壳。既然工人承担生产中的危险，工人就必须拥有监督生产的权力；既然工人用生命支撑产业，工人就必须有权决定什么样的生产不能继续。

这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把安全交给资本自律和国家监管，结果工人仍然处在被支配地位；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把安全建立在劳动者掌握生产、监督生产和管理生产的基础上。不是让工人在资本安排下“注意安全”，而是让工人成为生产安全的主人；不是让工人被动接受培训，而是让工人能够主动检查、揭露、停止危险生产；不是让工人在事故后等待赔偿，而是让工人在事故前就有力量阻止事故。

因此，浏阳“5·4”事故的第八个教训，就是必须把“工人监督权”提到中心位置。没有工人监督，安全就是空话；没有工人组织，监督就是摆设；没有停工权，安全意识就是恐惧；没有公开权，隐患整改就是黑箱；没有参与事故调查的权利，追责就可能变成统治机器自我修补的程序。工人阶级不能只作为受害者出现在事故通报中，而必须作为生产安全的主人出现在事故预防中。

浏阳的爆炸已经证明，依靠企业自觉不够，依靠地方监管不够，依靠事后追责更不够。真正能防止血案重演的，是工人阶级在生产现场中掌握实际权力。只有让工人能够监督、能够公开、能够拒绝、能够停工、能够组织，安全才不再是资本和官僚口中的漂亮话，而成为劳动者保护自己生命的现实力量。否则，每一次事故后的“沉痛教训”，都可能只是下一次事故前的空洞背景音。

九、从事故看修正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谁的发展，谁的血肉？

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不能只看作一个企业的事故，也不能只看作一个行业的事故。它更深刻地暴露了修正主义社会所谓“发展”背后的阶级逻辑。统治者和地方官僚总是喜欢谈发展：产业要发展，经济要发展，地方品牌要发展，出口市场要发展，企业规模要发展，传统产业要转型升级。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追问：这究竟是谁的发展？发展成果归谁占有？发展风险由谁承担？发展代价由谁支付？如果所谓发展建立在工人无权、危险劳动、低成本剥削和事故频发之上，那么这种发展就不是人民的发展，而是资本的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修正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发展。

在官方话语中，烟花产业往往被描绘成地方经济的骄傲。它有历史，有品牌，有市场，有就业，有出口，有产业链，有文化象征。地方政府可以把它写进宣传材料，企业可以把它拿去争取订单，媒体可以把它包装成传统工艺和现代产业结合的样板。可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工人在哪里？工人的劳动在哪里？工人的危险在哪里？工人的死亡又在哪里？官方的发展叙事，总是把产业规模放在前面，把劳动者放在后面；把地方名片放在前面，把工人生命放在后面；把产值、税收、市场份额放在前面，把火药桶旁的身体放在后面。

这正是修正主义“发展观”的本质。它打着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服从资本积累；它使用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语言，实际上运行资本主义的逻辑；它说一切为了人民，实际上把人民群众，尤其是一线工人，变成产业扩张的耗材。社会主义的生产，按理说应当以满足人民需要、保障劳动者安全、提高劳动者地位为目的；而修正主义社会的生产，却越来越服从利润、市场、竞争、地方财政和官僚政绩。它不是消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是让资本在国家机器的保护下更加有组织地支配劳动。

所谓“发展”，在这种社会中变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只要打着发展的旗号，许多问题就可以被推迟解决；只要关系到地方经济，许多隐患就可以被暂时容忍；只要牵涉就业和产业稳定，许多违法违规就可以被轻拿轻放；只要企业还在创造产值，工人的抱怨、恐惧和危险就可以被视为局部问题。发展成了最高理由，工人生命却变成可以等待、可以妥协、可以事后补偿的东西。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反人民的。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发展绝不能同劳动者的生命相对立。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服务于劳动人民的解放，而不是让劳动者在更大规模、更高速度、更复杂产业链中承受更多危险。技术进步应当减少危险劳动，而不是为资本提高产量；产业组织应当提高工人的安全和权利，而不是扩大资本支配劳动的范围；地方经济应当服从人民需要，而不是让人民服从地方经济指标。可是，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发展恰恰颠倒了这一切：不是发展为了人，而是人为了发展；不是产业服从劳动者生命，而是劳动者生命服从产业运行。

浏阳烟花产业所体现的，正是这种颠倒。地方政府可以把烟花产业看作名片，企业可以把烟花产品看作利润，市场可以把烟花消费看作景观，但工人看到的是另一种现实：危险工序、化学药剂、火药粉尘、生产压力、安全隐患和随时可能降临的事故。对地方官僚来说，产业是一组漂亮数据；对资本来说，产业是一条利润链；对工人来说，产业却是一处每天必须进入的危险现场。阶级地位不同，对“发展”的感受就完全不同。

因此，不能抽象地歌颂产业发展。任何一个产业，都必须问它的阶级内容。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决定生产方式？谁安排劳动过程？谁占有利润？谁承担风险？谁有权说停？谁只能服从？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手里，生产过程由企业和官僚支配，利润归资本占有，危险由工人承担，那么无论这个产业多么“传统”、多么“有名”、多么“先进”、多么“有竞争力”，它对工人来说都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越发展，资本越强；资本越强，工人越被压在它下面。

修正主义社会最善于用“共同发展”的语言掩盖这种阶级分裂。它说企业发展了，地方就发展了；地方发展了，人民就受益了；产业壮大了，工人就有饭吃了。可是，这种说法把阶级关系抹掉了。企业发展，不等于工人有权；地方发展，不等于工人安全；产业壮大，不等于工人摆脱剥削。工人有饭吃，不等于工人应当在危险中吃饭；工人有就业，不等于工人应当用生命换工资；地方有产业，不等于地方可以把劳动者放在利润和政绩之下。

所谓“就业”在这里尤其常被拿来当遮羞布。地方政府和企业会说，产业提供了许多岗位，解决了群众生计。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提供就业，不是施舍，而是为了剥削劳动力；工人接受就业，不是感恩，而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就业本身并不等于解放。低工资、高危险、无监督权、无组织权、无拒绝危险作业权的就业，只是资本把工人固定在剥削关系中的方式。用“提供就业”来为危险生产辩护，本质上就是用工人的贫困来迫使工人接受危险。

更进一步说，修正主义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并不是站在工人和资本之间的中立调停者。它在现实中参与组织资本积累，参与招商引资，参与产业规划，参与品牌宣传，参与维持生产秩序。它既要资本创造产值，也要工人保持稳定；既要企业发展，也要社会不要爆炸；既要产业扩张，也要安全事故不要影响政绩。于是，地方官僚的角色就不是保护工人阶级，而是管理矛盾、维持秩序、保证资本积累在可控范围内继续进行。

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国家权力、地方利益和资本积累纠缠在一起。企业不是单独逐利，地方政府也不是单独监管，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发展机器。这个机器需要工人劳动，需要土地、政策、市场、金融、宣传和监管配合；它也需要在工人不满、事故爆发、舆论压力出现时迅速维稳和修补。平时它讲发展，事故后它讲追责；平时它要求工人服从生产，事故后它替工人表示哀悼；平时它保护产业运行，事故后它宣布专项整治。这种两面性，正是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方式。

浏阳事故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就在于它撕开了“发展”话语的表皮。烟花产业的繁荣不是抽象的，它有具体的阶级基础：企业为了利润组织生产，地方为了政绩推动产业，监管为了稳定维持秩序，工人为了生存进入高危岗位。事故发生时，所有被宣传遮盖的东西都暴露出来：原来地方名片背后是危险车间，原来产业优势背后是工人无权，原来经济贡献背后是安全成本被压缩，原来所谓发展背后是劳动者用生命承担风险。

这说明，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发展”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规律。它仍然服从价值增殖，服从市场竞争，服从利润率，服从地方财政和官僚政绩。它会使用社会主义语言，但它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再是劳动人民掌握生产，而是资本和官僚共同支配劳动。它会把工人称为主人翁，但工人在车间里没有主人翁的权力；它会说人民至上，但人民在生产现场没有至上的地位；它会说生命至上，但生命在利润、订单和产业稳定面前一次次让步。

因此，对这起事故的批判不能停留在安全层面，而必须上升到对整个修正主义发展逻辑的批判。我们要问：如果一个社会自称社会主义，为什么工人在自己创造的产业中没有权力？如果一个国家自称人民国家，为什么人民群众必须用生命为资本和地方政绩买单？如果一个政权自称代表工人阶级，为什么工人阶级在生产现场没有监督权、停工权和组织权？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回答不上来，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就只剩下招牌，实际内容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

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同这种逻辑彻底决裂。它不能把产值放在生命之上，不能把地方产业名片放在工人安全之上，不能把企业利润放在劳动者权利之上，不能把官僚政绩放在群众监督之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应当首先看劳动者是否更安全，工人是否更有权，生产是否更受群众监督，危险劳动是否被减少，社会财富是否归劳动人民支配。离开这些标准，所谓发展越快，越可能只是资本积累越快；所谓繁荣越大，越可能只是劳动者承担的风险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浏阳“5·4”事故不是发展道路上的“代价”，而是这种发展道路本身的罪证。统治者喜欢说发展难免有问题，产业升级需要过程，安全治理需要加强。但工人的生命不能被说成发展中的代价。没有任何产业有权要求工人用死亡来换取地方名声，没有任何企业有权用利润来抵消生命，没有任何政府有权把事故说成发展过程中的个别教训。工人的血不是发展成本，工人的命不是产业燃料，工人的家庭不是地方经济的牺牲品。

因此，浏阳“5·4”事故的第九个教训，就是必须重新定义发展。发展不是产值增长，不是企业扩张，不是地方品牌，不是出口订单，不是官僚政绩。真正的发展，应当是劳动人民的安全、权利、组织和尊严的发展；应当是工人从被支配、被剥削、被置于危险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应当是生产服从人民需要，而不是人民服从生产指标；应当是劳动者掌握生产，而不是资本和官僚利用劳动者来积累财富和权力。

浏阳的爆炸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所谓发展必须由工人的血肉来支付，那么这种发展究竟有什么资格被歌颂？如果所谓产业繁荣必须建立在劳动者无权和危险积累之上，那么这种繁荣究竟属于谁？如果所谓地方名片背后是工人死亡和家庭破碎，那么这张名片上写着的不是荣耀，而是血债。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撕开发展话语的伪装，指出它的真实内容：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所谓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和官僚共同支配劳动、榨取劳动、牺牲劳动者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从浏阳事故中必须得出的结论之一：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问发展为了谁；不是不要产业，而是要问产业由谁掌握；不是不要生产，而是要问生产服务谁；不是不要就业，而是要问劳动者是否有权；不是不要安全监管，而是要问工人能否监督监管者。只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才能把事故批判从一般安全评论推进到阶级批判；只有把“发展”的阶级内容揭开，才能看清这场爆炸背后的历史性质：它不是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偶然偏差，而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后，资本和官僚共同压迫劳动者的必然表现。

十、结论：不是“吸取教训”，而是清算血账

浏阳“5·4”烟花厂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不能在几句“沉痛哀悼”“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中被冲淡，也不能在几个责任人被传唤、几份文件被下发、几场整顿被宣布之后就被封存。37条生命，1个失联者，51名伤者，不是事故通报上的冷冰冰数字，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高危行业中留下的血债。每一个遇难者，都在用自己的死亡揭露一个事实：当生产服从利润和政绩，而不是服从劳动者生命时，所谓安全就永远脆弱，所谓发展就必然带血。

统治阶级最擅长把血案变成“教训”。一场事故发生了，就说教训深刻；几十条生命没了，就说必须警钟长鸣；工人家庭破碎了，就说要举一反三；社会愤怒起来了，就说要严肃追责。可是，教训如果不触动资本，就只是空话；追责如果不追到地方官僚和资本利益结构，就只是切割；整顿如果不赋予工人权力，就只是旧秩序的自我修补。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吸取教训，而是谁在吸取教训，吸取什么教训，教训最后是用来保护工人，还是用来恢复生产、平息舆论、维持产业秩序。

对资本来说，事故的“教训”往往是如何更好地规避责任，如何补齐手续，如何应付检查，如何在舆论过去之后重新复产。对地方官僚来说，事故的“教训”往往是如何压实责任，如何完善台账，如何避免影响政绩，如何防止下一次事故演变成更大的政治压力。可是对工人阶级来说，真正的教训只有一个：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资本家的良心，不能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官僚的文件，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事故之后的追责。工人必须组织起来，掌握监督生产、拒绝危险作业、公开安全隐患和参与事故调查的权力。

这场事故已经证明，单靠企业自查是不够的。因为企业自查首先服从企业利益，企业不会天然站在工人生命一边反对自己的利润。单靠地方监管也是不够的。因为地方政府既是监管者，又是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它同地方资本、财政、就业、政绩和产业名片深深纠缠。单靠事故后追责更是不够的。因为追责只能处理已经发生的灾难，却不能让死去的工人复活，不能让伤者恢复原来的身体，不能让破碎的家庭回到从前。真正能够防止血案重演的，只能是工人在事故发生之前就拥有实际权力。

因此，浏阳事故的结论不能停留在“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当然要加强，但问题是由谁来管理，管理服务谁，管理听谁的声音。如果仍然是资本管理工人，官僚管理企业，上级管理下级，而工人只能被管理、被培训、被要求提高意识，那么这种管理仍然没有改变工人无权的根本状态。真正的安全，不是让工人在火药桶旁更加小心地服从命令，而是让工人有权拒绝把自己放进火药桶；不是让工人背诵安全规程，而是让工人有权监督规程是否真正执行；不是让工人事故后等待赔偿，而是让工人事故前就能阻止危险生产。

必须明确提出：高危行业中的一线工人，应当有权选举自己的安全监督代表，有权检查危险品存放、设备维护和生产流程，有权公开企业隐患和监管失职，有权要求停产整改，有权参与复产验收，有权参与事故调查，有权拒绝任何危险作业而不受打击报复。没有这些权力，所谓“生命至上”就是虚伪的；没有这些权力，所谓“人民至上”就是空洞的；没有这些权力，所谓“安全生产责任制”就很容易变成压在工人头上的责任，而不是保护工人生命的武器。

这场事故也必须使我们看清所谓修正主义“发展”的真实面目。它口头上讲人民，实际上让工人为产业承担危险；它口头上讲社会主义，实际上让资本和地方官僚共同支配劳动；它口头上讲生命至上，实际上在平日里让生命服从订单、产量、利润和政绩。烟花产业的地方名片上，写着的不是单纯的传统文化和市场繁荣，也写着工人的伤残、死亡和无权。只要这种发展逻辑不被揭露，不被批判，不被工人阶级自己的斗争所打破，类似的事故就不会真正成为过去。

所以，我们不能把浏阳“5·4”事故看成一个已经结束的事件。爆炸现场可以清理，厂房可以重建，企业可以更名，地方可以整顿，舆论可以过去，但只要资本逐利的逻辑还在，只要地方产业利益压倒工人生命的逻辑还在，只要监管形式主义还在，只要工人没有组织和权力，那么危险就仍然会在别的车间、别的矿井、别的工地、别的工厂里继续积累。下一次爆炸、坍塌、中毒、火灾、矿难，只是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地点、由哪些工人承受的问题。

因此，真正的结论不是“吸取教训”，而是清算血账。清算这笔血账，不只是要求处理几个直接责任人，而是要揭露资本如何把安全变成成本，揭露地方官僚如何把产业放在生命之前，揭露监管如何用文件和程序掩盖危险，揭露资产阶级法律如何把制度责任缩小为个体责任，揭露修正主义统治如何用社会主义话语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只有把这些都讲清楚，死者的血才不会被行政语言稀释，工人的苦难才不会被发展口号吞没。

我们悼念遇难工人，但悼念不能代替斗争。我们同情伤者和家属，但同情不能代替组织。我们要求追责，但追责不能代替工人阶级自己的权力。浏阳的爆炸已经把问题摆在所有劳动者面前：是继续相信资本家的承诺、官僚的文件和事故后的整顿，还是组织起来争取监督生产和保护生命的权利？是让血债被写进通报后逐渐遗忘，还是把它变成揭露资本主义复辟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武器？

这场事故的最后结论，应当写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上：工人的生命高于利润，劳动者的权利高于产业政绩，生产必须服从人民需要，而不是人民服从资本增殖。没有工人监督，就没有真正安全；没有工人组织，就没有真正追责；没有工人阶级掌握生产，就没有真正社会主义。浏阳“5·4”烟花厂爆炸事故所留下的，不只是废墟和伤亡数字，而是一条血淋淋的真理：只要资本和官僚继续支配劳动，工人的生命就永远处在危险之中；只有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才能把这种危险生产秩序彻底改变。

纪念胖猫两周年

一、纪念不是网暴，而是阶级批判

胖猫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了。两年以后再谈他，不应当是为了重新制造一次互联网审判，不应当是为了把一个死去的青年再次拖进流量场，也不应当是为了把他的死亡变成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的互相清算。一个年轻人的死亡，本来就已经足够沉重；如果我们把它再次加工成网暴、羞辱、猎巫和性别仇恨，那就不是纪念，而是第二次消费他的痛苦。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胖猫事件不是一个可以用几句网络脏话概括的事件。他不是一个抽象的“舔狗”，不是一个用来嘲笑的梗，也不是性别战争里随手挥舞的一面旗。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青年，一个劳动者，一个在孤独、贫困、情感依赖和精神压力中走向崩溃的人。正因为如此，纪念他，就不能停留在私人恩怨和道德审判上，而必须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把一个青年逼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段私人关系上？是什么样的社会，使他的劳动、生活和精神世界如此贫乏？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在他死后还能把他的死亡继续变成流量、标签和仇恨？

胖猫的悲剧，表面上是一场恋爱悲剧；但如果只把它看成恋爱悲剧，我们就会永远停留在最浅的地方。中修社会最擅长的，正是把一切社会矛盾私有化、道德化、性别化。青年人的贫困，被说成“不努力”；青年人的孤独，被说成“性格问题”；青年人的情感崩溃，被说成“恋爱脑”；青年人的死亡，被改造成“男女性别对立”的又一个燃料。这样一来，真正该被审判的社会关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互联网上互相撕咬的群众。

这正是中修路线最阴险的地方。它在文化上摆出一副极左翼的姿态，口口声声反封建、讲文明、讲进步、讲个人自由、讲现代价值；但在政治经济上，它却实行最赤裸的极右翼路线：资本支配劳动，平台支配青年，住房、教育、医疗和婚恋都被商品化，普通劳动者被推入没有保障、没有组织、没有尊严的生存状态。文化上，它把群众推向道德审判和身份对立；经济上，它把群众交给资本剥削和市场碾压。胖猫之死，正是在这种撕裂的社会里发生的。

所以，纪念胖猫，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被永远羞辱的个人，不是为了把某个女性钉在耻辱柱上，也不是为了证明“男人活该”或“女人都坏”。真正的纪念，是把他从流量中夺回来，把他从性别战争中夺回来，把他重新放回这个吃人的社会结构之中。我们要问的不是“谁更该被网暴”，而是：为什么青年劳动者如此孤独？为什么感情关系会承受如此沉重的经济压力？为什么平台可以从死亡中牟利？为什么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却让无数青年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废墟上独自挣扎？

胖猫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他是这个时代许多青年的影子：工作不稳定，生活无保障，精神世界被互联网填满，现实生活中缺少组织、缺少集体、缺少真正能托住人的社会关系。他把爱情当作避难所，并不是因为他天生软弱，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早已剥夺了青年人其他可以依靠的东西。当劳动没有尊严，生活没有前途，集体被瓦解，个人就只能抓住私人感情不放。可私人感情本身又早已被金钱、消费、阶层焦虑和商品关系侵蚀。

因此，胖猫两周年的意义，不在于继续追杀谁，不在于复刻当年的情绪狂欢，而在于把这个悲剧上升为对社会制度的批判。我们纪念他，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的死亡暴露了这个社会的不义：它一边把青年变成孤岛，一边要求青年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它一边让资本压榨劳动，一边把劳动者的崩溃解释成私人失败；它一边放任平台吃人血馒头，一边在舆论失控时摆出维护秩序的面孔。

纪念胖猫，首先就是拒绝把他的死亡交给流量机器。其次，就是拒绝把他的死亡交给性别战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死亡交还给阶级批判。真正应该被审判的，不是一个已经被互联网反复撕碎的私人关系，而是这个把青年推向绝望、把爱情变成交易、把死亡变成内容、把群众变成互相仇恨的原子的社会。

一句话：纪念胖猫，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恨，而是为了反对制造绝望的社会。

二、胖猫首先是青年劳动者，不是网络标签

胖猫死后，互联网上最廉价的处理方式，就是给他贴标签。有人说他是“舔狗”，有人说他是“恋爱脑”，有人把他当作男性受害叙事的图腾，也有人把他当作嘲笑底层男性情感失败的段子。可一旦我们这样谈论他，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就消失了。他的劳动、贫困、孤独、精神压力，他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全部被粗暴地抹掉了。

我们首先应当把胖猫还原为一个青年劳动者。

他不是抽象的网络角色，不是性别战争里的符号，而是一个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年轻人。他从事的是一种带有新时代特点的劳动：游戏代练、长时间在线、依靠平台和客户获得收入。这种劳动看起来不像传统工厂里的流水线，也不像矿山、工地、车间里的重体力劳动，但它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劳动者被迫出售劳动力的一种形式。它消耗人的时间、精力、身体和精神，却不给人稳定的生活和真正的保障。

平台经济最擅长制造一种假象：好像这种劳动很自由。你不用打卡，不用进厂，不用面对老板的脸色，好像只要开着电脑、接着订单，就能自己安排生活。但这种“自由”恰恰是最残酷的地方。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稳定休息，没有集体保障，没有工会，没有同事关系，没有清晰的劳动边界。人看起来不受某一个老板支配，实际上却被订单、客户、评分、平台规则和生存压力无时无刻地支配着。

这种劳动把人困在房间里，困在屏幕前，困在无休止的接单和在线状态中。传统的工厂劳动至少还能让劳动者在同一个空间中相遇，形成某种共同生活和共同经验；而平台化、网络化、零散化的劳动，却把劳动者拆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劳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账号后面承受压力，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失败只是自己的失败。

这就是中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后青年劳动的一个典型形态：劳动越来越不稳定，生活越来越个人化，压力越来越心理化，痛苦越来越私人化。社会不给青年稳定的工作、住房、组织和前途，却要求青年自己承担一切后果。赚不到钱，是你不努力；情感崩溃，是你太脆弱；生活没有希望，是你不会规划人生。可是问题在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在没有保障的劳动中，长期处在孤立状态中，长期没有现实集体可以依靠，他的精神世界又怎么可能不被压垮？

胖猫的悲剧，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他不是一个拥有宽阔现实生活的人，不是一个有稳固阶级组织、朋友网络、社会保障和集体归属的人。他的生活很大部分被网络劳动、私人感情和个人幻想占据。当现实生活贫乏到一定程度，爱情就很容易被赋予过重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而会变成一个人对未来、家庭、归属和人生意义的全部想象。

这不是胖猫一个人的问题。许多青年劳动者都是这样被社会塑造出来的。他们在现实中没有稳固的位置，在劳动中没有尊严，在城市中没有根，在家庭中承受压力，在网络中寻找陪伴。他们不一定会说出“阶级压迫”这个词，但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在承受阶级压迫。他们的孤独不是纯粹心理问题，而是社会关系瓦解后的结果。

中修社会一方面用极右翼的政治经济路线摧毁青年生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用文化上的道德审判来羞辱失败者。它让青年在平台经济中自生自灭，却又嘲笑他们“不成熟”“不理性”“不会处理感情”。它让资本剥夺青年劳动者的时间和未来，却把青年人的精神崩溃解释成个体性格缺陷。这种社会最无耻的地方就在于：它制造绝望，又责怪绝望者不够坚强。

所以，我们纪念胖猫，不能从嘲笑开始，不能从标签开始，而要从他的阶级位置开始。他是一个青年劳动者，是平台资本和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孤立个体。他的死亡不应该被解释成某种“男性失败学”，也不应该被解释成某种“恋爱脑的报应”。它首先暴露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青年劳动者已经被剥夺到连现实生活都难以承受，最后只能把全部希望压在私人感情上。

胖猫不是一个笑话。他是被中修资本主义现实消耗掉的青年之一。把他重新看作劳动者，才是纪念他的第一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他为什么这么傻”的浅薄问题，转向真正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会让那么多青年劳动者孤独到只能在网络和私人关系里寻找最后的救命绳？

三、中修的政治经济极右翼：一切为了资本，一切服从资本

胖猫的悲剧不能只停留在情感关系里理解。一个青年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到如此狭窄的空间里？为什么会长期处在高强度、低保障、孤立化的劳动状态中？为什么他的精神世界会贫乏到只能把一段私人关系当成全部希望？这些问题的背后，不是抽象的“现代社会压力”，而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后，整个社会机器已经越来越彻底地服务于资本。

中修口头上仍然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仍然把红旗、党史、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词挂在嘴边，但它的现实经济路线早已是极右翼的。所谓极右翼，不只是文化上的保守或民族主义，而是在政治经济上把资本的利益放在劳动人民之上，把市场、利润、老板、平台、房地产、金融和地方财政放在劳动者的生命之上。它保卫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秩序；它维护的不是人民生活，而是资本增殖。

在这种路线下，劳动者被迫为资本承担一切风险。企业要灵活用工，劳动者就失去稳定工作；平台要降低成本，骑手、代练、主播、客服、网约工就失去保障；房地产资本要利润，青年就背负房租、房贷和家庭压力；教育产业要扩张，学生和家庭就背负培训、学历和竞争焦虑；医疗和社会保障不足，个人就只能把风险扛在自己身上。资本越安全，劳动者越不安全；利润越稳定，生活越破碎。

所谓“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极右翼政治经济路线最典型的谎言之一。它把失业说成灵活，把无保障说成自由，把被平台支配说成自主创业，把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休息、没有稳定收入的状态包装成新时代机会。胖猫这样的青年劳动者，正是在这种结构中被塑造出来的。他看起来是在自己接单、自己赚钱、自己安排时间，实际上是被市场需求、平台规则、客户评价和生存压力共同支配。

这正是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自由”：资本自由地雇佣和抛弃劳动者，平台自由地制定规则，老板自由地压低成本，市场自由地惩罚弱者，而劳动者只有自由地焦虑、自由地熬夜、自由地透支身体、自由地崩溃。中修所谓发展，发展的首先是资本支配劳动的能力；所谓现代化，现代化的首先是剥削形式；所谓新经济，新在剥削更隐蔽、更分散、更难组织。

胖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工人，但他同样处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之中。他出售自己的时间、技术、注意力和身体消耗，用长时间在线换取收入。他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因为这种劳动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在市场夹缝中活下去。一个青年每天被迫在这种零散、紧张、孤独的劳动中消耗自己，他的生活自然会越来越狭窄，他对情感关系的依赖自然会越来越沉重。

中修的政治经济极右翼，还表现在它彻底把社会生活商品化。住房是商品，教育是商品，婚恋被消费主义裹挟，情感被金钱关系渗透，人的价值被收入、房子、车子、消费能力衡量。青年如果没有钱，就没有尊严；没有稳定收入，就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预期，就只能在私人关系里寻找补偿。胖猫把大量情感和金钱投入一段关系，不能仅仅理解成个人判断失误，它也是商品社会把爱情、前途和生活希望全部缠在一起的结果。

这个社会一方面用资本主义逻辑剥夺青年，另一方面又要求青年以“理性个体”的姿态独自承担后果。它不会承认是社会关系出了问题，只会说你不够成熟、不够努力、不够清醒、不够会爱自己。可问题正在这里：当一个社会系统性地剥夺青年人的稳定劳动、现实集体和未来希望之后，再要求他们独自保持心理健康和情感理性，这本身就是残酷的阶级压迫。

中修政治经济路线完全服务于资本，所以它不可能真正关心胖猫这样的青年。它关心的是平台经济能否继续运转，消费能否继续扩大，社会秩序能否稳定，舆论能否被控制，资本能否继续增殖。只要青年还能接单、还能消费、还能还贷、还能忍耐，他们就是“新时代奋斗者”；一旦他们崩溃、死亡、闹出舆情，他们又会被重新解释成个体悲剧、家庭矛盾、心理问题或网络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纪念胖猫必须批判中修的政治经济极右翼。因为胖猫的绝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生长在一个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中：劳动被平台化，生活被商品化，青年被原子化，痛苦被私人化，死亡被流量化。中修所谓社会主义外壳下的现实内容，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

因此，胖猫不是死于一个抽象的“情感失败”。他死在一个完全服务于资本的社会结构里。这个结构先把青年劳动者变成孤岛，再让他们在孤独中寻找救命绳；先让资本摧毁他们的生活基础，再把他们的崩溃说成个人失败。真正应该被审判的，正是这种政治经济极右翼路线：它让资本活得越来越强大，让青年活得越来越破碎。

四、平台经济制造“自由劳动”的骗局

胖猫所处的劳动形态，不是偶然的边缘现象，而是中修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青年劳动被平台化、零散化、孤立化的集中表现。平台经济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新技术、新机会、新自由：不用进厂，不用坐班，不用看老板脸色，只要有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可是这种所谓自由，恰恰是资本对劳动者更深一层的支配。

传统资本主义工厂里，老板和工人至少还在同一个生产场所中对立。剥削是直接的，纪律是可见的，工时是明确的，监工是具体的。到了平台经济这里，资本把自己隐藏在规则、订单、算法、评分、流量和客户需求之后。劳动者看不见老板，却时时刻刻被老板支配；没有固定工时，却永远处在待命状态；没有人强迫他加班，可生存压力会替资本强迫他加班。资本不再需要每天站在他面前训斥他，因为市场和平台已经成了无形的鞭子。

这就是所谓“自由劳动”的真相。胖猫这样的青年，看起来是在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实际上他必须不断接单、不断在线、不断满足客户要求，才能维持收入。他不是不劳动，而是把自己的生活整个交给劳动。他的房间就是工位，他的电脑就是车间，他的账号就是劳动证件，他的在线时间就是被平台和市场吞掉的生命。资本不必为他提供稳定岗位、社保、休假和未来，却可以从他身上榨取时间、技术和精神消耗。

中修最无耻的地方，就是把这种无保障状态说成“灵活”。它不说青年失去了稳定劳动，而说青年拥有了更多选择；它不说劳动者被平台资本分散统治，而说劳动者成为了新业态从业者；它不说失业和半失业正在扩大，而说灵活就业正在发展。语言在这里成了统治工具。资本剥夺人的保障，官僚替资本改名；资本制造人的不安，官方替资本粉饰。

平台劳动的核心，就是把风险从资本转嫁给劳动者。没有订单，是劳动者自己的问题；收入下降，是劳动者自己竞争失败；身体熬坏，是劳动者自己不会休息；精神崩溃，是劳动者自己心理脆弱。平台只负责抽成、管理、压价、制定规则，却不承担劳动者的生活后果。资本拿走利润，劳动者承担风险，这就是政治经济极右翼服务资本的本质。

五、中修的文化极左翼：用文化伪左翼掩盖资本主义复辟

中修政治经济上的极右翼，必须有一套文化上的外衣。它不能公开承认自己就是为资本服务，不能公开承认自己早已背叛社会主义，不能公开承认劳动者、青年、妇女和一切被压迫者都只是资本增殖机器上的燃料。于是它需要一种文化上的伪装：它要在口号上显得“进步”，在话语上显得“现代”，在道德上显得“文明”，在身份问题上显得“开明”。但这种开明不是无产阶级解放，而是资产阶级身份政治；这种进步不是革命，而是统治术；这种文化极左翼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遮羞布。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把人拆成一个个孤立的身份标签，然后让群众围绕标签互相审判、互相攻击、互相消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揭示的是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是资本如何支配人的劳动、身体、欲望、家庭和生活。可中修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在政治经济上维护资本，在文化上却不断制造身份焦虑、性别对立、身体焦虑、婚恋焦虑和道德审判。它不让青年追问资本为什么剥削他们，而是让青年互相追问谁更“落后”、谁更“封建”、谁更“不尊重”、谁更“不文明”。

这就是中修文化极左翼的本质：用文化战场转移阶级战场，用身份矛盾遮蔽阶级矛盾，用道德审判替代社会革命。

这种文化极左翼的理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来各种西方“批判理论”的影响中看到。法兰克福学派表面上仍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谈异化、谈压抑、谈文化工业、谈现代性、谈主体性；但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改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它不再把工人阶级的组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放在中心，而是越来越把批判的重心转向文化、心理、欲望、消费、家庭、性、日常生活和身份形式。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被抽去了革命骨髓，剩下一种可以在大学课堂、出版市场、文化圈和平台舆论中流通的“批判姿态”。

法兰克福学派当然也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也揭露现代社会如何操纵人的欲望和意识，这些地方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批判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脱离了政权问题，脱离了生产关系问题，脱离了党、军队、阶级专政和群众组织问题，那么它最终就会变成一种安全的反叛。它可以骂消费主义，骂父权制，骂权威，骂启蒙理性，骂现代性，却不真正组织工人夺取政权；它可以在文化领域里显得非常激进，却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毫无威胁。这样的“批判”，对资本来说并不可怕。资本完全可以把它印成书、做成课程、剪成短视频、包装成青年人的身份消费。

这正是中修为什么需要、纵容甚至推崇这类理论的根本原因。中修并不怕抽象的文化批判，不怕学院里的“批判理论”，不怕青年在身份、欲望、性别、身体和消费符号中寻找自我表达。它真正害怕的是马列毛主义，是群众路线，是工人夜校，是工人组织，是革命报纸，是秘密建党，是把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直接指向中修统治本身的革命政治。法兰克福式的文化批判，恰恰可以帮助中修完成一个任务：把青年从阶级斗争中引开，把革命问题改造成文化问题，把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改造成心理问题、性别问题、身份问题、审美问题和代际问题。

所以，中修需要一种“看起来左”的理论，来掩盖自己“实际上右”的政治经济路线。它需要让大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网络青年相信：最激进的事情不是组织工人，不是反对资本，不是反对中修国家机器，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政治，而是在文化上反叛，在语言上解构，在身份上重新命名，在消费上重新选择。这样，青年看似变得越来越激进，实际却越来越远离革命；文化话语看似越来越左，社会经济现实却越来越右。

这并不是说文化问题不重要。毛主义从来不否认文化战线的重要性。相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战场。但毛主义讲文化革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群众批判党内走资派；而法兰克福式的文化批判，在修正主义社会里却往往被改造成一种去阶级化、去组织化、去革命化的文化左翼。前者把文化斗争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后者则用文化斗争替代阶级斗争，甚至用文化激进掩盖经济右翼。

这套文化伪左翼，在婚恋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清楚。中修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而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它不真正解决妇女被资本剥削、家务劳动、婚姻制度和生育压力压迫的问题，也不真正解决底层男性青年被房价、彩礼、低收入和家庭责任压垮的问题。它把男女青年一同推入市场化婚恋的斗兽场，然后让他们互相撕咬。男人被要求有钱、有房、有车、有阶层前途；女人被鼓励把婚恋变成资源交换、消费资格和阶层跃迁。双方都被资本主义婚恋市场扭曲，最后却把仇恨发泄到彼此身上。

中国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说到底不是要同贫苦工人平等，而是要同官家平等，同资产阶级男性平等，同掌握资源、权力和消费能力的人平等。它追求的不是劳动妇女和劳动男性共同摆脱资本压迫，而是让少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性、官僚家庭女性、资产阶级女性进入更高层级的消费、权力和资源分配。它看不上贫苦工人，看不上外卖员、工厂工人、代练青年、底层男性，也同样看不上底层劳动妇女。它要的不是打碎阶级社会，而是在阶级社会内部争取更体面的座位。

所以，当胖猫这样的青年在婚恋市场中失败，在情感和经济双重压力中崩溃，中修的走狗就会跳出来说这是“性格问题”。这是最无耻的谎言。性格从来不能脱离阶级条件来谈。所谓“性格好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常常只是阶级地位的另一种说法。有些人性格更恶劣、更自私、更粗暴，却照样对象一个接一个，照样被人追捧，照样在婚恋市场里占据优势，为什么？因为他家里有钱，因为他家里有权，因为他属于官家，因为他背后站着阶级资源。到了贫苦青年这里，一切社会压迫忽然都被说成“你性格不好”。这不是分析，这是资产阶级对底层的羞辱。

胖猫的问题不是一句“性格差”可以解释的。如果一个青年有稳定工作、有住房保障、有集体组织、有现实生活、有阶级归属、有被社会托住的安全感，他当然不至于把全部希望都押在一段私人关系上。可中修资本主义社会先剥夺了青年人的稳定生活，再把他们丢进商品化婚恋市场，最后在他们崩溃时说：这是你的性格问题。这就像资本家把工人榨干以后说工人不够坚强，像平台把骑手逼死以后说骑手不够守规矩，像官僚把群众逼到绝路以后说群众情绪不稳定。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替这种阶级压迫披上“进步”的外衣。它把底层男性的痛苦一概解释成“爹味”“厌女”“incel”“活该”，却不分析这些底层男性为什么会被资本主义婚恋市场碾碎；它把女性的困境解释成单纯的男性压迫，却不分析劳动妇女如何被资本、家庭、国家机器和消费主义共同压迫。它用性别道德审判替代阶级分析，用身份优越感替代群众路线，用小资产阶级的怨恨替代无产阶级的团结。

胖猫事件正是在这种文化结构里被引爆的。一个青年劳动者的死亡，本来应该让人追问平台劳动、资本压迫、青年孤独、商品化婚恋和精神崩溃；但中修社会的文化机器却迅速把它转化为性别战争。一边是男权情绪把所有女性都打成“捞女”，一边是资产阶级女权把底层男性的痛苦嘲讽为“活该”“incel”“恋爱脑”。双方看似对立，实际上都在替资本遮蔽问题。因为只要群众互相仇恨，他们就不会共同反抗制造这一切的社会制度。

这就是中修文化极左翼最毒的地方：它不是直接让所有人闭嘴，而是让所有人吵错方向。它让青年反复讨论身份，却不讨论阶级；讨论性别，却不讨论资本；讨论个人选择，却不讨论社会关系；讨论谁道德失败，却不讨论谁在经济上统治。它鼓励群众在文化泥潭里互相撕碎，然后让政治经济极右翼继续替资本开路。

因此，胖猫的死亡绝不能被文化极左翼吞掉。我们不能让它变成“男人坏”或者“女人坏”的证据，不能让它变成资产阶级女权和男权反扑互相投喂的燃料，也不能让它变成平台算法继续制造焦虑的素材。我们必须指出：真正的问题是中修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整个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上，它让资本统治劳动；文化上，它让身份政治统治群众的想象；国家机器上，它镇压真正的革命者；平台算法上，它把人的痛苦变成流量；婚恋市场上，它把爱情变成阶层交换。

这才是胖猫悲剧背后的灵魂问题：一个完全服务于资本的社会，必然需要一套看似激进、实则反动的文化话语来掩盖自身。中修文化极左翼，就是政治经济极右翼的遮羞布；资产阶级身份政治，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精神鸦片；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争夺资源的旗帜，而不是贫苦工人阶级的解放道路。

纪念胖猫，就必须撕掉这块遮羞布。真正的出路不是让青年在身份战争中互相毁灭，而是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阶级位置。不是让男人和女人、普通青年和性少数、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彼此仇恨，而是让他们共同看见：压在所有人头上的，是资本，是平台，是商品化生活，是中修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有把文化泥潭中的痛苦重新提升为阶级斗争，胖猫的死亡才不会继续被中修和资本拿去喂养新的仇恨。

中修推行文化极左翼，并不是为了让人民获得解放，而是为了把中国人民重新打成精神上的“东亚老病夫”：让青年丧失斗志，让劳动者丧失阶级自觉，让男人和女人互相仇恨，让民族的反抗意志被身份政治、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一点点腐蚀。它要重新给中国人民戴上看不见的手铐脚镣，使我们不再敢组织、不再敢斗争、不再敢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劳动果实；它宁愿让外国资本、跨国犯罪网络和本国买办势力一起践踏人民，也不愿让马列毛主义重新把中国人民组织成革命的力量。

六、性别战争是阶级矛盾被扭曲后的产物

胖猫事件爆发以后，最先冲上来的不是阶级分析，而是性别战争。一个青年劳动者的死亡，迅速被撕成两面旗：一边说“女人都是捞女”，一边说“底层男都是活该”；一边把胖猫塑造成被女性毁灭的殉道者，一边又把他的痛苦嘲笑成“恋爱脑”“incel”“没价值男性的自我感动”。于是，一个本来应该指向平台劳动、资本压迫、青年孤独和商品化婚恋的问题，被迅速拖进了男女互相仇恨的泥潭。

这正是中修社会最需要的结果。

因为只要男人和女人互相仇恨，劳动者就不会共同追问：为什么青年没有稳定生活？为什么爱情越来越被房子、收入、消费和阶层焦虑绑架？为什么一个普通青年必须用金钱证明感情，用供养证明价值，用自我牺牲换取被爱？为什么女性也被迫在婚恋市场里计算安全感、阶层、资源和未来？为什么所有人都被资本主义商品关系逼成互相估价、互相审判、互相伤害的对象？

性别战争最毒的地方，就在于它把真正的敌人藏起来了。

男权反扑说：问题在女人。
资产阶级女权说：问题在男人。
平台算法说：继续吵。
中修统治说：只要别谈阶级，怎么吵都行。

可真正的问题是：资本把男女都变成商品社会中的孤立个体，又让他们在婚恋市场里互相挑选、互相消费、互相索取、互相防备。男人被训练成提款机、供养者、房车和彩礼的承担者；女人被训练成消费主体、阶层交换者、婚恋市场里的“风险管理者”。这种关系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亲密关系彻底商品化以后的结果。

在这种结构里，底层男性被压得喘不过气，底层女性同样没有真正的解放。劳动妇女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女权话语而摆脱工厂、办公室、服务业、家庭劳动和生育压力；底层男性也没有因为传统性别角色而真正获得权力。他们都在资本下面被碾压，只是被碾压的方式不同。可是中修文化机器偏偏要让他们忘记共同的处境，只记住彼此的怨恨。

胖猫事件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胖猫本来是一个青年劳动者，一个在平台劳动和私人情感中被压垮的人。可是性别战争把他变成了符号：对一部分人来说，他只是“深情男孩被捞女害死”的证据；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只是“底层男自我感动失败”的笑料。两边都没有真正看见他。两边都把他从具体的人，变成了自己立场里的工具。

这就是文化极左翼与政治经济极右翼的合谋。文化极左翼负责制造道德审判、身份对立、性别斗争和网络围剿；政治经济极右翼负责继续让资本支配劳动，让平台支配青年，让婚恋支配未来，让贫困支配感情。前者让群众吵错方向，后者让资本继续吃人。前者把群众锁在文化战场，后者在经济战场稳稳收割。

我们必须反对把胖猫变成厌女主义的旗帜，也必须反对把胖猫变成资产阶级女权嘲笑底层男性的靶子。真正的革命立场，不是站在男人反对女人，也不是站在女人反对男人，而是站在劳动人民反对资本，站在被压迫青年反对商品化婚恋，站在无产阶级反对中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真正的妇女解放，不是让少数官家和资产阶级女性获得更高的消费权、择偶权和支配权；真正的男性解放，也不是恢复旧式父权，让男性重新压迫女性。真正的解放，是把男女都从资本主义婚恋市场、家庭私有制、工资奴役、消费主义和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没有阶级解放，性别解放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内部重新分赃；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所谓“平权”就会变成富人之间的平权、官家之间的平权、上层之间的平权。

所以，我们纪念胖猫，必须拒绝性别战争的陷阱。我们不能让他的死亡继续喂养男权仇恨，也不能让他的死亡继续喂养资产阶级女权的优越感。我们要指出：胖猫的绝望，不是“男人天生愚蠢”的证明，也不是“女人天生邪恶”的证明，而是商品社会、平台劳动、阶级压迫和文化伪左翼共同制造出来的悲剧。

中修希望青年男人恨青年女人，希望青年女人恨青年男人；希望底层恨底层，希望受害者互相审判；希望所有人都在网上争夺道德高地，却没有人回头看见资本家的手、平台的手、官僚的手、国家机器的手。我们偏偏要反过来：把胖猫从性别战争里夺回来，把他放回阶级斗争里去理解。

一句话：胖猫事件中的性别战争，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被资本和中修扭曲后的形式。真正的敌人不是普通男人，也不是普通女人，而是这个把男女青年都推入商品化婚恋、平台剥削和精神孤岛的资本主义复辟社会。

七、商品社会侵入亲密关系：爱情被资本改造成阶层交换

胖猫事件之所以刺痛许多人，不只是因为一个青年死了，也不只是因为一段关系破裂了，而是因为它暴露出一个更深的现实：在中修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里，爱情早已不再只是爱情。它被房子、收入、消费、阶层、家庭资源和未来预期层层包围，最后变成了商品社会中最残酷的交换场之一。

资产阶级社会总喜欢把恋爱说成“个人选择”。你爱谁，是你的选择；你给谁花钱，是你的选择；你被谁拒绝，也是你的选择。听起来很自由，实际上是把全部社会压力都转嫁给个人。它故意不说，一个贫苦青年进入亲密关系时，本来就已经背着低收入、不稳定劳动、住房压力、家庭期待和阶层焦虑；它也故意不说，人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卑微、讨好、控制、焦虑、崩溃，往往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性格缺陷，而是商品社会长期压迫后的结果。

中修的走狗最喜欢说：这是性格问题。
可这是扯淡。

性格当然存在，但性格从来不是脱离阶级条件的孤立东西。一个官僚家庭、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人，即使脾气更坏、责任感更差、道德更低下，也可以凭借家庭资源、社会关系、消费能力和阶层身份，在婚恋市场里占据优势。一个贫苦青年即使真诚、节省、愿意付出，也可能因为没有房、没有钱、没有稳定未来，被整个市场冷冰冰地淘汰。到这时，资产阶级社会反过来说：你失败，是因为你性格不好。多么无耻！

在商品社会里，所谓“魅力”往往已经被阶级包装过。收入可以包装成成熟，房产可以包装成责任，家庭背景可以包装成安全感，官家资源可以包装成前途，消费能力可以包装成浪漫。相反，贫穷会被说成无能，节省会被说成寒酸，深情会被说成廉价，痛苦会被说成不体面。阶级优势被说成个人魅力，阶级劣势被说成性格缺陷，这正是资产阶级婚恋市场最恶毒的骗局。

八、互联网平台把死亡加工成流量：人血馒头的现代形式

胖猫死后，最令人寒心的，不只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如何被互联网迅速吞下、切碎、包装、贩卖。一个青年从桥上离开世界，本来应当使人沉默、反思、追问社会责任；可是到了平台那里，他立刻变成一组可以被推荐、被剪辑、被转发、被争吵、被消费的标签：深情男孩、捞女、外卖、长江大桥、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反转、两周年。

这就是平台资本的本性。它不关心真相，只关心流量；不关心死者，只关心情绪；不关心人民，只关心停留时间和商业转化。它最喜欢的内容，就是能让群众愤怒、流泪、羞辱、站队、互骂的内容。胖猫的死亡，对平台来说不是一个需要敬畏的生命终结，而是一场可以反复生产的内容矿山。今天剪成深情悲剧，明天剪成性别战争，后天剪成反转阴谋，再过两年又剪成周年纪念。人死了，流量还活着；青年被埋葬了，平台还在继续吃他的尸体。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人血馒头。旧社会的人血馒头，是围观刑场、迷信鲜血可以治病；今天的人血馒头，是围观痛苦、相信别人的死亡可以给自己提供情绪刺激、道德优越、身份认同和流量收益。过去是茶馆闲谈，今天是算法推送；过去是围观砍头，今天是围观崩溃；过去吃的是肉眼可见的血，今天吃的是被剪辑、标题党、热搜和评论区加工过的精神血浆。

中修口口声声说治理网络，可它从来没有真正治理制造悲剧的社会关系。它治理的不是资本，而是舆论；不是平台剥削，而是群众不满；不是流量机器，而是失控的讨论。平台只要还能赚钱，只要还能服务消费，只要还能帮助转移阶级矛盾，它就仍然是中修政治经济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事件失控、舆论反噬、群众开始追问制度问题时，中修才会摆出一副“管理者”的姿态出来维稳。

平台算法在胖猫事件中起到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再生产。它不断把最极端、最煽情、最能制造对立的内容推到人们面前。它让人看到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最容易让人发怒的碎片；不是社会结构，而是私人丑闻；不是阶级压迫，而是男女互斗；不是青年劳动者的困境，而是一个可以被反复消费的“情感失败案例”。算法不是中立的，它是资本的神经系统。

一个人只要点开一次，平台就会继续喂给他更多相似内容。你愤怒，它就给你更多愤怒；你仇恨，它就给你更多仇恨；你想审判，它就给你更多审判对象。于是群众的情绪被平台训练，判断被平台塑造，仇恨被平台加深。到最后，人们以为自己是在表达正义，实际上是在替平台完成免费劳动：评论、转发、争吵、造梗、站队、举报、辱骂，全都变成平台流量生产链的一部分。

胖猫事件里，外卖纪念就是一个典型。许多人也许最初是真诚的，是想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悼念一个年轻人；可是这种悼念很快就被商品形式吞噬了。悲伤变成订单，纪念变成消费，悼亡变成品牌事故，外卖平台、商家、营销号、围观者全部卷进来。一个青年死了，最后却变成“给他点一份外卖”的集体仪式。这个场面越热闹，越说明这个社会的贫乏：我们甚至连哀悼都只能通过商品来表达。

这不是人民的错。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被训练到只能用消费表达感情，用购买表达关心，用订单表达哀悼。平台和商家早就把人的一切情绪——爱、恨、悲伤、愤怒、怀念、同情——都接入商品流通。你想纪念一个人，平台马上给你消费路径；你想表达愤怒，平台马上给你转发按钮；你想寻找真相，平台马上给你一堆剪碎的“证据”。在这个社会里，连痛苦都要经过资本的接口才能被看见。

所以，胖猫死后的网络狂欢，不是互联网偶然失控，而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它把私人悲剧公共化，把公共讨论情绪化，把社会矛盾性别化，把阶级问题碎片化，把死亡本身商品化。它制造一场看似全民参与的纪念，实际却让每个人都在平台规则中活动：有人生产内容，有人提供愤怒，有人制造谣言，有人反谣言，有人借机卖货，有人借机涨粉。所有人都像是在表达自己，实际上都在替资本增加数据。

中修为什么不真正反对这种机制？因为这种机制对它有用。平台把群众的痛苦分散成无数个私人事件，把阶级矛盾改造成情绪事件，把青年绝望改造成心理事件，把社会批判改造成道德审判。只要群众还在热搜里互相撕咬，只要青年还在评论区争谁更恶心，只要男人和女人继续互相仇恨，资本就可以继续剥削，官僚就可以继续维稳，修正主义统治就可以继续装成裁判。

平台经济和中修统治在这里是一体的。平台负责把人的痛苦加工成内容，中修负责在政治上保证这种加工机器不触及真正的阶级问题。平台说：不要停，继续看，继续骂，继续转发。中修说：可以骂，但不要组织；可以哭，但不要革命；可以讨论性别，但不要讨论资本；可以纪念死者，但不要追问为什么这样的青年会不断被社会逼到绝境。

因此，纪念胖猫，就必须反对平台资本对死亡的加工。我们不能让他的名字永远停留在热搜、短视频、营销号和周年流量里。真正的纪念，不是再一次点开那些剪辑，不是再一次参与评论区审判，不是再一次把他的死亡变成情绪消费，而是要把这个事件从平台手里夺回来，从算法手里夺回来，从性别战争手里夺回来。

胖猫不是流量素材。胖猫不是热搜标签。胖猫不是短视频脚本。胖猫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压碎的青年劳动者。

我们要说清楚：吃掉他的，不只是某一段关系，不只是某一次网暴，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社会机器。平台吃他的死亡，中修吃平台的稳定，资本吃青年的劳动，文化伪左翼吃群众的仇恨。所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真正的吃人社会。

一句话：胖猫死后仍然被平台反复消费，说明在中修资本主义社会里，青年活着时被资本榨取劳动，死后还要被平台榨取流量。纪念胖猫，就必须反对这种把死亡商品化、把悲剧内容化、把群众情绪资本化的人血馒头机器。

九、文化极左翼与政治经济极右翼的合谋：左手制造泥潭，右手保卫资本

胖猫事件不是孤立的网络舆论事件。它真正暴露出来的，是中修社会的一种基本统治结构：文化上极左，政治经济上极右；话语上激进，现实中反动；口号上解放，制度上压迫。 这两者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配合的。文化极左翼负责把群众拖进身份、性别、道德、情绪和网络审判的泥潭；政治经济极右翼负责在泥潭之外安安稳稳地保卫资本、平台、老板、官僚和资产阶级秩序。

中修不是不知道青年痛苦，不是不知道平台压榨，不是不知道婚恋市场已经腐烂，不是不知道社会上到处是孤独、焦虑、抑郁和绝望。它当然知道。它的统计、警察、平台、学校、单位和基层组织，比谁都更清楚这个社会正在怎样把青年压碎。可是它绝不会承认根源在资本主义复辟，不会承认根源在劳动无保障、住房商品化、教育内卷、平台剥削和阶级固化。它必须把问题改名，改成心理问题、性格问题、家庭问题、性别问题、网络问题、舆论问题。

这就是文化极左翼的功能：替政治经济极右翼改名。

青年没有稳定工作，不叫资本剥削，叫个人规划失败。
青年买不起房，不叫房地产资本吸血，叫还不够努力。
青年在婚恋中被阶层筛选，不叫商品社会侵入亲密关系，叫你性格不好。
青年精神崩溃，不叫社会压迫，叫情绪管理能力差。
男女青年互相仇恨，不叫资本主义婚恋市场制造对立，叫性别意识觉醒。
劳动者被平台榨干，不叫剥削，叫新业态、新机会、灵活就业。

语言一变，敌人就消失了。资本消失了，阶级消失了，国家机器消失了，平台消失了，官僚资产阶级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个互相指责的普通人：男人怪女人，女人怪男人，穷人怪穷人，青年怪青年，受害者怪受害者。中修最希望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文化极左翼不是没有激烈口号。恰恰相反，它的口号可以非常激烈。它可以天天谈反封建、反歧视、反压迫、反传统、反权威、反落后观念。可是它的激烈永远停留在文化层面，永远不越过阶级斗争的红线。它可以批判父母，可以批判婚恋，可以批判日常语言，可以批判某些个人习惯，却不会真正批判资本如何统治劳动，不会真正批判中修国家机器如何镇压革命者，不会真正批判平台资本如何把青年变成数据和耗材。

这就是一种被阉割过的“激进”。它看起来很凶，实际上很安全；看起来在反叛，实际上在分流；看起来在解放，实际上在缴械。它允许你在文化上愤怒，正是为了阻止你在政治上革命。它允许你在身份上重新命名，正是为了阻止你在阶级上重新组织。它允许你在网络上审判别人，正是为了阻止你在现实中审判资本和政权。

政治经济极右翼则在另一边稳稳运转。资本继续扩张，平台继续抽成，老板继续压榨，房地产继续吸血，教育继续筛选，医疗继续制造负担，青年继续被迫竞争，劳动者继续没有组织。文化战场上吵得天翻地覆，经济战场上资本却寸土不失。群众以为自己在参与一场大战，实际上只是被关在中修搭好的笼子里互相撕咬。

胖猫事件正是这种合谋的标本。一个青年劳动者死了，本来应该让人追问：平台劳动为什么这样孤立？青年生活为什么这样脆弱？贫苦青年为什么这样缺少现实支持？商品化婚恋为什么把人逼到绝路？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让爱情也变成阶层交换？可是文化机器马上把问题改造成“男女大战”。这样一来，最应该被批判的社会结构隐身了，最应该被团结起来的青年群众分裂了，最应该指向资本的怒火被转向了彼此。

这就是中修的高明之处，也是它的反动之处。它并不总是简单禁止群众说话。很多时候，它允许群众说话，但诱导群众说错话；允许群众愤怒，但诱导群众恨错对象；允许群众批判，但诱导群众批判不到制度根子上。只要你不组织工人，不建立革命政治，不宣传马列毛主义，不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复辟和中修国家机器，那么你的文化愤怒就可以被平台消化，被舆论吸收，被市场包装。

所以文化极左翼不是政治经济极右翼的敌人，而是它的助手。它像一层五颜六色的烟幕，遮住了资本赤裸裸的统治。它让中修可以一边说自己进步、现代、文明，一边让劳动者继续被压榨；一边说自己反对压迫，一边更严厉地镇压真正的革命者；一边说自己关心青年，一边把青年交给平台、房价、教育内卷和婚恋市场去碾碎。

这种结构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把人的反抗意志也改造掉了。一个青年本来可以问：“为什么我们被资本这样压迫？”最后却变成问：“为什么男人/女人这么坏？”一个劳动者本来可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组织？”最后却变成问：“为什么我不够成功？”一个被商品社会伤害的人本来可以问：“为什么爱情被阶级和金钱污染？”最后却变成问：“为什么我性格不好？”

这就是精神上的手铐脚镣。

中修推行文化极左翼，并不是为了让人民获得解放，而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重新跪下：让青年丧失斗志，让劳动者丧失阶级自觉，让男人和女人互相仇恨，让民族的反抗意志被身份政治、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一点点腐蚀。它要重新给中国人民戴上看不见的锁链，使人民不敢组织、不敢斗争、不敢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它宁愿让资本、买办和各种黑暗势力践踏人民，也不愿让马列毛主义重新把中国人民组织成革命力量。

我们必须把这层关系说透：文化极左翼不是中修政治经济极右翼的失误，而是它的工具。 没有文化极左翼制造的泥潭，政治经济极右翼就无法如此顺利地保卫资本；没有身份政治制造的群众分裂，资本就无法如此轻松地压榨劳动；没有网络道德审判制造的互相仇恨，中修就无法如此方便地把阶级问题压下去。

胖猫之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撕开了这层伪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青年不是先在理论上被打败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被打败的：在劳动中被平台孤立，在爱情中被商品关系污染，在网络中被流量机器消费，在舆论中被性别战争吞没，在社会解释中被说成“性格问题”。这一整套过程，就是中修文化极左翼与政治经济极右翼合谋的完整链条。

因此，纪念胖猫，就不能只批判平台，也不能只批判婚恋市场，更不能停留在男女互骂。我们必须批判这整个结构：文化上制造伪左翼，经济上保卫真右翼；文化上谈解放，经济上搞剥削；文化上鼓励群众互斗，政治上镇压革命组织；文化上把人拆成身份，经济上把人变成劳动力和消费者。

真正的革命批判，必须把这两只手同时抓住。只批判文化极左翼，而不批判资本，就会滑向旧式保守主义；只批判资本，而不批判文化伪左翼，就会看不清中修如何瓦解青年斗志、分裂劳动群众。我们要反对的，正是这二者的合谋：反对文化伪左翼把群众拖入泥潭，也反对政治经济极右翼把人民交给资本。

一句话：中修的文化极左翼，是给资本主义复辟戴上的红色面具；中修的政治经济极右翼，是这张面具下面真正的资产阶级统治。胖猫的悲剧告诉我们，只有撕下面具，才能看见吃人的制度本身。

十、真正的纪念：组织起来，反对吃人的社会

写到最后，我们必须回到胖猫本人。胖猫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符号，不是性别战争里的弹药，也不是平台算法里的素材。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劳动者，一个在孤独和压力中被社会压碎的人。纪念他，不能只停留在悲伤里，更不能停留在愤怒里。悲伤如果不转化成批判，就会被平台消费；愤怒如果不找到真正的敌人，就会被中修文化机器引向互相撕咬。

真正的纪念，不是再去围攻某一个人，不是再去翻炒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和私人细节，也不是把胖猫塑造成一个无条件正确的圣像。纪念胖猫，首先是承认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其次，是承认他的悲剧不是孤立的；最后，是要从他的死亡中看见这个社会如何系统性地制造绝望。一个青年为什么会如此孤独？为什么劳动不能给他稳定生活？为什么爱情要承担如此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功能？为什么平台可以把他的死继续加工成流量？为什么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最后却让青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泥潭中独自沉没？

答案不在性格里，不在“恋爱脑”里，不在“男人坏”或“女人坏”里。答案在社会关系里。是中修政治经济极右翼把劳动者交给资本，把青年交给平台，把住房、教育、医疗、婚恋、未来全部交给市场；又是中修文化极左翼把这些阶级矛盾改造成身份冲突、性别战争、道德审判和网络狂欢。前者制造绝望，后者解释绝望；前者压碎青年，后者羞辱被压碎的人。

所以，真正的纪念必须从私人悲剧走向社会批判，从社会批判走向组织。没有组织，青年只能在网络上哭、骂、转发、争吵，然后被平台再次吞掉。没有组织，劳动者只能把自己的痛苦理解成个人失败，把自己的孤独理解成性格缺陷，把自己的愤怒投向同样被压迫的普通人。没有组织，胖猫这样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只是名字不同、平台不同、热搜不同。

组织起来，首先意味着把青年从孤岛状态中解救出来。青年劳动者不能只活在屏幕前、订单里、聊天框里和私人关系里。必须有现实中的集体，有能够互相支持、互相教育、互相保护的组织形式。工人夜校、读书会、互助小组、劳动者社群、青年政治教育、反平台剥削的宣传、心理危机中的互相支撑，这些都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把孤立个体重新变成阶级成员的第一步。

组织起来，也意味着重新夺回解释权。中修和平台会告诉青年：你的痛苦是性格问题，你的失败是能力问题，你的孤独是心理问题，你的愤怒是性别问题。我们必须说：不。你的痛苦有社会根源，你的失败有阶级根源，你的孤独有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源，你的愤怒必须指向资本、平台、商品化生活和中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秩序。只有这样，青年才不会继续被错误的敌人消耗。

组织起来，还意味着反对把普通群众变成彼此的敌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不是为了把劳动妇女推到敌人一边；我们反对文化极左翼和身份政治，不是为了迫害普通性少数或任何被压迫个体；我们反对男权反扑，也不是为了否认底层男性真实的痛苦。真正的革命立场，是把一切被资本压迫、被平台孤立、被商品社会扭曲的人，从互相仇恨中解救出来，让他们重新看见共同的敌人。

胖猫事件最应该提醒我们的，就是：当劳动人民没有阶级组织时，他们的痛苦就会被各路资产阶级力量瓜分。男权势力拿他的死去仇恨女性；资产阶级女权拿他的死去羞辱底层男性；平台拿他的死去赚流量；中修拿他的死去做维稳和舆论管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拿他的死去讲心理学、讲性格、讲边界感。可是胖猫作为青年劳动者本身，反而消失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夺回来。

把胖猫从流量里夺回来，把他重新看作一个被平台社会压碎的青年劳动者。
把胖猫从性别战争里夺回来，把他重新放回商品化婚恋和阶级压迫的结构中。
把胖猫从资产阶级心理学里夺回来，把他的痛苦重新解释为社会关系的结果。
把胖猫从中修文化伪左翼手里夺回来，把他的死亡变成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控诉。

真正的纪念，不是纪念一个完美的人，而是纪念一个被不义社会夺走生命的普通人。正因为他普通，他才重要。因为他身上有千千万万青年劳动者的影子：孤独、节省、劳累、缺少未来、缺少现实共同体，把爱情当成最后的避难所，又在商品社会的冷酷面前被彻底击碎。

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再痛苦，但我们必须反对这个系统性制造痛苦的社会。我们不能把每一个私人悲剧都变成革命，但我们必须从私人悲剧中看见革命的必要。我们不能用口号复活胖猫，但我们可以阻止他的死亡继续被消费、被歪曲、被拿去制造新的仇恨。

所以，胖猫两周年，最重要的话不是“继续骂谁”，也不是“谁赢了性别战争”，而是：后来的人怎么办？

后来的人不能再一个人熬夜接单到崩溃。
后来的人不能再把全部人生压在一段私人关系上。
后来的人不能再被平台和资本榨干以后，还被骂成性格失败。
后来的人不能再在男人恨女人、女人恨男人的泥潭里互相毁灭。
后来的人必须组织起来，学习起来，团结起来，把私人痛苦变成阶级觉悟，把孤独变成集体，把绝望变成斗争。

胖猫死于一段具体关系，但他的绝望生长在整个社会之中。这个社会让资本支配劳动，让平台支配青年，让商品关系支配爱情，让文化伪左翼支配舆论，让政治经济极右翼支配现实生活。纪念胖猫，就必须反对这一整套吃人的秩序。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

胖猫不是笑话，不是标签，不是流量，不是性别战争的弹药。他是中修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中被压碎的青年劳动者。纪念他，就是反对这个把青年变成孤岛、把爱情变成交易、把死亡变成内容、把群众变成互相仇恨的原子的社会。真正的纪念，不是哭完就散，不是骂完就忘，而是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反对平台，反对中修文化极左翼与政治经济极右翼的合谋，把被压迫的青年重新带回阶级斗争的道路上。

从5月习特会看美中帝国主义交易与世界重新瓜分

第一段：开篇总论——习特会不是和平，而是大国交易

2026年5月发生的习特会，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会谈，也不能被理解为所谓“中美关系回暖”或者“大国理性回归”的简单事件。它表面上表现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礼仪性会见、经济性谈判和所谓“战略稳定”共识，实质上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继续加深、帝国主义战争风险不断上升、全球供应链和金融秩序日益动荡的条件下，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政治交易。特朗普来到北京，不是带着美国人民的和平愿望而来，而是代表美国垄断资本的现实利益而来；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也不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市场、利润和安全需求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所谓“战略稳定”，不是人民的稳定，不是和平的稳定，不是反对战争和压迫的稳定，而是帝国主义强盗之间为了避免矛盾暂时失控、为了继续共同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战争危机和重新划分利益边界而形成的反动稳定。因此，习特会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带来了和平，而在于它集中暴露了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事实：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既充满矛盾和斗争，又不断进行妥协和勾结；它们今天可以互相制裁、互相威胁、互相围堵，明天也可以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把贸易、能源、台湾、伊朗、朝鲜半岛、乌克兰以及整个世界市场作为交换和分赃的对象。对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来说，习特会不是希望的信号，而是警钟；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和平绝不会从北京和华盛顿的谈判桌上产生，真正的出路也绝不在帝国主义强盗之间选择一个“较好的强盗”，而只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斗争中寻找。

第二段：致敬项观奇同志——革命前辈的战略敏锐性

在分析5月习特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向项观奇同志致以革命的敬意。项观奇同志在第一时间抓住了特朗普访华、普京访华这两个连续事件的世界政治意义，没有把它们看作孤立的外交新闻，也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国际关系评论层面，而是把它们放在当代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矛盾运动和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项观奇同志指出，特朗普同习近平会谈，普京随后又访问中国，三国领导人的讲话、会谈和文件，都表明当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变化；他进一步把这一变化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联系起来，认为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反动格局。这个判断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从资产阶级外交辞令出发，而是从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出发；不是被所谓“和平”“合作”“战略稳定”的表面话语所迷惑，而是透过这些外交辞令，看到了大国之间在世界市场、地缘政治、战争危机和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交易与勾结。特别是项观奇同志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打破这种反动的大国格局，从而对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判断，体现了老一代革命者对于世界形势的敏锐观察，也体现了把国际形势分析同中国革命任务结合起来的战略眼光。

当然，我们在继承项观奇同志这一基本判断的时候，也需要在具体表述上进一步精确化。美、俄、中三国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公开条约式同盟，也不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夺、没有相互防范的稳定集团。相反，它们之间充满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的竞争、怀疑、背叛和重新讨价还价。美国仍然要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仍然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取更高地位，俄国帝国主义也仍然要保住自己在欧亚、中东和能源体系中的势力范围。因此，我们更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已经完全固定下来的“三国铁盟”，而是三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力量之间，在世界危机加深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阶段性的交易、协调、妥协和重新分赃的反革命大国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项观奇同志的判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入口和政治方向，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把5月习特会的阶级实质、经济实质和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揭示出来。

第三段：习特会的外交包装——所谓“战略稳定”

5月习特会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战略稳定”。在中美双方的外交语言中，这个词被包装得十分温和，仿佛它意味着两国关系终于从冲突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理性，从危险走向和平。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被资产阶级外交辞令的表面温度所欺骗。所谓“战略稳定”，首先要问：是谁的稳定？为了谁的稳定？稳定的是什么秩序？如果从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出发，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稳定”绝不是人民的稳定，不是工人阶级生活的稳定，不是被压迫民族摆脱战争和掠夺的稳定，也不是世界人民真正享有和平和自由的稳定。它所要稳定的，是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至于立即失控；它所要稳定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能够继续运转；它所要稳定的，是国际分工、供应链、金融秩序和地缘政治边界能够继续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利润积累；它所要稳定的，是帝国主义强盗们可以在不立即爆发全面冲突的情况下，继续压迫、剥削和瓜分世界人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稳定”不是和平的同义词，而是帝国主义危机管理的同义词。帝国主义之间当然会发生冲突，甚至会走向战争；但是，帝国主义之间也会谈判、妥协、签署协议、建立机制、举行峰会。战争和谈判不是彼此排斥的两个东西，而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两种形式。它们在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在冲突尚可管理的时候通过谈判来重新划分利益边界。枪炮、军舰、制裁、关税、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战略对话，表面形式不同，阶级本质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争夺世界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交通线、军事据点和势力范围服务的工具。因此，当习近平和特朗普都愿意使用“战略稳定”这种语言的时候，恰恰说明中美两国统治阶级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双方矛盾继续无节制升级，就可能危及各自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甚至危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可控运行。

对美国来说，所谓“战略稳定”首先是为了维护它作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美国并不是因为放弃了霸权主义而愿意同中国谈判，也不是因为它突然尊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愿意缓和关系。相反，美国是因为它在世界各地同时面临太多矛盾和危机，才需要以谈判的方式重新安排自己的力量。美国要维持在欧洲、中东、亚太和拉美的霸权体系，要处理同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要面对中东战争和能源通道的动荡，要维持美元金融体系和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优势，还要解决国内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统治阶级需要中国在供应链、贸易、稀土、能源、金融和国际危机管理等问题上作出一定配合。所谓“战略稳定”，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不能立即彻底压倒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下，通过交易和谈判，把中美矛盾控制在不破坏美国全球霸权总体布局的范围之内。

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来说，所谓“战略稳定”也不是出于对和平的真诚追求，而是出于自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深深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离不开美国市场，离不开全球供应链，离不开技术、金融、贸易和国际投资体系。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一方面利用民族主义宣传把自己打扮成反霸权、反美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不断寻求同美帝国主义缓和关系，因为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出口、就业、金融稳定和国际地位，都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既害怕美帝国主义的围堵和打压，又害怕同美国彻底脱钩会引发国内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爆发。因此，习近平在习特会中强调“战略稳定”，实质上就是要求美帝国主义承认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在现有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减少某些方面的战略压力，使中国统治阶级能够继续在所谓“稳定外部环境”中压迫本国劳动人民、积累资本、扩张影响并维持反动统治。

所以，习特会中的“战略稳定”绝不能按照资产阶级媒体和外交官的解释来理解。它不是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是反战力量的胜利，不是世界和平的新开端，而是两个反动国家机器在危机压力下达成的一种暂时安排。它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统治阶级都希望把双方矛盾控制在可以谈判、可以交易、可以计算的范围内；它意味着它们都不愿意让冲突立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它意味着它们都还需要对方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承担某种功能。美帝国主义需要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市场、供应链和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社会帝国主义需要美国承认它作为大国强盗之一的谈判资格。于是，双方就在“战略稳定”的漂亮话语下，把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把世界危机变成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对象。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政治中最虚伪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总是把统治阶级的稳定说成人民的稳定，把资本的安全说成社会的安全，把帝国主义之间暂时不火并说成世界和平。可是，对劳动人民来说，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往往意味着工资压迫的稳定、失业恐惧的稳定、警察镇压的稳定、民族压迫的稳定、战争准备的稳定和贫富分化的稳定。一个稳定地剥削工人的社会，不是人民应当赞美的社会；一个稳定地掠夺世界的国际秩序，不是无产阶级应当维护的秩序；一个稳定地让帝国主义大国管理战争和危机的体系，也不是世界人民真正的和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揭穿“战略稳定”的阶级内容：它不是为了让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而是为了让帝国主义在更可控的条件下继续准备战争；不是为了消灭世界危机，而是为了让大国强盗共同管理危机；不是为了结束资本主义剥削，而是为了在剥削秩序受到威胁时重新稳定剥削秩序。

正因为如此，习特会的外交包装越是温和，我们越要看到它背后的反动实质。特朗普和习近平可以在镜头前握手，可以互相使用礼貌语言，可以宣布双方关系进入所谓“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世界人民，而是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的统治阶级。美国政府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军工资本、能源资本、科技资本和农业资本的利益；中国修正主义政权代表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国家资本、出口资本、房地产金融集团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们之间的会谈，本质上是两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间的谈判，而不是人民之间的和平协商。所谓“战略稳定”，就是强盗之间约定暂时按照某种方式分赃，约定在某些问题上彼此克制，在另一些问题上继续争夺，在共同害怕世界局势失控、共同害怕人民革命兴起、共同害怕资本主义秩序崩溃的时候，建立一种反革命的危机管理机制。

因此，5月习特会所揭示的不是和平的曙光，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深刻腐朽。它说明，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会因为几个大国领导人握手而消失；相反，这种握手本身就是矛盾尖锐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正因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矛盾、军事矛盾、地缘政治矛盾和世界市场矛盾已经发展到危险程度，双方才需要用“战略稳定”来给这种矛盾套上一个可以管理的外壳。正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更深的危机，帝国主义强盗们才需要通过峰会、协议和机制来防止危机立即撕裂整个体系。对无产阶级来说，必须从这种外交包装中看清阶级实质：帝国主义之间的稳定，不是人民的解放；大国之间的缓和，不是战争根源的消灭；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谈判桌，不可能产生真正属于世界人民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只能建立在推翻帝国主义、推翻社会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之上。

第四段：经济实质——美中垄断资本的交易

如果说“战略稳定”是习特会的外交包装，那么经济交易就是习特会的现实骨架。资产阶级外交最喜欢把国家领导人的会谈说成是“增进理解”“扩大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剥开这些漂亮辞令，就会看到一张清清楚楚的资本账本：飞机订单、农产品出口、稀土供应、关键矿产、市场准入、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供应链稳定、能源通道、金融风险管理。这些内容同普通劳动人民没有直接关系，却同美国和中国两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白宫在会后事实清单中明确把特朗普访华说成是为美国工人、农民和工业争取“历史性协议”，并列出了贸易、投资、稀土和关键矿产、波音飞机、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牛肉和禽肉准入等成果。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暴露了习特会的阶级实质：它不是人民之间的和平会议，而是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谈判；不是世界人民共同反对危机，而是大国资产阶级共同管理危机；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矛盾，而是把这些矛盾暂时整理成可以讨价还价的商业项目和政治条件。

特朗普来到北京，首先不是作为美国普通劳动者的代表，而是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人来到北京。他口中所谓“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工人阶级优先，也不是美国底层人民优先，而是美国金融资本、军工资本、能源资本、航空资本、农业资本和科技资本的利益优先。美国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越深，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就越需要把危机向外转嫁；美国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需要中国市场，美国航空资本需要飞机订单，美国科技资本需要供应链和关键矿产，美国金融资本需要世界市场保持可控，美国国家机器需要中国在某些国际危机上配合美国的全球霸权布局。所以，特朗普访华的经济目的并不神秘：他要把中国重新拉回一个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的交易框架之中。他可以在政治上威胁中国，在军事上围堵中国，在贸易上压迫中国，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美国资本又离不开中国市场、供应链和资源节点。这种既压迫又依赖、既围堵又交易的关系，正是当代帝国主义矛盾的典型表现。

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这场交易中的角色，同样不是代表中国人民，而是代表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国劳动人民并没有从所谓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工人仍然要在血汗工厂、外卖平台、建筑工地、电子厂、物流仓库和各种资本主义企业中出卖劳动力；中国农民工仍然要承担低工资、长工时、无保障、被驱赶、被欠薪的压迫；中国青年仍然面对失业、内卷、房贷、教育成本和国家机器的政治压迫。可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市场，需要出口订单，需要美国消费者，需要美元体系，需要国际投资，需要技术输入和贸易通道。它一方面用民族主义语言对内宣传“东升西降”“伟大复兴”“反对霸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在现实中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要求美国给予市场空间、技术空间、金融空间和地缘政治缓冲。这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只有一个已经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取更高议价权和更大掠夺份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稀土和关键矿产问题集中体现了习特会的经济实质。稀土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现代军工、半导体、新能源、航空航天和高端制造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美国关心稀土，不是因为美国人民需要和平生活，而是因为美国军工资本、科技资本和高端制造资本需要稳定供应。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白宫称中国将处理美国对于稀土短缺的关切，而这些短缺已经影响美国航空航天和半导体制造。这就说明，所谓“合作”背后，是美国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为了维护军事工业和高技术资本运转而提出的战略要求；而中国则把稀土作为谈判筹码，用来换取美国在关税、市场、投资、台湾或其他问题上的让步。一个是想保证自己的战争机器和高科技霸权不断粮，一个是想用资源控制来抬高自己的谈判地位。两边都不是从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各自垄断资本的利益出发。

波音飞机和农产品问题也是一样。美国把飞机订单、农产品出口、牛肉和禽肉准入包装成对美国工人和农民的胜利，好像美国普通劳动者就是这场交易的主人。但是，真正从这些交易中首先受益的，是航空垄断资本、农业资本、跨国粮商、运输资本和金融资本。美国农民在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不是自由而平等的小生产者，他们越来越受制于农业综合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和国际市场价格。所谓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不会改变美国资本主义农业体系对小农和农业工人的压迫；所谓波音飞机订单，也不会改变航空工业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特朗普把这些交易说成是“美国人民的胜利”，不过是把垄断资本的利润说成普通人民的利益，把资产阶级国家的商业成功说成劳动人民的胜利。这正是资产阶级政治最常用的骗术：资本赚钱，说成国家胜利；国家交易，说成人民受益；垄断集团分赃，说成两国合作。

同样，中国方面也会把这些交易包装成“大国外交成功”“中美合作稳定世界”“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但是，对中国劳动人民来说，这些所谓成功并不意味着工资提高、政治自由扩大、劳动条件改善、社会保障加强或者剥削制度削弱。相反，所谓外部环境稳定，往往是为了让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能够更稳定地剥削本国工人，更稳定地维持出口机器，更稳定地镇压劳动者的反抗，更稳定地把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超级工厂和资本输出大国。中国修正主义政权最害怕的不是美帝国主义本身，而是中美关系剧烈破裂引起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国内阶级矛盾，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因此，中国统治集团追求“战略稳定”和经贸缓和，归根到底是为了给自己的反动统治争取时间，为官僚垄断资本争取市场，为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资产阶级争取继续积累和扩张的条件。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习特会的经济交易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一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竞争就不再只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垄断集团、金融资本和国家机器结合起来的竞争。国家不再只是资本的“外部保护者”，而直接成为资本对外扩张、对内镇压、谈判分赃和战争准备的组织者。美国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谈判，表面上是两个国家的外交，实质上是两个垄断资本集团背后的国家机器在谈判。贸易委员会不是中立机构，投资委员会不是人民机构，供应链稳定不是无阶级的技术问题，市场准入也不是抽象的经济自由。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开路、为利润铺路、为危机管理搭桥的工具。

所以，习特会越是强调经济合作，我们越要看到它背后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总是说，经贸合作可以造福两国人民；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合作首先造福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工人生产飞机，资本家拿走利润；农民和农业工人生产粮食，粮商和金融资本拿走利润；矿工、工程师和产业工人支撑稀土和高科技产业，国家资本和跨国资本拿走利润；亿万劳动者维持世界供应链，真正坐在谈判桌前分配供应链收益的，却是总统、主席、部长、银行家、企业巨头和官僚资本家。劳动者创造世界财富，却被排除在决定世界财富如何分配的会议之外。习特会的经济实质，正是这种资本主义荒谬现实的集中表现：生产世界的是劳动人民，谈判世界的是资产阶级；承担危机的是劳动人民，管理危机的是帝国主义国家；被剥削的是劳动人民，被说成“国家利益”的却是垄断资本的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把习特会从资产阶级外交的幻象中拉回到阶级分析的地面上。特朗普和习近平谈的不是抽象的中美友好，而是资本和资本之间的交易；不是世界人民的未来，而是世界市场的分配；不是和平的原则，而是利润的条件；不是消灭危机，而是推迟危机、转嫁危机、管理危机。美国垄断资本希望通过习特会获得市场、订单、资源和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配合；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希望通过习特会获得缓和、承认、稳定和继续发展的空间。双方互相斗争，又互相需要；互相威胁，又互相交易；互相防范，又共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就是习特会经济实质的全部秘密。对无产阶级来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国之间的经贸协议不等于人民之间的团结，垄断资本之间的交易不等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帝国主义之间的暂时妥协更不等于世界和平。真正能够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不是北京和华盛顿的商业谈判，而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斗争。

第五段：台湾问题——大国交易桌上的筹码

在习特会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集中、最尖锐、也最能暴露所谓“战略稳定”反动实质的问题之一。中美之间谈“战略稳定”，并不是在一个抽象的和平空间里谈判，而是在台海军事紧张、美国持续利用台湾牵制中国、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不断以民族主义动员和军事压力威胁台湾的现实背景下谈判。中方公开稿件在谈到习特会时，明确把台湾问题放在中美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位置，并强调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危机；美国方面虽然在某些公开材料中有意淡化台湾问题，但这恰恰说明，台湾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放进了中美双方对“战略稳定”的不同理解和相互试探之中。CFR的分析也指出，中美虽然都使用“战略稳定”这个词，但双方对它的含义并不相同：美国更关心竞争是否可控、贸易是否可管理，中国则更希望通过这一概念迫使美国在台湾等核心问题上降低战略压力。

这就说明，台湾问题在习特会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议题，而是中美两大反动国家机器进行战略交易的核心筹码之一。美帝国主义并不是真正关心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解放。美国长期以来把台湾作为其西太平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作为遏制中国、控制第一岛链、维持亚太霸权、向中国施压的前沿阵地。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口中所谓“保卫台湾民主”，从来不能脱离美国军工资本、亚太军事基地、武器销售、战略围堵和霸权体系来看。美国可以在需要对中国施压的时候高喊台湾安全，也可以在需要同中国交易的时候把台湾问题放上谈判桌；它可以用台湾作为军事筹码，也可以用台湾作为外交筹码。台湾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眼中，不是自己的命运主体，而是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同样不是从台湾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把台湾问题包装成所谓“民族复兴”的核心任务，用民族主义语言把它说成不可讨论、不可质疑、不可动摇的国家统一问题。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怎样解释自己的领土要求，而在于这种要求服务于哪个阶级、采取什么方式、造成什么结果。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服务的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台湾劳动人民的共同解放，而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国利益、军事利益、民族主义统治合法性和区域霸权扩张。它把台湾人民的命运纳入北京统治集团的国家战略，把台湾问题变成国内民族主义动员的工具，把反对美帝霸权的正当情绪引向支持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扩张的错误方向。

因此，台湾问题的实质不能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遮蔽。美帝国主义利用台湾，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就有权压迫台湾；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威胁台湾，也不意味着台湾人民就应当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帝国主义保护。对台湾劳动人民来说，美帝国主义不是解放者，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也不是解放者。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军售和安全承诺，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口号、军事演习和统一威胁，也不可能带来劳动人民的解放。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不是成为华盛顿的棋子，也不是成为北京的战利品，而是作为劳动人民、作为被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体系压迫的一部分，同中国大陆工人阶级、美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本地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习特会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危险性，正在于它把台湾人民排除在台湾命运之外。大国政治最反动、最野蛮的地方，就是它总是把人民居住的土地变成战略空间，把人民的生命变成军事风险，把人民的未来变成谈判筹码。台湾不是一张地图上的岛屿，不是美国印太战略文件中的一个节点，也不是中国民族主义宣传机器中的一个符号。台湾有工人，有农民，有青年，有妇女，有失业者，有低薪劳动者，有被资本压迫、被房租压迫、被工作制度压迫、被资本主义政治压迫的人民群众。可是，在中美两国统治阶级的谈判中，台湾人民作为阶级主体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台海稳定”“核心利益”“战略互信”“军事平衡”“不发生冲突”这类资产阶级国际政治术语。人民的真实生活被抽空了，阶级矛盾被遮蔽了，台湾问题被改写成两个大国如何避免误判、如何管理风险、如何互相让步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战略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为了保证台湾人民不受战争威胁，而是为了保证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冲突暂时不超出可管理范围；不是为了让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命运，而是为了让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战略算计；不是为了消灭台海战争的根源，而是为了把战争风险纳入双方都可以利用、可以威胁、可以交易的范围内。美国需要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中国需要台湾问题来动员民族主义和争取大国地位。双方都说自己是在维护稳定，实际上都在制造不稳定的根源。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存在、军售体系、同盟网络和战略围堵，是台海危机的重要来源；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民族主义动员和大国扩张，同样是台海危机的重要来源。两个强盗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和平，却共同把台湾人民推到战争风险之中。

更深一层看，台湾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中美大国交易的核心，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军事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的交织。台湾处在东亚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美国军事霸权体系的交汇处，也处在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争取区域霸权和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关键位置上。台积电、半导体产业链、海上通道、第一岛链、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中国的海权扩张、日本和菲律宾的战略位置，这些都使台湾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统一”的问题。它已经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军事体系深深卷入。谁控制台湾，谁就能在东亚供应链、军事部署和地缘政治中获得重要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轻易放手，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也不愿意放弃压力。台湾人民的命运被夹在两个大国强盗之间，正是帝国主义时代小民族、小地区、被压迫人民经常遭遇的悲剧。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两种错误立场划清界限。第一种错误立场，是自由派和亲美派的立场。他们把美国说成台湾民主的保护者，把美国军售、美国军事存在和美国印太战略说成安全保障。这种看法完全遮蔽了美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美国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国际民主教师，更不是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美国维护台湾，不是为了台湾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为了美国霸权的需要。今天美国可以说支持台湾，明天美国也可以在更大的交易中牺牲台湾。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就是把台湾人民的命运交到另一个强盗手中。

第二种错误立场，是中国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立场。他们把台湾问题说成中国内部问题，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站在中国国家机器一边，甚至把反对武力威胁、反对民族主义压迫、主张台湾人民民主权利的声音都说成“卖国”或者“台独”。这种立场同样是反动的。它把中国工人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把反对美帝霸权同支持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混为一谈，把民族问题上的革命立场变成对现存国家权力的服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反美”变成“拥护中修”，不能把反对美国利用台湾变成支持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威胁台湾人民，更不能把台湾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删除。

因此，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必须是清楚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把台湾变成军事前哨、武器市场和遏制中国的棋子；同时，我们也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用民族主义和武力威胁压迫台湾人民。我们反对任何大国把台湾人民的命运拿到谈判桌上交易，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以“安全”“稳定”“统一”“民主”的名义剥夺台湾劳动人民作为主体的权利。台湾问题的真正出路，不在美国保护之下，也不在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吞并之下，而在两岸劳动人民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革命团结之中。台湾工人阶级和大陆工人阶级不是敌人；美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也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把他们推向战争、民族仇恨和相互屠杀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从习特会来看，台湾问题暴露了所谓大国政治的全部反动本质。习近平和特朗普都可以说自己关心和平，都可以说自己希望稳定，都可以说自己不愿意冲突失控；但是，只要台湾仍然被当作美国霸权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争霸的筹码，台海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不是两个大国说“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是台湾人民不再被任何大国支配；不是美中之间建立军事热线，而是美帝国主义撤出自己的军事霸权体系，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停止民族主义威胁；不是强盗之间约定暂时不动刀，而是人民群众推翻强盗统治本身。正因为如此，习特会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战略稳定”，不是和平的保障，而是下一轮危机的准备；不是台湾人民命运的解决，而是台湾人民命运继续被大国摆布的延续。

所以，我们批判习特会，就必须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切口。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会议中的每一个“稳定”，背后都有人民被排除；每一个“大国共识”，背后都有小民族、小地区和被压迫群众被牺牲；每一个“战略安排”，背后都有资本和国家机器对人民命运的垄断。对无产阶级来说，不能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之间选择一方，不能把台湾人民的命运交给任何一个大国，也不能让民族主义压倒阶级立场。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反对美帝利用台湾，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威胁台湾，支持台湾劳动人民和大陆劳动人民在反帝、反修、反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实现真正的团结。只有这种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才可能打破大国交易的锁链，才可能把台湾问题从强盗谈判桌上夺回来，重新交还给人民和革命。

第六段：伊朗、朝鲜半岛和世界危机——大国共管世界

如果说台湾问题暴露了习特会在东亚问题上的反动实质，那么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朝鲜半岛问题，则进一步说明习特会根本不是一次单纯的中美双边会谈，而是一次围绕世界危机进行的大国政治协调。美国和中国坐在谈判桌前，谈的并不只是关税、飞机、农产品、稀土，也不只是台湾问题，而是把中东战争、能源通道、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整个世界秩序的运行都纳入了大国交易的范围。白宫会后事实清单声称，特朗普和习近平确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共同目标，并且在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形成共同表述；相关报道还指出，双方会谈涉及朝鲜半岛安全、台湾、美国—以色列同伊朗的战争以及双边贸易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这就清楚说明，习特会的实质不是“两个国家改善关系”，而是两个大国强盗在世界危机面前商量如何管理危机、分配责任、划定边界、维持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可控运行。

首先看伊朗问题。伊朗问题之所以进入习特会，不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突然关心中东人民的命运，也不是因为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真心反对战争，而是因为伊朗问题已经触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神经：石油、航运、美元、军事霸权、中东秩序和全球能源价格。美国长期把伊朗视为中东霸权体系中的障碍，围绕核问题、制裁、军事打击、以色列安全和海湾秩序不断施压。中国则一方面依赖中东能源，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同伊朗、沙特、海湾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于是，伊朗人民的命运、伊朗的主权、伊朗劳动人民在战争和制裁中承受的苦难，都被大国政治改写成“核扩散”“能源安全”“海峡通航”“地区稳定”这类资产阶级国际政治术语。人民消失了，剩下的是国家、导弹、石油、海峡、舰队、制裁和谈判。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尤其典型。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能源运输的关键通道，谁能影响这条通道，谁就能影响世界市场的能源价格、运输成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美国要求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反对任何国家或组织收取通行费用，表面上说的是航行自由，实质上维护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海洋秩序和资本主义能源流通秩序。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所谓“航行自由”从来不是抽象原则，而是美国海军霸权、能源霸权和全球贸易霸权的政治语言。美国的航母和军舰遍布世界，不是为了保卫人民自由，而是为了保证美国垄断资本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能够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运转。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失控，油价、航运、金融市场、军工部署和全球资本流动都会受到冲击。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必须把这个问题拿到同中国的谈判中来。

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需要中东能源，需要海上通道，需要全球市场稳定，需要伊朗不要把能源和航运危机推到不可控的程度。特朗普在返程时甚至说，中国很大一部分能源或石油经过海峡，美国“不需要”它，因此中国会自然希望海峡开放；布鲁金斯的分析也指出，特朗普本来希望在伊朗问题上获得中国帮助，但中方公开上并没有承认具体让步。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中美在伊朗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但它们都有共同的危机管理需要。美国要维护霸权，中国要维护能源和贸易通道；美国要中国配合自己的中东秩序，

中国又不愿意公开充当美国的副手。于是，双方之间出现的不是人民和平，而是大国算计；不是反战团结，而是危机分工；不是为了消灭中东战争根源，而是为了让战争、制裁和能源通道保持在不至于立即撕裂世界市场的范围内。

朝鲜半岛问题也具有同样性质。白宫说特朗普和习近平确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共同目标，而韩国媒体也报道，会谈涉及半岛安全问题。(聯合新聞社)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朝鲜半岛长期紧张的根源，不是抽象的“核问题”，而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朝鲜半岛分裂、冷战结构的延续、地区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以及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围绕东北亚秩序的争夺。美国一方面要求朝鲜无核化，另一方面在韩国、日本和整个亚太维持庞大的军事体系；美国一方面说维护和平，另一方面不断利用半岛问题巩固自己的同盟网络和军事部署。中国则把朝鲜半岛作为自己东北战略安全和同美国、日本、韩国博弈的重要缓冲区。这样一来，朝鲜半岛人民的统一、和平和社会解放问题，又被大国政治压缩成核武器、导弹、制裁、军事演习和战略平衡问题。

这里最应该批判的，是大国共管世界危机的逻辑。所谓大国共管，就是几个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人民排除在外，把战争地区、能源通道、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的命运拿到自己手中进行安排。它们可以说某个国家不能拥有核武器，可以说某条海峡必须开放，可以说某个地区需要稳定，可以说某个国家必须接受国际监督；但是，它们从来不问这些地区的劳动人民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从来不承认这些危机本身正是帝国主义体系长期压迫、干涉、制裁、军事包围和资本掠夺造成的。帝国主义先制造危机，再出来管理危机；先点火，再主持灭火；先把世界撕裂成势力范围，再装作自己是维护秩序的仲裁者。这就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真实面目。

伊朗、朝鲜半岛、霍尔木兹海峡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放到习特会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伊朗连接中东能源、反美力量、以色列安全、海湾秩序和全球石油市场；霍尔木兹海峡关系到能源运输、海上霸权和世界市场稳定；朝鲜半岛关系到美国东北亚军事体系、中国东北安全、日本再军事化和亚太战略平衡。也就是说，这些问题都不是单纯地区问题，而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集中点。美中两国在这些问题上谈所谓“共识”，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如何防止地区危机冲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何把战争风险控制在能够被大国利用而不至于完全失控的范围内，如何让危机服务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转化为人民革命和反帝斗争的突破口。

对美国来说，大国共管世界危机，是维护霸权的一种方式。美国不能单靠军事打击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在每一个地区都无限投入力量。它需要盟友，需要附庸，需要对手在某些时候配合自己，需要通过谈判把中国、俄罗斯甚至其他地区大国纳入某种危机管理框架。美国可以轰炸，可以制裁，可以封锁，也可以开会、谈判、签协议、交换条件。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目标都是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和美国国家机器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美国要求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不是因为美国反对核霸权，而是因为它只允许自己和自己的盟友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美国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是因为美国尊重世界人民的交通权，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能源流通不能被妨碍；美国要求朝鲜无核化，不是因为美国反对战争，而是因为美国要维持东北亚军事优势。

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来说，大国共管世界危机，则是争取大国地位的一种方式。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一方面对内宣传所谓“反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积极争取参与国际危机调停、地区秩序安排、能源安全谈判和大国峰会机制。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不再只是世界工厂，而是世界秩序的共同管理者；不再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生产基地，而是可以同美国一起讨论伊朗、朝鲜半岛、能源通道和地区安全的大国。可是，这种“大国地位”本身就是反人民的。它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支持被压迫民族革命，也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分享管理世界、影响世界、重新划分世界利益的权力。它不是打破帝国主义秩序，而是要求在帝国主义秩序中获得一个更高的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国共管世界危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关心的是各国劳动人民如何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如何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占领和剥削，如何把反战斗争同反资本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大国共管关心的则是危机怎样不冲击世界市场，战争怎样不影响能源通道，核问题怎样不破坏军事平衡，地区冲突怎样不使大国失去控制。前者的主体是人民，后者的主体是国家机器；前者的目标是解放，后者的目标是统治；前者要推翻帝国主义体系，后者要维护帝国主义体系。习特会把伊朗、霍尔木兹、朝鲜半岛等问题纳入谈判，正好说明它站在后者一边，而不是站在人民一边。

这里还必须指出，大国之间所谓“防止战争”的努力，往往并不是反战，而是更高级的战争准备。帝国主义国家当然害怕某些战争不受控制，因为不受控制的战争会破坏市场、打断供应链、冲击金融、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甚至激发人民反抗。但是，它们并不反对战争本身。它们反对的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战争，而不是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战争；它们反对的是对自己不利的核扩散，而不是自己的核垄断；

它们反对的是影响自己能源利益的封锁，而不是自己对别人的封锁；它们反对的是削弱自己同盟体系的地区冲突，而不是自己制造的军事包围。因此，美中在伊朗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并不能说明它们站在和平一边，只能说明它们希望以大国方式垄断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特会对世界人民来说不是好消息，而是危险信号。因为当大国开始把世界危机共同纳入管理框架时，往往意味着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空间会受到更大压缩。伊朗人民、巴勒斯坦人民、朝鲜半岛人民、台湾人民、乌克兰人民以及世界各地被卷入大国冲突的人民，都可能被要求服从所谓“地区稳定”“国际秩序”“大国共识”。任何真正触动帝国主义秩序的反抗，都可能被污名化为破坏稳定；任何不符合大国安排的革命，都可能被说成威胁和平；任何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都可能被大国拿来谈判、出卖或压制。所谓世界稳定，实际上常常是世界人民被迫安静地忍受剥削和压迫。

第七段：中美矛盾没有消失——缓和是斗争的一种形式

在揭露习特会的大国交易性质之后，我们还必须防止另一种片面的、机械的理解：仿佛中美两国在5月举行会谈，提出所谓“战略稳定”，达成若干经济和政治共识，就意味着中美矛盾已经消失，甚至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完全合流为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统一集团。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勾结，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勾结。相反，正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垄断资本的基础上，都要争夺市场、原料、投资场所、技术优势、军事据点和世界政治影响力，所以它们之间必然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尖锐矛盾；既会谈判，又会冲突；既会暂时妥协，又会重新翻脸。习特会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中美矛盾的终结，而是中美矛盾在新的世界危机条件下的一次重新组织。

中美之间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它要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维护美元体系，维护军事同盟网络，维护高技术垄断，维护海上通道和世界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则已经不再满足于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低端加工厂和廉价劳动力基地，而是依靠国家资本、官僚垄断资本、高端制造、军工力量、数字资本、金融扩张和“一带一路”等形式，要求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中获得更大份额。这两个大国在许多问题上可以交易，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份额、产业链主导权、技术标准、军事空间、金融影响、东亚秩序、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全球南方影响力等方面的矛盾，不可能因为一次会谈而消失。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老牌帝国主义霸权不会自动让位，新兴社会帝国主义力量也不会停止扩张。双方的会谈，恰恰是在这种矛盾日益尖锐的基础上发生的。

因此，缓和不是矛盾消失，而是矛盾运动的一种形式。帝国主义之间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以战争和公开冲突的形式表现矛盾；在很多时候，它们通过谈判、协议、峰会、经济机制、外交声明和危机热线来调整矛盾。今天握手，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制裁；今天谈贸易，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技术封锁；今天讲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军演和军事部署；今天说互利合作，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重新提高关税、扩大制裁名单、加强军事同盟或者煽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和平时期”，本身就是下一轮冲突的准备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机制”，本身就是下一轮讨价还价的组织形式；帝国主义之间的“稳定关系”，本身就是在不稳定基础上暂时建立起来的平衡。

这正是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观点。帝国主义不是一种静止的国际关系，而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扩张、竞争和重新分配利益的体系。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把竞争提高到更集中的、更残酷的、更国家化和军事化的形式。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可以建立国际垄断同盟，可以划分市场，可以协调价格，可以签订协定，可以共同压迫弱小民族和被殖民半殖民地区；但是，这些同盟和协定从来不是永恒的。随着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变化，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危机和战争的爆发，旧的分配关系必然被新的分配要求所冲击。于是，昨天的合作伙伴可以变成今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以在某些条件下成为明天的临时伙伴。帝国主义的联盟、妥协和和平，本身就孕育着新的冲突和战争。

习特会正是这种规律的现实表现。中美两国之所以要谈“战略稳定”，不是因为矛盾变小了，而是因为矛盾太大了；不是因为双方已经互相信任，而是因为双方都害怕矛盾失控；不是因为它们放弃了争夺，而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继续争夺的同时防止代价过高。美国不可能放弃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产业遏制和军事围堵，因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能容忍中国在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金融、航运和全球南方市场中不断扩大影响。中国也不可能放弃对美国市场、技术、金融和国际承认的需求，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深深依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于是，双方之间形成一种矛盾的统一：它们既互相依赖，又互相防范；既互相交易，又互相压迫；既共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又在这个秩序内部争夺更大份额。

这种矛盾统一，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简单归结为“全面对抗”或者“全面合作”。资产阶级自由派往往喜欢把中美关系理解为“理性合作战胜意识形态冲突”，仿佛只要双方多谈判、多贸易、多接触，就能自动走向和平。这种看法是幼稚的，因为它看不到资本主义竞争的根源。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由误会造成的，不是由外交语言不够友好造成的，也不是由某个总统个人性格造成的，而是由垄断资本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造成的。

另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者又喜欢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东升西降”“美国被迫承认中国崛起”，仿佛一次会谈就证明中国已经战胜美帝。这样的看法同样是反动和愚蠢的，因为它把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体系内争取地位的活动，说成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把社会帝国主义的大国交易，说成了所谓民族复兴的成果。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资产阶级叙事。习特会既不是自由派所谓中美理性合作的新纪元，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所谓中国压倒美国的胜利时刻。它是两个资本主义大国在深刻矛盾中进行的一次阶段性调整。美国没有放弃霸权，中国没有放弃扩张；美国仍然要遏制中国，中国仍然要争取更大空间；美国仍然要利用台湾、日韩、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整个印太体系压迫中国，中国仍然要利用中俄关系、全球南方、市场规模、产业链和资源控制同美国讨价还价。双方的矛盾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暂时装进了“战略稳定”的框架里；双方的斗争不是停止了，而是以更加复杂、更加隐蔽、更加有组织的形式继续展开。

我们还要看到，中美缓和本身也可能服务于更残酷的内部阶级压迫。美国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对华交易为本国垄断资本争取订单、市场和供应链稳定，同时继续压迫美国工人阶级、移民、少数族裔和贫困群众；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也可以利用中美缓和来稳定出口、金融和就业表面数据，同时继续镇压工人斗争、压低工资、加强监控、打击异议和维持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缓和并不必然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对资产阶级来说，缓和意味着资本积累条件的改善；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斗争，缓和往往只意味着剥削秩序更加稳定地运转。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完全可能是稳定地剥削、稳定地压迫、稳定地失业、稳定地制造贫困和稳定地准备战争的秩序。

从国际角度看，中美缓和也可能意味着其他地区人民被拿来交易。帝国主义之间缓和的一个常见结果，就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地区的利益被牺牲。大国为了达成某种暂时平衡，可能在台湾、伊朗、乌克兰、朝鲜半岛、南海、巴勒斯坦、拉美和非洲等问题上进行明示或暗示的交换。一个地区的危机可以成为另一个地区让步的筹码，一个国家的市场可以换取另一个国家在军事问题上的沉默，一个民族的命运可以被包装成“维护总体稳定”的必要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迷信帝国主义之间的和平谈判。强盗之间停止互相开枪，并不等于他们不再抢劫；强盗之间划分地盘，并不等于被抢劫的人获得了自由；强盗之间建立规则，并不等于这些规则符合人民利益。

因此，所谓“中美矛盾没有消失”，不仅是一个外交判断，更是一个阶级判断。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只要垄断资本还存在，只要世界市场仍然由资本主义竞争支配，只要国家机器仍然服务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消失。它们可能暂时缓和，可能阶段性合作，可能形成共同管理危机的机制，但这种缓和和合作本身仍然建立在压迫世界人民的基础上，仍然孕育着新的危机和战争。帝国主义没有永恒和平，只有暂时平衡；没有真正合作，只有利益交换；没有共同繁荣，只有共同剥削和重新分赃。

这一点对我们分析美、中、俄三角关系尤其重要。特朗普访华和普京访华相继发生，并不意味着三个大国组成了没有裂缝的永久联盟。美国同俄罗斯在乌克兰、欧洲安全和核问题上有深刻矛盾；美国同中国在台湾、技术、贸易和亚太秩序上有深刻矛盾；中国同俄罗斯之间虽然有反美协作和能源合作，但也存在经济地位不平衡、地区影响力、资源价格、战略依赖等矛盾。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同盟关系，而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复杂三角交易。它们会在某些问题上联合，在某些问题上冲突，在某些问题上互相利用，在某些问题上暂时妥协。我们既不能低估它们共同压迫世界人民、共同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反革命共同利益，也不能把它们之间的矛盾想象成已经完全消失。

这种辩证理解，对于革命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只看到中美冲突，就容易落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错误，把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误认为反帝力量，甚至把反美斗争变成支持中修国家机器的附庸。如果我们只看到中美缓和，又容易误以为帝国主义之间已经形成完全统一的世界政府式统治，从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矛盾带来的裂缝、危机和革命可能。正确的立场应该是：既看到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又看到它们共同的阶级本质；既利用它们之间的裂缝发展人民斗争，又绝不依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强盗；既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也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既揭露大国冲突的反动性，也揭露大国缓和的欺骗性。

所以，第七部分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习特会不是中美矛盾的结束，而是中美矛盾的新形式；不是大国斗争的停止，而是大国斗争和大国勾结的重新组合。帝国主义之间的缓和，本身就是斗争的一部分；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本身就是争夺的一种形式；帝国主义之间的稳定，本身就是下一次不稳定的准备。无产阶级必须透过握手看到刀子，透过协议看到分赃，透过“战略稳定”看到危机，透过大国外交看到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不被战争叫嚣所绑架，也不被和平辞令所麻痹；既不站到美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到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一边，而是始终站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革命立场上。

第八段：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地位——依附、投机和争霸并存

在分析习特会的时候，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阶级性质和国际地位，就很容易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陷入两种错误：一种是把中国说成单纯的美国附庸，好像它没有自己的扩张利益和争霸冲动；另一种是把中国说成反帝力量，好像它同美国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两种看法都不能正确说明现实。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形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结构、并逐步向外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一方面深深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美元体系、国际贸易、技术链条和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又依靠国家资本、军工力量、金融扩张、资源控制、“一带一路”和民族主义动员，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争取更高地位和更大份额。正因为如此，它在习特会中的表现，也不是单纯投降，也不是独立反帝，而是依附、投机和争霸并存。

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依附性，是理解习特会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长期把所谓“改革开放”吹嘘为民族复兴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劳动人民重新投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把中国变成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几十年来，中国工人阶级以极低的工资、极长的劳动时间、极残酷的劳动强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剩余价值。欧美跨国公司、港台资本、日本资本、韩国资本以及中国本土官僚资本、民营资本，共同把中国工人变成世界工厂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越性的证明，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官僚国家机器同世界资本结合起来，对中国劳动人民进行超强度剥削的结果。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而是深深嵌入这个体系之中的。

这种嵌入，决定了中国统治集团离不开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国需要美国市场，需要美元结算和金融体系，需要全球航运和保险体系，需要欧美技术、设备和高端市场，需要稳定的出口订单，也需要国际资本和跨国生产网络。哪怕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形成强大的国家资本和工业能力，它仍然不能简单切断同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可以在宣传中高喊“斗争精神”，可以在外交中摆出强硬姿态，可以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一到现实经济运转层面，它就不得不考虑出口、就业、汇率、资本流动、外资信心、供应链稳定和技术封锁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在习特会中强调“战略稳定”。这不是因为中国统治集团真心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害怕中美矛盾失控会冲击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进而激化国内阶级矛盾。

但是，如果只看到中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又是不够的。中国不是一个没有主动性的被动附庸。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依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也在利用自己的国家规模、工业能力、金融资本、军事力量和外交网络，争取成为更大的世界强盗。它通过“一带一路”输出资本和过剩产能，通过贷款、基建、港口、矿产、通信、能源项目扩大影响，通过国有企业和政策银行在亚非拉争夺市场、资源和政治关系，通过海军建设和军事现代化争取更大地缘政治空间。它既接受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规则，又要求在这个体系中重新分配权力；既依赖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又反感美国不允许它上桌分更大的一块蛋糕。它的所谓“反霸权”，并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体系本身，而是反对美国独占霸权；它的所谓“多极化”，并不是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是几个大国强盗共同分赃。

这就是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投机性。它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投机，在全球南方和西方资本之间投机，在反霸权话语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投机，在社会主义招牌和资产阶级统治之间投机。它对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实际上实行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它对外打着“发展中国家”的旗号，实际上在许多地区推行资本输出、资源攫取和债务控制；它在国际场合说自己反对霸权主义，实际上自己也在争取大国霸权；它在国内说自己代表人民，实际上镇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一切真正要求民主权利与社会解放的力量。它一面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以便在反制美国压力时获得后方；一面又同美国谈战略稳定，以便稳定出口、金融和国际地位。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官僚垄断资本的利益出发；不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而是从大国资本主义投机出发。

习特会正是这种投机性的集中体现。中国一方面要让美国承认自己是必须被认真对待的大国，另一方面又不能同美国彻底决裂；一方面要在台湾、技术、贸易和国际秩序问题上争取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矛盾失控；一方面对内宣传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另一方面对外又要同特朗普谈贸易、稀土、投资、能源和危机管理。这样的政策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完全符合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它既要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向上爬，又不愿意冒立即摧毁现有积累条件的风险；既要同美国争夺，又要同美国交易；既要利用俄国，又不愿意完全被俄国拖下水；既要利用全球南方的反美情绪，又不愿意真正支持任何可能威胁资本主义秩序的人民革命。这就是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真实面貌。

项观奇同志在参考文档中严厉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在美、俄、中三国关系中的屈辱地位，指出中国依附美帝、投降美帝，并把这种表现看作中国人民和真正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这个批判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击穿了中国修正主义政权的民族主义伪装，指出所谓“大国外交”背后存在着对美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依赖。

但我们在进一步分析时，还应当补充说明：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不仅在于它对美帝有依附和妥协，还在于它自身也已经成为压迫本国人民、输出资本、争夺世界份额的帝国主义力量。它不是被动地被美帝操纵，而是在依附中投机，在投机中扩张，在扩张中表现出自己的争霸欲望。

这种认识对于革命立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只强调中国对美国的依附，而不强调中国自身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就容易让人误以为问题只是中国统治集团不够强硬、不够独立、不够民族主义，好像只要换成更强硬的国家路线，中国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反帝力量。实际上，这种看法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围内。中国的问题不是不够强硬，而是它的阶级性质已经变了；不是没有民族自尊，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国家机器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不是没有同美国斗争，而是这种斗争本身是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一个压迫本国工人阶级、镇压人民民主权利、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外输出资本和扩张影响的国家，不可能因为同美国有矛盾就变成革命力量。

同样，如果只强调中国的扩张和争霸，而完全忽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也会看不清习特会的动因。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不是已经完全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它仍然处在一个既强大又脆弱、既扩张又受制、既依附又竞争的复杂位置。它的工业规模巨大，但很多关键技术、金融环节和高端市场仍然受制于西方；它的国家资本强大，但资本积累仍然依赖世界市场；它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但美国仍然掌握全球军事同盟和海洋霸权；它的外交影响扩大，但在许多地区仍然需要同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力量竞争。正因为它既有扩张欲望，又有依附弱点，才特别需要习特会这样的交易：既向美国显示自己不可忽视，又向美国要求缓和；既争取大国地位，又避免立即摊牌。

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对外投机是统一的。中国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稳定外部环境，是为了更稳定地维持国内资本主义秩序。它需要出口稳定来维持工厂运转，需要金融稳定来避免债务危机，需要外部缓和来延缓失业和社会矛盾爆发，需要民族主义来压制阶级斗争，需要国家安全机器来镇压任何真正的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农民反抗和革命力量。它对外同美国谈判，对内就可以宣传“大国外交胜利”；它对外同俄罗斯合作，对内就可以宣传“世界格局变化”；它对外参与国际危机管理，对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负责任大国”。这些话语最后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巩固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麻痹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使他们把统治阶级的利益误认为自己的利益。

因此，批判习特会，必须同批判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性质结合起来。我们不能把习近平同特朗普的会谈说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会谈，也不能把它说成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美国的会谈。这里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只有披着红旗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中国；这里也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国外交，只有社会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交易。中国修正主义政权仍然使用共产党名称，仍然使用社会主义话语，仍然利用毛主席和革命历史的遗产，但这些都已经变成它掩盖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外衣。正因为它披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资本主义，打着反帝旗号参与帝国主义分赃，它比一般资产阶级政权更具有欺骗性。

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立场就是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反对美帝对中国的围堵、压迫、战争威胁、技术封锁和利用台湾进行战略挑衅，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中国修正主义政权。我们反对美国霸权，不是为了支持另一个霸权；我们反对美国利用中国人民，不是为了让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继续压迫中国人民；我们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不是为了把中国工人阶级绑到中国国家机器的战车上。真正的反帝立场，必须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而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在美帝和中修之间选边，而必须把斗争锋芒同时指向帝国主义霸权和社会帝国主义统治。

所以，第八部分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地位，是依附、投机和争霸并存。它依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需要同美国谈“战略稳定”；它投机于大国矛盾之间，所以同时经营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它具有争霸冲动，所以不断要求在世界秩序中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大份额。习特会不是中国反帝的表现，而是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取自身利益的一次交易。它证明，中国修正主义政权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力量，而是一个披着红旗、挂着共产党招牌、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参与世界重新瓜分的反动大国。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真正的任务不是支持这个国家机器同美国讨价还价，而是推翻这个修正主义统治，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重新把中国从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帝国主义道路上解放出来。

第九段：普京访华与中俄关系——不是三国铁盟，而是霸权主义三角交易

特朗普访华之后，普京随即访问中国，这一连续事件具有重要的世界政治意义。它说明，北京在5月并不是单纯接待了美国总统，也不是单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双边交易，而是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处理同美国、俄罗斯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关系。普京在北京同习近平会谈时称，俄中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水平，并邀请习近平来年访问俄罗斯；路透社也报道，普京是在特朗普访华之后抵达北京，同习近平举行会晤。

(这一点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利用美俄矛盾、中美矛盾和俄美矛盾，在大国三角关系中进行复杂周旋。它一方面同美国谈所谓“战略稳定”，争取贸易、金融、台湾和国际危机管理上的缓和；另一方面又同俄罗斯加强战略协作，利用俄国同美国和欧洲的冲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国际回旋空间。这不是和平外交，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强盗体系中的两面下注。

中俄关系当然不是普通的国家关系。自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和军事压力，在经济、贸易、能源、技术和外交方面更加依赖中国；中国则利用俄罗斯同美国和欧洲的对抗，获得廉价能源、地缘政治后方和反美战略伙伴。俄国需要中国市场、金融通道、工业产品和外交支持，中国需要俄罗斯能源、军事技术经验、欧亚战略空间和联合反制美国的筹码。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反美协作的一面，又有利益不平衡和相互利用的一面。普京在北京强调中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水平，正是这种现实处境的表现：俄罗斯在同西方冲突中越来越需要中国，而中国也乐于把俄罗斯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指出：中俄关系的加强，并不说明中国是反帝力量，也不说明俄罗斯是反霸权力量。俄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由垄断资本、能源寡头、军工集团、金融资本和国家官僚集团支配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同美帝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冲突，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也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势力范围、安全边界、能源通道、军事同盟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冲突。俄罗斯反对美国霸权，不是为了世界人民解放，而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在欧亚地区的势力范围要求，在能源政治中的垄断地位，都表明它不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而是另一个争夺世界份额的强盗。

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同俄罗斯的关系，也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而是两个反动大国之间的利益协作。它们可以发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多极世界的声明，但是所谓“多极世界”并不等于世界人民的解放。多极世界如果只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共同分赃，那就不是进步，而是强盗数量增加；不是霸权被推翻，而是霸权被重新分配；不是人民站起来，而是更多大国坐上瓜分世界的桌子。中国和俄罗斯反对美国独霸世界，并不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体系，而是为了在这个体系中建立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它们不是要结束大国政治，而是要改写大国政治中的权力分配；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而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争得更多发言权、更多资源、更多市场、更多战略空间。

因此，特朗普访华和普京访华连续发生，不能简单理解为“三国铁盟”已经形成。美、中、俄三者之间的关系远比铁板一块的同盟更加复杂。美国同中国有贸易、技术、台湾、南海、产业链和全球影响力的矛盾；美国同俄罗斯有乌克兰、欧洲安全、核战略和北约东扩等矛盾；中国同俄罗斯虽然关系密切，但也存在经济地位不平衡、资源价格、欧亚影响力、对美国关系处理方式等潜在矛盾。三者之间不是一个稳定一致的集团，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算计、交易和临时组合的霸权主义三角关系。中俄可以联合反美，中美又可以阶段性交易；俄国可以同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对抗，也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谈判；中国可以利用俄罗斯制衡美国，也可以通过对美国缓和来避免被俄罗斯的战争处境完全拖住。

这就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真实面貌：没有永恒朋友，只有永恒的垄断资本利益；没有真正和平，只有临时平衡；没有原则联盟，只有利益组合；没有道义外交，只有强盗之间的讨价还价。美、中、俄三国都在根据自身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的利益调整关系。美国可以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又在需要市场、稀土和危机管理时同中国谈判；中国可以把美国称为霸权主义压力来源，又在需要出口、技术和金融稳定时同美国缓和；俄罗斯可以把中国称为战略伙伴，又在某些资源、军事和欧亚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独立算计。它们之间的每一次握手，都包含着下一次背叛的可能；每一次合作，都包含着新的争夺；每一次联合声明，都不能消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根本矛盾。

所以，项观奇同志把特朗普访华、普京访华联系起来分析，是完全有政治敏锐性的。因为这两个事件确实不能孤立看待。特朗普访华表明美中之间存在阶段性交易和危机管理的需要；普京访华表明中俄关系继续加深，也表明中国正在把俄国作为自己世界战略中的重要支点。二者合起来，说明当代世界格局已经不是简单的美苏冷战式两极对抗，也不是美国单极霸权毫无阻碍地支配一切，而是进入了多个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力量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交易的新阶段。项观奇同志所说的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形成新的反动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启发。

但我们在表述上必须更精确：这个反动格局不是一个已经制度化、条约化、公开化的三国同盟，而是一种霸权主义三角交易结构。所谓三角交易，就是每一个大国都在利用另外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谋利。美国试图利用中俄之间潜在的不平衡，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完全形成反美整体；中国试图利用俄美冲突和美欧矛盾，为自己争取缓冲空间；俄罗斯试图利用中美矛盾，摆脱自己在西方制裁下的孤立处境。三者都不是被动棋子，而是主动强盗；三者都不是和平力量，而是战争和危机的制造者、管理者和受益者；三者都不是世界人民的朋友，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不同统治力量。

从俄国的角度看，它同中国靠近，是由自身帝国主义困境推动的。俄乌战争使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高度紧张，制裁和军事消耗迫使它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和中国产品。俄罗斯可以向中国出售能源，可以从中国获得工业品、技术渠道和外交支持，可以借中俄合作显示自己并未被西方孤立。但是，这种依赖本身也说明俄国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它仍然拥有核武器、能源资源、军事经验和欧亚地缘空间，但在经济规模、工业制造、金融能力和全球市场方面已经无法同美国、中国直接对等。因此，俄罗斯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大国身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向中国靠拢。这种关系不是平等的社会主义友谊，而是帝国主义强弱变化下的利益靠拢和相互利用。

从中国的角度看，它同俄罗斯靠近，是为了增强自己同美国谈判的筹码。中国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完全失败，因为俄罗斯失败会加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但中国也不愿意被俄罗斯完全绑架，因为那会破坏中国同美国、欧洲和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需要俄罗斯牵制美国，但又需要同美国做生意；需要俄罗斯能源和军事协作，但又需要避免被西方视为彻底同俄国一体；需要打反霸权旗号，但又需要保持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利润来源。这种政策表面上灵活，实质上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投机性。它不是根据无产阶级原则决定外交路线，而是根据官僚垄断资本在不同方向上的利益需要，不断调整同各大国的关系。

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访华也不能脱离中俄关系来看。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俄关系无限加深，因为这会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优势；但是，美国也不可能只靠威胁同时压倒中国和俄罗斯。美国需要在某些问题上拉住中国，防止中俄关系完全形成对美国不利的稳定反美集团；同时又需要通过对俄谈判、对华交易、对欧控制和对中东危机管理，重新安排自己的全球霸权布局。特朗普可以一面同习近平谈贸易和战略稳定，一面同普京谈乌克兰或其他问题；可以一面威胁中国，一面感谢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战争中保持“中立”。路透社6月17日报道，特朗普曾感谢习近平和普京在伊朗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也说明美、中、俄之间并不是简单敌我关系，而是存在围绕战争危机的复杂互动。

这恰恰证明，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道德关系，而是利益关系。资产阶级媒体喜欢用“亲密伙伴”“战略对手”“负责任大国”“稳定力量”这些词来描述大国关系，好像外交是一种人格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这些词全部还原为阶级关系和资本关系。所谓亲密伙伴，就是在某些时期共同反对另一个竞争者；所谓战略对手，就是在世界市场和军事空间中发生利益冲突；所谓负责任大国，就是愿意共同管理资本主义危机；所谓稳定力量，就是愿意维护现有压迫秩序不被人民革命打破。中俄关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美俄关系也好，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间围绕世界利益分配进行的关系，而不是人民之间的关系。

因此，普京访华与习特会放在一起看，正好揭示了当前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当代帝国主义不是单线对抗，而是多重交易；不是固定阵营，而是流动组合；不是纯粹战争，也不是纯粹和平，而是战争、制裁、谈判、贸易、能源、军事同盟和外交峰会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体系。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个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它既要同美国交易，又要同俄罗斯合作；既要维护世界市场，又要争夺世界市场；既要避免战争立即失控，又要在战争危机中谋取利益。这样的国家绝不是社会主义力量，而是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积极参与者、投机者和重新分赃者。

对无产阶级来说，理解这一点具有直接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因为中俄反对美国霸权，就把中俄当成进步力量；也不能因为美国同中国、俄罗斯有矛盾，就在帝国主义强盗之间选边站。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俄国帝国主义同样不是世界人民的朋友。它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被革命者认识和利用，但不能成为我们依附其中任何一方的理由。革命者的任务不是替某个大国制定更聪明的外交政策，不是希望中国在中美俄三角中占上风，也不是希望俄罗斯拖住美国从而给中国喘息，而是要揭露整个大国交易体系的反人民本质，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扩张的斗争。

所以，第九部分的结论应当十分明确：普京访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也不是世界和平力量的会合，而是中俄两个反动大国在美帝压力和世界危机条件下的战略协作；特朗普访华也不是中美和平的新纪元，而是美中两个反动大国在矛盾尖锐化条件下的阶段性交易。二者连续发生，说明当前世界正在形成的不是简单的三国铁盟，而是美、中、俄三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力量之间既斗争又勾兑、既争霸又协调、既相互利用又共同压迫世界人民的霸权主义三角交易格局。这个格局越是复杂，越需要无产阶级保持独立立场；这个格局越是以“稳定”“多极”“合作”“和平”的语言出现，越需要革命者揭穿它的阶级实质。真正的出路，不在美、中、俄任何一个强盗的胜利中，而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反对所有强盗、打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革命斗争中。

第十段：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帝国主义和平会议也是重新瓜分世界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5月习特会并不是孤立的外交事件，也不是某个总统个人风格造成的偶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要真正理解习特会的性质，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国际关系学所谓“大国竞争”“战略沟通”“风险管控”“经贸合作”这些表面概念上，而必须回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

列宁早已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金融资本形成，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垄断资本同盟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并在新的力量对比变化中不断重新瓜分世界。项观奇同志在参考文档中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特朗普访华、普京访华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联系起来，指出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调整，不能从普通外交往来理解，而必须从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规律来理解。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外交语言最善于把帝国主义的本质掩盖起来。它们把重新瓜分世界说成“国际合作”，把大国妥协说成“战略稳定”，把势力范围调整说成“地区安全”，把资本输出说成“发展援助”，把军事威胁说成“维护秩序”，把贸易分赃说成“互利共赢”。如果没有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人们很容易被这些词语麻痹，以为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坐下来谈判，就说明世界走向和平；以为几个大国达成协议，就说明矛盾得到了合理解决；以为贸易和投资恢复，就说明人民会因此受益。但是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和平会议同战争一样，都是重新瓜分世界的形式。战争是用炮火和军队重新瓜分世界，谈判是用协议和交易重新瓜分世界；制裁是用经济武器重新瓜分世界，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则是用制度化方式重新安排垄断资本的利益边界。

习特会的每一个主要议题，都可以放进这个框架中理解。贸易问题，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美中两国垄断资本如何分配市场和利润的问题。投资问题，不是抽象的资本自由流动，而是金融资本、国家资本和跨国企业如何在两个大国之间重新安排利益的问题。稀土和关键矿产问题，不是普通资源贸易，而是高科技产业、军工体系、能源转型和战略竞争的资源基础问题。波音飞机和农产品问题，不是普通订单，而是美国航空资本、农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交易问题。台湾问题，不是单纯民族问题，而是美国印太霸权体系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区域扩张之间的战略节点问题。伊朗、霍尔木兹、朝鲜半岛问题，也不是普通地区安全问题，而是能源通道、核战略、军事部署和世界秩序管理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非常清楚的图景：习特会是两个大国国家机器代表各自垄断资本，在世界危机中重新估价、重新划线、重新讨价还价的一次会议。

列宁主义还告诉我们，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和妥协从来不是永恒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没有真正稳定的和平，只有暂时的均势；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利益的结合；没有共同的人类理性，只有资本和国家机器的计算。美中之间今天可以谈“战略稳定”，明天仍然可以在台湾、技术、南海、关税、金融和军事问题上激烈冲突；中俄之间今天可以称为“前所未有”的战略协作，明天也可能因资源、价格、欧亚影响力和对美政策出现摩擦；美俄之间今天可以在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上严重对抗，明天也可能为了某种更大交易进行妥协。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危机程度、阶级斗争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习特会理解成永久和平的开始，也不能把中俄合作理解成反帝阵营的形成，更不能把美、中、俄三者之间的阶段性互动理解成没有矛盾的固定同盟。

但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有矛盾，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共同反对人民。恰恰相反，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压制被压迫民族反抗、管理战争危机、防止革命爆发的问题上，它们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美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之间可以互相争斗，但它们都害怕真正的人民革命；它们可以在乌克兰、台湾、中东、能源和市场问题上互相算计，但它们都害怕资本主义秩序被无产阶级打碎；它们可以在多极还是单极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它们都不希望世界人民真正摆脱大国支配。所谓单极霸权和多极世界之间的冲突，在资产阶级框架内，不过是一个强盗单独称霸，还是几个强盗共同分赃的问题。无产阶级不能因为反对美国单极霸权，就幻想多极帝国主义秩序会自动带来解放。几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同管理世界，并不比一个帝国主义强盗单独管理世界更进步。

这正是列宁主义同各种资产阶级“地缘政治分析”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分析家关心的是哪个国家赢、哪个国家输，哪个大国上升、哪个大国衰落，哪个联盟更强、哪个阵营更弱。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则是：这些国家代表哪个阶级？这些联盟服务于什么生产关系？这些战争和谈判背后是谁在获利、谁在流血、谁在被剥削、谁在被压迫？资产阶级地缘政治学把世界看成国家之间的棋盘，马克思主义则把世界看成阶级斗争的场所。习特会在资产阶级眼中，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关于未来关系的战略沟通；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是两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表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战略资源、战争风险和被压迫地区进行交易的一次反动会议。

所以，我们不能用“国家利益”这个抽象词遮蔽阶级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美国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稳定资本积累、扩大国际地位和压制国内阶级矛盾的利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不是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俄国垄断资本、能源寡头、军工集团和国家官僚集团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包装成全体人民的利益，把资本的利润包装成民族的光荣，把战争和分赃包装成国家安全。列宁主义的任务，就是撕开这个包装，把所谓国家利益还原为阶级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习特会中的“战略稳定”不是无阶级的稳定，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稳定；“贸易合作”不是无阶级的合作，而是垄断资本之间的合作；“危机管理”不是人民对战争的控制，而是大国对战争风险的垄断；“多边协调”不是世界民主，而是几个大国对世界人民命运的共同支配。帝国主义会议的本质，不在于它有没有使用和平语言，而在于它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否改变了垄断资本支配世界的事实、是否让被压迫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习特会不是和平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危机条件下进行自我调整的表现。

列宁主义还要求我们把帝国主义外交同国内阶级统治联系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如何分赃，取决于它们对内如何统治；它们对外需要市场、资源、投资场所和战略空间，正是因为国内资本积累需要不断扩张。美国垄断资本需要对外扩张，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不断制造过剩资本、过剩商品和利润率压力；中国官僚垄断资本需要外部稳定，是因为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出口、就业、债务、房地产、地方财政、青年失业和工人斗争都可能冲击统治秩序；俄罗斯需要对外势力范围，是因为俄国垄断资本和国家机器要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与资源利益。对外政策不是同国内阶级关系分离的东西，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向世界范围扩张的表现。习特会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中美两国统治阶级都需要通过对外调整来缓解内部和外部危机。

这也说明，反对帝国主义不能只停留在外交口号上。真正反帝，不是支持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不是支持中国同美国讨价还价，也不是支持俄罗斯牵制美国。真正反帝，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绑上国家战车，反对统治阶级以民族、国家、安全、统一、文明、秩序等名义压制阶级斗争。美国工人阶级的敌人首先在美国国内，是美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首先在中国国内，是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敌人首先在俄罗斯国内，是俄国垄断资本和国家机器。只有各国无产阶级都把斗争锋芒指向本国资产阶级，国际主义才不是空话。

在这个意义上，习特会给革命者提出的任务，不是研究哪个大国外交更高明，而是揭露大国外交的阶级本质；不是判断中美谁占了便宜，而是说明劳动人民为什么总是在这种交易中被排除；不是替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设计更强硬的谈判策略，而是动员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看清这个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不是把美国衰落当成自动革命，而是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打碎帝国主义体系。帝国主义危机可以制造裂缝，可以造成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可以削弱某些反动政权的控制力，但危机本身不会自动变成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有自己的革命政党，有自己的政治路线，有自己的群众基础，才能把帝国主义危机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

因此，第十部分的理论结论应当是：习特会再次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帝国主义没有因为全球化而消失，没有因为贸易合作而变温和，也没有因为大国峰会而变成人类共同体。它仍然是垄断资本支配世界、金融资本争夺世界、国家机器瓜分世界、强国压迫弱国、资本压迫劳动的体系。今天的帝国主义可以穿西装，可以开峰会，可以使用“战略稳定”“合作共赢”“危机管理”“多极世界”的语言，但它的本质仍然是强盗政治。帝国主义和平会议也是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合作机制也是垄断资本利益安排，帝国主义战略稳定也是反人民秩序的稳定。对无产阶级来说，列宁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旧理论，而是解释习特会、解释美中俄关系、解释当代世界危机的活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武器，才能不被资产阶级外交辞令欺骗，才能在复杂的大国交易中保持独立的革命立场，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推进到底。

第十一段：无产阶级结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5月习特会的实质已经十分清楚。它不是人民的和平会议，不是世界走向稳定的标志，也不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胜利，而是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帝国主义矛盾重组、战争风险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围绕贸易、投资、稀土、台湾、伊朗、朝鲜半岛、能源通道和世界秩序进行的一次大国交易。特朗普代表的不是美国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而是美国金融资本、军工资本、科技资本、能源资本、农业资本和跨国垄断集团的利益；习近平代表的也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资本集团、出口资本、金融资本和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的利益。所谓“战略稳定”，就是这两个反动国家机器在矛盾尖锐而又暂时不能彻底摊牌的条件下，为了继续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管理战争风险、稳定供应链和重新划分利益边界而达成的反动安排。它所稳定的不是人民生活，而是资本积累；不是世界和平，而是强盗秩序；不是劳动人民的未来，而是垄断资本继续统治世界的条件。

因此，无产阶级面对习特会，绝不能被资产阶级外交语言所迷惑。不能因为中美领导人握手，就幻想帝国主义之间已经走向真正和平；不能因为双方谈贸易、投资和危机管理，就以为世界人民从此能够摆脱战争和压迫；不能因为中国修正主义政权同美帝国主义有矛盾，就把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误认为反帝力量；也不能因为美帝国主义压迫、围堵和威胁中国，就站到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边。无产阶级的立场，既不是亲美自由主义，也不是中国民族主义；

既不是拥护美国霸权，也不是拥护中修争霸；既不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择一个主人，也不是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几个强盗之间寻找所谓“进步阵营”。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政治立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俄国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资本主义压迫体系。

美帝国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霸权主义力量。它长期通过军事基地、金融霸权、美元体系、跨国资本、制裁机器、战争威胁、代理人战争和政治干涉压迫世界人民。它在中东、东亚、拉美、非洲、欧洲和全世界维护自己的垄断资本利益，把“民主”“自由”“人权”“航行自由”“国际秩序”变成维持霸权的政治语言。它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利用朝鲜半岛维持东北亚军事体系，利用伊朗问题维护中东霸权和能源控制，利用乌克兰问题重组欧洲安全秩序，利用贸易和技术封锁维护美国资本的优势地位。对这样的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不能有任何幻想，不能把它当成民主的保护者、自由的代表或者世界和平的仲裁者。美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到之处，从来带来的都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军事控制、经济掠夺、政治操纵和资本统治。

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绝不等于支持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修正主义政权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政权，而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基础上形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它对内镇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压低工资，维持血汗工厂和平台资本剥削，压制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民主权利，用国家安全机器打击一切真正的革命力量；它对外则利用国家资本、金融贷款、基础设施投资、资源项目、军事扩张和民族主义宣传，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取更高地位和更大份额。它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资本主义，打着共产党招牌镇压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打着反霸权旗号参与大国分赃，打着民族复兴旗号维护官僚垄断资本的利益。对这样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同样必须坚决反对。谁把反美变成挺中，谁就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谁把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说成中国人民的代表，谁就把工人阶级绑上了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战车。

俄国帝国主义也不是世界人民的朋友。俄国同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势力范围、能源通道、军事安全和地缘政治秩序的矛盾。俄罗斯垄断资本、能源寡头、军工集团和国家官僚机器同样压迫本国劳动人民，也同样在国际上争夺资源、市场和势力范围。它反对美国霸权，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体系，而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中俄关系的加强，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革命团结，而是两个反动大国在美帝压力和世界危机条件下进行的战略协作。无产阶级不能因为俄国同美国有矛盾，就把俄国当成反帝力量；也不能因为中俄联合反美，就幻想所谓“多极世界”会自动带来人民解放。几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分赃，不是比一个帝国主义强盗单独称霸更进步的秩序；多极帝国主义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世界，仍然是资本压迫劳动、大国压迫弱小民族、国家机器压迫人民群众的世界。

所以，习特会以及它前后美、中、俄三国关系的变化，对我们提出的最根本教训，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在大国之间选择阵营，而是把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是支持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打败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国家机器；不是把外交斗争当成革命斗争，而是把反帝、反修、反资本主义同各国具体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敌人首先在美国，是美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首先在中国，是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敌人首先在俄罗斯，是俄国垄断资本和国家官僚机器。只有各国无产阶级都把斗争锋芒指向本国统治阶级，才能真正打破帝国主义战争和大国交易的锁链。

在台湾、伊朗、朝鲜半岛、乌克兰、巴勒斯坦以及世界一切被压迫地区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坚持同样立场。人民不是大国交易的筹码，土地不是强盗分赃的地图，民族命运不能由华盛顿、北京、莫斯科或者任何其他帝国主义首都决定。台湾人民不能被美帝国主义当作军事前哨，也不能被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用民族主义和武力威胁压迫；伊朗人民不能被美国战争机器和制裁体系践踏，也不能被任何大国当作能源和核问题的谈判筹码；朝鲜半岛人民不能永远生活在美国军事体系、大国博弈和核战略阴影之下；乌克兰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各地被战争、制裁、占领、贫困和资本剥削压迫的人民，都不应当成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牺牲品。真正的和平，不能从大国共管中产生，只能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

对中国革命者来说，习特会尤其具有深刻警示意义。它再次证明，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已经彻底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边，已经彻底成为世界反动秩序的一部分。它同美国谈“战略稳定”，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是为了官僚垄断资本的稳定；它同俄罗斯加强协作，不是为了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大国投机和战略回旋；它在国内高喊民族复兴，不是为了工人阶级掌权，而是为了把人民群众绑在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旗帜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出路，不在于支持习近平同特朗普讨价还价，不在于幻想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强大以后人民就能得到解放，也不在于把民族主义当成反帝主义。中国人民真正的出路，只能是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我们应当明确指出：习特会所展示的世界，不是和平的世界，而是强盗分赃的世界；不是人民共同体，而是资本共同体；不是人类理性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危机管理的结果。美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大国之间，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冲突，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交易，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共同管理危机，但它们都不是人民解放的力量。无产阶级不能在强盗之间选择一个强盗，不能在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寻找救星，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立场只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俄国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国家机器；支持中国人民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打破修正主义统治，重新高举马列毛主义革命红旗。真正的和平不在北京、华盛顿、莫斯科的谈判桌上，而在全世界劳动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中。真正的未来不属于强盗之间的战略稳定，而属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胜利。

SOVINTERN——机会主义的新招牌：对当代修正主义国际路线的批判

第一部分：SOVINTERN不是新的共产国际，而是普京、习近平联手导演的政治闹剧

2026年4月27日，所谓“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国际网络”SOVINTERN在莫斯科高调举行成立论坛。它借用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等一整套革命词汇，又故意取了一个足以使人联想到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名称，企图把自己装扮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联合的标志。然而，判断一个组织的性质，不能看它给自己挂上什么招牌，而必须看它由谁发起、依靠什么力量、邀请什么人物、服务于什么政治路线。只要把SOVINTERN的舞台布置和参会阵容稍加剖析，就会发现它绝不是什么新的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国家力量搭台、中国修正主义体制内力量配合、各国议会机会主义者和“多极化”崇拜者共同捧场的一出政治闹剧。

这场论坛并不是由各国工人运动、革命共产党和人民战争力量自下而上发动的。SOVINTERN官方网站公布的日程清楚写明，开幕式首先宣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欢迎词；论坛的主要推动者是“公正俄罗斯”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主持组织工作的亚历山大·巴巴科夫不仅是该党第一副主席，还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参加开幕活动的还有“公正俄罗斯”副主席、军人和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人员、国家杜马议员和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教授等，也分别担任主持人、演讲者或平台建设者。换句话说，从欢迎词、组织委员会到会场资源、学术机构和政治人物，这个所谓“国际社会主义网络”的俄罗斯一侧，几乎处处都留下了现存俄罗斯国家机器的手印。

真正的革命国际，首先应当是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国际联合；SOVINTERN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现存议会党、国家杜马人物和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机构放在舞台中央。普京不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俄国垄断资本、能源寡头、军工集团和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政治代表。由他亲自向所谓社会主义国际网络致意，本身就已经说明，这个组织对俄罗斯统治集团不是威胁，而是可供利用的外交和意识形态工具。一个准备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国际，怎么可能由这个国家机器的最高代表公开祝福？一个真正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组织，又怎么可能把资产阶级议会里的副议长和议会党领袖当作自己的创办人和主宾？这不是革命国际同国家机器之间偶然的礼节往来，而是组织性质的公开自白。

中国修正主义方面虽然没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公开挂牌，却绝非同这场会议毫无关系。SOVINTERN正式日程列出的重要演讲者之一刘旭，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欧亚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他参加的不是一般文化交流环节，而是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形势与加强反帝反法西斯阵线”的核心战略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官方资料也证实其体制内学术和政策研究身份。必须说明，目前公开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习近平亲自任命的官方代表；但是，一个长期研究中俄战略关系、任职于中国修正主义重要高校智库的学者，出现在由俄罗斯国家政治力量组织的“国际社会主义网络”核心论坛中，绝不能简单解释为一个毫无政治意义的私人行为。它至少清楚表明，中俄国家战略叙事和SOVINTERN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人员通道和意识形态呼应。

因此，我们说SOVINTERN是普京和习近平联手导演的闹剧，不是说目前已经发现一份由两人共同签署、命令成立SOVINTERN的秘密文件，而是对其政治功能所作的阶级定性：俄国统治集团负责搭建舞台、提供会场、组织机构和总统背书；中国修正主义体制内的国际关系力量则进入核心议题，为所谓中俄联合“反帝”、多极世界和国际危机管理提供理论包装；各国机会主义政党再被召集到莫斯科，充当这出大国政治戏剧的国际群众演员。所谓“联手导演”，就在这种国家战略、人员构成、理论话语和组织效果的相互配合中表现出来。否认这种政治联系，只因为习近平本人没有站在会场讲台上剪彩，就如同因为导演没有亲自上台演戏，便否认整场戏存在导演一样荒谬。

参会名单更把这场闹剧的性质暴露得一览无余。大会既邀请了美国共产党的哈兹·阿尔丁、克里斯托弗·赫拉利和杰克逊·欣克尔，也邀请了英国工人党领袖乔治·加洛韦、世界反帝纲领代表、公正俄罗斯及其友党人物、拉丁美洲的议会政治家和各类“爱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之间并没有统一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纲领，没有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也没有共同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实践；真正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的，是对俄罗斯国家外交路线的不同程度支持，是把“反对美国单极霸权”偷换成支持中俄“多极化”，是用反北约和反特朗普的语言为另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争夺世界份额涂上红色油漆。大会甚至把网络平台、人工智能宣传、顿巴斯问题和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反帝反法西斯阵线”并列为战略议程，更像一个为俄罗斯国际宣传招募协作者的论坛，而不像一个为世界革命建立统一路线和纪律的无产阶级国际。

尤其讽刺的是，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也派出了代表。帕万·卡尔基公开表示，自己代表尼泊尔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SOVINTERN创立会议；而这个尼泊尔共产党现由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即普拉昌达——担任协调员。普拉昌达曾经以人民战争和毛主义的名义登上历史舞台，后来却放弃摧毁旧国家机器的革命道路，把人民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资产阶级议会秩序，自己三度出任旧国家的总理。如今，他领导的党又派人参加由俄罗斯议会党和国家杜马人物主持的“社会主义国际网络”，这不是偶然的个人选择，而是普拉昌达主义路线的必然归宿：昨天用毛主义的名义把人民战争带进议会坟墓，今天再用国际主义的名义投入大国外交的怀抱。

SOVINTERN最虚伪的地方，还在于它一边摆出反特朗普、反美国霸权和反北约的姿态，一边充当着普京和习近平同特朗普谈判、合作和重新划分利益时的红色布景。2026年5月，习近平公开宣布同特朗普形成建设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新构想，并称这一定位将指导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到7月4日，普京又同特朗普进行长时间电话会谈，双方同意保持直接沟通并在近期再次联系。也就是说，习近平正在同特朗普设计中美“战略稳定”，普京正在同特朗普保持高层协商；与此同时，由俄国政治力量操办、得到中修体制内人员参与的SOVINTERN，却向各国左翼兜售反特朗普、反霸权和反帝国主义的表演。这难道还不够虚伪吗？

项观奇同志对2026年美、中、俄关系的分析，正好为我们揭开了这层画皮。他指出，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问中国以及三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表明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正在形成新的勾结和交易格局；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一面依附美帝、谋求同美国保持关系，另一面又同俄罗斯经营所谓战略协作。无论是否完全接受“正式联盟”这一具体表述，项观奇同志抓住的基本事实是正确的：美、中、俄之间并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个阵营的斗争，而是几个反动大国既争夺又妥协、既冲突又合作、共同瓜分和管理世界的关系。

从这一点看，SOVINTERN不是同习特会和普特谈判相对立的“反帝力量”，恰恰是它们的另一面。前台上，普京和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通话、谈贸易、谈战争、谈战略稳定；后台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又需要召集一批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党派，高喊反美、反霸权和多极化，为中俄争取世界份额制造“国际左翼支持”的假象。一只手同特朗普做交易，另一只手举起红旗骂特朗普；在华盛顿面前讲战略合作，在各国左翼面前讲反帝斗争；需要美国市场和政治交易时便称特朗普为伙伴，需要动员国际支持时又把特朗普塑造成唯一的帝国主义恶魔。这不是辩证策略，而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大国外交披上了社会主义戏服。

所以，SOVINTERN的成立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喜讯，而是国际机会主义进一步集结的危险信号。它企图把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理论阉割成反对美国一家，把毛主义的世界革命路线篡改成支持中俄多极化，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降格为各国议会党和爱国主义政客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声援。它借共产国际的历史威望给资产阶级国家工程贴金，借社会主义的名称给大国分赃抹红，借各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正当仇恨，把他们引向支持俄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错误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话说透：SOVINTERN不是新的共产国际，而是一场由普京搭台、习近平路线配合、普拉昌达之流和各国机会主义者共同出演的政治闹剧；它不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是大国机会主义的化装舞会。

第二部分：一面同特朗普合作，一面高喊反特朗普——机会主义的两副面孔

SOVINTERN这场政治闹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把普京、习近平同特朗普之间的现实合作藏在幕后，却把反对美国霸权、反对北约和反对特朗普政府战争政策的口号摆在台前。它一方面装出不共戴天的“反帝”姿态，声称要建立所谓“反帝反法西斯阵线”；另一方面，它所依附的俄罗斯和中国国家机器，却正在同特朗普政府保持密切接触，围绕贸易、战争、能源、台湾、乌克兰和世界秩序进行谈判。前台是红旗、口号和慷慨激昂的声明，后台则是总统热线、国事访问、利益交换和所谓“战略稳定”。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中的灵活性，而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最典型的两面政治：面向美国统治集团时谈合作，面向国际左翼群众时谈反帝；需要特朗普时称其为可以合作的伙伴，需要欺骗人民时又把他装扮成自己坚决反对的敌人。

SOVINTERN并不掩饰它在宣传上把美国和北约放在主要攻击对象的位置。其论坛专门设置了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形势与加强反帝反法西斯阵线”的战略会议，又把顿巴斯冲突单独列为核心议题。它通过的伊朗声明直接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称为“有预谋且无端的侵略”，指责美国实行霸权和国际恐怖主义；其乌克兰声明则几乎完整照抄俄罗斯政府的战争叙事，把俄军行动说成反对北约侵略、保卫俄罗斯主权的“唯一可能道路”，最后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维护所谓地区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这个组织不是在分析所有帝国主义大国，而是在把美国描绘成帝国主义的唯一主体，同时把俄罗斯国家的军事行动包装成反帝行为。

可是，就在SOVINTERN高举这些反美口号之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却在北京以最高规格欢迎特朗普。中国外交部的公开记录写得非常直白：习近平把特朗普访华称作一次“历史性和标志性”的访问，两人同意建立所谓“建设性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在稳定经贸关系、扩大实际合作、处理彼此关切以及协调国际地区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特朗普则公开表示，

双方“同意了很多事情，做成了很多交易，解决了很多问题”，还称习近平是自己的“老朋友”，期待在华盛顿再次接待习近平。到6月底，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通话时仍在强调，要把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转化成具体政策和行动，扩大合作事项，缩短分歧清单。

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集团不是把特朗普政府看作必须由世界无产阶级推翻的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而是把它看作可以共同规划未来三年以上双边关系、共同管理国际危机、共同开展经济交易的合作对象。它不是仅仅为了避免战争而进行一次临时接触，而是在公开打造一个具有持续性和制度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外交部门还不断把这一关系吹捧成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全世界期待的正确方向。换句话说，在北京的会客厅里，特朗普是“老朋友”，是可以做成很多交易的合作伙伴；到了SOVINTERN的宣传舞台上，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又摇身一变，成为必须组织“反帝反法西斯阵线”反对的头号恶魔。前一种语言说给美国资产阶级听，后一种语言说给世界左翼群众听，两套语言服务的是同一个目的：维护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利益。

普京的表现同样如此。SOVINTERN通过的乌克兰声明不仅为俄罗斯国家机器的全部官方说法背书，而且把支持俄罗斯联邦直接写进所谓国际社会主义网络的正式文件之中。可与此同时，普京同特朗普之间并没有保持什么不可调和的“反帝斗争”关系。克里姆林宫公开资料显示，普京与特朗普在2026年4月29日进行了一次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交谈；6月14日，普京又致电特朗普祝贺其生日；7月4日，双方再次直接通话。俄美之间当然仍有尖锐矛盾，但普京显然把特朗普视作可以不断协商、谈判和交换条件的另一个大国领导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敌人。

大国之间进行谈判，本身还不足以证明机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在必要时也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谈判，革命力量在具体条件下也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谈判者代表哪个阶级？谈判服务于什么目的？是否仍然向群众说明对方和自身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是否保持无产阶级政治的独立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可以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条约，但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因为签约就把帝国主义国家说成人民朋友，也没有建立一个所谓国际社会主义网络来给沙皇主义或资产阶级大国的扩张政策披红衣。革命策略中的妥协，是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机会主义的妥协，则是把统治阶级的现实交易美化成革命路线，再用革命口号欺骗群众。

SOVINTERN所做的正是后者。它没有公开揭露俄罗斯垄断资本、能源资本、军工集团和国家官僚的阶级利益，也没有批判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之间的深刻结合；它把全部“帝国主义”概念压缩成美国和北约，把俄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说成民族自卫，把中国同特朗普的战略交易说成和平合作。它不要求俄罗斯工人反对俄罗斯资产阶级，不要求中国工人推翻中国修正主义统治，也不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同本国统治阶级划清界限。相反，它要求各国左翼组织围绕俄罗斯国家的外交立场集合，把支持俄国政府等同于反帝，把支持中俄多极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这就完全颠倒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各国无产阶级首先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斗争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结合起来。SOVINTERN的“国际主义”却要求各国机会主义者支持俄罗斯国家，把莫斯科的国家利益冒充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它口头上反对特朗普，实际上不是为了推翻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加强普京和习近平同特朗普讨价还价的地位；它口头上反对美国霸权，实际上不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体系，而是为了让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体系中分到更多市场、资源、领土影响和国际权力。它反对的不是大国瓜分世界，而只是美国在瓜分世界时拿得太多。

正如项观奇同志在分析特朗普、普京相继访问中国时指出的那样，美、俄、中三个反动大国之间的关系，根本不能用简单的“反美阵营”和“亲美阵营”来划分。它们之间既有争霸，也有勾结；既有冲突，也有交易；今天可以互相攻击，明天又可以为了共同利益坐到一张桌子旁。项观奇同志正是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规律出发，揭露了三国统治者共同维护反动世界秩序的性质。SOVINTERN所做的，则是故意遮蔽这种复杂而肮脏的交易关系，把普京和习近平打扮成反对美国霸权的进步力量，把三大强盗之间的分赃矛盾伪装成反帝与帝国主义的斗争。

普京和习近平一面同特朗普合作，一面又借SOVINTERN之类的平台反对特朗普，何其虚伪！他们需要特朗普缓和制裁、稳定贸易、协调战争和承认大国地位时，就强调友谊、对话、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当他们需要利用各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时，就放出一批议会政客、国家学者和机会主义党派，高喊反美、反北约和反法西斯。他们既想从特朗普手里得到现实利益，又想垄断反对特朗普的政治威望；既要参加帝国主义分赃，又要把自己装扮成反对分赃的革命者；既要做强盗，又想让世界人民把他们看成反强盗的英雄。

这种机会主义比公开的资产阶级政治更加危险。公开的资产阶级至少承认自己追求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而SOVINTERN却盗用社会主义、

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名义，把资产阶级大国竞争冒充无产阶级革命。它用美国帝国主义的罪恶替俄罗斯帝国主义开脱，用北约扩张替普京的国家利益辩护，用特朗普的战争政策替习近平同特朗普的交易遮羞。它告诉群众，世界上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而只是美国一家独霸；解决办法不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支持普京、习近平和所谓多极化力量取得更大的国际权力。

因此，我们批判普京、习近平的两面政治，绝不是要求他们对特朗普采取更加狭隘、更加冒险的民族主义敌对政策，而是要揭露他们根本不具有反帝性质。他们同特朗普合作，不是革命力量在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而是三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他们反特朗普，也不是为了世界革命，而是为了提高自身大国资本在分赃桌上的价码。SOVINTERN正是这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合作时替他们沉默，冲突时替他们呐喊；交易时不谈阶级，宣传时大谈社会主义。它的一切“反帝”口号，最终都要服从普京和习近平同特朗普进行交易的现实需要。

所以，对SOVINTERN的第二个结论也必须明确：它不是反对特朗普机会主义政治的国际阵线，而是普京和习近平机会主义政治的另一张面孔。莫斯科、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和交易，是这场戏的真实内容；SOVINTERN会议上的红旗和声明，只是遮挡真实内容的舞台幕布。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不能跟着这块幕布鼓掌，而必须把它撕开，让全世界劳动人民看见幕后的总统交易、资本利益和帝国主义分赃。

第三部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国家外交所取代——SOVINTERN究竟为哪个阶级服务

判断一个国际组织是否具有无产阶级性质，不能只看它是否使用“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国际团结”的词汇，更不能只看会场上摆了多少红旗、代表们唱了多少革命歌曲。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是：这个组织以哪个阶级为主体，反对哪一个国家机器，依靠什么社会力量，又准备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各国工人阶级摆脱本国资产阶级控制、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政治原则；资产阶级国家外交，则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利用谈判、战争、联盟、宣传和国际组织，维护本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二者在根本方向上是对立的。SOVINTERN最大的政治问题，正在于它盗用了前者的名义，却把实际内容交给了后者：它嘴上讲世界社会主义，组织中心却不是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是俄罗斯国家外交的现实需要。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它的成立方式上。SOVINTERN的正式日程不是以地下工人组织、革命共产党或被压迫民族解放力量为中心，而是由俄罗斯科学院机构人员主持开幕，由“公正俄罗斯”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亚历山大·巴巴科夫等人占据重要位置，并以普京的总统欢迎词为整个论坛开场。巴巴科夫不仅是国家杜马副主席，而且直接担任首届SOVINTERN论坛组织委员会主席。一个国家的现任总统提供政治祝福，现任议会副议长主持组织，合法议会党担任主要推动者，国家学术机构人员承担主持和理论说明，这已经不是某种偶然的“外部支持”，而是俄罗斯国家政治结构直接构成了该组织的骨架。

真正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不是因为它得到某个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支持，而是因为它建立在十月革命打碎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础之上。苏维埃俄国对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支持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今天普京政权对SOVINTERN的支持，则是现存俄罗斯国家机器召集各国左翼力量为其外交路线服务。二者虽然都发生在莫斯科，虽然都可能使用社会主义词汇，但其阶级性质完全相反。把普京主持下的俄罗斯同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相提并论，不是继承共产国际，而是在侮辱共产国际；不是复兴列宁主义，而是利用列宁主义的历史威望替俄国资产阶级国家贴金。

普京的欢迎词本身就说明，俄罗斯国家并不把SOVINTERN视为一个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危险组织，而是把它视为符合本国国际战略需要的平台。克里姆林宫公开称，该论坛把俄罗斯和外国政治党派、社会组织及专家代表召集到莫斯科，希望与会者开展“建设性对话”，形成“有用的倡议和建议”。一个真正要求俄罗斯工人推翻俄罗斯资本和官僚国家机器的国际组织，不可能得到普京如此坦然、公开而热情的欢迎。资产阶级国家并不害怕它，正是因为它不准备触碰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基础；普京愿意替它背书，正是因为它可以替普京的对外政策提供一层社会主义合法性。

SOVINTERN后来发表的乌克兰声明，更把这种从属关系公开写进了自己的正式文件。该声明没有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出发，没有号召俄罗斯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战争机器，也没有把俄乌战争放在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框架中分析，而是直接宣布支持和声援俄罗斯联邦“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换句话说，它不是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审查俄罗斯国家，而是站在俄罗斯国家的立场上要求国际左翼支持俄罗斯。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际网络，竟然在正式声明中把对一个现存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作为共同政治立场，这已经足以说明，它所实践的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国际延伸。

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国无产阶级保持政治独立，绝不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冒充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俄罗斯国家要求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战略边界和地区影响，是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国家目标；它同美国和北约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反对北约扩张，可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包围、制裁和战争政策，但这绝不意味着必须支持普京政权，更不意味着要把俄罗斯国家的战争解释和外交目标写进所谓社会主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盗，不能成为支持另一个强盗的理由；揭露美国的侵略，不能成为替俄国的垄断资本和国家扩张开脱的借口。

SOVINTERN却把这种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站队说成国际主义。它的逻辑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各自的统治阶级"，而是"全世界左翼力量联合起来支持俄罗斯反对美国"；不是要求俄国工人、美国工人、中国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共同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而是要求各国左翼组织在大国竞争中选择莫斯科和北京一边。这样一来，阶级界线被国家界线取代，无产阶级独立政治被大国阵营政治取代，反资本主义革命被所谓"多极世界"取代。革命者不再被要求组织本国工人推翻资产阶级，而是被要求替普京、习近平的外交路线制造国际舆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SOVINTERN能够容纳政治路线如此混杂的参会者。它的公开论坛日程把俄罗斯议会党人、国家学者、美国"爱国社会主义者"、英国议会政治人物、各国合法左翼党以及普拉昌达路线的代表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它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战争、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革命、宗教、民族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并没有统一路线，甚至可能存在根本对立；但是，只要它们接受反对美国单极霸权、支持俄罗斯的国际立场，就可以共同出现在SOVINTERN的舞台上。把这些人联合起来的，不是共同革命纲领，而是共同外交站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认同，而是对莫斯科主导的"多极化"叙事的认同。

真正的革命国际不可能回避最根本的路线问题。它必须回答：各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无产阶级怎样夺取政权？是否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处理议会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关系？怎样反对修正主义？怎样建立受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SOVINTERN却绕开这些问题，把数字宣传、国际论坛、反美声明和网络社群建设当作组织重点。其官方网站甚至把自身描述为记录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和社会成就的"数字博物馆"，并计划建设一个面向社会主义研究者和同道者的私人社交网络。这样的项目可以是宣传平台、资料网站或者政治交流社区，但它同领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完全不是一回事。

它的组织形态恰好适合国家外交，而不适合革命斗争。对普京统治集团来说，一个松散的"网络"比一个具有严格纲领和组织纪律的革命国际更加好用。革命国际会要求审查俄罗斯的阶级性质，会批判俄罗斯资产阶级国家，会支持俄罗斯工人独立组织起来；松散网络则只需要发布声明、举办论坛、组织网络宣传和邀请外国政治人物访问莫斯科。前者可能成为国家机器的敌人，后者却可以成为国家机器的宣传资产。SOVINTERN没有真正统一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纪律，恰恰不是它尚未成熟的偶然缺陷，而是它能够为俄罗斯外交广泛吸纳各类机会主义者的必要条件。

中国修正主义的参与逻辑同样如此。习近平集团并不需要建立一个真正要求世界革命的国际组织，因为真正的革命国际首先就会支持中国工人阶级反对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揭露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它需要的是另一种国际左翼：这种左翼可以批判美国，可以支持所谓多极化，可以赞扬中国的发展成就，可以把中美之间的争霸解释成社会主义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却绝不能组织中国工人、批判中国修正主义和提出社会主义再革命。对中修而言，最理想的"国际主义者"，就是在国外高喊反美、在中国问题上保持沉默，甚至主动为习近平政权辩护的人。

正因如此，SOVINTERN中的中俄配合并不需要习近平本人公开担任共同主席。俄罗斯国家负责提供组织中心、政治背书和会议平台，中国修正主义的学术和外交叙事则为"多极化""中俄协作""反对单边霸权"等概念提供理论资源。两国统治集团都希望把世界左翼的反帝情绪引导到支持中俄国家力量的方向上，都希望把各国人民对美国战争和制裁政策的愤怒转化为自身外交资本。所谓"普京和习近平联手导演"，最实质的内容就在这里：他们未必需要共同签署导演名单，但两国国家战略在SOVINTERN的政治方向上高度会合，共同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改造成服务大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种做法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结合。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工人阶级从属于本国资产阶级国家，在战争到来时支持自己的政府；现代SOVINTERN式机会主义，则要求各国左翼从属于它所指定的"反霸权国家"，在大国冲突中支持俄罗斯和中国。前者以"保卫祖国"为名背叛国际主义，后者以"建设多极世界"为名背叛国际主义；前者直接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后者把另一个资产阶级大国包装成世界人民的天然盟友。形式有所变化，核心完全一致：都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立场，都把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政策的附属品。

普拉昌达之流之所以能够自然加入这样的网络，也正是因为他们早已完成了从革命路线向国家政治的投降。普拉昌达主义的本质，是把夺取政权的人民战争变成进入旧国家机器的谈判筹码，把革命军队变成议会妥协的资本，把无产阶级领导权让位于资产阶级宪政秩序。SOVINTERN所要求的，又是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大国外交的辅助工具。一个在国内把革命交给旧国家的人，自然也会在国际上把革命交给大国政府；一个已经接受资产阶级议会规则的人，自然不会反对由国家杜马副主席主持所谓社会主义国际。普拉昌达路线与SOVINTERN路线的会合，不是偶然误入，而是两种机会主义在国内路线和国际路线上的相互承认。

第四部分：修正主义国际的新联盟——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坐到一起

SOVINTERN最值得分析的地方，不只是它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机器的支持，也不只是普京公开致辞、国家杜马副主席主持筹备，而是这样一个明显服务于大国外交的平台，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召集来自多个国家、政治背景看似十分不同的党派和人物。论坛公开名单中既有俄罗斯“公正俄罗斯”领导人和国家杜马人物，也有英国工人党领袖乔治·加洛韦、美国共产党的哈兹·阿尔丁和杰克逊·欣克尔、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议员、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运动人物、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代表、世界反帝纲领成员，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和其他国家机构、党派、工会和宣传平台的人员。它们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革命历史，没有共同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一套经过严肃斗争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却可以轻易地被安排在同一个主席台、同一组战略讨论和同一套政治声明之中。

这种联合并不神秘。把这些组织和人物召集到一起的，不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共同决心，而是几个最低限度的机会主义共识：把美国当作几乎唯一的帝国主义，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作反对美国单极霸权的天然进步力量；把所谓“多极化”当作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把议会政治、国家外交和国际论坛当作改变世界的主要途径；回避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用反美、反北约和反法西斯语言，掩盖对中俄国家战略的支持。这些原则足以组成一个外交联盟，却远远不足以组成一个革命国际。

真正的革命联合，必然伴随着尖锐的路线斗争。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就必须对当代帝国主义性质、各国革命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议会主义、民族主义、武装斗争和群众路线等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不同党派之间如果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就不能靠一场友好论坛和几份模糊声明把它们掩盖过去。

列宁建立第三国际，不是把所有自称左翼的人请到一起拍照，而是在第二国际破产、社会沙文主义者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同机会主义进行彻底决裂。加入共产国际需要接受明确的政治条件，需要清除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需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

SOVINTERN采取的路线恰恰相反。它不是先划清路线，然后联合革命者，而是先围绕俄罗斯国家外交广泛聚人，再把一切原则问题模糊化。它的组织形式越松散，越容易让互相矛盾的力量共同出现；它的政治纲领越模糊，越容易让议会党、国家主义者、“爱国社会主义者”、合法共产党、网红评论员和体制内学者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真正的革命运动来说，这种混杂是致命弱点；对于大国外交来说，这种混杂却是优点。因为普京集团并不需要这些人与自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达成一致，只需要他们在国际宣传中共同反对美国和北约、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叙事，并为所谓“多极世界”提供左翼合法性。

论坛的议程本身就表现出这种特点。它把“数字游击队”、社交网络与人工智能平台、顿巴斯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形势和所谓反帝反法西斯阵线放在突出位置；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如何被打碎、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俄国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修正主义的性质等问题，却没有任何严肃的共同路线。论坛由美国共产党人物和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成员主持数字宣传讨论，由俄罗斯国家和学术机构人员介绍平台建设，由直接参与或支持顿巴斯叙事的人物讨论战争，再由俄罗斯议会党成员、中国体制内学者、世界反帝纲领代表和各国党派人物共同讨论“反帝反法西斯阵线”。这套安排的中心不是革命，而是如何组织一条服务于特定大国叙事的国际传播和政治支持网络。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把各种机会主义者联合起来，是因为机会主义从来不要求理论和实践的彻底一致。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言行统一：既然说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包括本国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既然说工人阶级解放，就必须支持工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既然说社会主义，就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修正主义统治。机会主义却只要求口号有用。今天反美口号能够为俄罗斯外交服务，就高喊反美；明天同特朗普谈判能够为本国资产阶级争取利益，就拥护谈判；在群众面前说革命，在议会里遵守资产阶级规则；在国际会议上说国际主义，回国后继续维护本国统治阶级。只要现实利益一致，理论矛盾完全可以暂时搁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共产党这一类“爱国社会主义”力量能在其中占据显眼位置。论坛把该党国际关系负责人克里斯托弗·赫拉利列为开幕发言人，把主席哈兹·阿尔丁和执行委员会成员杰克逊·欣克尔分别安排在大会和“数字游击队”讨论中。

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方向，正好符合SOVINTERN的需要：使用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语言，却把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同民族国家复兴、文化保守主义和支持所谓多极化大国结合起来；反对美国自由派和北约，却不一定由此走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而可能走向以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力量为依托的阵营政治。

这种政治表面上很激进，因为它痛骂美国统治集团、金融资本和自由主义精英；实际上却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它反对的是某种美国政治路线，而不是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它主张的是另一种国家发展和国际联盟方式，而不是工人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样的力量非常适合SOVINTERN，因为它们能够用美国人的身份替俄罗斯说话，用共产主义语言证明俄罗斯外交并非单纯国家宣传，再通过网络传播吸引对现有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不满的青年。所谓“数字游击队”，于是就不是无产阶级地下斗争的新形式，而可能沦为国家宣传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名称。

乔治·加洛韦和英国工人党的参与，也表现了同一逻辑。加洛韦长期以反战、反北约、反美国干涉的形象出现，这些立场中当然包含可以被肯定的内容。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并不自动等于马克思主义，更不自动等于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反对美国霸权的结果，是支持俄罗斯国家和中国修正主义成为新的世界权力中心；如果反战政治的终点只是议会演说、选举联盟和大国外交平衡，那么这种反战依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政治的边界。SOVINTERN把这样的议会人物置于核心位置，说明它寻求的不是职业革命家和群众斗争领导者，而是能够为中俄外交路线提供国际知名度和左翼修辞的人物。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出现，则显示SOVINTERN如何利用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桑地诺革命曾经具有反对美国干涉和独裁统治的进步历史意义；但一个组织不能仅凭历史名称永远获得革命性质。必须考察它今天掌握什么国家机器、实行什么阶级政策、如何对待工人和群众，以及是否已经从革命运动转化为执政集团。SOVINTERN并不进行这种阶级审查，而是把一切曾经具有反美、民族解放或社会主义历史的政党都纳入自己的象征体系。革命历史于是变成外交资本，烈士和群众斗争创造的声望，被现存国家和执政集团拿来替大国联盟背书。

普拉昌达路线在这里尤其具有代表性。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革命曾经发动长期人民战争，使无数工农群众付出鲜血和生命；但他后来放弃继续打碎旧国家机器，把人民战争的成果交给资产阶级议会、联合政府和国家职位。如今，由他担任协调员的尼泊尔共产党参加SOVINTERN，这正好完成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国际延伸：在国内，从人民战争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在国际上，从无产阶级革命退到大国外交网络。参加这样一个由俄国议会党发起、国家杜马副主席组织、普京公开祝贺的论坛，对于真正坚持毛主义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普拉昌达主义者来说却十分自然，因为他们早已把进入旧国家机器解释成“策略”，把放弃革命解释成“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

普拉昌达主义同SOVINTERN的共同点，就是都把革命内容抽掉，只保留革命名称。普拉昌达保留“共产党”“毛主义”“革命”等历史资本，却把现实政治建立在议会交易和政府联盟上；SOVINTERN保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等名称，却把现实活动建立在俄罗斯国家支持和多极化外交上。二者都善于把投降描述成灵活，把原则破产描述成适应新形势，把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描述成从内部改造，把依附大国外交描述成国际统一战线。正因为语言和手法高度相似，它们才会彼此吸引。

会议中的世界反帝纲领，也暴露出所谓“反帝统一战线”的根本错误。论坛把该平台代表安排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形势与加强反帝反法西斯阵线”的核心讨论中。这种路线通常把世界简单划分为美国、北约及其盟友构成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等反帝或主权力量构成的抵抗阵营。它的根本问题不是揭露美国帝国主义过于激烈，而是对其他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放弃阶级分析。只要一个国家同美国发生冲突，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垄断资本、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似乎都可以被暂时取消。

这种“阵营论”实际上把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改造成国际关系中的朋友敌人名单。列宁分析帝国主义，依据的是垄断资本、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和重新瓜分世界，而不是依据一个国家今天同华盛顿关系好坏。按照真正的列宁主义，俄罗斯是否是帝国主义，不能由北约是否围堵它来决定；中国是否是社会帝国主义，也不能由美国是否打压它来决定。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完全可能受到另一个更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同时仍然压迫其他人民、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强盗被更大的强盗殴打，并不会因此变成无产阶级。

SOVINTERN却需要这种阵营论，因为只有把美国说成唯一或绝对主要的帝国主义，才能把支持俄罗斯和中国说成反帝。只要承认俄国自身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普京的欢迎词就会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对左翼网络的收编；只要承认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复辟并具有社会帝国主义性质，中国体制内学者参与论坛就不能再代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贡献，而只能代表中国国家战略的意识形态介入。为了维护整场闹剧，SOVINTERN必须在理论上阉割帝国主义概念，在政治上取消无产阶级独立性。

论坛参与者之间的杂乱，因此并不是偶然缺乏筛选，而是修正主义联盟的真实形态。革命者之间可能因为原则问题发生严肃分裂；机会主义者之间却可以因为现实利益迅速联合。民族主义左翼需要国际舞台，议会党需要革命装饰，网红需要流量和政治身份，俄罗斯政府需要外国左翼背书，中国修正主义需要“社会主义多极化”话语，普拉昌达主义者需要证明自己的议会道路仍然属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每一方都从这个平台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它们不必解决彼此之间的理论矛盾。

这就是修正主义国际的新联盟：它不是以共同革命目标消除分歧，而是以共同回避革命来容纳分歧；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达成一致，而是在支持多极化和俄罗斯国家外交上达成一致；不是联合各国工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联合各国左翼人物为另一些资产阶级大国提供政治服务。它的广泛性不证明其力量，只证明其没有原则；它的多样性不证明其群众性，只证明任何愿意进入大国外交框架的人都能得到位置。

项观奇同志关于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既争夺又勾结的分析，再一次说明这种联盟为什么具有欺骗性。SOVINTERN试图把俄中两国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关系中抽出来，安放到所谓“反帝阵营”一边；但习近平同特朗普建立战略稳定，普京同特朗普反复沟通，以及中俄自身的垄断资本和国家利益，都揭示了这种划分的虚假。 SOVINTERN参与者不是没有看见这些事实，而是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主动回避这些事实，因为一旦正视它们，整个“反帝多极联盟”的理论基础就会倒塌。

因此，SOVINTERN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克服分裂的标志，而是国际修正主义、议会主义、国家主义和阵营主义重新聚合的标志。它把各国不同类型的机会主义装进同一个网络，用反美主义作为最低共同纲领，用俄罗斯国家资源作为组织中心，用所谓社会主义多极化作为理论包装。它不是新的共产国际，而更接近一个国际机会主义俱乐部：每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的社会主义，只要不反对普京；每个党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旗号，只要接受莫斯科的国际议程；每个人都可以批判资本主义，只要不触碰中俄现存国家机器。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同这种联盟划清界限。我们可以同任何力量在具体反战、反侵略和反制裁行动中进行有限合作，但绝不能因此取消对其阶级性质和政治路线的批判，更不能进入一个由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主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必须有无产阶级领导，合作必须服从革命原则，策略妥协不能变成政治依附。否则，所谓广泛联合就会变成无产阶级向机会主义者投降，所谓反帝阵线就会变成替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站台。

所以，这一部分的结论十分明确：SOVINTERN能够把这样一批路线各异的人召集起来，并不是因为世界革命终于找到了共同纲领，而是因为它把革命纲领彻底取消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对大国多极化的共同幻想；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决心，而是利用社会主义名称谋取各自政治利益的需要。这不是革命力量的大团结，而是修正主义者、议会政客、国家宣传者和投降派的一次国际合影。

第五部分：点名批判普拉昌达主义——从人民战争的领导者到大国机会主义的座上宾

SOVINTERN的参会者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不是那些本来就属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职业政客，也不是那些靠网络流量兜售“爱国社会主义”的评论员，而是普拉昌达所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派出的代表。帕万·卡尔基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公开声明，自己是“代表尼泊尔共产党”参加SOVINTERN成立大会，而今天这个尼泊尔共产党的协调员，正是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普拉昌达。2025年11月，原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同统一社会主义者党等多个党派合并成立新的尼泊尔共产党，普拉昌达被推举为协调员。由此可见，卡尔基参加SOVINTERN并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一次同该党路线无关的私人旅行，而至少是以普拉昌达领导的政党名义参加俄罗斯主导的国际政治平台。

普拉昌达本人没有坐在莫斯科大会的主席台上，并不能改变这一事件的政治性质。一个政党的代表公开以党名义参加国际组织的成立大会，当然要由这个政党的政治路线承担责任。即便目前没有公开文件证明普拉昌达亲自签署了参加SOVINTERN的指示，这种参与仍然反映了他所领导政党的国际选择：不是同坚持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联合，而是走进一个由俄罗斯议会党发起、国家杜马副主席组织、普京公开致辞的国家外交平台。这不是一个偶然偏差，而是普拉昌达主义多年演变的必然结果。

普拉昌达之所以值得单独批判，正因为他并非从来没有讲过革命，也并非从来没有领导过群众斗争。他曾经领导尼泊尔持续十年的武装斗争，以人民战争、打倒君主制和建立新国家为号召，动员了大量工人、贫农、妇女、青年和被压迫民族群众。正因为无数人民相信革命、参加革命并为革命付出生命，普拉昌达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威望。对一个从未参加革命的普通议会政客来说，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只是一贯路线；对一个依靠人民战争取得领导地位的人来说，把革命力量引入旧国家秩序，则构成更深刻的历史背叛。

2006年的《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尼泊尔政府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之间的武装冲突，并规定由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整合和安置毛派战斗人员；随后关于武装力量管理的协议，把人民解放军战斗人员和武器纳入联合国监督下的营区管理。

2011年的七点协议进一步规定，最多有6500名毛派战斗人员可以按照尼泊尔军队体系安排进行整合。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一过程绝不是革命政权同旧国家之间的暂时军事妥协，而是革命军队逐步失去独立性、人民战争成果被纳入旧国家机器的过程。

判断这一和平进程的性质，不能只看它是否结束了战争，也不能只看君主制后来是否被废除，而必须考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否真正夺取了国家权力，旧军队、旧官僚机构和旧的阶级统治是否被摧毁。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名称，也不是让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进入议会和政府，而是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如果旧军队仍然存在，旧官僚体系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议会仍然成为政治中心，土地、资本和生产资料仍然由剥削阶级控制，那么过去的革命者即使当上总理，也不等于人民取得了政权。

普拉昌达此后的道路已经给出了回答。他先后三次担任尼泊尔总理，越来越深地卷入议会联盟、政府组合、信任投票和国家职位的循环。世界银行的公开介绍和多家新闻资料均确认，他分别在2008—2009年、2016—2017年以及2022—2024年三次出任总理；2024年担任总理期间，他依靠议会联盟和信任投票维持政府，最终又在失去议会多数后下台。曾经宣称要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人，最后把主要政治精力投入到怎样在旧国家机器中组织多数、分配职位和更换联盟，这就是普拉昌达主义从革命走向议会机会主义的现实轨迹。

机会主义者总会辩解说，参加和平进程和议会只是策略，是为了通过合法斗争完成革命目标。但是，判断一种策略是否仍然服务于革命，不能听领导人怎样解释，而要看它实际把群众力量引向哪里。真正的革命策略可以暂时停战，可以参加谈判，甚至可以有限利用议会，但必须保存革命军队和无产阶级独立组织，必须把一切合法活动服从于夺取政权的总目标。普拉昌达路线却恰恰相反：人民战争停止了，革命军队被整合和安置了，党转变为议会党，领导人反复进入政府，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断被推向遥远的将来。

这里的关键不是简单指责普拉昌达“参加了议会”，而是指出他把议会手段变成了政治路线，把原本可能是从属形式的合法斗争变成了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革命时期，群众被组织起来改变社会关系；议会时期，群众则被组织起来为选票、联盟和领导人职位服务。革命时期，军队是人民夺取政权的工具；和平进程以后，战斗人员被纳入旧国家设计的整合和安置方案。革命时期，党宣称自己要建立新国家；后来，党的成功越来越以获得多少议席、能否进入政府、谁来担任总理衡量。形式上仍然保留共产党名称，内容上却已经服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2025年普拉昌达又同多个议会左翼组织合并，成立新的尼泊尔共产党。这一合并并没有重新提出人民战争和摧毁旧国家机器，而是面向新的选举和议会竞争，强调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制度改革。公开资料显示，该党参加了2026年议会选举，并以议会席位和选举得票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活动方式。这进一步说明，普拉昌达主义不是在议会内为重新发动革命积蓄力量，而是已经把自身改造成尼泊尔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秩序中的常规政党。

正因为普拉昌达已经接受了旧国家的基本规则，他领导的政党参加SOVINTERN才显得如此自然。在国内，他把革命党改造成议会党；在国际上，他的党便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改造成国家外交网络。在国内，他同资产阶级和其他议会党不断组织政府联盟；在国际上，他便同俄罗斯议会党、国家杜马人物、各国国家主义左翼和机会主义者组织所谓社会主义联盟。在国内，他用共产党名称维持革命历史带来的政治资本；在国际上，SOVINTERN则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名称为俄罗斯国家战略积累政治资本。两条路线在这里完美地会合了。

普拉昌达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总能给每一次原则退却找到一套听起来十分辩证的解释。停止人民战争被说成改变斗争形式，解除和整合革命军队被说成推进和平进程，进入旧政府被说成从内部改造国家，参加选举被说成扩大群众基础，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被说成灵活运用统一战线。如今，参加SOVINTERN又可以被解释成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团结。但是，当所有“灵活策略”累积起来，最后留下的却是革命军队消失、旧国家继续存在、领导人担任总理、政党参加选举并进入大国外交论坛，那么所谓策略的真实方向已经再清楚不过：不是接近革命，而是一步一步离开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区分真正的统一战线和普拉昌达式的无原则联合。毛主义的统一战线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领导，其目的在于孤立主要敌人、发展革命力量和推进夺取政权。普拉昌达主义的联合，则不断以扩大联盟为理由削弱无产阶级独立性：在国内同旧制度中的政党和统治集团结盟，在国际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支持的“社会主义者”结盟。统一战线原本应当服务于革命，到了普拉昌达手中，却变成革命力量融入现存秩序的通道。

SOVINTERN同普拉昌达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旧国家给予的合法性误认为革命取得的胜利。普拉昌达能够当选总理，SOVINTERN能够得到普京祝贺，机会主义者便把这些现象解释为社会主义力量扩大了影响。但资产阶级国家愿意让某些共产党人进入政府，往往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再威胁国家机器；普京愿意祝贺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也正是因为这个网络不会组织俄罗斯工人推翻普京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得到旧国家的承认，不一定说明革命力量强大，也可能说明革命已经被驯服。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拉昌达主义者曾经以“二十一世纪民主”为名，声称过去的社会主义经验需要新的发展；SOVINTERN今天又以“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为名，为俄罗斯国家外交建立新平台。两者都用时代变化为修正主义辩护：仿佛因为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过时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过时了，人民战争和革命暴力就过时了，只有议会、多党竞争、国家合作和国际论坛才是现实道路。实际上，变化的只是机会主义的语言，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变化。

从主要毛主义立场看，普拉昌达路线最严重的错误，不只是某一次谈判判断失误，也不是某一次政府联盟不够明智，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战争必须发展到夺取全国政权的原则。他把革命战争产生的政治力量用于进入旧制度，而不是摧毁旧制度；把人民群众的牺牲转化成议会谈判资本，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新政权；把毛主义的名称保留下来，却切除了毛主义关于政权、武装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核心内容。

因此，普拉昌达主义不是毛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创造性发展，而是以毛主义语言包装的议会修正主义。它告诉革命者，可以先发动人民战争取得政治资本，然后用这个资本同旧国家谈判；可以先建立革命军队，再把军队交给和平进程管理；可以先号召群众摧毁旧秩序，再由领导人进入旧秩序担任总理。这样的“道路”一旦被普遍接受，人民战争就不再是夺取政权的方法，而会沦为资产阶级议会谈判的一种极端筹码。

这正是普拉昌达路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危险的影响。一个普通社会民主党公开主张议会改良，革命者很容易识别；普拉昌达却可以用自己曾经领导人民战争的履历，为议会主义提供革命证明。他的存在仿佛在告诉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接受旧宪法、进入议会、担任部长和总理，并不算背叛，反而是毛主义适应新时代的表现。SOVINTERN同样利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历史形象，为资产阶级国家外交提供社会主义证明。一个盗用人民战争的威望，一个盗用共产国际的威望，二者的结合绝不是偶然。

项观奇同志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分析指出，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之间存在着既争夺又妥协、既对抗又勾结的关系，革命者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大国误认为世界革命的天然盟友。 普拉昌达领导的政党参加SOVINTERN，却恰恰站到了这种大国机会主义网络之中。它不是利用大国矛盾发展尼泊尔和世界革命，而是把自己的国际路线依附于俄罗斯国家主持的平台。这表明，普拉昌达在国内放弃无产阶级独立路线之后，也必然在国际上放弃无产阶级独立路线。

因此，我们点名批判普拉昌达，不是为了否定尼泊尔人民战争中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作出的英勇牺牲，恰恰是为了捍卫这些牺牲不被机会主义领导层据为己有。尼泊尔革命的功绩属于参加斗争的工农群众，不能被普拉昌达拿来证明自己后来参加旧国家、组织议会联盟和投入SOVINTERN的正确性。人民为推翻旧世界流血，不是为了让领导人坐进总理府；革命者建立人民解放军，不是为了有一天被旧军队整合；群众高举毛主义旗帜，不是为了给俄罗斯国家主持的外交论坛增加一名“革命来宾”。

所以，本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普拉昌达主义是从人民战争退向资产阶级议会、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退向大国外交机会主义的一条完整路线。普拉昌达领导的政党参加SOVINTERN，不是他过去革命路线的延续，而是他背离革命路线的最新表现。他从人民战争的领导者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三任总理，他所领导的政党又从革命国际主义走进普京祝贺的SOVINTERN，这条道路已经用自身实践证明：一旦放弃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独立性，所谓策略就会变成投降，所谓和平就会变成解除革命，所谓国际联合就会变成给大国机会主义站台。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彻底反对普拉昌达主义。我们要捍卫尼泊尔人民战争的革命遗产，就必须反对把这段历史改写成普拉昌达进入议会和总理府的垫脚石；要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必须拒绝由这类投降派代表毛主义参加SOVINTERN。人民战争不是通往资产阶级议会的弯路，毛主义也不是为机会主义领导人积累政治资本的招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仍然是夺取政权、摧毁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社会，而不是在旧秩序中为自己争得一个席位，更不是在普京、习近平所需要的大国外交舞台上争得一把座椅。

第六部分：革命国际还是国际论坛——SOVINTERN的组织形式批判

经过前面对SOVINTERN政治背景、国家外交属性、参与者构成和普拉昌达主义路线的分析，还必须进一步回答一个根本问题：SOVINTERN究竟是不是一个能够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组织？它究竟是一个具有共同革命纲领、统一组织纪律和实际群众斗争能力的革命国际，还是一个依靠论坛、声明、网络传播和国家资源维持的国际政治交流平台？如果只看它响亮的名称，它似乎有意让人联想到苏维埃、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只要考察其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实际活动，就会发现它同真正的革命国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

判断一个国际组织是否具有革命性质，不能以规模大小和参会国家数量为标准，也不能以是否邀请了几个自称共产党人的代表为标准。革命国际首先必须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纲领之上。它必须明确回答：当代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哪些国家属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任务是什么？是否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看待资产阶级议会、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如何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如何把各国的具体革命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如果这些根本问题没有明确答案，那么无论名称多么响亮、会场多么热闹，也不能构成一个革命国际。

截至目前，SOVINTERN公开展示给世界的，首先不是一部共同的革命纲领，不是一套明确的组织章程，也不是各成员党必须遵守的政治条件，而是一场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论坛。其官方网站公开的核心内容，是论坛日程、视频直播、照片和若干国际声明。论坛的主要形式，是开幕演讲和四场所谓“战略会议”：讨论网络政治传播的“数字游击队”、社会主义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平台、顿巴斯冲突以及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反帝反法西斯阵线”。这些议题可以成为宣传会议的内容，却不能代替关于革命纲领、组织路线和夺取政权战略的严肃讨论。

SOVINTERN官网对自身的说明更加耐人寻味。它目前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记录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物质与社会成就的“数字博物馆”，并宣布未来将建设一个供社会主义研究者和志同道合者使用的私人社交网络。该网络计划提供讨论、资料库、社群地图和专题小组，供参与者交流理论、分析时事和寻找同道。换句话说，SOVINTERN当前公开展示的组织发展方向，主要是数字档案、网络社区、国际论坛和舆论传播，而不是建立能够领导各国阶级斗争的统一国际组织。

数字传播当然不是无用的。革命者必须善于利用报刊、广播、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一切可能的宣传工具。但是，宣传工具不能取代革命组织，网络社群不能取代共产党，线上讨论不能取代群众斗争，人工智能平台更不能取代工人阶级在现实生产关系中的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国际，可以拥有网站、数字档案和社交网络；可是，如果它的主要政治成果就是建设网站、举办论坛、发表声明和制造网络影响力，那么它就不是在利用数字工具服务革命，而是在用数字工具制造革命正在发生的幻象。

SOVINTERN所谓“数字游击队”这个说法，尤其暴露了它用激进语言包装宣传工作的倾向。游击队这个概念，在革命历史上意味着受政治纲领领导、同群众结合、承担实际军事和政治任务的革命武装。SOVINTERN却把它用于描述网络传播和政治沟通。这样的命名看起来十分激进，实际上很容易把革命斗争娱乐化、媒体化和网红化：只要转发视频、制作短片、参加直播、同对手在社交媒体上争论，仿佛就已经成为“游击队员”。真正的群众组织、秘密工作、工厂斗争、农村工作、政治教育和革命纪律，则被一套互联网英雄主义遮蔽了。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语言问题。机会主义政治最擅长用革命名称替代革命内容。没有人民军队，就发明“数字游击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就建设“私人社交网络”；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就发表宽泛的反美声明；没有世界革命的实际组织，就把一次国际论坛说成新国际的诞生。这样一来，一切真正困难、危险而长期的革命工作，都可以被轻松的象征活动代替。革命不再意味着组织工人、教育群众、建设党、对抗镇压和夺取政权，而变成参加会议、发表演讲、上传视频和经营政治品牌。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采取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条件，要求加入者同改良主义和中派彻底决裂，清除工人运动领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者，坚持在工会、合作社、军队和农村开展系统工作，把合法活动同非法活动结合起来，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纪律建设共产党。条件还要求议会党团服从党的领导，各国党的纲领接受共产国际审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对各支部具有约束力。

这些条件的具体历史实施当然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但它们至少表明，共产国际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带着自己的政治路线前来发言的松散论坛。它要求参加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组织、反改良主义和国际纪律等根本问题上作出选择。它不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爱国主义议员、议会机会主义者和革命共产党人全部安排在一个平台上，然后用“多样性”掩盖原则分歧，而是试图通过公开的路线斗争，把共产党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离开来。

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还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组织，组织工作的目标是建设能够保证无产阶级战胜有产阶级的力量。其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文件，把形成、组织和训练具有行动能力的共产党和领导机关，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说，真正的国际组织不是为了给已经存在的各种左翼政治身份提供交流空间，而是为了把各国革命力量锻造成能够同资产阶级国家斗争的组织。

以这样的标准考察SOVINTERN，差距就十分明显。至少在其当前公开材料中，我们看不到一套所有参与者必须接受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看不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统一原则，看不到要求成员同议会改良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加入条件，

也看不到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对各成员组织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国际领导机关。我们看到的，是“倡议党”“共同发起者”“论坛代表”“战略会议”“声明”和正在建设的网络平台。

这种组织形式不是偶然的技术缺陷，而是同SOVINTERN的政治功能完全一致。一个真正要求统一纲领和严格纪律的国际组织，必然要审查“公正俄罗斯”的阶级性质，审查俄罗斯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审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帝国主义问题，审查普拉昌达放弃人民战争、进入旧国家机器的问题，也必须审查各国议会党和“爱国社会主义者”究竟是否准备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一旦进行这样的路线审查，今天坐在莫斯科会场里的许多人根本不可能继续和平共处。

SOVINTERN要维持自己的广泛阵容，就必须避免明确纲领；要让俄罗斯议会党、国家杜马人物、普拉昌达主义者、美国“爱国社会主义者”、合法左翼党和各国民族主义政客共同参加，就必须把最根本的阶级问题搁置起来。它越没有统一革命原则，就越容易扩大所谓国际网络；它越不要求参与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就越容易得到资产阶级国家支持；它越回避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夺取政权，就越可以被普京当作“建设性对话”平台公开祝贺。普京向其成立论坛发去欢迎词，并期待论坛提出“有益的倡议和建议”，本身就显示俄罗斯现存国家机器并不把它视作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SOVINTERN刚刚成立，不能要求它立即具备成熟国际组织的全部结构。这种说法表面合理，却回避了方向问题。一个新生革命组织当然可能力量弱小、章程不完善、组织网络有限，但它从成立开始就必须明确自己准备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向统一革命纲领、无产阶级纪律和各国群众斗争发展，还是向更大的论坛、更多的名人、更多的网络流量和更广泛的外交伙伴发展？SOVINTERN公开宣布的下一步，是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研究者和同道的私人社交网络；它公开展示的中心活动，是国际论坛和数字平台。这不是暂时缺乏革命组织形式，而是它目前选择的道路本来就不是建设革命国际。

一个革命国际也不能只靠共同发表声明存在。声明可以表达立场，却不能代替组织行动。SOVINTERN关于乌克兰的声明，直接采用俄罗斯国家关于战争的核心叙事，并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维护所谓地区安全和稳定。这份声明恰好说明，SOVINTERN虽然缺乏对各成员党具有约束力的革命纲领，却能够迅速在支持俄罗斯国家政策的问题上形成一致。它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没有统一，在人民战争问题上没有统一，在中国修正主义问题上没有统一，在议会主义问题上没有统一，却能在为俄罗斯国家战争立场背书的问题上统一起来。这已经告诉我们，真正维持该网络的不是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外交立场。

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纪律”：对机会主义没有纪律，对大国外交却有纪律；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统一要求，对支持俄罗斯却能形成统一声明；成员可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各说各话，却不能偏离“美国和北约是唯一主要敌人”的阵营叙事。它不是以组织章程形式明确出现的民主集中制，而是一种围绕国家外交形成的非正式集中制。不同组织可以保留自己的名称、历史和理论，只要最后在关键国际问题上为莫斯科提供支持。

真正的革命国际必须拥有群众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基础，不是论坛有多少观众、社交媒体有多少粉丝，也不是名单上有多少国家，而是其各国支部是否真实存在于工厂、矿山、农村、学校、社区和被压迫群众之中，是否能够组织罢工、土地斗争、反镇压斗争、妇女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帝斗争，是否能够在阶级斗争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路线。SOVINTERN官网目前强调的是政治人物、专家、媒体人和网络平台，其成立论坛的主要发言者也多为议会议员、政党领导人、学者、记者和网络政治人物。这种精英化、论坛化的结构，同一个扎根群众、准备革命的国际组织有根本差异。

国际组织的力量，不在于主席台上坐了多少知名人物，而在于它能否把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政治力量。一个只有领导人来往而没有群众联系的国际，不过是党际外交；一个只有声明而没有共同实践的国际，不过是舆论联盟；一个只有网络平台而没有地下和公开组织的国际，不过是政治社交网络；一个由国家资源搭台、议会人物主导的国际，则更接近资产阶级国家的外围外交机构。SOVINTERN恰恰同时具有这些特点。

它的论坛日程甚至把“社会主义、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并列为一个战略会议主题，并由技术公司负责人、大学行政和技术人员、国家杜马议员共同讨论平台建设。这再一次说明，它对组织问题的理解主要是技术性的：只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传播平台、连接更多用户、形成国际社群，就能推动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可是，革命组织问题从来不是单纯通信技术问题。资产阶级拥有最先进的平台、算法、媒体和人工智能工具，却不因此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即使在通信条件极端困难的时代，也能够凭借正确路线、群众基础和纪律建设革命政党。

技术能够加快信息传播，却不能自动产生阶级意识；网络能够连接个人，却不能自动形成革命组织；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大量内容，却不能替代共产党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私人社交网络能够聚集“志同道合者”，却不能解决谁领导谁、为哪个阶级服务和怎样夺取政权的问题。把技术平台当作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组织突破口，本身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机会主义：它把政治路线问题转化成产品设计问题，把阶级组织问题转化成用户增长问题，把革命领导问题转化成内容传播问题。

这种技术机会主义同SOVINTERN的国家外交属性相互补充。对于俄罗斯国家来说，一个国际网络平台能够收集、联系和影响各国亲俄左翼人物，传播符合俄罗斯外交利益的材料，制造国际支持的可见度；对于各国机会主义组织来说，它可以提供曝光、资源、会议和国际身份；对于真正的群众革命来说，它却不能替代任何核心工作。结果是，平台越成功，俄罗斯的国际宣传网络可能越广；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无产阶级距离革命更近。

革命国际还必须拥有真正的国际民主和集中统一。民主不是让每个代表在论坛上发表一篇演说，集中也不是由主办国安排议程和发布声明。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各支部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参与讨论、选举领导、形成决定，并在决定形成以后共同执行；同时，国际领导机关必须接受代表大会和各支部监督。SOVINTERN当前公开材料主要显示的是倡议组织者、论坛组织委员会、演讲者和网络建设团队，却没有展示一套能够让各国无产阶级组织共同决定路线的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国际网络的实际中心只能是谁提供资金、场地、技术、媒体和政治资源，谁就拥有更大影响。莫斯科提供会场，俄罗斯议会党负责组织，普京提供最高政治背书，俄罗斯机构和人员主持多个核心环节，于是这个“平等网络”的实际重心自然落在俄罗斯国家政治力量手中。形式上没有中央，实质上却存在国家中心；形式上人人平等，实质上主办者决定议程；形式上是国际网络，实质上是围绕莫斯科资源形成的层级结构。

共产国际曾经明确要求各国共产党成为其支部，并接受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共同决定。这种高度集中的形式是否在历史实践中出现过错误，可以具体讨论；但是，它至少公开承认国际组织需要政治权力和责任结构。

SOVINTERN则可能形成一种更不透明的从属关系：它不公开要求成员服从俄罗斯国家，却通过会议资源、外交邀请、宣传平台和政治认可，使参与者逐步围绕俄罗斯的国际议程活动。公开纪律至少可以被公开批判，非正式依附却可以一直以“自愿合作”和“网络多样性”的名义存在。

因此，我们不能把SOVINTERN说成一个“尚不成熟的共产国际”。它目前公开展示的结构更接近一个由俄罗斯国家支持的国际左翼论坛、宣传联盟和数字社交项目。它可以举办会议，可以邀请代表，可以发表声明，也可以在某些反战、反制裁问题上产生舆论影响；但这些功能同领导世界革命不是一回事。一个国际论坛可以有进步发言，一个声明平台可以提出正确诉求，一个网络也可以包含诚实的革命者，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整体组织方向。

更不能因为它使用了“SOVINTERN”这一名称，就把它同第三国际相提并论。共产国际的历史权威来自十月革命、来自各国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来自无数革命者面对监狱、战争和死亡的牺牲，而不是来自名称设计。把一个由议会党发起、总统祝贺、国家杜马人物组织、以论坛和数字平台为主要形式的网络称作新共产国际，是在利用革命历史给国家外交项目镀金。名称越接近共产国际，实际内容同共产国际越相反，其欺骗性就越大。

SOVINTERN没有把参与者组织成反对各自资产阶级的革命支部，却把他们组织成支持俄罗斯外交立场的国际声音；没有建立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共同路线，却建立了传播所谓多极化和反美阵营论的宣传渠道；没有通过原则斗争清除机会主义者，却把议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学者和普拉昌达投降派共同纳入网络。它不是因为太年轻而尚未成为革命国际，而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政治路线根本不需要革命国际。普京和习近平之流需要的是可以支持大国外交、又不威胁本国统治的“社会主义网络”，不是领导俄罗斯和中国工人起来革命的国际组织。

所以，这一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SOVINTERN不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是国家外交的国际论坛；不是各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而是各类亲俄、亲多极化左翼的协调网络；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和推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革命国际，而是以反美声明、政治会议和数字平台为主要形式的宣传联盟。它拥有国际的名称，却缺乏无产阶级的内容；拥有社会主义的包装，却缺乏革命的组织；拥有网络传播的野心，却缺乏群众夺取政权的路线。

真正的革命国际不会从总统贺信、国家议会会场和人工智能社交平台中诞生，而只能从各国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中产生。它必须建立在马列毛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上，建立在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彻底决裂上，建立在各国革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上，建立在统一纲领、民主集中制、共同纪律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上。没有这些条件，所谓国际不过是合影；没有夺取政权的方向，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商标；没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实践，所谓反帝不过是替另一个大国站台。

SOVINTERN越是试图借用共产国际的形象，我们越有责任指出二者的根本区别。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决裂；SOVINTERN却把各种机会主义者召集到一起。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党反对本国资产阶级；SOVINTERN却要求各国左翼支持俄罗斯国家。共产国际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SOVINTERN以论坛、声明和社交网络为主要形式。前者即便在历史中犯过错误，也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尝试；后者则是用革命遗产装饰大国机会主义的一场国际政治表演。

第七部分：国家利益取代阶级利益——“多极世界”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SOVINTERN的全部理论和政治混乱，最终都集中到一个根本问题上：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高于资产阶级国家利益，还是应当要求世界各国工人服从所谓“反霸权国家”的外交需要？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来不是几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也不是由几个大国领导人共同设计一种新的国际力量平衡。它首先要求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要求各国劳动人民把共同的阶级解放置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利益”之上。SOVINTERN却把这一原则完全颠倒了：它表面上召集各国社会主义者，实际中心却是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赞扬中国修正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把中俄两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崛起包装成所谓“多极世界”的进步。

这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的国际化；不是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而是各国机会主义者围绕某些资产阶级大国的联合；不是要使工人阶级摆脱国家机器的控制，而是要把国际左翼编入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战线。它要求人们不要根据生产关系、阶级统治和资本输出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而要根据这个国家是否同美国发生矛盾来判断其“进步性”。在这套逻辑中，只要反对美国，俄罗斯垄断资本就可以被描述成反帝力量；只要同华盛顿争夺国际影响，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可以继续被称为社会主义；只要高喊多极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都可以被说成对世界人民有利。

SOVINTERN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正式声明，最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国家主义立场。该声明并没有把战争理解为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也没有号召俄罗斯和乌克兰工人共同反对战争及其各自统治阶级，而是完整接受了俄罗斯国家关于战争的核心解释。它把俄罗斯军事行动描述成反对北约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俄罗斯价值的“唯一可能道路”，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的吞并要求，并在结尾公开表示支持和声援俄罗斯联邦加强所谓地区安全和稳定。

这一文件已经把SOVINTERN究竟服务于哪个阶级写得清清楚楚。它没有支持俄罗斯无产阶级，而是支持俄罗斯联邦；没有支持俄乌两国劳动人民，而是支持普京国家机器的战争目标；没有要求工人阶级保持独立，而是要求世界社会主义者接受俄罗斯国家对战争的解释。这里的政治主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国家；评判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不是阶级解放，而是俄罗斯安全；所谓国际团结的对象也不是被战争伤害的劳动人民，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垄断资本、军队、官僚集团和势力范围要求的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反对北约东扩，反对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利用乌克兰扩大军事同盟、争夺欧亚大陆和牺牲乌克兰人民。

但是，反对北约并不等于支持普京，正如反对一个强盗并不意味着必须拥护另一个强盗。无产阶级可以同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包围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要求；可以同时揭露乌克兰反动政权和俄罗斯反动国家机器；可以支持顿巴斯和乌克兰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却拒绝把这些权利交给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处理。SOVINTERN恰恰取消了这种独立立场，把反对北约偷换成支持俄罗斯国家。

这正是社会沙文主义的现代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保卫祖国为借口，要求各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今天的SOVINTERN没有简单要求所有人支持自己的祖国，而是要求各国左翼支持被它划入“反霸权阵营”的大国。形式上看，它似乎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它只是把社会沙文主义扩大成国际阵营主义：不再单纯说“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而是说“支持俄罗斯、中国以及一切同美国对抗的国家”。

这种阵营主义依然以资产阶级国家为政治出发点。它不是问哪个阶级掌握生产资料，而是问哪个国家同美国对立；不是问工人是否掌握国家政权，而是问政府是否支持多极化；不是问一个国家是否输出资本、压迫劳动者和争夺势力范围，而是问它是否受到华盛顿制裁。只要一个国家同美国发生矛盾，它内部的阶级对立便被宣布为次要，工人对本国统治集团的斗争也被要求服从所谓反霸权大局。结果，反帝主义被从革命理论降格成了国家名单：美国及其盟国是帝国主义，中俄及其伙伴则自动成为反帝力量。

SOVINTERN自己对所谓多极世界的宣传，把这种立场表达得十分直白。其地区协调员发表的文章称，俄罗斯虽然受到所谓“恐俄症”排斥，却仍在继续建设一个“多极和团结的世界”。这里的俄罗斯不是作为充满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进步主体出现；俄罗斯工人、资本家、寡头、军工集团和国家官僚之间的阶级界线被全部抹掉，整个国家被塑造成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力量。

“多极世界”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迷惑许多左翼人士，是因为美国单极霸权确实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美国凭借军事基地、美元体系、金融制裁、跨国资本和全球同盟干涉世界各地，反对这种霸权当然具有正当性。但是，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独占优势，变成几个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大国共同争夺，并不等于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一个强盗独自分赃和几个强盗共同分赃，在强盗数量上有所不同，在被掠夺人民的处境上却没有根本区别。

多极化本身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革命。它只说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的资本主义大国获得了挑战旧霸权的能力。如果多极世界中的各个“极”，仍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垄断资本、国家军队和对外扩张之上，那么多极化不过意味着世界重新瓜分的竞争更加复杂。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地区强国之间可能形成新的联盟和冲突，但劳动者仍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弱小民族仍然会被大国当作筹码，战争也不会因为霸主数量增加而消失。

项观奇同志关于美、俄、中三国霸权主义关系的分析，正是对“多极世界自然进步”幻想的重要反驳。他指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两个阵营关系，而是既存在争夺，又存在勾结、妥协和共同瓜分世界的倾向。习近平可以一面同普京强调中俄战略协作，一面同特朗普谋求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转变；普京也可以一面主持反美和反北约的国际宣传，一面同特朗普谈判和保持大国沟通。 这些事实说明，所谓多极大国并不是同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革命力量，而是根据自身垄断资本利益，同美国既斗争又合作的竞争者。

SOVINTERN无法接受这一分析，因为一旦承认中俄同美国之间存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共同利益，它的全部政治叙事就会崩塌。它必须把美国塑造成世界上一切反动的唯一根源，把俄罗斯塑造成反法西斯堡垒，把中国塑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只有这样，它才能把支持俄罗斯战争政策说成反帝，把赞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说成支持社会主义，把国际左翼服从中俄外交说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SOVINTERN网站对1978年以来中国道路的介绍，是这种修正主义立场的另一个明确证据。该网站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外国投资和私人企业、建立经济特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描述成中国走向现代化和生产力飞跃的成功实验；它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科技实力和“一带一路”共同说成现代中国道路有效性的证明。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套叙述不是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赞扬，而是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公开美化。阶级斗争被放弃，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被重新引入，劳动力被大规模商品化，中国被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一切恰恰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资产阶级重新取得统治地位。SOVINTERN却把这种历史倒退解释成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把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资本主义剥削解释成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道路，把官僚垄断资本和科技实力解释成社会主义优越性。

它甚至把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正面经验。这句话实际上概括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全部方法：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利益背后的阶级利益，而是让马克思主义服从所谓国家利益；不是让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而是让国家机器规定什么才算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世界革命为最高原则，而是以增强国家实力和维持社会稳定为最高目标。

所谓“从国家利益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改造成资产阶级国家治理术。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私人资本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有利于国家实力，资本输出可以叫“一带一路”合作；只要有利于政权稳定，镇压工人和禁止独立组织可以叫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有利于同美国交易，战略稳定可以叫和平外交；只要有利于同俄罗斯合作，支持普京又可以叫反帝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批判现存秩序的武器，而成为给国家一切现实政策盖章的橡皮图章。

这与毛主义所坚持的政治原则完全相反。毛主席强调政治是阶级的政治，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必须继续革命，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内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SOVINTERN却把国家看成超阶级主体，把增强国力当作社会主义，把社会稳定当作最高价值，把执政党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招牌当作国家性质的充分证明。于是，中国资本家拥有工厂、平台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缺乏独立组织权利，都不妨碍它继续称中国为社会主义；俄罗斯由寡头和垄断集团控制，也不妨碍它把俄罗斯称为多极世界的进步建设者。

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并不是天然一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国家服务于消灭阶级和推进世界革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可能把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归根到底是其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俄罗斯所谓国家安全，包含其垄断资本维护欧亚势力范围的要求；中国所谓国家发展，包含官僚垄断资本扩大市场、资本输出和国际影响的要求；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同样是美国金融资本和军工资本全球统治的政治表达。

如果不分析国家的阶级性质，只讲抽象国家利益，工人阶级就必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美国资产阶级要求美国工人为“民主世界”而战，俄罗斯统治集团要求俄罗斯工人为俄罗斯世界和国家安全而战，中国修正主义要求中国工人为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而忍受剥削。三个国家使用的词汇不同，实质却一样：都要求劳动人民把本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国家机器，把资本家的竞争当作自己的竞争，把统治集团的国际地位当作自己的民族荣誉。

SOVINTERN所做的，是把这一要求进一步国际化。它不仅要求俄罗斯工人支持俄罗斯国家，还要求美国、英国、尼泊尔、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左翼人士共同支持俄罗斯；不仅要求中国工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把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当作社会主义榜样。它把对中俄国家的支持提升为一种国际纪律，却不要求中俄工人拥有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国际主义是假的。真正的国际主义要求俄罗斯共产党人反对俄罗斯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美国共产党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机器，各国革命者在这种独立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互相支持。SOVINTERN式国际主义却要求美国左翼反对美国政府，同时支持俄罗斯政府；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同时接受中国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它只承认敌对阵营内部存在阶级斗争，却把自己支持的国家描述成无阶级的统一整体。

这种选择性的阶级分析，是机会主义最明显的标志。谈美国时，它可以谈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帝国主义；谈俄罗斯时，资本家和国家官僚就突然消失，只剩下遭受北约围堵的祖国；谈西方国家时，它可以揭露贫富差距和垄断统治；谈中国时，亿万雇佣劳动者同资本家的对立便被“现代化成就”和“国家实力”遮蔽。阶级分析不是一个可以根据外交阵营随意开关的工具。只在敌人身上使用阶级分析，在朋友身上使用民族主义语言，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国家外交服务的宣传术。

普拉昌达主义之所以能够接受这套逻辑，也正因为它早已在尼泊尔把阶级利益服从于所谓国家和平和宪政稳定。人民战争被要求服从和平进程，革命军队被要求服从国家整合，工农群众的政权要求被要求服从共和制度和议会平衡。如今，在国际问题上，它又把尼泊尔革命力量的独立性服从于SOVINTERN的大国多极化路线。从服从本国资产阶级国家，到服从国际大国外交，不过是同一种机会主义原则在两个层次上的展开。

革命者并非不能利用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主义从来不拒绝利用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裂缝，也不拒绝在具体条件下同非无产阶级力量进行有限合作。但利用矛盾同依附国家有根本区别。利用矛盾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保持自己的纲领、组织和领导权；依附国家，则是把自己的政治路线交给某个资产阶级政府。利用矛盾，是为了削弱所有反动派、发展革命；SOVINTERN式阵营主义，则是为了帮助一个大国对抗另一个大国，并把前者的胜利误认为人民革命的胜利。

如果一个革命组织在反对美国制裁的具体行动中同俄罗斯方面暂时采取一致立场，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支持普京政权；如果它反对北约扩张，也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俄罗斯吞并领土的全部要求；如果它反对美国围堵中国，也不意味着必须承认中国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艺术，正在于能够同其他力量进行有限共同斗争，同时保持阶级独立和公开批判。SOVINTERN恰恰取消了这种独立，把暂时一致升级为战略从属，把具体合作升级为阵营认同。

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拒绝“多极化即进步”的公式。我们反对美国单极霸权，是因为它压迫世界人民；我们也反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大国以反对美国为名，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资本扩张体系。无产阶级不是要求美国同中俄更公平地瓜分世界，而是要求结束所有大国瓜分世界的制度；不是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更多中心，而是要推翻由资本统治的整个世界体系；不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建立新秩序，而是要组织俄罗斯、中国和各国劳动人民打碎这些统治集团的国家机器。

SOVINTERN试图让世界左翼相信，俄罗斯的强大、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相对削弱，会自动给社会主义创造更好条件。实际上，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只会提供客观矛盾和政治裂缝，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否利用这些矛盾发动独立革命。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党、军队、统一战线和革命路线，所谓多极化只会给新的资产阶级强国创造机会，而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政权。

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一个霸权衰落，就自动把胜利交给人民。旧帝国主义削弱，可能为新帝国主义扩张创造空间；一个大国遭遇危机，可能由另一个大国接管市场和势力范围。只有无产阶级以独立革命力量介入，帝国主义危机才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SOVINTERN却用对中俄国家的支持取代这种革命准备，使国际左翼把希望寄托在大国关系变化上，而不是寄托在群众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上。

所以，本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SOVINTERN所谓国际主义的实质，是用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取代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用资产阶级多极化取代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用支持一个帝国主义阵营取代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它要求各国革命者围绕国家站队，而不是围绕阶级联合；要求工人阶级赞美大国崛起，而不是推翻本国资本；要求人们把普京、习近平同特朗普之间的争夺看成反帝斗争，却故意掩盖他们之间的交易、合作和共同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事实。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不意味着工人对民族压迫和国家主权问题漠不关心，而是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最高原则。真正的国际主义，必须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反对侵略和霸权，

同时反对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这种斗争；必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拒绝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必须反对美国霸权，也必须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必须把世界人民从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共同支配下解放出来。

SOVINTERN高喊的“多极世界”，仍然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世界；它鼓吹的“大国平衡”，仍然是强国安排弱小民族命运的平衡；它所称赞的俄罗斯和中国道路，仍然没有把国家权力交给工人阶级。无论世界被划分成一个中心、三个中心还是十个中心，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仍然存在，世界人民就没有获得真正解放。无产阶级的目标不是让世界拥有更多资本主义中心，而是通过世界革命消灭一切资本主义中心，建立劳动人民自己的国际秩序。

第八部分：革命还是和平主义——用大国谈判和“战略稳定”取代世界革命

SOVINTERN不仅用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取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进一步用大国之间的谈判、妥协和所谓“战略稳定”，取代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它口头上不断谈论战争、法西斯主义、世界危机和反帝阵线，甚至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形势”列为成立论坛的核心议题；但是，在它公开公布的会议日程、组织计划和政治声明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国家之间怎样重新安排安全关系、怎样解决地区危机、怎样建立多极秩序，却看不到各国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推翻本国资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应当怎样夺取政权、帝国主义战争应当怎样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不是简单的理论遗漏，而是SOVINTERN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一个由俄罗斯现存国家力量推动、得到普京公开祝贺、又要为中俄大国外交争取国际左翼支持的平台，不可能真正把世界革命放在中心。因为一旦承认革命是中心，就必须支持俄罗斯工人推翻俄罗斯资产阶级，支持中国工人反对中国修正主义统治，也必须要求一切参与者同本国的议会制度、垄断资本和国家机器进行斗争。这将直接触犯SOVINTERN的组织基础。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它只能把社会主义降格为国家政策，把反帝国主义降格为反对美国，把革命降格为论坛和宣传，再把几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平衡说成世界和平的现实道路。

SOVINTERN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声明，正好集中表现了这种做法。声明一方面反复宣称自己追求“持久、公正和可持续的和平”，另一方面又完全接受俄罗斯国家关于战争根源、领土、军事行动和安全秩序的解释，把俄罗斯军事行动称为当前条件下保护俄罗斯主权、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可能道路”，并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这里看起来既支持战争又主张和平，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它所支持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它所追求的也不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和平，而是俄罗斯国家按照自己的力量和要求重建地区秩序。

这种“和平”的主体是国家，不是人民；这种“和平”的前提是俄罗斯国家目标得到实现，不是俄乌两国劳动人民摆脱资本主义统治。声明没有号召俄国工人反对俄国垄断资本，没有号召乌克兰工人反对乌克兰寡头和北约，没有号召两国士兵拒绝为资产阶级国家相互屠杀，更没有提出把战争造成的统治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机会。它关心的是乌克兰保持什么国际地位、哪些地区归哪个国家、北约怎样部署、俄罗斯需要怎样的安全保证。也就是说，它把战争理解成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阶级战争和革命问题。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抽象地反对一切战争。被压迫民族反对侵略的战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同帝国主义大国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性质。问题从来不是简单地在“战争”和“和平”两个词之间选择，而是要问：哪个阶级发动战争？为了什么政治目标？战争将建立什么社会制度？谁掌握武装，谁取得国家政权？如果避开这些问题，只是歌颂本国国家的战争、要求大国通过谈判恢复稳定，那就既不是革命的战争观，也不是革命的和平观，而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批判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同和平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懂得战争同国内阶级斗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口号，不是帮助本国政府取得更好的谈判条件，也不是要求几个强国达成更加公平的势力范围安排，而是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这里所谓国内战争，不是对任何混乱暴力的盲目崇拜，而是强调无产阶级不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参加帝国主义分赃。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队动摇和群众苦难，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种危机组织工人和士兵，把斗争锋芒从敌对国家的劳动人民转向本国统治阶级。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则采取相反路线：他们口头上仍然说社会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却要求工人保卫本国国家，支持本国政府取得胜利。SOVINTERN对俄罗斯国家的支持，同这种社会沙文主义具有明显的共同逻辑。

SOVINTERN当然不会公开使用“保卫俄国资产阶级”的语言，而是把俄罗斯国家描述成反对北约、法西斯主义和单极霸权的力量。

可是，无论使用什么词汇，只要结论仍然是要求世界左翼支持俄罗斯联邦，而不是支持俄罗斯工人反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它就仍然把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国家之下。它不是要把战争转变为革命，而是要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俄罗斯国家战争政策的支持网络。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述，同样同SOVINTERN路线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具有普遍意义。 这句话的根本含义不是说革命者在任何条件下都要轻率发动战争，而是说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反动阶级不会仅凭道德劝说、网络宣传或议会讨论自动交出国家机器。革命斗争的各种形式，最终必须服从解决政权问题这一中心任务。

SOVINTERN却恰恰回避政权问题。它可以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谈论反帝反法西斯阵线，可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也可以建设所谓“数字游击队”和社会主义社交网络；但是，它没有提出俄罗斯无产阶级应当从普京所代表的国家机器手中夺取政权，也没有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推翻修正主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它承认国家可以使用战争解决问题，却不承认人民应当用革命解决国家问题；它支持资产阶级国家运用军队实现外交目标，却回避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这正是修正主义战争观最虚伪的地方。对于普京的军队，它可以极力赞扬其历史使命；对于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武装，它却往往强调和平、合法性、谈判和政治解决。国家军队越过边界，可以被解释成反帝反法西斯；工农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却会被批评为不符合现实条件、破坏统一战线或者妨碍国家稳定。战争并没有被真正反对，只有不受现存国家机器控制的人民革命战争被反对；暴力并没有被消灭，只有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革命暴力被取消。

普拉昌达主义正是这种路线在另一种条件下的典型表现。尼泊尔人民战争发展起来的时候，普拉昌达曾经承认武装斗争和建立新政权的必要性；当他决定进入和平进程以后，战争便突然被描述成必须结束的旧形式，议会、谈判和国家整合则被描述成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革命军队被解除和整合，革命根据地失去独立性，旧国家机器却没有被打碎。所谓和平的实际内容，就是革命力量接受资产阶级国家规定的政治秩序。

今天，普拉昌达领导的政党参加SOVINTERN，正是这种和平主义机会主义在国际层面的延续。在尼泊尔，他以和平进程的名义把人民战争引入旧国家；在国际上，他的党又进入一个把大国谈判、地区稳定和国家外交说成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平台。

国内是阶级调和，国际是国家调和；国内要求革命群众服从旧国家，国际要求各国左翼服从俄中大国外交。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把革命原则当作可以无限期推迟的远景，把现实政治交给资产阶级国家掌握。

SOVINTERN所宣传的“多极和平”，也是这种路线的世界化。它给人的印象是，只要美国单极霸权被削弱，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能够形成更加平衡的力量结构，战争危险就会减少，世界就会自然走向公正。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平幻想。多极大国之间也会争夺市场、资源、航道、边界和势力范围；力量平衡可以暂时推迟某些战争，也可能制造新的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大国平衡就不可能消灭战争根源。

和平条约也不能自动消灭帝国主义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一次战争后签订协议，也可以在力量变化以后撕毁协议；可以今天讨论停火，明天重新武装；可以在一个地区缓和，在另一个地区发动冲突。资产阶级和平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整，除非工人阶级推翻制造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时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把斗争锋芒转向自己的政府，帝国主义战争之后不可能获得真正民主的和平。

项观奇同志对美、俄、中三国关系的分析，也揭露了所谓大国和平的虚伪。习近平一面同特朗普建立“战略稳定”，普京一面同特朗普保持谈判和沟通，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政治力量又以反美、反北约的姿态召集SOVINTERN。 这表明大国统治者并不真正坚持什么不可动摇的反帝原则，而是根据自身利益在战争、谈判、合作和对抗之间不断转换。他们今天需要美国市场、技术或外交妥协，就赞扬对话与稳定；明天需要调动民族主义和国际左翼支持，就高喊反帝和反法西斯。

对这些统治者来说，和平与战争都只是国家政策的手段。能够通过谈判取得利益时，他们就谈和平；谈判不能满足要求时，他们就使用制裁、军事压力和战争。SOVINTERN没有从阶级角度揭露这种共同本质，而是把俄国的战争说成正义，把中俄同美国的谈判说成和平，把三大强国之间的利益调整描绘成反霸权世界秩序的成长。这样一来，无论普京和习近平选择战争还是选择谈判，SOVINTERN都能替他们找到社会主义解释。

这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国家政策辩护术。革命理论应当为无产阶级提供判断统治阶级政策的独立标准；SOVINTERN的理论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变化而变化。普京打仗，它就说这是反法西斯斗争；普京同特朗普谈判，它就说这是通向和平的责任外交；习近平同特朗普进行经济交易，它就说这是稳定世界；习近平同美国发生冲突，它又说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反对霸权。国家政策永远正确，国际左翼的任务永远只是事后为其寻找理由。

真正的革命路线并不拒绝谈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曾经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也曾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和约。问题在于，革命力量参加谈判时并没有放弃独立政权、革命军队和群众组织，也没有把敌对阶级美化成共同管理世界的伙伴。谈判服从革命，和平手段服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战略目标，而不是革命服从谈判。

机会主义则把这种关系完全倒置。它先把保持外交关系、国家稳定和议会合法性确定为不可触碰的目标，再要求革命原则适应这些目标。只要革命斗争可能破坏谈判，就要求群众克制；只要工人斗争可能影响所谓国家发展，就要求工人顾全大局；只要人民战争可能妨碍资产阶级和平进程，就要求革命军队解除武装。久而久之，和平不再是革命者可以利用的一种斗争条件，而变成压制革命的最高原则。

SOVINTERN的所谓“反帝反法西斯阵线”，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真正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走向法西斯统治，并在斗争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SOVINTERN的阵线却由俄罗斯议会党、国家杜马人物、体制内学者和各国议会机会主义者构成，其政治中心是支持俄罗斯国家。它不是人民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组织，而是俄罗斯国家以反法西斯历史记忆为资源构建的外交联盟。

它反复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却不分析法西斯主义同金融资本、资产阶级国家和阶级危机之间的关系。凡是反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力量，可以被称为法西斯；支持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国家、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则可以进入反法西斯阵线。法西斯主义于是从一个阶级概念退化成国家外交中的敌我标签，反法西斯斗争也从推翻垄断资本统治退化成支持普京国家政策。

这种路线最终只会麻痹世界人民。它让劳动者相信，大国总统之间的电话、峰会和停火方案将决定他们的命运；让各国左翼把主要精力用于支持或反对某个国家的外交计划；让革命力量等待多极世界成熟，而不是立即组织本国群众。它不断谈世界大战的危险，却不给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行动方案；不断谈社会主义未来，却把今天的一切政治主动权交给普京、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如果战争爆发，SOVINTERN要求人们支持它所认定的“反帝国家”；如果大国谈判，SOVINTERN又要求人们欢迎和平与稳定。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无产阶级都只能充当观众和支持者，不能成为独立政治主体。这样的路线表面上关心世界命运，实际上彻底取消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是要求人民在本国资产阶级身后保持安静，而是要求把战争造成的危机转化为革命；反对和平主义，也不是鼓吹没有目标和组织的冒险暴力，而是坚持只有消灭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战争。我们支持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分赃战争，也反对用虚假的和平谈判解除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武装。

真正的和平不是普京、习近平和特朗普划分利益以后形成的均势，而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制度以后建立的新社会关系。真正的反战运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大国和平力量”身上，而必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机器。真正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不能只要求大国停止冲突，更必须组织工人阶级推翻制造冲突的统治阶级。

因此，本部分的结论十分明确：SOVINTERN既不是革命战争的国际领导力量，也不是真正反对战争的和平力量。它支持的是俄罗斯国家的战争，追求的是大国国家的和平；它允许资产阶级国家使用武装重新安排世界，却取消无产阶级以革命方式重新创造世界的权利；它把战争交给总统和将军，把和平交给外交官和议员，把世界无产阶级降格为鼓掌、转发声明和参加论坛的观众。

SOVINTERN所谓“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实际通向的不是世界革命，而是以中俄大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改良。它不打算消灭制造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只希望几个大国更加平衡地管理这个制度；不打算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只希望某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获得更多权力；不打算让人民掌握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只希望由它所支持的总统取得更加有利的外交条件。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拒绝这种虚假选择。我们既不支持美帝国主义和北约的战争政策，也不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大国扩张；既不接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动员，也不接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麻痹。我们的任务不是等待普京、习近平和特朗普谈出一个新世界，而是组织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大国和平的双重欺骗之外，开辟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解放的第三条道路。

第九部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用虚假的国际中心收编革命力量

SOVINTERN的危险，不仅在于它替俄罗斯国家的战争和外交政策进行辩护，也不仅在于它美化中国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更深刻的危险在于，它企图把自己塑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中心，

把散布在世界各地、正在寻找国际联系和理论方向的共产党人、工人组织、反帝力量和进步青年，吸引到一条以俄中大国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路线上。它借用共产国际和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象征，利用世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北约战争、以色列侵略和殖民主义的正当愤怒，再用“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反帝反法西斯阵线”和“多极世界”等口号，把这种愤怒引向支持俄罗斯国家、中国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国外交。

SOVINTERN已经不再把自己仅仅描述成一次莫斯科论坛。它在2026年5月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声称，该网络已经包含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党派、运动和组织；它还宣布正在建设一个面向世界各地社会主义研究者和“志同道合者”的私人社交网络，提供讨论、资料共享、社群地图和专题小组等功能。这里的组织数量是SOVINTERN自身发布的说法，目前未见完整、可独立核查的正式成员名册；但至少可以确认，它正在努力把一次论坛扩展成长期存在的国际协调和传播网络。

这意味着，对SOVINTERN的批判不能停留在嘲笑几个机会主义者开了一场会。它试图建设的，是一套具有持续吸纳能力的国际政治基础设施：莫斯科作为会议和协调中心，俄罗斯国家力量提供政治背书，各国议会左翼和亲俄组织提供成员，体制内学者提供理论包装，网红和媒体人物负责传播，数字平台负责维持跨国联系。即使这个网络目前还十分松散，它的发展方向也已经比较清楚：把各国分散的反美、反北约和亲多极化力量，逐步组织成一个围绕俄中大国叙事活动的国际舆论集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处于分散和低潮状态，许多国家的革命力量规模较小，彼此联系困难，理论路线也存在严重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国家资源、国际会场、媒体曝光和跨国邀请能力的平台，必然会对缺乏国际联系的组织产生吸引力。它可以提供会议邀请、国际身份、公开发言机会、宣传渠道和同其他国家组织建立联系的可能。对受到镇压、孤立或者长期缺乏国际承认的小组织来说，这些资源具有现实诱惑。但是，资源从来不是没有阶级属性的。谁提供会场、资金、媒体和政治保护，谁就有能力规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问题必须回避，哪些立场能够获得推广，哪些批判会被排斥。

一个革命组织如果把国际生存和影响力建立在俄罗斯国家或任何资产阶级大国提供的资源之上，就很难继续公开批判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最初，它可能只是在乌克兰或者北约问题上同俄罗斯采取一致立场；随后，它会为了维持合作而淡化对俄罗斯垄断资本、国内镇压和大国利益的批判；最后，它可能把支持俄罗斯解释成反帝原则的一部分。依附并不总是从公开宣誓效忠开始，它往往从一次会议邀请、一份共同声明和一个“暂时不讨论”的原则问题开始。

SOVINTERN的宽松组织形式，尤其适合完成这种收编。它不要求参加者立即放弃原有党名和理论传统，也不要求他们公开宣布支持普京的一切政策。每个组织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旗帜、历史和语言，只需要在几个核心问题上逐步接受共同框架：美国和北约是世界主要甚至唯一的帝国主义力量；俄罗斯和中国是推动多极化的进步力量；当前国际任务是支持反霸权国家，而不是发动反对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革命。在这种框架下，收编不是通过严格的组织命令实现，而是通过共同语言、会议关系、资源依赖和政治身份逐渐实现。

这是一种比公开命令更灵活、也更具有欺骗性的控制方式。一个组织不必正式成为俄罗斯国家的附属机构，也可能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重复俄罗斯国家叙事；一个人不必接受俄罗斯政府资助，也可能因为国际舞台和政治认同而自觉维护莫斯科的立场；一个共产党不必放弃马克思主义名称，也可能把阶级分析的适用范围限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而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所谓反霸权国家停止阶级分析。形式上仍然独立，政治上却已经进入大国外交轨道。

SOVINTERN还会制造一个虚假的理论权威。由于它以国际网络名义发表声明，召集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又得到普京公开祝贺，它很容易给外围群众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它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判断，仿佛支持俄罗斯和中国就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路线。普京在成立论坛当天发出正式贺词，称其汇集了俄罗斯和外国政党、社会组织与专家，并希望论坛产生“建设性”成果。这种来自现存国家最高权力的背书，会被机会主义者反过来当作组织重要性和国际代表性的证明。

可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承认不能赋予一个组织无产阶级权威。恰恰相反，一个自称革命的国际组织越容易得到现存国家机器的公开欢迎，革命者越应当追问：它为什么不使统治阶级感到威胁？普京愿意祝贺SOVINTERN，不是因为普京支持俄罗斯工人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因为这个网络可以帮助俄罗斯国家获得国际左翼支持。国家背书创造的不是革命合法性，而是外交合法性；SOVINTERN却企图把后者冒充成前者。

这种虚假国际中心还会进一步混淆“正确的具体立场”和“正确的总体路线”之间的区别。SOVINTERN发表过要求释放声援加沙的国际活动人士的声明，也呼吁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并谴责土耳其当局拘捕反帝活动人士。这些具体诉求中包含正当内容，革命者当然应当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反对美国封锁古巴，也反对土耳其政府镇压政治活动人士。

但是，一个组织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并不能自动证明其总体路线正确。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也曾经支持工会和社会福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可能反对某些殖民侵略，甚至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可能在特定问题上揭露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罪行。判断一个组织的根本性质，不能只挑选其最进步的声明，而必须考察这些声明服务于什么总体战略。SOVINTERN对巴勒斯坦、古巴和受镇压活动人士的声援，最后是否被用来发展各国人民独立革命，还是被用来证明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反帝斗争的天然领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例如，SOVINTERN要求中国、俄罗斯和金砖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打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反对美国封锁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份呼吁的政治主体仍然不是古巴、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而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政府。声明所寄托的希望，不是群众运动和国际工人阶级，而是“强大国家联合行动”。它甚至把古巴危机同俄中战略稳定和核力量平衡联系起来，使声援古巴进一步服从中俄大国安全逻辑。

这种政治方法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丧失对群众力量的信心。每当美国实施制裁，人们就等待俄罗斯和中国出手；每当战争爆发，人们就等待普京、习近平和其他大国领导人谈判；每当被压迫国家陷入危机，人们就呼吁金砖国家提供援助。工人阶级、农民、妇女、青年和被压迫民族群众不再被视作改变历史的主体，而被降格成向“进步大国”请求保护的对象。国际主义从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退化成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援助。

SOVINTERN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第二种危害，是进一步传播错误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把帝国主义主要解释成美国霸权、北约扩张和西方国家干涉，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世界体系。只要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美国制裁或同北约发生矛盾，它便可能被归入反帝阵营。这样一来，俄国垄断资本的对外利益、中国官僚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以及其他地区强国的扩张，都被从帝国主义分析中排除。

这种理论一旦成为国际左翼的共同语言，列宁主义就会被掏空。帝国主义不再是可以根据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科学分析的概念，而变成一个外交骂人词；谁同美国关系不好，谁就不是帝国主义；谁反对俄罗斯，谁就可能被称为北约代理人；谁批判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谁就可能被指责破坏反帝统一战线。阶级分析让位于阵营忠诚，理论讨论让位于政治站队。

第三种危害，是给各国修正主义和议会机会主义提供国际保护。一个在本国已经放弃革命、融入资产阶级议会和国家机器的党，只要参加SOVINTERN、发表反美讲话，就可以重新获得“社会主义”和“反帝”身份。它不必解释为什么不组织工人夺取政权，不必解释为什么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也不必解释为什么其领导人担任旧国家的部长和总理。国际论坛上的红旗和激进口号，可以替它遮盖国内路线的破产。

普拉昌达主义就是典型例子。在尼泊尔，普拉昌达路线已经从人民战争转向议会政府和国家职位；在SOVINTERN中，其政党代表却可以凭借过去的革命名声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出现。SOVINTERN没有要求其说明人民解放军为何被解除和整合，没有审查其是否仍然坚持摧毁旧国家机器，只把它作为来自尼泊尔的共产党代表纳入论坛。这样的平台不会纠正修正主义，反而会替修正主义提供新的革命证书。

第四种危害，是把国际团结降格为领导人和组织之间的外交联系。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当使各国基层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和革命组织之间建立长期联系，交流群众工作经验，共同支援罢工、反镇压和革命斗争。SOVINTERN当前公开活动的中心，却是政党领导人、议会议员、专家、媒体人物和网络活动人士。其“国际性”主要表现为多少国家有人出席、多少组织签署声明、多少知名人物发表讲话，而不是各国群众斗争之间是否形成了实际联系。

这种精英外交式国际主义，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依赖少数领导人和政治名人。群众成为被代表的对象，而不是国际运动的建设者；国际路线由论坛上的著名发言者塑造，而不是在各国阶级斗争中检验；组织力量用成员名单、国家数量和媒体传播衡量，而不是用工厂、农村、社区和战场中的实际群众基础衡量。一个组织即使在本国没有多少工人，也可能因为得到莫斯科邀请而获得国际地位；一个真正扎根群众却拒绝支持俄罗斯的组织，反而可能被排除在所谓反帝国际之外。

第五种危害，是进一步分裂和扰乱本已分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SOVINTERN会把一个新的错误分界强加给各国左翼：不是以是否坚持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正主义划线，而是以是否支持俄罗斯、中国和所谓多极世界划线。反对美帝国主义但同时批判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人，会被称为亲北约；反对美国围堵中国但坚持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会被说成反华；拒绝为普京战争政策背书的共产党，可能被排除出所谓反帝阵线。

这样一来，真正的路线斗争被国家忠诚测试取代。革命组织之间本来应当围绕战略、阶级性质、群众路线和政权问题展开讨论，却被迫不断表明自己是否支持某个资产阶级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从怎样组织世界革命，转向怎样解释莫斯科和北京的每一项外交行动。大国政府成为理论争论的中心，工人阶级反而被移出中心。

第六种危害，是使一些诚实但理论不成熟的反帝青年滑向国家主义甚至反动政治。世界各地许多青年痛恨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虚伪，这种愤怒完全可以成为革命意识发展的起点。但是，SOVINTERN及其周边的“爱国社会主义”“多极化社会主义”和网络政治人物，会把这种愤怒引向对强国、军队、传统秩序和领袖政治的崇拜。青年可能从反对美国金融资本出发，却最终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垄断资本；从反对北约战争出发，却最终赞美普京国家机器；从寻找共产主义道路出发，却最终把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当作社会主义。

这种政治尤其善于利用互联网。激进剪辑、军事图像、红旗、苏联符号、领袖讲话和反美口号，可以制造强烈的革命外观，但其内容可能只是支持某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SOVINTERN所强调的“数字游击队”和私人社交网络，若建立在错误路线上，只会使机会主义传播得更快、更广，而不会因使用新技术就变成革命。错误路线加上先进传播工具，产生的不是先进政治，而是更高效率的错误政治。

第七种危害，是用“广泛联合”压制必要的反修正主义斗争。SOVINTERN的支持者很可能把任何原则批判说成宗派主义，认为世界战争危险已经如此严重，左翼应当先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和北约，不应继续争论俄罗斯、中国、普拉昌达或议会主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重视团结，实际上要求革命者在最根本问题上保持沉默。它所反对的不是无原则分裂，而是有原则的路线斗争；它所维护的不是无产阶级统一，而是机会主义者不受批判的权利。

列宁主义从来没有把团结本身当作最高原则。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在正确路线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团结，而不是同一切使用社会主义名称的人无条件联合。第二国际曾经拥有庞大组织和国际声望，但它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背叛无产阶级；第三国际的建立，正是通过同这些机会主义者决裂实现的。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统一；掩盖路线分歧，只会让机会主义掌握领导权。

SOVINTERN还可能利用一些真实的国际团结行动，要求革命者停止总体批判。它声援巴勒斯坦、古巴或者遭到拘捕的活动人士以后，支持者便可能反问：这样一个帮助被压迫人民的组织，怎么会是机会主义的？可是，政治路线不能按善举数量计算。一个国家外交工具完全可能在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问题上支持正义诉求；一个修正主义组织也可能组织真诚的群众参加进步行动。革命者既应支持其正确的具体要求，也必须批判其总体路线。拒绝这种辩证态度，非要在“全部支持”和“全部否定”之间选择，反而是形而上学。

我们反对美国封锁古巴，可以同SOVINTERN参加者在具体行动中站在同一边；我们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也可能同其中一些组织共同示威；我们要求释放遭到土耳其政府拘捕的活动人士，同样是应有的国际主义责任。但是，具体行动的一致不能取消政治独立。共同反对一次镇压，不等于承认普京为反帝领袖；共同支援古巴，不等于接受中国修正主义道路；共同声援巴勒斯坦，也不等于加入由俄罗斯国家力量主导的国际网络。

这就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同机会主义收编之间的根本区别。统一战线允许共同斗争，同时保留公开批判和独立组织；机会主义收编则利用共同斗争，要求参加者接受其整体领导和政治叙事。革命者可以同SOVINTERN内部诚实的基层成员进行对话和具体合作，但必须清楚说明：我们合作的是某项正义要求，不是支持SOVINTERN的路线；我们团结的是愿意斗争的群众，不是普京和习近平的国家外交；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也不会因此放弃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

项观奇同志关于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相互争夺、相互妥协和共同维护反动世界秩序的分析，为揭露SOVINTERN的欺骗性提供了重要武器。 SOVINTERN企图告诉世界左翼，俄罗斯和中国站在反帝一边；项观奇同志的分析则提醒我们，普京和习近平可以一面借反美口号召集国际支持，一面同特朗普进行合作、交易和战略协调。一个不能揭露这种两面政治的国际网络，绝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对SOVINTERN，不能采取两种错误态度。第一种错误态度，是因为它得到普京支持、包含机会主义力量，就拒绝同其中任何成员和群众进行一切接触。这会把许多受到反帝口号吸引、但仍有可能转向革命路线的人完全交给机会主义领导。第二种错误态度，是因为它具有一定规模、发表过正确声明、能够提供国际资源，就放弃原则批判，甚至以“先加入再改造”为借口进入其政治轨道。这会使革命组织失去独立性。

正确路线应当是：在思想上彻底揭露SOVINTERN的国家主义、阵营主义和修正主义性质；在组织上坚持马列毛主义者自己的国际联系和独立平台；在群众工作中争取被SOVINTERN错误路线影响的诚实反帝人士；在具体反战、反封锁和反镇压行动中，根据明确条件开展有限联合；同时绝不接受俄罗斯国家或中国修正主义的政治领导，绝不把多极化当作社会主义，绝不停止对普拉昌达主义、议会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依靠总统贺信和国家外交资源重新建立。它必须建立在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之上，建立在对马列毛主义共同原则的捍卫之上，建立在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之上。

国际中心不是由谁最有钱、谁能提供最大会场、谁能邀请最多代表决定的，而应当由谁真正代表世界革命方向、谁能把理论同群众实践结合、谁能领导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来决定。

所以，本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SOVINTERN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害，不在于它公开反对共产主义，而在于它冒充共产主义；不在于它公开赞美美帝国主义，而在于它利用反美主义替其他资产阶级大国开脱；不在于它拒绝国际联合，而在于它用国家外交式的虚假联合取代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公开的敌人容易识别，披着红旗、借用共产国际名称、发表正义声明并向革命者招手的机会主义中心，反而更具有欺骗性。

SOVINTERN可能吸收更多组织，可能建立更大的网络，也可能在某些国际事件中发挥实际影响。但是，数量和影响力不能改变路线性质。一个错误路线掌握更多资源，只会造成更大危害；一个以国家利益代替阶级利益的平台吸收更多共产党，只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更深的修正主义侵蚀。革命者的任务不是追随这股潮流，而是逆流而上，揭穿这场以国际主义为名的大国收编，争取其中一切可以争取的群众，重新建立不依附华盛顿、莫斯科、北京或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

第十部分：坚持马列毛主义的独立路线——不依附任何帝国主义大国，不把统一战线变成政治投降

对SOVINTERN的批判，最终不能停留在揭露普京的国家外交、习近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普拉昌达的议会机会主义上。单纯指出别人错误，还不足以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走什么道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美帝国主义仍然占据世界霸权地位、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各国革命力量又普遍处于分散状态的条件下，马列毛主义者应当怎样建立国际联系？怎样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不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庸？怎样开展广泛统一战线，又不把无产阶级的独立纲领交给资产阶级国家？怎样既反对宗派主义和自我孤立，又拒绝SOVINTERN式的无原则联合？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坚持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立政治路线、独立组织和独立国际中心。无产阶级可以同其他阶级和政治力量进行暂时合作，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在具体反战、反侵略、反封锁和反镇压斗争中形成广泛联合；但是，无论采取什么策略，都不能放弃对革命目标、阶级性质和国家政权问题的独立判断。谁放弃了这种独立性，谁就不再是在利用矛盾，而是在被矛盾的一方利用；不再是在领导统一战线，而是在充当资产阶级大国统一战线中的群众演员。

SOVINTERN路线的根本错误，不是它同某些非无产阶级力量进行接触，而是它把这种接触变成了政治依附。俄罗斯国家不是统一战线中的普通参加者，而是论坛的实际组织中心；普京不是被无产阶级暂时利用的矛盾一方，而是为整个网络提供公开政治合法性的国家领导人；俄罗斯议会党和国家杜马人物不是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而是掌握会场、议程和组织资源的主导力量。在这种结构中，无产阶级并没有领导统一战线，而是被统一到俄罗斯国家外交路线之下。

真正的统一战线必须有明确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可以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必须以发展自身力量、孤立主要敌人和推进革命为目的。统一战线不是让各方暂时忘记阶级差别，更不是把无产阶级纲领降低到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最低水平。恰恰相反，越是广泛的统一战线，越需要无产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治组织和理论旗帜；越是同复杂力量合作，越需要向群众公开说明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是利用敌人矛盾，越不能把某一个敌人美化成革命朋友。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问题上，这一原则尤其重要。美国军事、金融和政治霸权仍然压迫世界人民，革命者当然必须反对美国发动的战争、军事基地、金融制裁、政治干涉和代理人统治。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能被偷换成支持俄罗斯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更大份额。无产阶级反对美国，不是因为它希望另一个国家成为新的霸主，而是因为它反对一切大国支配世界人民；无产阶级反对单极霸权，也不是为了建立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共同管理世界的多极秩序，而是为了摧毁整个帝国主义体系。

因此，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同时反对两种错误路线。第一种是亲美自由主义，它把美国和西方国家包装成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代表，否认美帝国主义战争、资本输出和全球霸权的阶级性质。第二种是SOVINTERN式阵营主义，它正确揭露美国罪行，却把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从批判对象中排除，把反对美国异化成支持中俄。前者公开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后者则在反美旗号下站到另一些资产阶级大国一边。二者虽然在外交站队上相反，却都取消了无产阶级独立路线。

这种独立路线还要求革命者坚持全面、统一的帝国主义标准。不能因为美国比俄罗斯强，就否认俄罗斯垄断资本和国家扩张的帝国主义性质；不能因为美国围堵中国，就否认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并形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输出；也不能因为某些国家受到制裁，就自动把它们归入革命阵营。帝国主义性质必须根据生产关系、垄断资本、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势力范围争夺和对内阶级统治来判断，而不能根据一个国家同华盛顿关系的好坏来判断。

无产阶级独立路线并不意味着对各国之间力量差别视而不见。美国仍然可能是许多地区最主要、最直接的外来压迫力量，具体斗争当然要区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但是，区分主要敌人不等于把次要敌人改名为朋友；在某一阶段集中反对美国，也不等于停止揭露俄罗斯和中国的阶级性质。革命策略要求分清主次，机会主义则利用主次关系取消原则。前者说，在当前具体斗争中集中打击主要敌人，同时保持对其他反动势力的政治独立；后者说，既然美国是主要敌人，就必须支持一切反美国家。

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懂得，暂时共同目标和长远共同道路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共同反对某次外国侵略，但不能因此承认这个政府代表无产阶级；可以反对美国封锁某国，同时继续支持该国工人反对本国资本家；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联盟，同时准备同其争夺领导权；可以利用俄美、中美矛盾为革命争取空间，同时绝不接受莫斯科或北京规定的国际路线。这正是无产阶级策略的复杂性，也是它同SOVINTERN式简单站队的根本区别。

独立路线还必须落实到组织资源问题上。革命组织如果长期依赖某个资产阶级国家提供资金、会议场地、媒体平台、签证便利、外交接待和政治保护，就会不可避免地承受路线压力。依赖关系不一定立即表现成直接命令，却会表现成自我审查：为了继续获得邀请，不再批判主办国；为了维持国际身份，不再公开讨论其帝国主义性质；为了保住资源，把原则分歧说成次要问题。最后，形式上的合作逐步变成政治从属。

因此，马列毛主义国际联系必须尽可能建立在各国革命组织自身力量和群众基础上。国际会议、刊物、网站、翻译、代表访问和互助工作，都应当主要依靠成员组织和劳动群众承担，而不是依靠某个大国国家机器。物质条件可能因此更加困难，发展速度可能更加缓慢，但这种困难本身就是保持政治独立的代价。一个资源贫乏却能够自由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网络，远比一个拥有巨大会议厅、总统贺信和先进数字平台，却必须服从国家外交的网络更有价值。

政治独立还要求实行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国际组织不能为了表面团结而禁止路线斗争，也不能把对主导力量的批判说成破坏统一。共产主义统一不是把分歧藏起来，而是在公开、严肃和有组织的斗争中区分正确与错误。对于帝国主义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战争、议会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复辟等根本问题，各组织必须明确表态并接受实践检验。没有这种路线斗争，所谓统一只能由资源最强、国家支持最多的一方决定方向。

SOVINTERN恰恰害怕这样的批评。如果允许参与者公开讨论俄罗斯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普京政权代表哪个阶级、中国是否仍是社会主义、普拉昌达是否背叛人民战争，那么它当前的组织联盟就会立即瓦解。它只能用反美、反北约和多极化这些最低共同口号维持团结，把更根本的分歧推迟或禁止讨论。这样的团结不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建立在集体回避问题基础上的和平共处。

马列毛主义者则必须采取相反做法。我们不能害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原则分化。错误路线如果已经存在，掩盖它不会产生团结，只会让错误路线掌握领导权；公开批判普拉昌达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阵营主义，不是制造分裂，而是在为真正统一清除障碍。第三国际的产生，本身就是同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决裂的结果。没有对旧机会主义的彻底批判，就不会有新的革命国际。

但是，反对机会主义不等于把所有有错误认识的人都当作不可争取的敌人。SOVINTERN内部和外围必然存在一些真诚反对美国战争、关心巴勒斯坦、古巴和被压迫人民、但尚未看清俄罗斯和中国阶级性质的党员、青年和群众。对这些人，马列毛主义者不能只进行辱骂和排斥，而应当通过事实、理论和共同斗争，耐心揭示阵营主义的错误。必须把机会主义领导层同受其影响的普通群众区分开来，把对路线的坚决斗争同争取群众结合起来。

在具体行动中，我们可以同这些力量共同反对美国制裁、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北约战争和抵制政治镇压，同时保留自己的旗帜、组织和宣传材料，公开说明我们也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不要求所有参与具体行动的人预先接受完整马列毛主义纲领，但绝不能为了参加共同活动而隐瞒自己的纲领。统一战线越广泛，独立宣传越重要；行动一致越必要，政治界线越必须讲清。

无产阶级独立路线还意味着不能把国际组织建设同各国革命实践分离。一个国际组织不是几个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俱乐部，而应当是各国革命实践相互联系和相互检验的形式。它的权威必须来自成员组织真实领导工人、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能力，而不是来自总统接见、国家数量或社交媒体影响力。一个党如果在本国不敢组织工人反对资本家，却在国际论坛上高喊反帝，它的国际主义必然是空洞的；一个组织如果不敢批判本国政府，却要求其他国家人民反对美国，也不可能代表无产阶级。

真正的国际联合应当交流的是如何建设革命党，如何在工厂、农村和城市贫民中工作，如何对抗国家镇压，如何开展工人夜校和政治教育，如何组织罢工和群众斗争，如何建设人民武装，如何处理合法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如何防止党内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路线篡权。这样的国际联系可能没有豪华会场，也不会得到总统欢迎，却能够真正增强各国人民的革命能力。

在组织原则上，未来的革命国际不能只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网络，也不能由某个大国政党或国家机构单方面控制。它应当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由各参加组织通过代表大会共同决定路线，建立可以被监督和罢免的领导机关，并实行适合实际条件的民主集中制。共同决定一旦形成，各成员应当承担执行责任；同时，任何国家或成员都不能因为资源较多、规模较大而垄断国际领导权。

这里尤其需要防止“大国党天然领导国际”的错误观念。一个党所在国家规模大、经济强或者国际影响力高，并不自动赋予它领导世界革命的资格。国际领导权只能来自正确路线、革命实践和为世界无产阶级服务的能力。中国修正主义政权即使控制庞大国家机器，也没有资格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罗斯即使拥有核武器和国际影响力，也不能因此成为世界反帝中心。把国家力量等同于革命领导权，本身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项观奇同志关于美、俄、中三国霸权主义力量相互勾结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分析，对坚持独立路线具有直接意义。它提醒我们，不能因为中俄同美国存在矛盾，就忘记它们之间同时存在合作、交易和共同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 无产阶级如果把国际战略寄托在某个大国同美国发生冲突上，就会在这些国家重新妥协时陷入被动。今天普京高喊反北约，明天可以同特朗普谈判；今天习近平批评美国霸权，明天可以同特朗普建立“战略稳定”。只有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和路线不会随着总统电话和外交交易而改变。

坚持独立路线，也意味着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阶级检验，而不是根据党名和国家符号作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社会主义，不能看执政党是否仍叫共产党，不能看国旗是否红色，也不能看政府是否引用马克思主义词汇，而要看生产资料由谁掌握，劳动者是否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是否存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国家机器服务于哪个阶级，以及国内是否允许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中国修正主义正是利用社会主义历史和共产党名称掩盖资本主义复辟，SOVINTERN又进一步把这种伪装传播到国际左翼。

因此，反对SOVINTERN也必须同反对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一个国际组织如果不能承认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帝国主义格局；如果把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说成社会主义成功，就必然把中国同美国的争霸说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如果接受这种错误判断，就会进一步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习近平的外交路线。理论错误、国际路线错误和组织依附由此连成一体。

同样，反对SOVINTERN必须同反对普拉昌达主义结合起来。普拉昌达路线说明，即使一个党曾经发动人民战争，如果放弃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和夺取政权的目标，也会逐步融入旧国家和大国政治。过去的革命功绩不能保证未来路线正确，领导人曾经讲过毛主义，也不能成为免受批判的护身符。国际组织如果不建立防止机会主义篡权的政治和组织机制，就可能重复尼泊尔革命的悲剧。

无产阶级独立路线还要求反对领袖崇拜式国际政治。SOVINTERN的政治叙事不断围绕普京、习近平以及各国知名政治人物展开，仿佛几个强势领导人能够凭借国家意志改变世界。马列毛主义当然承认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作用，但革命领袖的权威来自群众斗争和正确路线，而不是来自国家职位、军事实力或外交影响。普京和习近平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世界无产阶级。

真正的革命国际不能围绕某个总统或大国建立，也不能依靠对领袖个人的信任代替组织原则。它必须依靠各国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实行集体讨论和集中领导，使任何领导人都接受纲领、组织和群众监督。否则，所谓国际联合就会退化成围绕大国领袖的个人崇拜，所有理论解释都必须服从这些人物的现实政策。

从主要毛主义立场看，坚持独立路线还意味着坚持人民战争和夺取政权是革命的中心，而不是把国际工作变成同现存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各国革命道路具有具体差异，不能机械照搬单一形式，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解决武装力量和国家政权问题这一普遍原则不能被取消。一个国际组织如果只谈和平、发展、多极化和国家合作，却不谈怎样摧毁反动国家机器，就不是革命国际。

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组织只能讨论军事问题。群众组织、政治教育、经济斗争、反镇压运动、妇女解放、民族问题、生态斗争和国际声援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斗争必须同夺取政权的战略方向联系起来。否则，它们就会被资产阶级制度吸收，成为改善现存秩序的压力活动。SOVINTERN把大量精力投入声明、论坛和数字传播，却没有把这些活动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联系起来，因此其活动无论多么热闹，都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范围内。

建立真正国际革命联合，还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援助。援助不应由大国国家机器决定，而应由各国革命组织和群众共同承担。受到镇压的共产党、罢工工人、政治犯、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战争力量，应当获得宣传、法律、物质和政治支持。国际主义不是邀请领导人参加论坛，而是在革命者遭到逮捕、群众遭到屠杀和罢工遭到镇压时采取实际行动。

这种援助必须不附带大国外交条件。不能因为某个革命组织批判俄罗斯或中国，就拒绝声援其遭到的镇压；不能只支持符合中俄外交路线的运动，而忽视真正独立的群众斗争。国际主义的判断标准应当是阶级正义和革命利益，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朋友敌人名单。

因此，马列毛主义者面对SOVINTERN，不能采取“加入以后从内部改造”的幻想。它的国家资源结构、论坛组织形式、公开声明和理论方向，已经决定其政治中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力量薄弱的革命组织进入这样的网络，很难改变由俄罗斯国家和各国机会主义者掌握的整体方向，反而更可能因为资源和国际身份逐步被同化。所谓从内部斗争，如果没有独立力量作为基础，往往只是为机会主义平台提供革命装饰。

更正确的道路，是建立独立于SOVINTERN的马列毛主义国际联系，同时对其内部群众开展公开政治争论。我们不拒绝同任何诚实反帝者对话，也不拒绝在具体行动中合作；但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刊物、会议、理论文件、组织网络和国际行动，不能让普京祝贺的论坛代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存在清晰的革命替代方案，对SOVINTERN的批判才不会变成消极拒绝，而会成为争取国际领导权的积极斗争。

这一独立国际联合不能靠宣布一个宏大名称立即完成。它需要从具体工作开始：互相翻译理论文件和群众工作经验；建立稳定、可靠而安全的通信机制；共同调查各国阶级状况和帝国主义资本活动；组织针对政治镇压、战争、资本输出和修正主义的联合行动；培养能够进行国际工作的干部；在长期共同实践中检验各组织路线。真正的统一必须从斗争中生长，而不能由一次峰会和一张合影创造。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防止另一种极端，即把维护纯洁性变成拒绝一切合作的宗派主义。一个组织如果只同完全同意自己每一句话的人联系，就无法建立广泛反帝和群众统一战线，也无法争取处于中间状态的革命力量。原则坚定不等于策略僵硬，政治独立不等于自我孤立。马列毛主义的任务，是在不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团结人民，而不是把所有尚未接受完整纲领的人推到机会主义者一边。

独立路线因此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性表现为不承认任何资产阶级大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不放弃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阶级性质的批判，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的目标；灵活性表现为善于区分敌友主次，利用大国矛盾，在具体问题上同不同力量开展合作，并争取SOVINTERN影响下的群众。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避免成为大国附庸，也避免陷入狭小宗派。

所以，本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面对SOVINTERN，马列毛主义者不能用另一个国家阵营反对它，也不能用孤立主义回避它，而必须建立世界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既不属于华盛顿，也不属于莫斯科和北京；既不接受特朗普的自由帝国主义，也不接受普京的“多极世界”和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反对北约，也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既反对普拉昌达式议会投降，也反对用论坛和网络平台冒充革命组织。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以各国工人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为出发点，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共同目标，以马列毛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群众路线和革命实践为生命，以统一纲领、民主集中制和共同纪律为组织保证。任何合作都必须服务于这个方向，任何统一战线都不能牺牲这个方向，任何大国矛盾都只能被这个方向利用，而不能反过来支配这个方向。

SOVINTERN要求世界左翼在美帝国主义和中俄大国之间选择阵营；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回答：我们不选择任何资产阶级强盗，我们选择世界无产阶级。SOVINTERN把希望寄托在普京、习近平和所谓多极世界上；我们把希望建立在工人、农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斗争上。SOVINTERN试图用总统贺信和国际论坛制造一个虚假中心；我们的任务则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建设一个真正能够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联合。

第十一部分：结论——撕下SOVINTERN的红色面具，支持ICOR，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综上所述，SOVINTERN绝不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国际，也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走向统一的革命起点。它所展示出来的，不是世界无产阶级摆脱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控制、重新组织起来的伟大前景，而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国家力量、中国修正主义意识形态资源、各国议会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左翼和投降派共同拼凑起来的一场政治闹剧。

它借用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历史光环，却抽掉了这些名称背后的阶级内容；它高喊反帝国主义，却把帝国主义缩减为美国一家；它宣扬国际主义，却要求各国左翼服从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外交；它谈论世界革命，却没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组织人民夺取政权的共同纲领。

判断SOVINTERN的性质，不能停留在它发表了多少反美声明、邀请了多少外国代表、会场上出现了多少红旗，也不能因为它声援过巴勒斯坦、古巴和遭到镇压的活动人士，就放弃对其总体路线的分析。一个机会主义组织完全可以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提出正确口号，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也完全可能在同竞争对手发生矛盾时支持某些正义诉求。问题始终在于：这些行动最终是为了发展世界人民的独立革命力量，还是为了替某个大国积累外交资本？是把被压迫群众组织成历史主体，还是把他们引向对“进步强国”和“多极化领袖”的依赖？

SOVINTERN已经用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立场给出了回答。它的舞台由俄罗斯现存国家政治力量搭建，开幕得到普京公开祝贺，核心活动由俄罗斯议会党、国家杜马人物、体制内学者和各国合法政治人物推动；它能够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议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保持模糊，却能在支持俄罗斯国家战争叙事和所谓多极世界的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它缺少革命纲领，却不缺外交立场；缺少群众斗争的统一行动，却不缺对大国政策的共同声明；缺少领导各国工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却不缺替普京和习近平塑造反霸权形象的宣传资源。

这正是SOVINTERN最虚伪的地方。普京和习近平一面同特朗普谈判、交易和协调，一面又借助所谓国际反帝网络塑造自己反对特朗普和美国霸权的形象。习近平可以在北京同特朗普规划所谓“战略稳定”，谋求稳定贸易、资本和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普京可以同特朗普保持直接沟通，把俄美矛盾作为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问题处理。与此同时，SOVINTERN却在国际左翼面前高喊反美、反北约和反法西斯，把俄中两国装扮成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天然领导者。

何其虚伪！在同特朗普谈利益时，他们是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家；在动员左翼群众时，他们又变成反帝斗士。在需要美国市场、技术、外交妥协和战争安排时，他们大谈对话、稳定与合作；在需要世界人民支持中俄扩大国际影响时，他们又放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的口号。他们既要坐在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谈判桌旁，又要让世界劳动人民相信自己是反对这张谈判桌的革命力量；既要做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共同管理者，又要盗用世界革命的语言给自己涂脂抹粉。

项观奇同志对美、俄、中三大霸权主义力量关系的分析，帮助我们穿透了这层虚假的阵营划分。他指出，美、俄、中三国之间并不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营，而是既争夺又勾结、既冲突又交易、共同参与世界重新瓜分的反动大国关系。 从这一角度看，SOVINTERN不是同习特会、普特会谈和大国分赃政治相对立的革命力量，而是这种政治的意识形态补充。前台由总统进行谈判，后台由机会主义者高举红旗；前台划分市场、能源、领土和势力范围，后台再把这些交易包装成反霸权、多极化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

因此，说SOVINTERN是普京和习近平联手导演的政治闹剧，并不只是对一次会议的情绪化评价，而是对其政治功能的阶级概括。普京所代表的俄罗斯国家力量提供舞台、资源和最高政治背书；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国修正主义路线则通过中俄战略叙事、体制内理论资源和所谓社会主义中国形象，为这个平台提供另一部分合法性。各国议会政客、民族主义左翼、网络机会主义者和普拉昌达投降派，则分别承担演员、宣传员和国际群众场面的角色。它们之间即使没有一份公开的共同导演合同，也在维护中俄大国利益、反对无产阶级独立革命这一点上形成了现实配合。

普拉昌达领导政党的参加，更把这场闹剧的机会主义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普拉昌达曾经依靠人民战争和无数工农群众的牺牲取得政治威望，后来却把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变成进入旧国家机器的谈判资本，自己反复担任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理。如今，他领导的政党又进入普京祝贺、俄罗斯议会党主持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网络。这条道路的逻辑十分完整：在国内，把人民战争交给资产阶级议会；在国际上，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交给大国外交；过去用毛主义装饰议会投降，今天再用国际主义装饰对俄中阵营政治的依附。

这也说明，SOVINTERN并不是孤立的组织偏差，而是当代国际机会主义多种形式的汇合点。这里有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有把多极化说成世界革命的阵营主义，有把参加旧国家政府说成革命新道路的普拉昌达主义，有把网络宣传说成数字游击战的技术机会主义，也有把议会人物和国家学者的国际会谈说成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外交机会主义。它们使用不同语言，却都回避同一个根本问题：无产阶级怎样夺取国家政权。

一切修正主义最终都要在政权问题上暴露自己。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坚持，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权，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防止资产阶级重新篡夺党和国家。

SOVINTERN却把现存俄罗斯国家视为反帝力量，把中国修正主义国家视为社会主义成功经验，把普拉昌达进入旧国家视为可以接受的革命发展。它不准备打碎这些国家机器，而是要求世界左翼支持它们；不准备组织工人夺取政权，而是邀请工人相信大国领导人会通过谈判和多极平衡创造更好的世界。

这不是革命，而是对革命的解除。它把群众的主动性让给总统，把国际战略让给外交官，把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让给大国国家机器，把共产党降格为国家政策的宣传者。人民只需要投票、转发、参加论坛、声援声明和支持“进步国家”，不再需要建立自己的党、自己的革命力量、自己的群众根据地和自己的政权。SOVINTERN口头上把革命语言说得震天响，实际政治却把无产阶级从历史主体的位置上赶了下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反对SOVINTERN的同时，必须明确支持一切真正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推动各国革命政党和组织独立联合的国际协调力量。就此而言，我们支持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支持它加强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支持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支持它推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声援和共同斗争。

我们支持ICOR，首先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永远处于相互隔绝、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面对跨国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和各国反动国家的联合压迫，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同样需要国际协调。各国革命党和组织应当交流群众工作经验，支援遭到镇压的同志，协调反帝反战行动，共同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各国阶级斗争。任何真正希望重新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都不能拒绝这种国际联合的必要性。

我们支持ICOR，也因为这种国际协调不应当建立在服从任何资产阶级大国外交的基础上。真正的革命国际联系不能依附华盛顿，不能依附莫斯科，也不能依附北京；不能因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就把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美化成革命力量；也不能因为某个大国能够提供会场、资金和国际曝光，就把国际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这个大国。我们支持ICOR朝着独立于一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方向发展，成为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共同协调斗争的平台，而不是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外围组织。

我们对ICOR的支持，不是无原则的吹捧，也不是认为其中已经不存在路线分歧。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革命国际协调，必须允许并组织严肃的理论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革命路线同议会机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阵营主义之间的界线。

支持ICOR，不意味着取消对其中具体错误观点和路线的批判；恰恰相反，真正的支持，就是推动它更加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独立性，更加坚决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更加深入地同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结合起来。

ICOR不应当模仿SOVINTERN，不应当以能够邀请多少著名议员、国家官员和政治名人为成功标准，也不应当把扩大网络变成降低原则。它必须依靠真正从事群众斗争、遭受国家镇压、组织工人农民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和组织，而不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它的国际权威应当来自成员组织的革命实践、理论斗争和群众基础，而不是来自任何总统贺信或资产阶级议会的认可。

我们希望ICOR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同时，也能够坚决揭露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在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侵略、占领和封锁的同时，也坚持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独立路线；在建立广泛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把统一战线变成对民族资产阶级、议会政客或大国政府的政治投降。

真正的国际联合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各国革命组织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可以根据各自国情采取不同斗争形式，但都必须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和国家政权，承认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之一。没有这些基本方向，国际联合就只能沦为外交论坛；坚持这些基本方向，国际协调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实际力量。

因此，我们支持ICOR，不是把它当成已经完美完成的“新共产国际”，而是支持它作为各国革命党和组织加强国际协调、推动共同斗争的重要阵地。它的未来取决于成员组织能否坚持革命原则，能否深入群众斗争，能否拒绝帝国主义大国的收编，能否通过路线斗争不断克服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我们希望ICOR更加积极地支持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支持中国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力量反对修正主义统治，也希望中国革命者通过自身的斗争和实践，为ICOR和世界革命作出应有贡献。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同SOVINTERN的路线彻底决裂。它不能以支持俄罗斯反对美国为中心，也不能以支持中国崛起为中心，而必须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为中心。美国工人必须反对美国金融资本、军工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俄罗斯工人必须反对俄罗斯垄断资本、寡头集团和普京国家机器；中国工人必须反对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统治。只有建立在这种独立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国际联合，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者当然要区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要在具体反战、反封锁、反侵略和反镇压行动中同广泛力量进行合作。但是，任何策略合作都不能改变政治领导权。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变成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反对北约，不能变成支持普京；反对美国围堵中国，不能变成替习近平的资本主义复辟辩护；声援巴勒斯坦、古巴和受压迫民族，也不能变成要求他们依赖俄中大国保护。

真正的统一战线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由俄罗斯国家或中国修正主义国家领导。革命者可以同SOVINTERN中的普通成员和诚实反帝人士开展具体合作，可以支持它提出的某些正义要求，也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公开辩论；但必须保留独立组织、独立纲领和独立宣传，明确说明共同反对某次美国侵略，并不等于承认俄罗斯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力量。否则，统一战线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争取群众的工具，而会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收编革命者的工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能用宗派主义回答SOVINTERN。简单地拒绝一切接触、辱骂所有参加者，只会把许多真诚反对美帝国主义、但理论上仍然混乱的青年和群众留给机会主义者。必须区分领导路线和普通群众，区分有意识的投降派和受到错误路线影响的诚实反帝人士。对普拉昌达等机会主义领导层要进行彻底的理论和政治批判，对被他们欺骗的群众则要开展耐心争取。

这种争取不能靠空洞的纯洁性宣言，而必须提出真正的国际革命替代方案。支持ICOR的意义，也正在于推动这一革命替代方案成长。我们要通过ICOR以及其他真正革命的国际联系，发展共同刊物、翻译网络、安全通信、干部交流、群众工作经验总结和反镇压支援机制。各国组织应当共同研究帝国主义资本流动、跨国企业剥削、战争和国家镇压，支持真实的罢工、土地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把国际工作缩减成领袖合影和外交声明。

未来真正的革命国际，不能由国家规模和军事实力决定领导权，也不能由谁能提供最大会场和最多资源决定方向。它必须建立在共同的马列毛主义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实际革命斗争基础上。它应当通过原则斗争同现代修正主义、普拉昌达主义、议会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也应当在共同实践中不断检验各组织是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

这样的国际联合不会得到普京、习近平、特朗普或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的祝贺。相反，它必然受到所有反动国家机器的敌视和镇压。因为它不会帮助某个大国改善国际形象，而会组织这个大国内部的工人推翻统治阶级；不会为某个国家的战争政策提供红色包装，而会组织劳动人民反对制造战争的资产阶级；不会把社会主义变成国家发展模式，而会重新把社会主义恢复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消灭阶级的革命事业。

这才是共产国际革命遗产的真正含义。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它曾经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而在于它试图把各国共产党组织成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力量；不在于它得到一个大国的外交支持，而在于它依托的是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今天的俄罗斯不是苏维埃俄国，普京不是列宁，“公正俄罗斯”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用共产国际的名称给俄罗斯资产阶级国家外交贴金，只能证明机会主义者已经把革命历史降格为政治商标。

所以，我们对SOVINTERN的最终结论是明确的：它不是新的共产国际，而是新的修正主义国际；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而是俄中大国机会主义的国际宣传平台；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体系的组织，而是要求世界左翼在帝国主义强盗之间选边的阵营主义网络；不是要把人民从大国政治中解放出来，而是要把人民重新编入普京和习近平的外交队伍。

我们拒绝SOVINTERN，支持ICOR，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国际联合，而是因为我们要求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不是因为我们忽视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危险，而是因为我们反对利用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替其他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开脱；不是因为我们拒绝策略和统一战线，而是因为我们反对把策略变成投降，把统一战线变成大国收编，把灵活性变成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

今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确实需要重建，需要克服分散、宗派主义和理论混乱，也需要建立能够协调世界革命的国际中心。ICOR已经为各国革命党和组织的国际协调提供了一个重要阵地。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它神化，而是支持它、参与它、建设它、通过原则斗争推动它更加革命化，使它真正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共同斗争的国际力量。

这个国际中心绝不能由普京搭台、习近平路线配合、普拉昌达之流登台演出。它只能从各国工人、贫农、妇女、青年和被压迫民族的现实斗争中产生，只能从真正的共产党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路线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只能从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产生。

让普京、习近平和特朗普继续在他们的谈判桌上进行交易吧；让各国机会主义者继续在SOVINTERN的会场上表演吧。我们的道路不在总统热线、不在国家杜马、不在资产阶级议会，

也不在所谓多极大国为世界人民安排好的新秩序中。我们的道路在工厂、矿山、农村、学校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发展中，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也在以ICOR为重要阵地的革命党和组织国际协调之中。

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新的主人，也不需要在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选择一个较好的主人。世界无产阶级需要的是自己的党、自己的革命力量、自己的国际联合和自己的政权。我们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既反对特朗普，也反对普京和习近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既反对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反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大国机会主义。

撕下SOVINTERN的红色面具，揭露这场由大国国家利益、议会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共同组织的政治闹剧，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重新建设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第一步。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从普京、习近平和普拉昌达之流手中夺回来，重新交到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手中。

反对美帝国主义！

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

反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

支持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

加强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的国际团结！

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

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国际！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纪念马克思诞辰208周年

第一部分：马克思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特里尔。208年过去了，资产阶级世界仍然不断试图把马克思改造成一个温和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问题研究者，仿佛他一生所做的，不过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史、商品和货币，为后来的大学教授留下几部可以反复注释的著作。他们可以承认马克思“很有思想”，可以承认他对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作出过某些深刻观察，甚至可以把他的画像挂进博物馆和大学课堂，却绝不愿意承认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马克思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把自己全部理论工作和全部生命献给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战士。

马克思的理论从来不是同现实斗争相分离的。对他来说，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研究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事业，而是无产阶级认识敌人、组织自身和改变世界的武器。他研究资本，不是为了帮助资本家更加有效地管理企业；他研究国家，不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政府设计更加合理的制度；他研究历史，也不是为了满足书斋里的好奇心。马克思所追问的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必然产生剥削和危机？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成为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工人阶级怎样从分散、受压迫的劳动者，成长为能够夺取政权、消灭阶级的革命阶级？

因此，马克思的一生不是一条安稳的学术道路，而是一条同资产阶级社会不断冲突的革命道路。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因为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宗教统治和社会不平等而遭到政府审查。《莱茵报》被查封以后，他被迫离开德国；在巴黎参加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后，又受到普鲁士政府压力，被法国当局驱逐；在比利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又遭到逮捕和驱逐。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公开支持民主革命和工人斗争；革命失败以后，他再次被迫流亡，最后长期居住在伦敦。

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如此害怕一个所谓“学者”？不是因为马克思写作艰深，也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观点过于抽象，而是因为他的理论直接指向现存制度的灭亡。他不是要求统治者做一些小修小补，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统治具有历史暂时性；不是请求资本家更加仁慈，而是揭示资本只能通过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存在；不是把国家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机构，而是指出国家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的理论一旦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会变成能够动摇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工人群众之上，以一个旁观者或者救世主的姿态替无产阶级设计理想社会。他同恩格斯一道深入当时的工人运动，研究各国工人的斗争经验，参与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设。1847年，他们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受同盟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不是一篇远离实际斗争的哲学论文，而是一个革命组织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自己目标、理论和政治立场的纲领性文件。它公开说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它公开号召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并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全文。

《共产党宣言》的意义，正在于它第一次以完整而明确的形式，把科学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以前，也有人批判贫富不平等，也有人幻想建立公平社会。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把新社会寄托在开明人物的设计、富人的良心或者少数人的实验之上。马克思却说明，共产主义不是某个天才头脑发明出来的理想，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和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社会不是由某位救世主赐予人民，而只能由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行动创造。

这就是马克思同一切资产阶级慈善家和社会改良家的根本区别。慈善家看到贫困，便提出向穷人施舍一些面包；改良家看到工人劳动时间过长，便希望通过温和立法稍加限制；自由主义者看到专制制度，便要求扩大选举和言论自由。马克思并不否认工人争取眼前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意义，但他指出，只要资本家仍然占有生产资料，只要工人仍然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剥削关系就不会因为统治阶级偶尔让步而消失。无产阶级必须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把争取个别改善提高到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

马克思不仅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也直接投入1848年革命。他通过《新莱茵报》分析革命中的各阶级力量，揭露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独立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怯懦和反动，支持群众把革命推向前进。他并没有因为当时德国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求工人阶级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无条件服从自由资产阶级。恰恰相反，他不断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参加现实的民主斗争，同时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和阶级纲领，不能把革命领导权交给必然同旧反动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

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没有退回个人生活，也没有把失败解释成群众不够成熟，从此放弃革命。他同恩格斯一道总结革命经验，研究法国革命和阶级斗争，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议会制度和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

他的理论不是在胜利时高喊口号、失败时便消失的理论，而是在失败中分析失败原因、为新的革命积累经验的理论。正是在这种不断总结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阶级联盟和国家政权的认识不断发展。

马克思流亡伦敦以后，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没有稳定收入，经常无力支付房租、购买食物和治疗疾病，几个孩子也在贫困和疾病中夭折。恩格斯长期以自己的收入帮助马克思一家，才使马克思能够继续从事理论和革命工作。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把这些困难描述成一个天才个人的悲剧，却回避了其政治原因：马克思之所以长期贫困，不是因为他缺乏才能，也不是因为他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找到体面的职业，而是因为他拒绝把自己的才能出售给统治阶级，拒绝用沉默和妥协换取安稳生活。

他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受到尊敬的教授、律师或者报刊作者，却选择成为一个被多个国家驱逐、被警察监视、生活贫困的职业革命家。他没有因为家庭和个人苦难而放弃事业，也没有为了进入上流社会而修改自己的立场。正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完成了《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组织工人运动，撰写国际文件，并持续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

1864年，马克思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他为第一国际起草成立宣言、章程和大量重要文件，努力把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传统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第一国际中既有工会活动家，也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其他政治派别。马克思没有为了维持表面团结而放弃原则，而是一方面推动各国工人在现实斗争中互相支援，另一方面同反对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和鼓吹小生产者幻想的错误路线展开斗争。

这一经验说明，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几个著名人物之间的友好交往，也不是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和交换礼节，而是各国工人阶级在共同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中建立实际联合。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压低工资、破坏罢工和争夺市场，工人同样必须越过国界进行组织和支援。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必须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以工人自身的解放为目的，而不能服从任何资产阶级大国的外交利益。

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态度，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他的革命立场。巴黎工人起义、建立公社以后，欧洲资产阶级和许多所谓民主人士都对工人的革命行动感到恐惧。马克思却坚定支持公社，并通过《法兰西内战》总结其历史经验。他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建立同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不同的新型无产阶级政权。

马克思没有因为公社失败而否定巴黎工人的行动，也没有站在事后聪明的立场上指责群众不应当起义。他既高度评价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伟大尝试的历史意义，也严肃分析它没有及时进攻反革命中心、没有控制银行等错误。他对革命的态度，既不是轻率浪漫主义，也不是失败主义，而是把支持群众革命同总结具体经验结合起来。革命的失败不能证明革命不可能，只能要求革命者更加深入地研究如何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每一个重大理论发现，都同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密不可分。唯物史观使工人认识到社会制度不是永恒的，而是由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决定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国家学说说明无产阶级不能依靠旧国家机器实现解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指出，各国工人的共同利益高于资产阶级制造的民族对立。这些理论不是为了完善一套学术体系，而是为了回答革命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资产阶级思想界今天愿意承认马克思是“伟大思想家”，却竭力否认他是革命导师。这是因为一个被限制在大学课堂里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会造成危险；一个被解释成研究贫富差距和经济危机的社会科学家，也可以被资本主义制度部分吸收。

关于我们：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政党，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cpcmlofficial.com/
订阅我们的报纸：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向者可通过以下邮箱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只有当马克思重新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当《资本论》不再只是学术研究对象，而成为工人认识剥削的武器，当《共产党宣言》不再只是历史文献，而成为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时，马克思主义才会恢复它真正的力量。

现代修正主义同样试图阉割马克思的革命性。它们在大会和纪念活动中悬挂马克思画像，却把阶级斗争改成社会和谐，把无产阶级革命改成和平发展，把无产阶级专政改成所谓全民国家，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国家调控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它们可以举办盛大的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可以修建纪念馆、出版文集和引用名言，却不允许工人独立组织起来反对资本，更不允许无产阶级挑战现存国家机器。

这种纪念不是对马克思的继承，而是对马克思的利用。统治阶级希望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无害的文化符号，用他的名字证明自己仍然具有社会主义合法性，同时彻底否定他的革命结论。他们赞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问题的批判，却声称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引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却回避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他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却把一切有利于官僚垄断资本发展的国家政策都解释成马克思主义创新。

真正纪念马克思，首先就必须把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学术和修正主义国家的纪念仪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温和批评者，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不是帮助统治阶级治理危机的顾问，而是帮助无产阶级利用危机发动革命的导师；不是主张贫富双方互相理解的道德思想家，而是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斗争理论家。

马克思的伟大，不只在于他预见了资本主义会产生垄断、危机和贫富分化，更在于他发现了能够结束这种制度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同时，由于大工业把无数工人集中起来、训练起来并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又具有推翻资本统治、消灭一切阶级的历史可能。马克思把这种处于客观地位上的阶级力量变成了有明确目标和科学理论的革命主体。

因此，马克思不是站在工人阶级外部同情工人的知识分子，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同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的革命者。他所追求的不是由少数理论家替群众建立幸福社会，而是无产阶级自身成为统治阶级，并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解放整个人类。正如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所强调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争取。

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诞辰208周年，绝不能只讲他如何刻苦学习、如何写出伟大著作，也不能把纪念活动变成背诵名言和展示知识。纪念马克思，就要重新恢复理论同革命实践的联系；就要让工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被动受害者，成长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大学讲台、国家仪式和修正主义官僚手中夺回来，使它重新成为工厂、矿山、农村、学校和一切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武器。

马克思的一生已经向我们表明，真正的革命理论家绝不是躲避斗争的旁观者。理论的价值必须在群众实践中得到证明，革命者的立场也必须在面对驱逐、贫困、镇压和失败时经受检验。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留下追求个人成功的道路，而是留下了一种完全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精神：在胜利尚未到来时坚持真理，在群众力量尚未充分觉醒时组织群众，在反动势力看似不可战胜时研究它必然灭亡的条件。

208年过去了，马克思仍然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只要资本继续占有劳动的产品，只要工人仍然被迫出卖劳动力，只要资产阶级国家仍然保护剥削制度，只要帝国主义仍然瓜分和压迫世界人民，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历史作用就没有结束。纪念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不是为他建立一座更加宏伟的雕像，而是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组织无产阶级，继续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继续推进他尚未完成的世界革命事业。

第二部分：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第一次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以前，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宗教把世界归结为神的创造，把社会制度解释为上帝的安排；唯心主义哲学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观念、精神或者某种超越现实世界的绝对理念；资产阶级历史学则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和政治精英的个人传奇。马克思彻底推翻了这些解释世界的旧观点，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科学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指出，世界首先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人的意识、宗教信仰或者某种神秘力量的产物。自然界并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是否相信某种宗教而改变自己的运动规律。太阳不会因为人类祈祷而升起，大海不会因为帝王命令而停止潮汐，社会的发展同样不依赖任何个人的幻想和愿望，而有着自身客观存在的规律。正因为世界具有客观规律，人类才能通过实践不断认识这些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

这一思想具有彻底的革命意义。几千年来，统治阶级总是试图告诉人民：贫富是天命，王朝是神授，剥削是自然，压迫是不可改变的命运。当资本主义建立以后，资产阶级又把市场、竞争和资本统治描绘成永恒存在的人性法则，仿佛资本主义从来如此，也将永远如此。马克思则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也必然随着这些条件的发展而走向灭亡。

马克思不仅坚持唯物主义，而且把辩证法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仍然被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发展运动；马克思则指出，真正发生运动和发展的不是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思想不是世界发展的主人，而是现实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正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充满矛盾和运动，人类认识也必须不断发展、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套静止僵硬的教条，而是一种不断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

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没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任何阶级能够永远存在。资本主义看似强大，但它内部始终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国家看似稳固，但它始终建立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基础之上；帝国主义看似控制世界，却不断因为争夺市场、资源和利润而走向战争和危机。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矛盾理解为偶然现象或者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矛盾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而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发展。资本主义之所以不断爆发危机，不是因为资本家偶尔犯了错误，也不是因为政府政策偶尔失败，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包含着无法消除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革命者主观幻想出来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认识来源的理解。过去的唯心主义认为，真理来自先验观念、神的启示或者少数天才人物的思考。马克思指出，人类的一切认识最终都来源于社会实践。人们首先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在劳动中积累经验，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的认识，并根据新的实践修正旧的认识。脱离实践的理论，无论写得多么优美，都只能停留在空想之中；只有能够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这一观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共产党不是依靠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智慧领导革命，而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群众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丰富理论。理论离开实践，就会变成教条主义；实践离开理论，就容易陷入盲目性和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二者始终保持统一。

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类社会首先必须解决生产生活资料的问题，然后才会发展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和文化。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思想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地位不同，也必然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资产阶级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因为私有制保证了它们的统治；无产阶级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因为自身处于被剥削地位。思想从来不是悬浮在社会之上的，它始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今天，资产阶级仍然试图掩盖这一点。他们宣称媒体是中立的，法律是全民的，道德是超阶级的，国家是所有人的共同国家。然而，当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时，媒体往往站在资本一边；当人民反抗压迫时，法院和警察维护的是资本家的财产权；当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时，大量所谓中立知识分子又立即站出来替本国统治阶级辩护。这一切都证明，思想、制度和国家始终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利益。

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不仅要学习理论，更要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一切社会现象。评价任何一种思想，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而要看它代表谁的利益；评价任何一项政策，不能只看它使用了什么漂亮口号，而要看它维护了哪个阶级；评价任何一种制度，也不能只看它自称民主还是社会主义，而必须分析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国家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劳动人民是否真正成为社会主人。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世界观，使社会主义第一次摆脱了空想和道德说教，成为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从此以后，无产阶级不再需要依靠救世主，不再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良心，也不再等待统治阶级主动让步，而是能够运用科学理论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认识自身历史使命，组织群众、发动革命，并最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208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虽然拥有比十九世纪更发达的科技、更庞大的金融体系和更加复杂的国家机器，却依然无法摆脱经济危机、战争、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相反，在资本统治下，它们进一步成为加强劳动控制、扩大资本积累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新工具。这更加证明，决定社会性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国家政权服务于哪个阶级。

真正纪念马克思，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运用阶级分析认识现实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揭露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把马克思留给世界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真正转化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

第三部分：唯物史观揭开了阶级社会发展的秘密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改变了人们理解历史的方法，更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以前，历史往往被解释为英雄人物的活动史、帝王将相的功业史，或者宗教、道德和观念不断发展的历史。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某位伟大人物出现了，某种新的思想传播了，或者某位君主实行了英明政策。马克思则彻底颠覆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他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必须生产维持自己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法律、艺术、哲学和宗教活动。因此，人类历史首先不是思想的发展史，而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

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如何组织劳动，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则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观念。当生产力不断发展，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时，社会矛盾便不断积累，最终推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因此，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少数统治者凭借个人意志创造出来的，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唯物史观使无产阶级第一次能够科学地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也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不会永远存在。封建社会并不是因为国王突然变坏才灭亡，也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才结束，而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已经无法继续在封建制度束缚下发展。同样，资本主义也不会因为资本家突然失去道德而灭亡，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不断发展，使这一制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当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化性质，而生产资料却仍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时，这种矛盾最终必然要求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阶级不是一种道德评价，也不是文化身份，更不是个人收入多少的问题。阶级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的地位。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获得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售劳动力维持生活。正因为二者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根本不同，它们之间就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这种对立不是某些资本家更加善良便能够消失，也不是通过慈善事业或者有限改革便能够解决，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决定的。

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全部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说历史上只有战争和冲突，而是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发展，都伴随着不同阶级之间围绕生产资料、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展开的斗争。从奴隶主和奴隶，到封建地主和农奴，再到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其基本阶级矛盾，而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唯物史观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并不是超越阶级的中立力量。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服务于一定阶级的统治需要。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生产资料，也掌握教育、媒体、文化和政治机器，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一个社会普遍流行什么观念，并不能证明这些观念就是客观真理，而必须分析它们服务于哪个阶级、维护哪种社会关系。

放到今天来看，这一分析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贫困被解释成个人努力不足，当失业被解释成劳动者缺乏竞争力，当住房危机被解释成市场暂时波动，当工人罢工被描述为扰乱社会秩序时，我们就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这些说法背后的阶级立场。唯物史观要求我们透过各种政治口号和媒体宣传，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而不是停留在现象本身。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第一次摆脱了空想和愿望，建立在对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它告诉无产阶级，自己的贫困不是命运安排，也不是个人失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自己的解放不能依赖统治阶级的施舍，而必须通过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去改变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解释历史的方法，更是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历史使命、坚定革命方向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四部分：《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秘密

如果说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资本论》则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运行的秘密。

马克思耗费四十多年心血，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分析，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真正来源，也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利润和市场的种种神话。从《资本论》诞生以来，资产阶级可以修改自己的政策，可以不断创造新的金融工具，可以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但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无法推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科学结论。

资产阶级经济学始终宣称，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之上。资本家自由投资，工人自由就业，双方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因此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剥削。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拥有平等权利，商品按照价值进行交换，资本家的利润似乎只是经营能力、风险承担或者管理才能的回报。然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恰恰隐藏在这种看似平等的交换之中。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和价值的本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而是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都凝结着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不是商人的主观定价，也不是市场参与者随意决定的，而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客观经济关系。货币也不是凭空创造财富的工具，而只是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

真正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前提。工人表面上是自由的，他既不属于任何奴隶主，也不属于任何封建地主；但与此同时，他又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不断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看起来同购买其他商品没有区别，似乎也是按照价值进行公平交换。然而，劳动力这种商品具有其他商品所没有的特殊性质：它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新价值。

工人在一天劳动中，首先创造出相当于自己工资价值的劳动成果，这部分劳动称为必要劳动；但是，劳动并不会因为工人的工资已经得到补偿而停止。工人还要继续劳动，为资本家创造超过自己工资价值的新价值，这部分无偿劳动就是剩余劳动，由此形成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产阶级全部财富，最终都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资本家自己的劳动。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发生的，不是资本创造财富，而是劳动创造财富；不是机器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不断积累资本，并不是因为资本本身具有神秘力量，而是因为资本掌握了生产资料，从而能够不断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成果。资本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而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支配劳动、占有剩余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具有不断增殖自身的内在冲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每一个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更新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纪律，以便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并不存在一个”满足”的时候，它永远要求更多利润、更高积累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从来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实现价值增殖。劳动人民需要住房、医疗、教育和食品，并不能决定资本是否生产；真正决定生产的是利润。

资本积累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越来越多的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并，大企业不断兼并小企业，金融资本控制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财富，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大资本集团手中。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却不断失去生产资料，越来越依赖出售劳动力维持生活。这一过程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停止，而是在今天表现得更加集中。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产业链，金融资本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平台资本垄断数据和市场，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资本集团，而世界劳动人民却面临更加普遍的不稳定就业、债务压力和生活成本上涨。

资产阶级长期宣传，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自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马克思却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和科学技术首先服务于资本，而不是服务于劳动者。机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本来意味着劳动时间可以缩短、劳动条件可以改善、社会财富可以更加丰富。但是，在资本统治下，机器往往成为加强劳动控制、提高劳动强度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工具。资本家利用机器延长劳动过程、加快劳动节奏、降低劳动力价值，并制造大量相对过剩人口，从而进一步压低工资、削弱工人的谈判能力。

这一分析在今天仍然完全适用。互联网、自动化生产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本来有能力使劳动人民摆脱大量重复劳动，获得更多自由时间。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技术更多地被用于监控劳动过程、算法管理、平台控制和降低劳动成本。外卖骑手被算法不断催促，仓库工人受到实时数据监控，工厂流水线节奏不断加快，办公室职员则面对全天候数字管理。技术越先进，资本控制劳动的能力反而越强。这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技术首先服从利润，而不是服从人民。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断生产贫困。资本积累越发展，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劳动者处于失业、半失业和不稳定就业状态。资本为了降低成本，总是在不断创造所谓”产业后备军”，利用失业人口压低在职工人的工资和待遇。资产阶级一方面炫耀社会财富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却不断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劳动强度、扩大贫富差距。这种现象不是偶然，而是资本积累规律本身的结果。

今天，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粮食足以养活全人类，住房建设能力远远超过现实需求，医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科学技术足以使劳动时间大幅缩短。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大量食品被浪费，而数亿人口长期营养不足；城市中存在大量空置住房，同时许多人无家可归；药品和医疗技术高度发达，但大量劳动人民因为支付不起费用而失去治疗机会；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劳动人民却不得不面对更高房租、更高债务、更长劳动时间和更加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一切再次证明，《资本论》所揭示的不是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科技进步而自动消除剥削，不会因为金融创新而摆脱危机，也不会因为资本家更加文明而放弃剩余价值生产。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本手中，只要劳动仍然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主义剥削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贫困不是个人失败，失业不是个人能力不足，经济危机也不是市场偶然失灵，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克服的结果。劳动创造了一切财富，资本却占有了劳动创造的财富；社会生产越来越具有共同劳动和社会协作的性质，而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这种根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既创造了消灭自身的物质条件，也创造了能够推翻自身的社会力量——现代无产阶级。

因此，《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革命著作。它使工人阶级第一次科学地认识到资本统治的秘密，也使无产阶级第一次能够以科学理论为武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本质，并坚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8年后的今天，《资本论》依然是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埋葬资本主义最锋利的思想武器。

第五部分：资本主义危机证明这个制度没有永恒生命

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长期宣称，市场能够自动调节一切，竞争能够不断推动社会繁荣，只要政府采取正确政策，经济危机便可以避免。然而，从十九世纪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到今天，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却不断证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战争危机，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危机却没有消失；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反而更加尖锐。这充分说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事故，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对于资本家来说，商品不是为了让人民使用而生产，而是为了出售并实现价值增殖而生产。只要能够获得利润，资本便不断扩大投资、扩大生产；一旦利润下降，即使社会仍然存在大量现实需要，资本也会停止生产、关闭工厂、裁减工人。人民是否需要住房、食品、药品和教育，并不能决定资本是否继续生产；真正决定资本行动的，是利润率和资本增殖。

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服从利润，而不是服从社会需要，所以资本主义内部始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各个资本家在竞争压力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希望通过更多商品获得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创造了全部社会财富，却只能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工资。资本为了增加剩余价值，不断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而劳动人民购买商品的能力却因此受到限制。结果便形成一种看似荒谬却完全符合资本主义规律的现象：社会不是因为生产太少而发生危机，而是因为生产太多却卖不出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危机首先表现为生产过剩。但是，这里的生产过剩并不是人民已经得到充分满足，而是商品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购买能力而言发生过剩。劳动人民仍然缺乏住房、医疗、教育和食品，却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无法购买商品；与此同时，大量商品积压在仓库，大量机器停止运转，大量工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因为人民需要得到满足而停止生产，而是因为商品不能继续带来利润而停止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历史荒谬。

危机发生以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便进入连锁反应。商品卖不出去，资本不能实现价值，企业资金回流中断，债务无法偿还，银行收紧贷款，信用体系受到冲击，大量企业破产，更多工人失业，劳动人民收入进一步下降，市场需求继续萎缩，从而形成更加严重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能够推动资本迅速扩张，而在危机爆发时，又会迅速放大整个经济体系的震荡，使局部困难演变为全面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是管理失误造成的，也不是某一个资本家或者政府犯错造成的。每一次危机爆发以后，资产阶级都会寻找各种具体原因：有人说是房地产泡沫，有人说是金融监管不足，有人说是货币政策错误，有人说是国际局势变化。然而，这些具体原因只能解释危机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某一种形式下爆发，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危机总是反复出现。马克思指出，真正决定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资本不断追求利润同劳动人民消费能力受到限制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成熟，这种矛盾表现得越明显。今天，全世界已经形成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市场，跨国垄断公司控制着生产、运输、金融和贸易，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现代科技使劳动生产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摆脱危机，相反，每一次危机都比过去影响更加广泛。金融资本可以在几秒钟内跨越整个世界，危机也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波及多个国家；房地产市场崩溃能够迅速传导到银行体系，银行危机又进一步影响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最终使亿万劳动人民承担资本危机带来的后果。

资产阶级政府面对危机，通常采取各种所谓救市措施：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向银行提供流动性、救助大型企业、扩大财政赤字等等。这些措施有时能够暂时延缓危机的发展，却不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因为政府能够提供货币，却不能创造剩余价值；能够暂时维持金融市场，却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被推迟以后，新的资本泡沫往往进一步扩大，债务不断累积，资本更加集中，下一次危机也因此更加严重。

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过程。在危机中，大量资本被毁灭，生产资料闲置，商品价格下降，竞争失败的小资本不断破产，大资本趁机兼并更多企业，劳动人民则承受失业、降薪和生活困难。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恢复利润率，为下一轮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因此，每一次危机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自己的基本矛盾，而只是进入新的积累周期，并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准备条件。

危机还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同人民需要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劳动人民创造巨大财富，却无法分享劳动成果；当危机爆发时，劳动人民又首先承担失业、降薪和生活成本上涨的后果。资本家在繁荣时期占有利润，在危机时期又要求国家和人民共同承担损失。利润属于资本，风险却转嫁给劳动人民，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真实的阶级本质。

今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饥饿人口，而食品却被大量浪费；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大量家庭无力购房，而无数房屋却长期空置；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仍有许多人因为贫困得不到治疗；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足以大幅缩短劳动时间，但劳动人民反而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加严重的就业不稳定。这不是因为社会财富不足，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只能按照利润组织生产。

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绝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相反，它一次又一次证明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曾经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这是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但是，当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而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极少数资本集团手中时，资本主义便逐渐从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丰富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创造了越来越深刻的社会危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创造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战争危险。

马克思主义并不把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立即灭亡的信号。危机本身不会自动带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会因为一次危机便自然退出历史舞台。危机只是进一步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建立革命政党，组织广大劳动群众，才能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机遇。否则，资本主义完全可能通过战争、通货膨胀、债务转嫁和加强国家镇压等方式，把危机代价继续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208年后的今天，《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科学分析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不断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越疯狂发动战争、扩大金融垄断和资本输出，就越说明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能够结束经济危机、结束失业、结束贫困和战争的，不是更加高明的资本主义管理，而是结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当生产真正服从人民需要，而不是服从资本增殖；只有当劳动人民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而不是继续受资本支配，人类才能最终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不断重复的历史循环，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社会。

第六部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马克思主义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最根本的分歧之一，就在于对国家本质的认识。资产阶级长期把国家描绘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代表，把政府、议会、法院、警察和军队说成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社会公平的中立机构。即使不同政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资产阶级也始终试图让人民相信，国家本身高于阶级，高于社会矛盾，只要通过选举、更换政府或者修改法律，就能够逐步解决社会问题。

马克思彻底揭穿了这种幻想。他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国家产生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阶级之后，是为了维护一定生产关系和一定阶级统治而形成的特殊强制机关。

当社会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后，为了维持现存统治秩序，就必须建立常备军、警察、监狱、法院、官僚机构和税收体系，这些共同构成了国家机器。因此，国家从来不是超越阶级之上的公共仲裁者，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在奴隶社会，国家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国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国家虽然披上了普选、议会、宪法和民主的外衣，但其根本任务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运行。无论政府由哪个政党组成，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国家机器最终都要维护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统治。

马克思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相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在封建制度下，人民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一定范围内的普选制度，为无产阶级组织和斗争创造了新的条件。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始终具有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它承认人民在投票日形式上的平等，却掩盖了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统治；它允许劳动人民每隔几年选择统治自己的代表，却不允许劳动人民真正决定社会财富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以及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中。

这一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明显。选举可以更换政府，却不能改变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议会可以讨论法案，却不能取消资本家的利润要求；法院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把侵犯资本财产权视为最严重的罪行；警察宣称维护公共秩序，却首先镇压罢工、示威和群众反抗。当劳动人民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裁员或者反对战争时，资产阶级国家往往立即暴露其真实面目。国家机器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维护社会稳定，而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

巴黎公社的经验，使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国家理论。1871年，巴黎工人在革命中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虽然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多天，但它向全世界证明，劳动人民不仅能够反抗资产阶级，而且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管理自己的社会事务。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总结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

这一结论具有划时代意义。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共产党通过选举取得多数席位，就可以逐步利用现有国家机器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却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它拥有自己的军队、官僚体系、司法制度和利益集团，不可能自动变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如果不打碎旧国家机器，只是在其中更换少数领导人，那么资本主义统治便会通过旧国家机构不断恢复自己的力量。

因此，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国家政权的根本变革。革命的中心问题，不是谁担任部长、总统或者议员，而是谁掌握国家机器，哪个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改造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改革便没有可靠保障，资产阶级也必然利用经济实力和旧社会影响不断恢复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把这种新的国家形式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长期故意歪曲这一概念，把它描绘成少数人专横统治甚至个人独裁。然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是个人统治，而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多数，对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实行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国家里长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却把这种统治包装成民主；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则公开承认国家具有阶级性质，并把国家用于消灭剥削制度本身。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不会因为革命胜利就自动接受失败，他们会利用资金、国际联系、文化影响甚至武装暴力进行复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卫革命成果，防止资本主义恢复，同时逐步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为最终消灭阶级创造条件。只有当阶级和阶级对立最终消失以后，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才会逐步失去存在基础，走向消亡。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科学性。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议会自然发展到社会主义，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同时，这些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仅仅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能够自动巩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新的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始终存在。正是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马克思关于国家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各种改良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仍然不断宣扬所谓和平过渡、全民国家、阶级合作和议会社会主义。他们希望劳动人民相信，只要不断扩大福利、加强国家干预、完善民主制度，就能够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不断证明，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本手中，只要国家机器仍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无论政府如何更替，劳动人民都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某些改革，可以接受部分财富再分配，却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国家机器和阶级统治。

因此，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它告诉无产阶级，不要把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国家自身的改革，不要幻想旧国家机器能够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具，更不要把国家理解为超越阶级的公共机构。革命的根本问题始终是政权问题，是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自己的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靠的政治基础。

纪念马克思，就必须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国家不是中立的，阶级斗争不能通过道德劝说结束，资本主义也不会依靠议会投票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为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历史条件。这正是马克思留给世界无产阶级最重要、也是最具有革命意义的政治遗产之一。

第七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以及分析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的重要结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个历史过渡时期，而这一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结论不是某种临时策略，更不是个别人意志的产物，而是由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只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只要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思想影响尚未彻底消灭，无产阶级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保卫革命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并最终创造消灭国家本身的历史条件。

资产阶级长期故意歪曲“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把它解释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或者简单等同于个人独裁、暴力统治和政治高压。然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质。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统治另一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这种专政常常披着议会民主、普选制度和法治国家的外衣。当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资本私有制、镇压工人运动、维护资本积累时，这种专政却被包装成所谓全民民主。马克思则公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同样需要建立维护劳动人民利益、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新型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因为革命胜利便自动消失，旧社会形成的经济关系、思想观念、国际资本力量以及被推翻的剥削阶级，都将继续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失去政权以后，并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利用资本、技术、文化影响、国际联系乃至公开暴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承担保卫革命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还承担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变化，更意味着整个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国家必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步消灭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使劳动真正从谋生手段逐步发展成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困基础上的平等，而是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财富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

马克思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立即结束。相反，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阶级斗争往往表现得更加复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失。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面对公开反抗的旧剥削阶级，也要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防止旧制度因素重新发展壮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理想状态。

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阶级差别逐步消失，生产资料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财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也将逐渐失去存在基础。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国家不再作为镇压工具存在，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重要历史桥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把国家神圣化，也反对否认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是把国家看作具有历史性的社会现象。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使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革命实践既证明了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出现新的问题等新的历史课题。围绕这些问题，不同革命实践形成了各自的经验和总结，也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今天，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国家作用和社会发展的讨论仍然十分广泛。无论如何理解具体历史经验，马克思关于国家具有阶级性质、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历史过渡阶段、社会制度不能脱离现实物质条件突然完成变革等基本观点，依然构成理解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纪念马克思，就意味着认真研究这些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逻辑体系，而不是把它们简单化为几个政治口号。只有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

第八部分：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争取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之一，就是他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解放。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原则不仅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原则，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不能依靠任何救世主，也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府、开明资本家或者少数政治精英身上。人民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自己进行斗争，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马克思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力。他认为，历史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中共同创造的。任何伟大的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革命理论，都不能脱离群众而独立存在。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不是因为党员天然比群众更加高明，而是因为共产党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分散的群众组织成为有共同目标、有共同纪律、有共同理想的革命力量。共产党不能代替群众革命，更不能脱离群众发号施令；党的全部力量都来源于群众，也必须服务于群众。

因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救世主思想。历史上，无论是宗教还是资产阶级政治，都不断制造各种救世主神话。宗教告诉人民等待神灵降临拯救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则要求人民相信总统、首相、议员或者某位改革家能够代表人民改变社会。马克思则指出，任何个人都不能代替一个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即使最伟大的革命家，也只能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进行革命。离开人民群众，再正确的理论也会失去现实力量；离开人民群众，再伟大的领袖也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同样反对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少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实验。在马克思以前，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理想社会方案，希望依靠富人的善心、启蒙宣传或者建立若干模范社区，逐步改变整个社会。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却没有发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某个天才头脑设计出来的蓝图，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历史结果，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新社会。社会主义不是别人赠送给工人的礼物，而是工人自己争取来的胜利。

这一思想决定了马克思始终高度重视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工人阶级虽然由于共同劳动而集中起来，但如果没有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他们仍然可能停留在分散状态，只围绕工资、工时和生活待遇展开局部斗争，而不能认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从自在阶级发展成为自为阶级，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从争取局部利益发展到争取整个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并没有轻视经济斗争。相反，他高度评价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认为这是工人组织起来的重要学校。但是，他同时指出，如果工人运动始终停留在经济斗争阶段，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不会受到根本动摇。资本家今天可以让步一点工资，明天又可能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裁员或者通货膨胀重新夺回利润。只有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维护眼前利益同争取夺取政权结合起来，工人运动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这也正是共产党存在的历史意义。共产党不是一个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集团，而是无产阶级最先进部分组成的革命组织。它的先进性，不是来源于地位和权力，而是来源于科学理论、坚定革命目标和同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共产党必须不断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一切劳动人民中间，把群众在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为理论，再把理论重新运用于群众斗争，不断提高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

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不断削弱劳动人民的组织能力。有人宣扬个人奋斗，认为贫困只是个人能力不足；有人宣扬消费主义，把人生目标变成不断追求商品和财富；有人把政治完全交给职业政客，把人民降格为投票机器；还有人利用互联网制造碎片化舆论，使劳动人民沉迷于各种热点和娱乐，而忽视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阶级关系。这些现象虽然表现形式不断变化，但都在削弱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使劳动人民难以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

因此，纪念马克思，就必须重新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根本原则。真正的革命不是等待别人来拯救自己，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自己建立革命组织，自己开展群众斗争，自己夺取国家政权。任何脱离群众的革命，都不会取得真正胜利；任何不能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运动，也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208年过去了，马克思留给无产阶级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正是这种坚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革命思想。资本主义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统治形式，现代修正主义也可以不断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但都无法改变一个根本事实：历史最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依靠无产阶级自己去实现。只有当亿万劳动人民真正组织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第九部分：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马克思的一生不仅属于德国，也不仅属于欧洲，而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从《共产党宣言》最后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伟大号召，到第一国际的建立，再到他一生始终关注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充分说明，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孤立完成的事业，而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共同事业。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把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天然具有世界性。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和扩张，市场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商品、资本、劳动力和金融逐步形成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不断寻找新的原料产地、新的销售市场和新的投资空间，把越来越多国家和民族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帝国主义时代到来以后，垄断资本更加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资源、劳动力和势力范围，使世界经济联系空前紧密，也使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面临越来越共同的命运。

正因为资本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必然具有国际性。如果资本能够跨越国界压低工资、转移生产、输出资本和发动战争，而工人仍然局限于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那么劳动人民便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马克思主义要求工人阶级超越民族、语言和国界的限制，把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作为最高利益，把国际团结建立在共同的阶级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制造的民族对立基础之上。

马克思始终反对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煽动劳动人民相互敌视。每当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统治阶级都会要求劳动人民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民族荣誉或者文明使命互相残杀。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同国家的工人并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真正从战争中获利的，往往是垄断资本、军工资本和统治阶级，而普通劳动人民却承担流血、贫困和破坏的代价。因此，马克思主义始终要求劳动人民坚持阶级立场，反对利用民族主义掩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否认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支持遭受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因为民族压迫本身也是维护剥削制度的重要手段。一个民族如果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就难以形成独立发展的条件，也不利于劳动人民开展阶级斗争。因此，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矛盾，而是统一于反对压迫和争取人民解放这一共同目标之中。

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反对把民族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无论哪个国家，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阶级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同劳动人民存在共同反对外来压迫的目标，但这种共同利益并不能消除阶级矛盾，更不能取消无产阶级争取独立领导权的必要性。国际主义要求各国共产党既坚持支持人民反对侵略和压迫，也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立场，不把工人阶级变成任何资产阶级集团的附庸。

今天，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的科学性。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产业链，金融资本能够迅速流动，国际市场彼此联系，各种经济危机、战争冲突和环境问题都具有明显的跨国特点。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劳动人民的斗争，都越来越同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斗争相互联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一步证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不是一种道德愿望，而是现代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要求。

正因为如此，各国革命力量之间的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支持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国家革命者可以结合各自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加强理论交流，开展国际声援，共同反对战争、压迫和剥削。这种国际联系，应当始终建立在无产阶级独立立场和革命原则基础之上，以促进劳动人民的共同解放为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任何国家或统治集团的利益。

纪念马克思诞辰208周年，就必须继承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制度，劳动人民的团结也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只有坚持国际团结，坚持各国劳动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斗争，坚持把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置于狭隘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之上，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历史号召继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十部分：捍卫马克思，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

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成为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不断攻击、歪曲和篡改的对象。资产阶级曾经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把它污蔑为乌托邦和危险思想；然而，当马克思主义不断影响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各种现代修正主义开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进行系统篡改，保留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保留社会主义的形式，恢复资本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套抽象的哲学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它的全部理论，都围绕着一个根本目标展开，那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只要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便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无论保留多少马克思主义术语，都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首先篡改的，就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而现代修正主义却把阶级斗争改写成阶级合作，把资本家和工人的根本利益说成可以长期协调一致，把社会主义解释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与共赢。他们要求工人相信，只要资本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只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只要劳资双方加强沟通，资本主义便能够不断完善，最终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基本原理。

他们篡改的第二个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利用旧国家机器，而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然而，现代修正主义却把国家描绘成全民共同利益的代表，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可以和平改造，把议会道路说成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降低为政府换届，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写成所谓全民民主，把共产党变成普通议会政党，把革命变成渐进改革，把推翻资本主义变成管理资本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还系统篡改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服从社会需要，而不是资本增殖。然而，修正主义却把国家资本主义包装成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市场关系长期合法化，把利润原则重新确立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他们保留社会主义的名称，却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保留共产党执政的形式，却允许资本支配劳动；保留红旗和马克思画像，却让资本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社会主义的外壳依然存在，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却不断被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

更重要的是，现代修正主义往往利用马克思的威望来反对马克思本人。他们在纪念活动中引用马克思，在学校讲授马克思，在各种官方文件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却同时否定马克思关于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他们把马克思描绘成主张社会和谐、共同富裕、和平发展和全民合作的思想家，而故意回避《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关于革命和国家问题的根本论述。这种做法，比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欺骗性，因为它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声望来削弱马克思主义本身。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不断出现新的机会主义思潮。有的把议会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有的否认革命政党的先锋队作用，有的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还有的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简单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把支持某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包装成国际主义。这些不同形式虽然表现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逐步放弃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独立革命的基本立场，使工人阶级重新依附于资产阶级政治。

因此，纪念马克思208周年，不仅要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反对一切利用马克思名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真正继承马克思，不是简单重复他的个别词句，而是坚持他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他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方向，坚持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现代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只有不断同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展开原则斗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实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新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才能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使马克思留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十一部分：纪念马克思的最好方式，是继续他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208年前，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特里尔；208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仍然统治着世界大部分地区，帝国主义战争仍然不断爆发，亿万劳动人民仍然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这说明，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历史课题。纪念马克思，绝不能停留在鲜花、雕像、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之中，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变成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武器，把马克思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马克思一生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几部经典著作本身，而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革命道路。他告诉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只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他告诉劳动人民，资本主义的一切财富都建立在工人的剩余劳动之上，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永远存在；他告诉革命者，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组织广大劳动群众，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结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的现实意义。

今天，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经济，跨国垄断集团支配国际市场，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数字经济不断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变得更加合理，反而进一步暴露出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劳动人民面对更加严重的不稳定就业、债务负担和生活压力，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市场、资源和战略利益不断制造战争和冲突。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今天表现得更加集中、更加国际化。

这也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特有的历史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科学技术进步而自动走向社会主义，也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偶尔进行改革而消灭阶级压迫。只要资本继续统治劳动，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只要国家机器继续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就不会结束。

因此，真正纪念马克思，就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背诵的经典语录，也不是大学课堂上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更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世界，把理论同今天的工人运动、群众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真正纪念马克思，还必须深入劳动群众之中。马克思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今天的革命者同样不能脱离群众。无论是工厂工人、物流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还是广大农民、青年学生和一切劳动人民，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把群众在现实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再把革命理论变成群众自己的思想武器，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

真正纪念马克思，也必须加强革命组织建设。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阶级，并进一步组织成为政党。没有革命组织，无产阶级就只能停留在自发斗争阶段；没有革命政党，群众斗争便难以形成统一领导和明确方向。因此，建设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的共产党，始终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培养革命干部，发展群众组织，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世界各国革命力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今天，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球体系，无产阶级革命也需要加强国际联系。我们支持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进一步加强各国革命力量之间的交流、团结和共同斗争，支持国际工人运动相互学习、相互声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剥削和现代修正主义。同时，我们也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独立立场，坚持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坚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纪念马克思，还意味着必须同一切现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展开长期斗争。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一门不断发展的革命科学；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更不能借发展之名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真正的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不断丰富革命理论；真正的继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向，而不是利用马克思主义名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208年前，马克思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208年后的今天，世界无产阶级仍然肩负着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责任。马克思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仍然等待全世界劳动人民去继续完成。

因此，纪念马克思，不只是为了缅怀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更是为了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再次宣告：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终点，共产主义不是遥远幻想，无产阶级革命仍然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业。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资本统治，仍然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仍然存在剥削、压迫和贫困，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马克思开创的事业就不会停止。

让我们继承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国际主义，坚持群众路线，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继续奋斗。

马克思主义万岁！

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

支持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

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纪念文化大革命60周年

第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六通知》，随后爆发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最具争议的政治运动之一。六十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赞同者还是批评者，都无法否认它对中国现代历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脱离它所处的历史背景，不能把它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意志，更不能脱离当时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而必须放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中进行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人所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一个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和殖民侵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时期取得了重要的国家建设成果，也为后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一个新的问题逐渐摆在执政党面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将沿着怎样的道路继续前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是否已经结束？国家机器、党的组织以及干部队伍如何避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经济建设、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也是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普遍讨论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格局仍在持续，国际局势高度紧张，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理论分歧和政治分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济发展模式、国际战略以及共产党执政方式，各种不同观点不断出现，并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政策讨论和社会氛围。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到自身建设，也被置于更广泛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之中。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国家管理体系日益扩大，干部队伍规模迅速增长，社会运行越来越依赖各级党政机关。一些干部作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关注，如何加强群众参与、改进干部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些问题，不同意见和不同政策主张逐渐出现，也构成了后来政治运动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第二部分：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主要目标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么理解这场运动，就必须首先了解它在当时所提出的主要政治目标。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仅仅依据最后的发展结果进行判断，也不能脱离其最初提出的问题和目标。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试图回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实课题，并希望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当时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是否已经结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旧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围绕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国家机器和党的组织是否可能出现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会发生新的变化等问题，当时存在着不同认识。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讨论背景下展开，并把这些问题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位置。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特权思想，希望通过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加强对干部工作的监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思路中，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也被赋予监督国家机关和干部队伍的重要角色。这一理念反映了当时对于如何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如何保持革命精神等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政治参与方式的一种探索。

文化大革命还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也涉及教育、文化、文艺以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发展。因此，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广泛讨论和社会参与，推动这些领域发生新的变化。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对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解，即社会制度的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建设，也需要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

除此之外，当时还提出，要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希望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增强劳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在这种设想中，群众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这一目标体现了当时关于扩大群众政治参与、增强群众主人翁意识的一种探索。

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目标都需要依靠相应的制度安排、组织方式和社会条件来实现。一个目标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其实现过程一定符合最初设想；一种政治理念，也可能在具体实践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同结果。因此，研究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目标，既要了解当时试图解决哪些现实问题，也要进一步分析这些目标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展开、取得了哪些经验、又遇到了哪些困难。这也正是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基础。

六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梳理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简单重复当时的政治口号，也不是为了脱离历史背景进行抽象评价，而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当时人们试图回答哪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以及这些课题为什么会在那个历史时期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种历史分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及其历史背景。

第三部分：群众运动与国家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参与的一次历史探索

文化大革命同中国此前历次政治运动相比，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政治参与规模空前扩大。大量青年学生、工人、干部以及社会各界群众，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发表意见和政治活动，国家政治生活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既反映了当时对于扩大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对国家机构运行、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带来了深远影响。

在当时的设想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依靠各级党政机关进行管理，更要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群众不应只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还应积极参与监督干部、讨论公共事务，并通过各种形式表达意见。这种思路强调群众路线，希望避免干部脱离基层、脱离劳动群众，使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始终保持广泛的社会参与。

随着运动不断展开，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社会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参与公共讨论和政治活动。群众通过集会、辩论、宣传等形式表达意见，围绕国家建设、干部作风、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管理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这种广泛参与，使政治生活在短时间内具有很高的社会动员程度，也使大量此前很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开始关注国家和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大规模群众运动也给国家机构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原有行政管理、教育教学、企业管理以及社会治理，在不同地区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一些地方仍然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运行，而另一些地方则因为组织关系复杂、意见分歧扩大等原因，出现了管理困难和社会秩序受到冲击的情况。这些不同情况说明，群众广泛参与政治与国家日常治理之间，如何实现有效协调，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群众参与政治具有积极意义。广泛的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增强社会责任感，也能够使基层声音更容易进入公共讨论。然而，群众参与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制度运行中的所有问题。如果缺乏稳定、规范和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同意见之间可能难以及时协调，公共管理也可能面临新的压力。因此，如何既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又保持社会正常运行，始终是现代国家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支持者强调，它反映了劳动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干部和关心国家发展的积极探索；批评者则指出，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实践中也暴露出组织协调、制度保障和社会运行等方面的困难。今天研究这一历史阶段，应当区分历史背景、具体实践和历史影响，避免用单一结论概括全部复杂过程。

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这一阶段，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如何不断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如何保持党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如何在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同时，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这些问题并不仅属于某一个历史时期，也始终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需要认真回答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下，文化大革命关于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探索，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历史价值。

第四部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实践及其历史影响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既不能脱离政治背景，也不能忽视这一时期经济、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实际情况。只有把不同领域的发展放在同一历史框架下考察，才能较为全面地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重要工业化建设。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发展，中国已经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一批重点工业部门逐步建立起来，国家开始具备独立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这些基础，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活动的继续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不同地区政治运动的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各地区经济运行状况也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地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保持了相对稳定运行，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也有一些地区因组织调整、社会秩序变化等原因，生产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这说明，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不能简单用单一结论概括全部情况。

工业建设方面，一批重大基础工业项目继续推进，能源、钢铁、机械、化工、交通运输等领域保持发展，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体系进一步扩展提供了一定基础。同时，中国在航空航天、国防科技以及部分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些发展表明，即使在复杂政治环境下，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仍然持续进行。

农业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继续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各地在农田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推广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不同地区积累了各自的发展经验。与此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管理方式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农业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教育、科研和文化领域则经历了更加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教育机构、科研单位和文化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面向基层医疗、农村教育以及技术推广等新的实践形式。这些不同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解释。今天回顾这一时期，需要尽可能结合历史资料，具体分析不同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能忽略其复杂性。

从更长历史周期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运动相互交织。一方面，中国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长期建设项目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政治运动对部分行业、教育科研以及社会运行造成了明显影响。这种复杂局面提醒我们，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任何一方面发生重大变化，都可能对其他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重新研究这一历史阶段，并不是为了简单得出”全部成功”或”全部失败”这样的结论，而是希望通过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的历史分析，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政治实践之间相互影响的经验。历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评价过去，更在于帮助后来者更加深入理解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复杂规律，为未来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思考。

第五部分：文化、教育与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及其历史影响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不仅因为它是一场政治运动，也因为它深刻影响了教育、文化、文艺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教育制度、文化建设、知识分子作用以及社会风气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对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文化创作和社会秩序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六十年后的今天，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既需要关注当时提出的问题，也需要分析这些实践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影响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学校教育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教学秩序、课程设置和招生方式都经历了调整。教育不仅被视为传授知识的过程，也被赋予培养社会责任感、劳动观念和公共参与意识等多重目标。当时围绕教育如何服务社会、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学校与生产劳动如何联系等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这些讨论反映了人们希望改革传统教育模式、探索新的教育理念的愿望。

与此同时，教育工作的正常运行在不少地区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部分学校停课、教学安排调整、科研活动变化等情况，使教育体系面临较大压力。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发展状况并不完全一致，也成为后来研究这一时期教育史的重要内容。今天回顾这些历史，应当区分改革目标、具体政策和实际效果，结合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概括为单一结论。

文化和文艺领域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围绕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文化创作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等问题，当时展开了广泛讨论。一些文艺作品强调劳动人民、基层群众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也推动了部分文化资源向基层传播。同时，不同历史研究也指出，这一时期部分文化创作、出版活动和学术研究受到限制，对文化多样性和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生活的复杂图景。

医疗卫生和基层公共服务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实践。基层医疗、公共卫生宣传以及面向农村和基层地区的医疗服务得到一定发展，使更多地区获得了基本医疗资源。这些实践在改善基层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成为后来公共卫生发展史中经常讨论的内容。同时，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和组织能力存在差异，各项政策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需要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风气和公共生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量群众更加关注国家事务和社会问题，公共讨论程度显著提高，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同时，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传统习惯、组织方式和人际关系也发生变化。在不同地区，这些变化既有积极探索，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和组织协调困难。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很难用简单的评价概括全部历史经验。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关于教育改革、文化建设和社会参与的一系列探索，提出了一些长期值得思考的问题：教育应当如何兼顾知识传授与社会实践？文化建设如何既保持活力，又鼓励多样发展？公共参与如何在制度框架下更加有序地展开？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历史阶段的结束而完全消失，而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回答的重要课题。

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研究。既要看到这一时期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和社会实践，也要重视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产生的影响。坚持以史实为基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理解这一阶段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位置，并从中总结具有历史价值的经验与启示。

第六部分：国际环境中的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广泛影响

文化大革命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发展，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处于冷战时期，世界被不同政治阵营所划分，各国共产党、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在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中国国内发生的这场政治运动，很快超出了中国本身，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重要事件。

在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社会主义组织以及左翼知识界都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一部分组织认为，中国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参与政治以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讨论方向；也有一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式、政治实践及其社会影响提出了不同意见。围绕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由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长期讨论的重要议题。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也更加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反殖民、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当时许多新独立国家仍然面临经济发展困难和国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中国同部分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新的外交联系，并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医疗合作。这些活动，使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国际影响力有所扩大，也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国际形象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立场以及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对这一历史事件提出了各自的分析和评价。一些研究强调它在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中的意义，也有研究更加关注其对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教育文化产生的影响。随着更多历史资料不断公开，围绕文化大革命的国际研究也不断丰富，形成了更加多元的历史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影响了国际左翼思想的发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社会运动，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希望从中寻找新的社会改革和政治参与模式。同时，也有不少左翼组织经过实践和观察，对其中一些做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反思。这些不同反应说明，文化大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并没有形成单一评价，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理解。

从今天回顾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不仅属于中国现代史，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冷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应，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同共产党之间以及世界左翼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关系，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

六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历史课题。坚持尊重历史事实，结合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背景进行具体分析，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更加深入、更加客观的研究与讨论。

第七部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评价——坚持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围绕这场运动的历史评价便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文化大革命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历史影响深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者以及不同政治立场，对这一事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六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文化大革命，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固定结论代替对历史本身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一时期进行了系统总结。与此同时，国内外历史学界围绕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随着历史资料不断丰富，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越来越强调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地区实践以及不同阶段变化之间的区别，而不是用单一概念概括整个十年历史。

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看，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始终存在不同观点。有些研究更加关注这一时期群众政治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以及国际影响；也有研究重点分析政治运动、社会运行、教育文化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不同观点之间既存在分歧，也共同推动了对这一历史事件更加深入的研究。这说明，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具有复杂性，需要不断依靠史料、实践和历史研究加以认识，而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背景作出简单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历史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发生的，也不能脱离当时国内外社会条件进行评价。文化大革命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受到当时国际环境、国家发展阶段以及社会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既要看到它试图解决哪些历史课题，也要研究这些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哪些经验、遇到了哪些困难以及产生了哪些历史影响。

历史评价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未来提供借鉴。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历史事业，不可能依靠一次运动或者一种政策完成全部任务。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群众参与、干部作风以及国家治理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历史研究价值；与此同时，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运行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认真总结。只有把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六十年后的今天，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史，也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研究不断深化。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正因为如此，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也应当坚持尊重史实、尊重历史条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断丰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

历史不会因为争论而停止前进，也不会因为简单肯定或者简单否定而获得真正理解。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坚持以史实为基础，坚持全面、具体、发展的分析方法，既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体现。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八部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六十年，但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历史阶段的结束而完全消失。相反，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治理、群众参与、干部作风、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仍然是今天许多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因此，纪念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不应停留于简单重复历史结论，而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历史事业，不可能通过一次政治运动或者一种政策安排彻底完成。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社会发展具有长期性和阶段性，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以后，仍然会不断遇到新的矛盾和新的任务。任何社会制度的发展，都需要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变化不断完善自身制度，提高治理能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探索的一种历史实践。

其次，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历史经验说明，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国家发展、监督干部工作，对于增强社会活力、改进工作作风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群众参与也需要建立在稳定、规范、有效的制度基础之上，使人民依法、有序、持续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水平。如何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次，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始终具有现实意义。随着国家建设不断发展，各级管理机构不断扩大，如何保持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如何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基层等现象，始终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历史经验表明，加强调查研究、倾听基层意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长期重要意义。这些问题不仅属于特定历史时期，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

文化大革命时期围绕教育、文化和社会建设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同样留下了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教育如何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文化建设如何服务人民群众，公共资源如何更加均衡地配置，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如何实现更加协调的发展，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虽然不同历史阶段采取的具体政策各不相同，但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对于推动教育改革、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仍然具有启发作用。

历史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参与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协调统一。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群众参与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制度建设也需要不断回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任何一个方面脱离其他方面，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平衡。因此，总结历史经验，应当坚持系统思维，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加以研究，而不能孤立看待其中某一个方面。

六十年后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段重要历史，其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在于简单重复过去，而在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不断丰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尊重历史事实，也尊重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现实和未来负责。

第九部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长期课题——从文化大革命到新时代的历史思考

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社会主义建设所面对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不断演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如何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依然是长期存在的重要课题。纪念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重新思考这些长期课题，而不是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理解为已经结束的一段历史。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形态，而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新旧社会因素长期并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处于不断发展和调整之中。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依靠一次运动解决全部问题，也不能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便不存在新的矛盾，而必须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推动发展。

社会公平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要提高社会生产力，也要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促进公共资源更加合理配置，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一目标并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独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努力的重要方向。

劳动者权益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劳动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如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劳动者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形态不断变化，这一课题也需要结合新的实际情况不断研究和完善。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也是长期历史任务。现代社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公共事务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保持制度运行稳定，成为现代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既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也需要不断健全制度，使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

文化大革命时期围绕群众监督、干部作风和社会参与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也提醒后来者重视国家治理中民主参与的重要意义。如何保持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如何不断提高公共决策透明度和社会参与程度，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历史发展而失去现实意义，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呈现新的形式。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社会环境，制度完善需要循序渐进，群众参与需要规范有序，社会改革也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发展条件。历史经验表明，现代社会的发展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坚持统筹兼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历史事业。它既需要坚持社会公平、人民主体地位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目标，也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治理能力，适应新的经济社会条件。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脱离实践不断完善自身。文化大革命所留下的一些讨论和思考，虽然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课题的部分内容，仍然具有值得继续研究和深入思考的价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在实践中认识和发展真理，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思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则。

第十部分：坚持实事求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用抽象的道德判断代替历史分析，也反对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简单化、绝对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恩格斯同样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无数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它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加以分析。

历史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而不是让事实服从预先设定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涉及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历史阶段，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不同政策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不同历史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更具有明显区别。如果脱离这些具体历史条件，只用一个简单结论概括整个历史过程，无论是全部肯定还是全部否定，都难以完整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应当放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中进行考察。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孤立发生的，也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建设而存在的，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建设、国家制度发展以及国际环境变化都有密切联系。同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在这一历史基础上继续展开的。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受到前一阶段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后一阶段的发展。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应当把它放到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整体过程中进行理解。

坚持实事求是，还意味着既不能神化历史，也不能把历史妖魔化。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既包含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探索，也可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局限。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要求革命者回避历史中的困难和错误，而是要求通过科学分析，总结经验、认识规律，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因为发现历史中的问题就否定整个历史阶段，也不会因为坚持某种政治立场而拒绝面对客观事实。只有把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求我们坚持发展的观点。社会不是静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事业，而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中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一些历史课题，在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继续以新的形式出现；一些历史经验也在后来的改革、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新认识。这说明，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只是解释过去，更重要的是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新的历史资料不断公开，国内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也不断深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教育史、地方史、口述史等不同研究方法，使人们能够从更多角度重新认识这一历史阶段。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观点差异，是历史研究中的正常现象。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讨论，而是主张在尊重史实基础上开展科学讨论，通过不断积累史料、深化研究，使人们对历史形成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认识。

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坚持实事求是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也需要不断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只有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的重要标准，才能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这种科学态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

因此，纪念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不应当成为重复历史争论的终点，而应当成为继续开展历史研究的新起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应当坚持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一切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则。只有不断回到历史本身，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也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十一部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纪念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失去意义。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也不是为了重复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希望通过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历史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在建立之后立即达到成熟完善，而必须经历长期探索、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会取得新的成就，也会遇到新的问题；既需要坚持正确方向，也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教条主义的重要特点。

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一些历史课题，例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保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如何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如何推进社会公平、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如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至今仍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今天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简单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所面对的长期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更加符合现实需要的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也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协调推进。任何重大改革和社会发展，都需要充分考虑历史条件、社会基础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坚持循序渐进、实事求是，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研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纪念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还意味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实践检验认识，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不是宣传材料，也不是政治标签，而是需要不断研究、不断丰富认识的人类共同经验。只有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也才能真正做到从历史中学习历史。

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次行动，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如此，它既需要坚定理想，也需要科学方法；既需要坚持人民立场，也需要尊重客观规律；既需要总结成功经验，也需要认真面对实践中的困难和不足。只有坚持这种科学态度，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今天，世界仍然面临贫富差距扩大、劳动者权益保障、公共资源配置、国际和平与发展等诸多挑战。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关于社会公平、人民主体地位和共同发展的讨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长期问题，并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六十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应停留于情绪化争论，而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成为今天和未来的财富，而不是分裂社会、固化偏见的工具。

历史属于过去，但经验属于未来。纪念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重复过去，而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历史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贡献新的力量。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

永存的原则，深刻的教训 ——永远不能忘却的对文革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马列毛）

同志们好！应“纪念文革网络会议”同志们的邀请，我在这里做一个粗浅、但是坦率的发言。
六十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五十年前的十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叛徒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践踏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领导、策划了“十六反革命政变”和全国范围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抓捕、屠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宣告失败。
一场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最终又遭遇失败的革命，值得我们纪念吗？只要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会得出肯定的认识：值得！

正像马克思评论巴黎公社时说过的，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留下的原则将会永存，将会在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一再显示它的光辉。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就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再革命理论的原则。只要社会主义革命依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解放的需要，这一原则就不会过时，就依然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手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今天，在纪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认识这一点，强调这一点，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

我们知道，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都会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到逐步获得更多的真理。人们、包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尤其是这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留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再革命的理论原则的认识和掌握，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的。

我们不会忘记那可悲的一幕。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毛主席刚刚去世，面对反革命政变，当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竟然纷纷上街欢呼政变，欢呼非法抓捕“四人帮”——包括毛主席的夫人，无知而又狂妄的大学生竟然还拉起“小平你好！”的横幅招摇过市……正是在这样的闹剧中，开始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这真叫毛主席说准了：“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信，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伟大的，是永存的。只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弄懂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特别是能不能真正把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变成我们手中的理论武器，指导我们投入现实的革命实践，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仅1976年表现了我们的愚昧，就是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依然没有克服这种愚昧。我们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了吗？我们坚持造反有理了吗？我们敢于起来向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了吗？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直到今天，我们连起码的民主权利都没有，甚至连言论自由都没有，可是，我们依然忍耐着，忍耐着，顶多在红群里发发牢骚，吹吹牛皮。而且，就在最近，我还得到网友善意的忠告，不要发带“敏感词”的话，不然就会封群。什么“敏感词”？！还不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还不就是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舆论？而这些网友竟然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的现象。这么胆怯，这么听话，连言论自由都不敢去争取，何谈造反，何谈革命，更何谈夺取政权？！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还不能对群众作历史的阶级的科学分析，而依然盲目地高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只能是对滥用主席语录的讽刺！

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文革的时候应该深刻反省的历史教训。

巴黎公社留下的原则是伟大的，但是150多年过去了，不是没有发生再版的巴黎公社吗？十月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还不到100年的时间，不是就发生了“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实际是资本主义复辟吗？而中国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要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十分困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走入低潮。

这是当今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其中肯定寓于着历史必然性。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正视、必须回答这一新的历史课题。现在实际的理论研究水平和成果还不能令人满意，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这里，我只想就我们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谈三点粗浅的体会：

一点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亦然。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一书，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基本理论、基本指导思想来自于列宁的教导，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要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十分困难，因为历史条件带来了各方面的局限。

再一点是，任何伟大的革命原则都是在一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无论是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劳动人民群众；还是为这种历史创造活动提供的客体——客观形势，都为创造这些伟大的革命原则提供了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想再版这些伟大的革命原则，革命主体就要适应客观形势提出新的要求。只要联系今天我们经历的实际状况，就应该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具体说就是，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这是历史提出的新的要求，革命主体必须要能够达到发动这一革命的历史要求。简单点通俗点说，当年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就能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可现在要想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就不能这样提问题，因为历史条件、历史要求，已经向前发展了，用列宁的话说就是：革命的起点高了。因为革命的起点高了，对投入革命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就必然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实际问题、实际困难。
第三点是，尽管我们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特别是还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恩格斯在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水平也没有达到。苏维埃也好，人大也好，形同虚设。不必诡辩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好像制度没有用。我们整天讲，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制度不起任何作用，何必这样说。更实际的历史事实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是一直在有效地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吗？就是我们的香港、台湾不也是这样吗？虽然整天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虚伪的，只有无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在制度上落实下来？！难道这不是比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虚伪吗？而且，都是走向了一党专政、一党专制。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再强调，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就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形象地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当然，毛主席最终还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是，如何正确地实现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解决。实际的结果就是从“领导”转化为“凌驾”。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凌驾于人大之上，凌驾于国家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毛主席多次强调，劳动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但是，这一点没有在政治体制上提供保证。结果就是现在我们遭遇到的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这种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在今天要想落实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原则是相当困难的。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是和现实的历史条件相统一的。只要还能勉强活下去，就不愿意冒着被抓捕、被镇压的风险去落实文化大革命的原则。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也是历史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更高要求。这反映了我们的觉悟离文化大革命的原则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毛主席强调“不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带头“炮打司令部”。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正确路线。如果不敢坚持这个原则、这条路线，不敢按照这个原则、这条路线奋起造反，直至夺取政权，那就只能处于现在这样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可怜可悲的境遇之中。发一万句牢骚，喊一万句豪言壮语，诉一万句对毛主席的怀念，都不如一步实际革命行动！《国际歌》唱的还不就是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自己不起来，谁也代替不了。所以，毛主席告诫我们，不但要唱《国际歌》，还要照着做，并一再强调，只要人民群众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列宁也反复告诫我们，如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能够觉悟起来，那统治阶级就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而且把解决问题的要害讲得很清楚：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革命导师们可谓苦口婆心！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宣传这些革命原则，那些“保救派”先生们就会立即表现得义愤填膺，就会马上给我们戴上“带路党”的帽子。近二十多年来，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例如，就曾有幸在乌有之乡网站被列为“十大带路党”之首。就在最近，还有位以网名发文的先生对我重复这样的攻击：“你既然承认红友遭受残酷打压的事实，又不允许在红群中‘发特色政权允许的议论’，实质就是主张在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去硬拼，你是安的什么心呢？你是要把所有红友驱赶到敌人的屠刀下吗？说反霸是‘干扰斗争大方向’！一听这话，人们有理由认为你拿了美帝的不少好处，否则是发不出这种‘高论’来的！潜台词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就是说要整体反对‘执政党’，整体反对‘当权者’，才是正确的‘大方向’。其实这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是大错而特错的。你们否认党内路线斗争，反对对共产党一分为二，把全体共产党员都作为了打击对象。我真怀疑你就是‘真言’一伙的后台！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你们的四面出击的行为真正地干扰了革命的大方向，这才是客观事实。”

这是多么典型的保救派言论！当然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资本主义复辟已经这样严重、这样残酷的今天，竟然还理直气壮地宣传这种背离马列毛主义——特别是背离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背离文化大革命原则的保救派理论。

这种保救派谬论，是对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社会性质的根本歪曲。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执政党”早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党，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党。只有尊重这个事实，敢于揭露这个事实，才是坚持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才是正确运用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观点，去认识、去分析官僚专制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借口一个所谓的“整体”，实际是为了掩盖现在的“执政党”、现在的“当权派”在搞修正主义，在搞资本主义复辟；用所谓“你们否认党内路线斗争，反对对共产党一分为二”，实际是为了掩盖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新时代”的皇帝、最高的司令部所领导、贯彻的修正主义路线占主导。事实是，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党内根本没有正确路线存在的余地。我们并不否认广大干部、广大党员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但是，一个铁的暂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的事实是：50年来，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实际实行、实际完成的是全面地彻底地复辟资本主义，而且，复辟出了一个最坏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谈论“带路党”，修正主义党才是真正的“带路党”。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到如今，这些修正主义头子都是投降派、“带路党”，对外都实行投降主义，投降帝国主义，首先是特别是投降美帝国主义。声称“和美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声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声称“有一千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搞坏中美关系”，就是这种投降主义的自白。这种对外的投降主义和对内的复辟资本主义是完全统一的。正是这个修正主义党，充当了国外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带路党”，从而给中国特色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带上了经济上的洋奴“特色”，形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私营垄断资产阶级和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阶级“特色”。在修正主义党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保护下，这些阶级以最残酷最野蛮的形式吸吮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

这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中国来了。总书记的导演和自白，等于又是一次历史检验，让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修正主义党才是真正的投降派、“带路党”。

欢迎的排场就不值得说了，不但，“欢迎，欢迎”，还要加上“热烈”两个字，连特朗普都感到荣幸。更重要的是总书记的讲话。作为会谈的开场白，总书记把宗旨说得很明确：“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造福两国的福祉和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这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接着，对于怎么“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怎么“共同书写时代答卷”，总书记毫不隐晦地直言相求：“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益。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最后吹嘘说：“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到了晚上的国宴，又进一步发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我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和美帝国主义“并行不悖”，是实话；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是老话。

请同志们看一看，想一想，这还像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声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和一个正在欺侮、侵略委内瑞拉、伊朗、古巴等弱小国家，在全世界横行霸道、到处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的法西斯头子对话吗？这些屁话，还有一丝一毫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论吗？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坐到一艘大船上去了，而且要共同“领好航，掌好舵”。

形同赫鲁晓夫，超过赫鲁晓夫。这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毛主席50年前批评邓小平的话，一点儿都没有错：“还是白猫黑猫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就才是最典型的投降派、“带路党”。
这倒是适时地从反面送给我们的一份纪念文革的礼物，它证明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516通知”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可惜啊，保救派的先生们，不但对修正主义党这个真正的“带路党”不做揭露、不做批判，反而掩盖这个事实，歪曲这个事实，把“带路党”的帽子扣到真正反对修正主义党的革命派的头上，这种是非颠倒，阶级颠倒，充分暴露了保救派实际是已经站到了修正主义党一边的打手。

可见，分歧是严重的尖锐的根本的。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倒真是具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他们的这种思想认识，这种政治立场，充分反映出保救派、保救思潮的要害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革命原则的彻底否定。既然要保修正主义的党，要救资产阶级的国，何必还恬不知耻地号称“毛派”，这是对毛主席的羞辱。他们不过是打着“毛派”旗号实际在充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皇权专制主义王朝的忠顺奴仆、当代宋江。甘于受招安，要做投降派，为了送上投名状，还要打方腊，二十多年来，他们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正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加上保救派以及其他持错误思潮派别从内部的干扰，导致了虽然资本主义复辟搞了整整50年，但是，直到现在依然让我们感到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还相当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根据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毛主席的反复教导，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正确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纲，坚持以反皇帝、炮打司令部为纲。在这条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基本路线统帅下，根据当前斗争的实际形势、实际需要、实际可能，为了突破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从具体策略上看，还是首先应该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哪怕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从而如列宁所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使无产阶级获得一个投入、展开、进行阶级斗争的舞台，就能作为一个阶级投入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不会像现在这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民主权利，没有掀起任何群众运动的可能。

这是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无法绕过的第一步。而且，就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深入进行、包括最后夺取政权来说，最终还是要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问题。
这就是把争取民主作为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一个重大策略的政治意义、革命意义。只有这样做，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是突出政治，才能够和形形色色的保救思潮、形形色色的工联主义思潮划清界限。
近一、二十年来，尽管这一意见不断遭到反对和攻击，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意见，因为这不是我的意见，这是革命导师的意见——经过历史检验的非常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能不认真思考、不能不争取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遵循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坚信历史是不会因为反动派的阻挡而停止前进的，恰恰相反，历史总是有力量有能力清除反动派，写下更加美好更加壮丽的篇章。人类不就是这样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永不停止地前进的吗？
而且，和这一历史规律相统一，我们清醒地看到，人类的历史总是一代又一代、一代胜过一代地创造出来的。不管野心膨胀、骄横一时的修正主义头子们曾经怎样地的得意于一时，不管江青、春桥同志所代表的无数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们，怎样落入牢狱之灾、直至牺牲生命，但是，我们骄傲地欣慰地看到，在他们的身后，新一代的年轻的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士，已经接过他们手中的革命红旗，勇敢地投入到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战斗中来了！

而且，依据列宁的教导看问题，修正主义统治者复辟出来的这一最反动最落后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中国现在面临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起点，还是比较低的，突破的可能性更大。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是残酷的，是给革命造成了困难，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压迫越大，反抗越烈。所以，他老人家充满信心地认为，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也很可能是短命的。这也是历史的规律，困难和机遇总是相辅相成。我们在看到困难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历史还留给了我们机遇。我在国际共产党人举办的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网络会议上，做了题为《中国，应该是新一轮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突破口——“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领导组织的国际会议发言稿》。就是着重讲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学习、研究体会。我把它附录在这个发言之后。

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是革命的希望主义者。

一切反动派都没有希望。希望永远只属于革命人民。过去是，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今天是，杀了造反派，自有后来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原则不仅永存，而且，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再版的升级的文化大革命原则，必将带来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胜利！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我们不但不悲观，而且有理由在今天依然要振臂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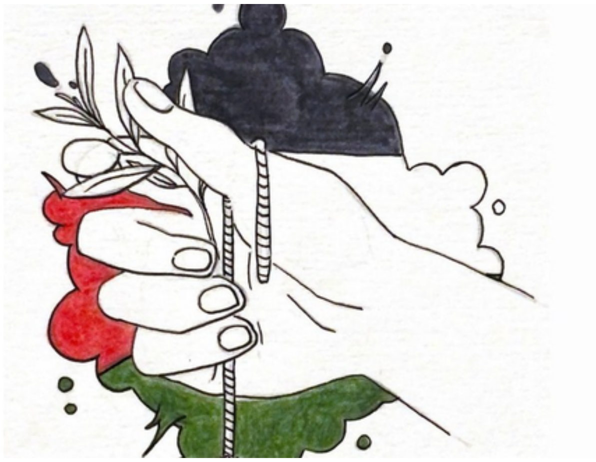
2026年5月16日

来源: 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网站

https://www.icor.info/en/en/2026/yong-cun-de-yuan-ze-shen-ke-de-jiao-xun-yong-yuan-bu-neng-wang-que-de-dui-wen-ge-de-ji-nian

让我们加强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团结！

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



1948年，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及其家人因以色列建国而被驱逐出家园。“灾难”（Nakba）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灾难”，指的就是这场毁灭性的驱逐。每年5月15日，世界各地都会纪念这场灾难，并将其与时事联系起来。今年，这场纪念活动有可能被日益增多的军事冲突，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所掩盖。然而，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巩固其霸权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其代价是牺牲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伊朗战争之后，内塔尼亚胡政权带着建立“大以色列”的计划，如今又将矛头指向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并继续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

让我们利用今年的5月15日，进一步推进我们争取巴勒斯坦自由的斗争，反对以色列、美国及其所有支持者的战争贩子，加强国际革命工人委员会（ICOR）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团结协议，特别是支持加沙地带的“回归”（Al Awda）医疗卫生网络。加沙人民目前尤其缺乏水和卫生条件。世界各地民众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依然强烈。目前已为ICOR团结协议筹集了超过33万欧元的捐款，其中16.9万欧元已指定用于医院建设。120名志愿者已准备就绪！让我们利用5月15日，加强这种支持，并推进ICOR医疗中心的建设。让我们也利用这一天，加强世界各地革命者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

声援巴勒斯坦解放斗争！

立即停止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

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西岸和黎巴嫩的扩张主义！

解放巴勒斯坦！

加强与回归运动的团结协议！

现有签署人，欢迎更多人加入。

刚果革命组织（ORC），刚果民主共和国

摩洛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路线（MMLPL）

爱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PDS），突尼斯

孟加拉国社会主义党（SPB）

中国共产党（马列毛主义）

尼泊尔共产党（马沙尔）

斯里兰卡新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党（NDMLP）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

保加利亚共产党（БК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劳动党（PR-ByH）

马列主义民主党（MLPD）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UPML Union Prolétarienne Marxiste-Léniniste（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联盟），法国

KOL Kommunistische Organization Luxemburg（卢森堡共产主义组织）

RM Rode Morgen（红色黎明），荷兰

UMLP União Marxista-Leninista Portuguesa（葡萄牙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

MLKP Marksist Leninist Komünist Parti Türkiye / Kürdistan（土耳其/库尔德斯坦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

PCP (independiente) Partido Comunista Paraguayo (independiente) （巴拉圭共产党（独立））

PC (ML) Partido Comunista (Marxista Leninista)（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多米尼加共和国

喀麦隆人民联盟（UPC-Manidem）：喀麦隆人民联盟——建立民主国家宣言

尼泊尔革命联合阵线（RUFN）

土耳其共产党（TKP-ML）：土耳其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乌拉圭革命共产党（PCR-U）：乌拉圭革命共产党

北库尔德斯坦布尔什维克党（BP (NK-T)）：北库尔德斯坦布尔什维克党

南非共产党（CPSA (ML)）：南非（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他签署方（非ICOR成员）：

Trotz alledem! 德国

来源: 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

https://www.icor.info/en/2026/lets-strengthen-our-solidarity-with-the-palestinian-struggle-for-liberation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第一部分）

德国
F·恩格斯

一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73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加的注。）］（见载于《人民国家报》第87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一文）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谈家在西班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道以外，我们还掌握有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继续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经日益变得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们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他们怎样摆脱了这种困境，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

“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相反地，他们厌恶这种思想，——而是卖劲帮助一个由冒险家、野心家、钻营之徒组成的并自称为不妥协派（unversöhnliche）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nota bene〔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

但是，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派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战，而不愿参加竞选。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例放弃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分裂为两派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由于国际的名称当时在西班牙工人中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

由于当时在西班牙至少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国际支部的良好的组织，因此毫无疑问，在卡塔卢尼亚工厂区，在瓦伦西亚，在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等地，由国际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选人都会取得光辉的胜利，并且必定能够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在每次表决时左右两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局的少数派。工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感觉到，发挥他们的当时还有雄厚力量的组织的作用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巴枯宁学派的首领先生们长期以来一直宣传无条件放弃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变方针；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条可怜的出路：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不参加选举，但是国际会员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投票。这个政治破产的声明的后果是：工人像在这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投票选举了伪装为最激进的人——不妥协派，从而对自己选出来的人以后所采取的步骤担负了一定的责任，并被卷入他们的行动。

二

同盟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的狡黠的选举政策使他们所处的可笑地位上坚持下去，否则他们至今所保持的对西班牙国际的统治就会完结。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即使仅仅为了装装样子。总罢工便是他们的出路。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9页），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领们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们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高谈阔论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们想像的运动所吓倒；他们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协议的皮－伊－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马上付诸实行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纲领，这些措施不仅会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结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给社会革命以一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的谈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渐渐表现不耐烦，他们中间最急躁的人物在安达鲁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领们如果不愿做不妥协派资产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总罢工。

当时在巴塞罗纳张贴了这样一张布告：

“工人们！政府利用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视反卡洛斯派的战争，我们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们的无比愤怒，”云云。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都多，可是，同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期，巴塞罗纳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这类驯顺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经到来，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们的著名的选举纲领，继而竭力宣传保持安静，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视他们。最软弱的不妥协派终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现了更大的毅力。同盟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们宣布实行总罢工，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们干脆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所（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同盟的报告［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导师语录

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

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载于1974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毛泽东-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